

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一卷

五代十国军事史

目 录

第十一卷 五代十国军事史

绪 论	(1)
第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替及其政治、经济概况	(9)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兴替	(9)
第二节 五代十国的政治	(16)
一、武人执政，战争频繁	(16)
二、枢密使职权的扩大	(19)
三、统治集团内讧迭起	(21)
四、宦官、外戚、伶人干政	(23)
五、藩镇的跋扈与衰落	(25)
六、法制的严重破坏	(27)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经济	(29)
一、北方经济的严重破坏与部分地区的复苏	(29)
二、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31)
三、南北双方的经济交往	(33)
四、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	(35)
第二章 五代十国的军事制度	(39)
第一节 军事领导体制	(39)
第二节 中央禁军的军事制度	(41)
一、中央禁军的建立和发展	(42)
二、中央禁军的编制体制	(43)
三、中央禁军的任务和性质	(45)
第三节 地方军的军事制度	(48)

一、藩镇兵的分布	(48)
二、藩镇兵的编制体制	(51)
三、藩镇兵的军事任务及其削弱	(52)
四、乡兵的建立与发展	(54)
第四节 兵种与兵役制度	(56)
一、兵种	(56)
二、兵役制度	(60)
第五节 后勤保障	(65)
一、兵器生产及管理	(65)
二、军马的来源	(68)
三、军需衣粮的供应	(71)
第六节 军事法规	(74)
第三章 后唐灭后梁及平蜀战争	(78)
第一节 后梁建国后的形势与李克用的扩张发展	(78)
一、后梁建国后的形势	(78)
二、李克用父子的军政改革	(79)
三、梁、晋矛盾的激化及双方的战略	(82)
第二节 梁、晋争夺潞州之战	(83)
一、梁军围攻潞州	(83)
二、晋军大举反击	(85)
第三节 梁、晋争夺河北之战	(86)
一、柏乡之战	(87)
二、幽州之战	(90)
三、魏州之战与梁军袭击晋阳的失败	(93)
第四节 梁、晋争夺黄河沿岸要点之战	(98)
一、杨刘之战	(98)
二、胡柳陂之战	(99)
三、德胜之战	(101)
第五节 同州之战与镇州之战	(102)
一、同州之战	(102)

二、镇州之战.....	(103)
第六节 后唐袭汴灭梁之战.....	(106)
一、李存勖建立后唐.....	(106)
二、后梁的政治腐败与母乙、董乙起义.....	(106)
三、唐军袭取郓州与梁军反击的失败.....	(107)
四、后梁分兵北进的企图与后唐的袭汴决策.....	(110)
五、唐军奇袭大梁及后梁的灭亡.....	(112)
第七节 后唐灭前蜀之战.....	(116)
一、王衍执政后的前蜀.....	(116)
二、后唐灭蜀的战略决策.....	(117)
三、唐军战前准备及进攻部署.....	(118)
四、威武、三泉之战.....	(120)
五、蜀军望风归降.....	(122)
六、唐军入占成都.....	(122)
第四章 后唐时期抗击契丹侵扰的战争.....	(125)
第一节 契丹的强盛及其南犯.....	(125)
一、契丹族的发展与阿保机的建国.....	(125)
二、契丹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概况.....	(126)
三、契丹向南扩张及对后唐的威胁.....	(129)
第二节 晋王时抗击契丹的斗争.....	(130)
一、晋王抗击契丹的方略.....	(130)
二、蔚州、云州之战.....	(130)
三、幽州之战.....	(131)
四、涿州、定州之战.....	(134)
第三节 明宗时抗击契丹的斗争.....	(136)
一、庄宗后期的腐败与明宗的执政.....	(136)
二、耶律德光执政后的契丹情况.....	(139)
三、契丹入占定州与曲阳之战.....	(141)
四、唐河之战与唐军收复定州.....	(142)
第四节 石敬瑭归降契丹与耶律德光灭唐兴晋.....	(144)

一、后唐末期的连续内乱.....	(144)
二、石敬瑭的崛起及其归降契丹.....	(145)
三、唐军围攻石敬瑭与契丹出兵.....	(146)
四、唐军晋安寨之败与契丹册立石敬瑭为晋帝.....	(148)
五、团柏之战与后唐灭亡.....	(151)
第五章 契丹的大举南下与中原军民的抗战.....	(153)
第一节 后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深.....	(153)
一、石敬瑭臣服契丹.....	(153)
二、藩镇叛乱，谋夺政权.....	(154)
第二节 契丹的战略及其战争准备.....	(158)
一、后晋北部边防战备的废弛.....	(158)
二、杨光远暗结契丹.....	(159)
三、契丹的战略目标及其南下准备.....	(160)
第三节 中原军民抗击契丹进犯的斗争.....	(161)
一、打退契丹第一次进犯.....	(161)
二、打退契丹第二次进犯.....	(166)
第四节 后晋北伐失败与契丹南下灭晋.....	(170)
一、后晋统治的严重危机.....	(170)
二、后晋北伐的酝酿及北伐战略.....	(172)
三、晋军北伐失利与契丹入汴灭晋.....	(173)
第五节 契丹的残暴统治与各地的抗暴斗争.....	(178)
一、契丹入犯中原后的残暴统治.....	(178)
二、各地军民的抗暴斗争.....	(180)
三、契丹被迫北归.....	(182)
第六章 后汉的建立及其平叛战争.....	(184)
第一节 刘知远晋阳称帝.....	(184)
一、刘知远的崛起.....	(184)
二、刘知远在晋阳称帝.....	(185)
第二节 刘知远南下入汴作战.....	(186)
一、刘知远南下的战略步骤.....	(186)

二、南下洛、汴以定中原.....	(188)
第三节 讨平杜重威与收降赵匡赞.....	(189)
一、汉军讨平杜重威.....	(189)
二、汉廷收降赵匡赞.....	(190)
第四节 平定关西三叛之战.....	(191)
一、关西三叛的爆发与汉军进讨部署.....	(191)
二、攻克河中.....	(194)
三、夺取长安.....	(196)
四、占领凤翔.....	(197)
第七章 南方诸国的军事斗争.....	(200)
第一节 南方诸国的基本国策.....	(200)
一、大力发展生产.....	(200)
二、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	(201)
第二节 吴对吴越的战争.....	(204)
一、吴与吴越的关系.....	(204)
二、苏州之战.....	(204)
三、湖州之战.....	(206)
四、常州之战.....	(206)
第三节 南汉的残暴统治与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	(208)
一、南汉的建国及其残暴统治.....	(208)
二、张遇贤农民起义的爆发.....	(209)
三、起义军北进与最后失败.....	(210)
第四节 楚平定溪州与荆南谋求扩张领土的战争.....	(211)
一、马氏建楚与高氏据守荆南.....	(211)
二、夔州之战.....	(213)
三、江陵之战.....	(214)
四、楚平溪州之战.....	(216)
第五节 后蜀建立与进兵散关、凤州之战.....	(216)
一、孟知祥、董璋图谋割据两川并联兵抗击后唐.....	(216)
二、孟知祥吞并东川，称帝西蜀.....	(220)

三、进兵散关、凤州之战	(223)
第六节 南唐攻灭闽、楚之战	(223)
一、徐氏代吴建立南唐	(223)
二、南唐军事战略的变化	(224)
三、灭闽之战	(226)
四、灭楚之战	(231)
第八章 后周的建立及其统一战争	(233)
第一节 郭威代汉建周及其初步改革	(233)
一、后汉的统治危机	(233)
二、郭威的清君侧与澶州兵变，灭汉建周	(234)
三、郭威的初步改革	(236)
第二节 后周反击北汉南犯之战	(239)
一、北汉的建立及其南犯准备	(239)
二、后周反击北汉的准备和作战方略	(240)
三、晋州之战	(243)
四、高平之战	(245)
五、围攻太原	(248)
第三节 周世宗谋求统一全国	(251)
一、后周“先南后北、再由北往南”战略的制定	(251)
二、大力推行改革，加强战争准备	(253)
第四节 西征后蜀之战	(259)
一、后蜀统治衰微	(259)
二、后周夺取陇右	(260)
三、战后对蜀措施	(262)
第五节 三征南唐之战	(263)
一、南唐国内情况	(263)
二、周世宗一征南唐	(265)
三、周世宗二征南唐	(272)
四、周世宗三征南唐	(275)
第六节 北攻契丹、北汉之战，赵匡胤代周建宋	(282)

一、后周征服南唐后的北伐准备.....	(282)
二、周世宗亲征，收复燕南失地.....	(283)
三、百井之战及后周的灭亡.....	(285)
第九章 统帅的军事艺术与名将事略.....	(287)
第一节 军事艺术.....	(287)
一、李存勖的用兵谋略.....	(287)
二、郭崇韬的用兵谋略.....	(290)
三、柴荣的用兵谋略.....	(293)
第二节 名将事略.....	(296)
一、“好兵略、涉猎史传”的刘𬩽	(296)
二、“勇而多智”的周德威	(299)
三、“多智算”的李存审	(302)
四、“雄武独夺”的李嗣源	(304)
五、临敌“必以身先”的郭威	(307)
后 记.....	(309)

书末附图：

- 1、梁晋柏乡之战示意图
- 2、梁晋魏州之战示意图
- 3、后唐灭后梁作战示意图
- 4、后唐灭前蜀作战示意图
- 5、汉军讨平关西三镇作战示意图
- 6、后周攻取寿州之战示意图

绪 论

五代十国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的过渡阶段，也是隋、唐以后我国逐步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

在我国北方以开封或洛阳为政治中心的梁、唐、晋、汉、周（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从未出现过大统一的局面。先有梁、晋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后有周、北汉两国的争战。长期比较稳定的长江、珠江流域一带，出现了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汉、前后蜀诸国。此外，还有契丹（辽）、回鹘、吐蕃、大理等兄弟民族政权。南北各国内部仍保存着唐朝后期的藩镇体制，节度使管辖数州，蓄养重兵，俨然以国中之国而自居。五代时期各国政权并存与各国内部藩镇林立，构成了五代十国政治上的显著特点，与当时军事发展变化的关系极为密切。

五代十国时期，我国北方由于连年战争，加以自然灾害频仍，造成土地成片荒芜，人口大批死亡或迁徙，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唐明宗统治期间，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出现过短暂的复苏。后周郭威、柴荣锐意推行改革，将国家直接控制的营田、官庄田无偿地分给广大农民，允许农民开垦荒地，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南方各国由于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超过了北方，南唐、吴越、闽、楚、前后蜀诸国尤为突出。南方经济的复苏、发展，不仅为各国军队提供了大批军需衣粮及器械装备，也为各国之间经济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自秦、汉以来业已形成的全国统一的经济联系，虽遭到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影响，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不断打破某些军阀集团所设置的人为壁垒。荆南高季兴占据的江陵城，已成为南北各国的重要的物资交流中心，既有各国官方的贸易交往，也

有民间商人、百姓的广泛的商业往来。结束各国并存局面，实现全国统一，是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这对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事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地方节度使发展起来的五代十国诸政权，面临着各国相互兼并，以及内部篡夺与藩镇动乱，在军事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由封建皇权直接控制的强大的中央禁军，以巩固其封建统治。各国帝王首先将原来隶属于自己藩镇的兵士，特别是其中的亲军升为中央禁军，同时还召募禁军，或收编藩镇军队，使中央禁军迅速扩大。后梁所创立的侍卫亲军，又为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朝所沿袭。侍卫亲军原先只是中央禁军的一支精锐武装，后来逐渐将其他各种称号的禁军合并进来。后晋设立的侍卫司作为禁军的总司令部，领导全国禁军，标志着禁军的建置已取得重大进展。周世宗整顿禁军，另外设置与侍卫亲军并列的殿前军，两者均直接隶属于后周王朝。五代王朝还逐步自上而下建立了军司——番号军——厢——军——指挥——都——队的军队编制，对禁军的军粮供应、战马来源、军械管理都有具体的规定。对禁军的宿卫、出征、戍边、屯驻、就粮也有明确的部署。这些改革贯彻到五代诸朝的始终，到后周世宗时已基本完成。

五代十国禁军作为国家主要的武装集团，是在同藩镇势力反复激烈斗争中逐步壮大的。中央禁军除驻京师外，还长期屯戍在全国军事要地，直接监视藩镇的动静，随时镇压藩镇的叛乱活动，并将藩镇军队中强壮之士逐步吸收到中央禁军。曾经在唐后期嚣张一时的河北卢龙、成德、魏博三镇，长期以武力反抗中央朝廷，称兵割据。五代初期，卢龙节度使刘守光自恃兵力强大，建国称帝，但旋即被晋王李存勖（勣）歼灭。成德藩帅张文礼、张处瑾父子作乱，同样兵败身亡。魏博节度使在梁、唐、晋、汉四朝先后六次发起叛乱，屡遭镇压，最后被分为四个藩镇，地狭兵少，已毫无作为。中央禁军逐渐强大，藩镇军队日益衰弱，这是五代十国武装力量发展的总趋势。从唐朝安史之乱后长达近 200 年间地方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到后周已基本结束。

五代十国禁军以及藩镇兵长期保存着唐后期骄兵集团的特征，后唐、后晋、前蜀诸国尤为严重。他们藐视军事法令，纪律败坏，不断要求厚赏；作战不力，临阵溃逃，或背军降敌；还动辄以武力威胁朝廷，拥立帝王，或称兵割据。这是造成各国频繁动乱以及政权迅速更迭的重要原因。五代十国针对这些严重影响军队建设的破坏性因素，严肃军事纪律，不断制定军事法规；严格规定军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统属关系，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唐庄宗、唐明宗、周太祖、周世宗制定有关行军作战的具体规定，坚决镇压军队的叛乱活动，惩处作战不力的军将。周世宗在高平之战后处死临阵溃逃的侍卫亲军高级将领 70 余人，还大胆提拔有军功的将士。唐末五代以来将骄兵惰的恶习到后周基本被消除，中央禁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枢密使掌握军机是五代十国军事制度的又一重要特点。唐后期由宦官充任枢密使，直接统领神策军，威逼帝王将相，为害严重。与此不同，五代十国所设置的枢密使，一般不以宦官担任，更未让他们兼任中央禁军高级军将。这时期虽出现过后唐郭崇韬、后汉郭威、后周王峻等枢密使短时期统兵征战的事例，但未形成固定制度。五代十国的宰相、兵部尚书权力有限，而枢密使协助各国帝王处理国家军事机务，有关调动军旅、任免将帅、作战谋略，枢密使都及时向各国帝王们提出建议，供其决策。这已成为五代十国军事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经过五代各国统治者五十多年的努力，到后周时军事制度已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中央朝廷直接掌握的中央禁军，与唐代神策军及北宋禁军前后发展一脉相贯，已发展为直属于中央朝廷的国家常备军，在全国军事力量中占有很大比重，肩负保卫朝廷、抑制藩镇、防御外来势力进扰的重任，成为左右全国政局与实现全国统一的主要武装力量。第二，中央朝廷设置了枢密院和侍卫司、殿前司等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前者掌握军事机密，侍卫司与殿前司的军事长官负责统领军队或指挥作战。这不仅消除了唐后期军事制度所产生的皇权削弱、藩镇称兵割据等种种弊端，

而且为北宋王朝所继承，进一步发展为枢密与三衙（即殿前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的军事领导体制。五代军事制度的发展、变革，在从唐朝军事制度向宋朝军事制度的变革中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五代十国军队所使用的主要兵器，仍然是冷兵器时代的弓、弩、刀、枪等，由各国政府设置作坊制造供应。这与五代以前诸王朝没有多大区别。然而五代战争中使用猛火油或火油（即石油），加强火攻，颇有特色。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大食（今伊朗）都向吴、吴越、后周各国送过猛火油。吴国为对抗后梁，派使者送给契丹猛火油，并传习使用方法。梁、晋争霸，吴与吴越作战，晋军、吴越军曾将石油洒向对方舰船，燃起大火，获得大胜。宋朝京师设有广备攻城作，专门制作攻城器械，其中就有“猛火油作”，很可能是在五代十国使用猛火油作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南唐、荆南等国所造战船较多，水师规模有所扩大。仅荆南高季兴占有沿长江流域三州之地，就造出战船 500 艘，吴越、南唐、楚等国水军更为壮观，在我国水军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长期在我国今河北、北京及山西等地北部的契丹族，自开平元年（907 年）契丹贵族阿保机自称可汗起，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构成对五代各国的严重威胁。然而五代各国沿边沧州、幽州、大同等节度使各辖数州，各藩镇只顾保守自己的地盘，兵力分散，导致国防前线战备废弛，对契丹作战经常被动挨打。幽州之东有渝关（今山海关），山海相连，地势险峻，唐朝后期曾设置 8 个防御军，据险防守，契丹军队始终无法进入关内。可是，晋方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不修边障，遂失渝关之险，契丹进占渝关之内的平州（今河北卢龙），长期派兵把守，成为南下幽、蓟诸州的前进基地。晋高祖石敬瑭拱手送给契丹幽、云等 16 州，契丹军从幽州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后汉朝廷为改变这种状况，派枢密使郭威镇守邺都（今河北大名北），有权统一调动河北地区兵甲钱谷以抗击契丹。但不久郭威挥师南下，灭亡后汉。五代北方国防战备废弛的状况一

直延续到宋朝。

五代十国战争连续不断，几乎从未停止。各国政权的相互兼并，中原地区军民反抗契丹军进犯的战争，时间长，规模大，有时双方共出兵几十万人。统治集团内部的篡权夺位，广大农民对暴政的武装反抗，也时有发生。这些战争造就了刘鄩、李存勖、周德威、李存审、李嗣源、郭威、柴荣等著名的军事统帅。他们善于汲取历代优秀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如后梁名将刘鄩爱好阅读《六韬》，后周太祖郭威拜李琼为师学习《阃外春秋》。后周世宗忙于南征北战，还指示大臣张昭编撰兵书，称为《制旨兵法》。但他们又不照搬古代兵书的作战经验，而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变出奇以取胜”^①。他们创造了梁、唐柏乡之战、后唐奇袭郓州与汴州之战、后唐抗击契丹的幽州之战以及征讨定州王都之战、后汉平定关西三叛之战、周世宗抗击北汉的高平之战与三征南唐之战等著名战例。五代十国存世时间短，没有传下总结作战经验的兵书，但从作战实践看，在作战指导方面仍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善于运用骑兵，屡败强敌。

五代十国十分重视骑兵队伍的建设，各国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有骑兵。晋将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周德威、史建瑭、李嗣昭或出身于北方沙陀族，或长期生活在北部边疆地区，精于骑射，指挥骑兵作战熟练自如。后梁建国后，晋方军事、经济实力及所占的地区都远远不如梁国，但骑兵力又超过之。李存勖等人统兵出战，多以骑兵为主力，不急于决战，不盲目攻城，尽可能选择平原旷野这样适合于骑军作战的有利地形，伺机破敌。他们先派遣小股骑军拦截敌军运粮队伍，扰乱敌人营地，千方百计引诱敌军离开营地。当梁军外出疲累不堪之际，晋方骑兵突然袭击，快速冲杀，迅猛追击，求得大胜。潞州之战、柏乡之战、魏州之战都是晋骑兵屡败强敌的重要战例。

第二，乘敌之隙，远程奔袭，出奇制胜。

^① 《新五代史》卷二一，《敬翔传》，中华书局版（下同）。

梁、晋交战，双方主要军事力量都投入到河北正面战场，鏖战不休。但梁朝首都汴州和晋方首府太原戍兵较少，防务空虚，所以富有谋略的军事统帅们常采取出奇兵远程奔袭的作战方案，企图一举置对方于死地。贞明元年（915年），后梁大将刘鄩一方面领6万大军与晋王李存勖争夺魏州，一方面又暗中率兵马进军太原，途中受阻才返回河北。次年，后梁为配合刘鄩在河北作战，大将王檀领兵3万人突然来到太原城下连续急攻，几乎要攻入城内。这两次偷袭行动由于兵力不足或途中受阻而失利，但仍不失为很有创见的谋略，给晋王李存勖不少启示。后来当梁、晋双方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相互对峙而任何一方都难以取胜时，唐庄宗亲自调查了解后梁内部军事、政治情况，决定在后梁料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利用骑兵快速机动的威力，自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一带渡过黄河，昼夜并进，直指防务薄弱的汴州。唐庄宗大胆地将远程奔袭的目标确定为梁朝国都汴州，迅速灭亡后梁，充分显示出他的胆略和运用远程奔袭、出奇制胜这一谋略的重大意义。

第三，灵活运用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原则。

避强击弱，先打弱敌，这是我国古代军事家十分重视的一条作战原则。周世宗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也沿袭了这条原则，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吸取了王朴提出的《开边策》中“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①的思想，决定从先易后难入手，先打力量较弱的后蜀，再打具有相当实力的南唐，然后再进军河北，收复被契丹占领的河北失地。但周世宗进攻南唐，根据当时的战争情势，又拣强敌先打，也不失为因敌制胜和具有远谋的正确决策。周世宗首先进攻由南唐著名将领刘仁瞻防守的设防坚固的寿州城，曾遭到刘仁瞻的顽强反击，又遇到大雨滂沱，淮河水位暴涨的不利条件，兵马损失很多。后周不少将领要求停止作战，班兵回朝。但周世宗坚持以进攻寿州为击破南唐的突破口，两次南下赴寿州城外指挥作战，迫使刘仁瞻开城门归降，从而取得了在南唐作战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周世宗显德二年，中华书局版（下同）。

的主动权，为夺取南唐江北 14 州奠定了基础。后周取得南唐江北 14 州后，为下一步进军河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四，关于水军交战的新特点。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诸国战争几乎全部在陆地进行，以步骑兵为主力；而南方各国水上作战规模颇大，出现了新的特点。贞明五年（919 年），吴越出动战船 500 艘，与吴国水军在狼山江（今江苏南通市南）交战。吴国水师顺风乘舰而下，吴越船队故意回避，并尾随跟踪。当吴越国水军接近吴国船队后，立即将事先准备的灰、沙，顺风撒向对方舰船上，使吴国兵上视线迷茫，站立不稳。吴越水军然后乘风纵火焚烧吴国船只，吴军大败。我国古代水上作战利用风向的战例屡见不鲜，三国时赤壁之战就是著名的战例。然而吴越国将领将战船尾于敌后，从而及时利用了风向，还结合风势将破坏吴国水师以及加强吴越水师的作战能力巧妙地结合起来，发展了古代水军作战的战术、技术。

战争是交战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也是军事统帅运用智谋的较量。在一定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军事统帅的主观能动作用，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对夺取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五代军事家们有关用兵作战的军事谋略，归根结底，就是善于根据战场上错综复杂的变化情况，机智灵活地用兵，避实击虚，奇正相兼，应变出奇，因敌制胜。这些谋略和指挥艺术以及他们在军事上的其他成就，为丰富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作出了贡献。

《五代十国军事史》主要围绕着这一时期有关军事制度和战争这两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及其与军事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由于史料的局限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本书在军事制度方面偏重于五代诸朝，而十国方面的研究较少，某些国家甚至还是一块空白。关于战争方面的研究，力求探讨每次战争的起因、主要过程，特别是有关指导战争谋略的成败。但从封建社会全过程来考察，深入探讨我国古代战争的发展规律，论证五代十国战争在我国封建社会军事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还颇不够，有待今后继续努力。

第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替及其政治、经济概况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兴替

从开平元年（907年）朱全忠建立后梁，到显德七年（960年）后周王朝灭亡的54年间，为我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在黄河流域相继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从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又分别建立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连同河东地区的北汉，共有十国。除此之外，刘守光在河北北部建燕国，李茂贞在凤翔称岐王，沿边各族所建渤海国、契丹国、大理国等，还未包括在内。当时南北各地许多政权并存，社会很不稳定，处在一个激烈动乱和变革的时期。为便于读者易于了解五代十国的军事史，先将这些国家的兴替情况，作简要的介绍。

后梁 唐末天祐四年（907年），唐朝宣武节度使、梁王朱全忠灭亡唐朝，建立梁国，史称后梁。后梁建都开封（今属河南），称东都，以洛阳（今属河南）为西都。梁太祖开平三年（909年）由开封迁都洛阳，末帝乾化三年（913年）又还都开封。后梁辖78州，占有今黄河以南，淮河、汉水以北及陕西关中等地区。吴越、闽、南汉、楚、荆南诸国名义上都臣属后梁。

梁朝建立前后，朱全忠在河南部分地区比较重视恢复农业生产，减轻租赋，安辑流亡，有利于社会的短暂稳定。但朱全忠称帝之后，多次诛戮功臣大将，又长期与河东李克用、淮南杨渥进行激烈的对抗与战争。国内阶级矛盾相当激烈。统治集团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相互残杀，混乱不堪。

朱全忠当了五年多皇帝，被第三子朱友珪杀死。8个月后，第四子朱友贞又发动兵变，夺取帝位。后梁先后历三主，历时16年，同光元年（923年）被后唐李存勖灭亡。

后唐 沙陀族人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二人是后唐王朝的创建者。李克用在唐朝末年任河东节度使，封晋王，与朱全忠长期争霸中原。李存勖在开平二年（908年）继承王位后，继续与后梁长期征战，同光元年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称帝，建立唐国，史称后唐。同年攻入汴州，灭亡后梁。

后唐建都洛阳，辖地126州，相当于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全部，以及陕西、宁夏、湖北、安徽、江苏等部分地区。同光三年（925年）后唐出兵灭亡前蜀，其领土一度扩展到长江上游。凤翔李茂贞和吴越、闽、楚、荆南，都向后唐称臣。

唐庄宗进入洛阳之后，皇后、宦官、伶人干政，朝政极端腐败。唐明宗继位，改革朝政，整顿禁军，出现了我国北方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后来其子李从荣、李从珂相继发动兵变，争夺帝位，国家逐渐衰落。

后唐经历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四主，共13年，最后被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灭亡。

后晋 沙陀族人石敬瑭，唐明宗女婿，在后唐长期统领禁军，并出任河东节度使，兼任大同、振武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石敬瑭为了推翻后唐朝廷，无耻投降契丹。清泰三年（936年）九月，契丹帝耶律德光在太原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不久攻入洛阳，灭亡后唐。后晋迁都汴州，升汴州为开封府，是为东京，以洛阳为西京，共辖111州。因燕、云等16州已割给契丹，实际统治地域比后唐略有减少。

后晋统治很不稳定，国内藩镇连续发生叛乱。全国各地连年发生水、旱、蝗虫等严重自然灾害，很多人饿死或逃亡。晋出帝袭位后，与契丹关系有所恶化。契丹统治集团大举南下，汴州失陷，晋国灭亡。后晋传二帝，历时11年。

天福十二年（947年）二月，契丹帝耶律德光在汴州改国号为

大辽。契丹骑军到处抢掠屠杀，激起中原地区广大军民奋起反抗，迫使契丹统治者匆匆自汴州北逃。

后汉 沙陀族人刘知远任后晋河东节度使，见后晋灭亡，契丹北还，中原空虚，遂在太原称帝。刘知远接着出兵南下，天福十二年（947年）六月建都汴州，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领有108州，比后晋统治区域又略有减少。

后汉时期，魏州、河中（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长安（今陕西西安）、凤翔（今属陕西）等地相继发生叛乱，征战不息。朝廷内部不和，相互残杀。乾祐三年（950年）十二月，邺都留守、枢密使郭威自魏州南下，进入开封，灭亡后汉。汉主传二世，仅存四年，系五代时期最短命的王朝。

后周 郭威灭后汉建后周。后周是五代的最后一个王朝，仍以开封为首都。先后夺取后蜀秦（今甘肃秦安西北）、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成（今甘肃西和西北）、阶（今甘肃武都东）与南唐淮南14州，共有119州。后周传三世，周太祖郭威称帝3年，世宗柴荣在位5年多，恭帝宗训在位半年，共9年。

郭威、柴荣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大力推行改革，废除许多弊政，增强了国家实力。周世宗南征北战，战无不胜，全国统一事业出现了五代时期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周世宗病故后，幼子宗训即位，后周政权随即被大将赵匡胤篡夺。

吴 吴国的创建者杨行密在唐朝末年转战淮南及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带，景福二年（893年）被唐朝授为淮南节度使，封吴王。杨行密选骁勇壮士5000人组织亲兵，称“黑云都”，衣粮赏赐优厚，出征作战，奋勇争先，成为淮南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为杨行密及其后继者长期割据淮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天祐二年（905年），杨行密死，子杨渥立，但军政大权不久就落入权臣徐温手中。后梁贞明五年（919年），杨隆演（杨行密第二子）正式建国，称吴王，改天祐十六年为武义元年。次年杨隆演卒，杨行密第四子杨溥袭位，于后唐天成二年（吴国乾贞元年，927年）称帝。大丞相徐温这时病故，其养子徐知诰拜太尉兼

侍中，继续专权朝政。

吴国首府为扬州（今属江苏），辖地 28 州，相当于今江西、皖南、江苏大部及鄂东部分地区。吴从杨行密景福元年（892 年）任淮南节度使算起，传渥、隆演、溥共四主，历时 44 年。后晋天福二年（吴国天祚三年，937 年），徐知诰迫杨溥让位，自己称帝，建齐国。

南唐 徐知诰系徐温养子，先后任吴国昇州刺史、润州刺史、淮南节度副使，封为齐王，与养父徐温一起，揽吴国大权。徐知诰在建立大齐国的第二年，冒充唐朝李氏后裔，改称李昇，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南唐处在后晋、楚、荆南、吴越、闽等国包围之中。李昇对南方诸国一般采取友好相处的联合政策；对来自北方的后晋威胁，则保持高度警惕，创造条件，准备北伐。李昇在国内注意选拔人才，改革朝政，发展经济。南唐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为南方诸国之冠。

李昇子李璟在后晋天福八年（南唐昇元七年，943 年）称帝，重用一批佞臣，先后发动对闽、楚两国的战争，国力严重消耗。此后，周世宗三次进军淮南，南唐连连失败，对周称臣。

南唐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盛时有 35 州，包括今江西全部及安徽、湖北、~~江苏、福建等部分地区~~，南唐从徐知诰（即李昇）于公元 937 年建大齐国，到北宋开宝九年（976 年）后主李煜被宋军俘，共传三主，存世 39 年。

吴越 杭州临安（今属浙江）人钱镠在唐朝末年占有浙江东、西二道，任唐朝镇海军节度使与镇东军节度使，进封越王、吴王。后梁又封他为吴越王。后唐同光元年（923 年），钱镠正式建国。

吴越首府在杭州（今属浙江），辖地 13 州，包括今浙江全省及江苏、福建部分地区。吴越地域狭小，长期受吴或南唐的包围。向中原诸王朝称臣纳贡，以牵制吴或南唐。自后梁贞明五年（919 年）起，吴越先后与吴国、南唐长期友好相处。吴越在战争较少的环境中，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钱鏗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卒，其子孙元瓘、佐、倧、俶相继袭位。吴越从钱鏗于景福二年（893年）任镇海军节度使，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灭亡，共86年。

闽 唐末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王潮、王审知兄弟参加当地的反唐武装，随同王绪辗转到达福建。王潮杀死王绪后，景福二年（893年）任福建观察使，次年改威武军节度使。乾宁四年（897年），弟审知继任其职。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同光三年（925年），王审知死，长子延翰继位。次年延翰建国称王。王审知次子王延钧在长兴四年（933年）称帝，国号闽，首府设福州（今属福建）。

闽国领福、建（今福建建瓯）、漳（今属福建）、泉（今属福建）、汀（今福建长汀）五州，地盘很小。王审知对外臣奉中原诸国，与邻国交好，战争很少，社会安定；对内劝课农桑，开辟海港，发展海上贸易，为古代福建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闽国自王审知死后，兄弟纷争，国无宁日。后晋开运二年（闽国天德三年、南唐保大三年，945年），南唐出兵攻占建州，俘闽主王延政。此后，闽国领土被瓜分，南唐占建州、汀州，吴越取福州，闽国军将留从效割据泉、漳二州，名义上仍臣属南唐。留从效死后，陈洪进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以泉、漳二州降于宋朝。

从唐末景福二年（893年）王潮任福建观察使起，闽国先后传审知、延翰、延钧、继鹏、延曦、延政，共53年。

南汉 南汉是刘隐建立的。刘隐在唐朝末年任封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梁国先后封刘隐南平王、南海王。刘隐于乾化元年（911年）卒，弟䶮袭位，贞明三年（917年）称帝，国号大越，次年又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建都广州（今属广东）。

刘隐、刘䶮延揽不少名士，委以重任，因而“为国制度，略有次序”^①。州县官一般以士人担任，不用武夫悍将，减少了动乱，

① 《新五代史》卷六五，《刘隐传》。

有利于岭南地区的稳定。刘隐、刘䶮多次出兵作战，击败岭南各地的割据者，基本上统一了岭南东西二道。

刘䶮及其后继者都是有名的暴君，其残刑酷法，骇人听闻，遭迫害致死者不计其数。刘晟、刘𬬮在位时，宦官专权，更使其统治区成为人间地狱。

南汉经刘隐、䶮、玢、晟、𬬮五代，统治岭南 67 年。北宋开宝四年（971 年），宋军攻入广州，刘𬬮降。

楚 唐朝末年，马殷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应募从军，随后渡淮河南下，由江西转战湖南，被唐朝授为湖南节度使。后梁建国，马殷遣使贡献，且有劝进之功，封楚王。开平四年（910 年），加天策上将军，马殷始开天策府，置左、右相。后唐天成二年（927 年）又封为楚国王，正式建国。

马殷一贯奉事中原诸王朝，借以抗衡吴、南唐、荆南、南汉各国；同时采取睦邻政策，对邻国不轻易挑起争端，起到了保境安民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大力鼓励农民发展蚕桑和茶叶生产，开展对外贸易。楚国势力强盛时有 23 州，首府潭州（今湖南长沙），后称长沙府。

后唐长兴元年（930 年）马殷卒，诸子希声、希范、希广、希萼、希崇争权夺位，内讧频繁。后周广顺元年（南唐保大九年，951 年），南唐军队攻入长沙，将马氏家族全部俘至金陵，楚国灭亡。

广顺二年（952 年），马氏旧将刘言、王逵、周行逢起兵，赶走南唐军队，降附后周。后来，刘言、王逵、周行逢相继称雄，割据湖南。北宋建隆三年（962 年）周行逢卒，子保权继立。次年，周保权归附宋朝。

荆南 开平元年（907 年），后梁以高季兴任荆南节度使。同光三年（925 年），后唐封高季兴南平王，故荆南又称南平。

高季兴仅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之地，首府荆州。荆南既奉事中原王朝，又向南方称帝的闽、南汉、后蜀诸国称臣，以争取更多的赏赐，并发展贸易往来。

荆南处在北方王朝与南方诸国之间，南方诸国将荆南作为屏障，以阻止北方王朝向南推进。北方王朝也把荆南看成南方各国进贡以及开展南北贸易的重要通道。因此，荆南尽管四面受敌，无险可守，但一直安然无恙，长时期得以存在。

高季兴天成三年（928年）卒，先后传从诲、保融、保勖、继冲，共5代。北宋建隆四年（963年），高继冲投降宋，荆南灭亡。

前蜀 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人王建，唐末参加忠武军。后随唐僖宗逃奔成都（今属四川），升为神策军将领。大顺二年（891年），王建攻入成都，任西川节度使，进封蜀王。后梁建国，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

后梁贞明元年（前蜀永平五年，915年），王建又夺取凤翔李茂贞所管辖的秦、成、凤、阶四州。前蜀强盛时有46州，包括今四川大部以及湖北、甘肃、陕西部分地区。

王建称帝后，颇能礼贤下士，招用唐朝衣冠士族。前蜀国的典章文物，保留了唐朝的遗风，各项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唐朝。王建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加紧军队建设，但不穷兵黩武，保持了社会的安定。

王建统治后期，诛杀功臣宿将，宦官势力猖獗，后妃干政，但尚未酿成大祸。后梁贞明四年（前蜀天汉二年，918年），王建子王衍称帝，宦官专权，贪贿风行，朝政腐败。同光三年（前蜀咸康元年，925年），后唐攻入成都，俘王衍北去，前蜀灭亡。

前蜀从唐末大顺二年（891年）王建任西川节度使起，传二世，共35年。

后蜀 同光三年（925年），后唐灭亡前蜀，派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董璋为东川节度使。长兴三年（932年），孟知祥出兵杀死董璋，兼并东川，被后唐封为蜀王。次年称帝于成都，国号蜀，史称后蜀。

孟知祥当皇帝半年死去，儿子孟昶继位。孟昶用人失当，亲信佞臣，朝政日益败坏。因长期偏安一方，后蜀上上下下，奢侈之风盛行。显德二年（955年）三月，后周出兵夺去秦、成、阶、

凤四州，后蜀北部防线崩溃。

乾德三年（965年），北宋军队攻入成都，孟昶降，后蜀灭亡。后蜀经二主，共31年。

北汉 后汉高祖刘知远建国称帝时，以弟刘崇留守太原。刘知远死，其次子承祐继位，为隐帝。刘崇见隐帝年少，大臣专权，便加紧图谋割据。郭威灭后汉建后周，刘崇即称帝于太原，国号汉，史称北汉或东汉，以区别于刘知远的后汉与岭南的南汉。

刘崇和石敬瑭一样，对契丹实行民族投降政策，一再乞求契丹出兵帮助他对后周作战。显德元年（954年），刘崇勾结契丹大军与后周战于高平（今属山西），大败而归，从此一蹶不振。

刘崇死，子承钧继立，向契丹上表称男。以后刘继恩、刘继元相继即位，都与契丹保持密切关系，依靠契丹武力来维持北汉政权。

北汉管辖12州，包括今山西北部和中部地区，境内赋役苛重，民户纷纷逃亡，户口大量减少。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刘继元兵败投降，北汉亡。北汉经四主，共28年。

第二节 五代十国的政治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统治者为适应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由武人执政。同时，协助帝王参谋军政的枢密使的权力不断扩大。唐后期宦官干政、藩镇跋扈、法制破坏等弊政，也有不少延续下来，甚至有所发展。各国政治极端腐败，到后周时期，才开始出现重大的变革。

一、武人执政，战争频繁

五代十国的开国者，原先都是各地区的节度使。他们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打败自己的对手，才登上帝王的宝座。朱全忠、李

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王建、孟知祥、杨行密、钱镠、王审知、刘隐、马殷、高季兴等无一例外。这些人的出身，有游手好闲的流民，有沙陀贵族或沙陀军人，还有家奴、木工、士卒、农民、盐贩、流浪孤儿等。其中不少人目不识丁，是只知骑马射箭、挥刀舞剑的武夫。

五代各国重用前朝或本朝士人敬翔、郭崇韬、桑维翰、王朴、严可求、骆知祥、宋齐丘、梁震、冯涓等为之出谋划策，但深得各国帝王宠信的军队将帅、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等武将在朝廷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士人难有作为。后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公然叫嚣，建立政权，戡定祸乱，只需要长枪大剑，耍弄笔杆的文人没有用！连朝中宰相都要看武将脸色行事，听其摆弄。石敬瑭建立后晋，使桑维翰充当谋主，出任枢密使、宰相。大将杨光远讨平魏博范延光后，回朝面奏桑维翰专权，石敬瑭不得不贬桑维翰为相州节度使。后来契丹军队攻占汴州，军将张彦泽阴谋掠夺家财，又将桑维翰杀死。李崧曾事后唐、后晋两朝，官至宰相兼枢密使。后汉高祖刘知远进入开封，将李崧房屋赐予揽有军权的宰臣苏逢吉，其家人有些不满，李崧害怕受牵累，连忙将房产契卷送与苏逢吉。苏逢吉仍不甘心，竟以谋反罪将李崧处死。朝中宰相如此轻易遭到武夫们的攻讦以至杀害，朝廷内外其他文官的处境就可想而知。

唐朝后期，除河朔地区外，各地节度使、刺史一般任命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五代时期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藩侯郡牧，多以勋授”^①，已成为各国的普遍事实。华温琪早年参加黄巢起义军，失败后到处流浪，事后梁为开道指挥使，以战功调绛、棣、齐、晋四州刺史、定昌军节度使。唐庄宗灭亡后梁，再拜华温琪顺义、镇国军节度使。沙陀人安叔干，不通文字，但立有军功，后唐拜为寿州刺史，以及振武、静难、横海、安国、建雄等军节度使。即使没有战功的王进，因走路飞快，从太原到洛阳往返传递情报仅

① 《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中华书局版（下同）。

用五六天时间，也特别受到后唐、汉、周几朝皇帝的赏识，授任禁军将领以及汝、郑二州防御使、相州节度使。

南方各国也大多是武将专权，杨行密平定淮南后，诸州长吏多用武夫。王建建立前蜀国，其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跟随他从许州（今河南许昌）起兵的军事将领，晋晖、张勣、王宗俦、王宗弼、王宗涤、王宗侃等分别官至中书令、马步军都指挥使、节度使、刺史。马殷统治湖南的核心骨干，都是同他一道由河南进入湖南的旧部同僚，如蔡州人许德勋任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许州人王环任水军指挥使，汝南（今属河南）人姚彥章为长直指挥使，蔡州人范攻克岳州刺史。唯有南汉国的地方刺史，通常不用武将，任命士人充当。但南汉远离中原与江淮各国，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

五代十国的封建军阀们靠掌握军队、发动战争登上政治舞台，也靠掌握军队、发动战争来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当时人说：“江南、山东，各有割据，斗力则人各有力，用兵则人各有兵”^①。五代十国的战争大致有五种不同情况：各国相互兼并或谋求统一全国的战争，各国中央政权与地方藩镇的战争，各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篡夺权力的战争，契丹入侵中原的战争，人民群众的起义战争。各种战争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五十多年间从未停止。这些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大河南北广阔平原地区，其次在江淮以南一带。既有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幽州（今北京市西南）、潞州（今山西长治）、河中、寿州（今安徽寿县）等重要城市的攻坚战，华北平原旷野的遭遇战，也有南方河川地区的水上作战。各国主要依靠步兵、骑兵进行战斗，江淮地区及珠江流域水师交战的规模也相当可观。几万或几十万人同时参战，规模庞大。战争的结果固然造成不少地区人员大量伤亡，社会经济严重破坏，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通过战争，逐步打破了唐末以来各地军阀势均力敌的僵持局面，败者为寇，胜者为王，为全国统一事业

^① 《全唐文》卷八八九，《谏用兵疏》，中华书局影印本。

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二、枢密使职权的扩大

枢密使的设置始于唐代宗永泰年间(765~766年)，多以宦官担任，负责向皇帝进奏表章，又将皇帝意图传递给宰相，起上报下达的作用。后来宦官专权，两枢密使和统领左右神策军的两护军中尉，号称“四贵”，威逼宰相，甚至废立皇帝，权势极大。唐末朱全忠诛杀宦官，以心腹重臣蒋玄晖为枢密使，不久蒋被杀，遂罢枢密使。

后梁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不再任用宦官，以亲信大臣敬翔为崇政院使。后梁崇政院的任务是“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①，与唐朝枢密使的职责相同。敬翔为人深沉稳重，有谋略，深得朱全忠的特别信赖。后梁朝廷的军谋民政，全部由敬翔负责处理。“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②

后唐又改崇政院为枢密院，设枢密使2人，由士人、宦官相互充任。唐庄宗先以佐命功臣郭崇韬、宦官张居翰为枢密使，对掌机务。张居翰深怕招惹是非，不敢过问政事，一切军政事务都由郭崇韬处理。宰相豆卢革、韦说也都听命于郭崇韬，不敢有任何异议。郭崇韬不仅参决军政机要，调动军旅，还亲自统兵讨伐前蜀，开创五代时期枢密使领兵出征的先例。

郭崇韬与唐庄宗先后被杀，唐明宗不再信任宦官，用亲信大臣安重诲任枢密使。《新五代史》卷二四《安重诲传》说：“处机密之任，事无大小，皆以参决，其势倾动天下。”宰相任圜与安重诲有矛盾，忿而辞职，退居磁州(今河北磁县)，安重诲竟伪造圣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梁太祖开平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晋高祖天福四年。

旨，杀死任圜。安重诲与唐明宗养子、河中节度使李从珂不和，又私自发布枢密使文书，指使河中牙内指挥使杨彦温拒绝李从珂进入河中。事情败露后，安重诲不顾唐明宗的反对，派遣军队攻打河中，杀死杨彦温以灭口。枢密使的权势在后唐时期更加膨胀。

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晋高祖见后唐枢密使安重诲专权擅政，侵犯了皇帝的权力，决定废除枢密院，所管政务归中书省办理。四年后，经宰相冯道几次奏请，又恢复枢密院，此后一直延续到后周灭亡。

后汉刘知远建国后，以杨邠、郭威为枢密使。宰相李涛奏请说，现在关西动乱不安，杨、郭二枢密使应当出镇外地，平息动乱，枢密使职务可由宰臣苏逢吉、苏禹珪担任^①。皇太后、汉隐帝对此十分不满，急忙免除李涛的宰相职务。当时，中书省发布诏命，南衙各司奏请政事，全部由杨邠裁决，宰相窦贞固、苏逢吉、苏禹珪拱手听命。领兵作战，出讨关西三镇，由郭威兼任统帅。枢密使职务又明显地分成政事、军务二项，二枢密使各司其职，到后汉已逐渐明朗。

郭威建立后周，仍以邺都起兵的佐命功臣王峻为枢密使，随后还几次派王峻统兵征战；但又以文臣范质、郑仁诲为枢密副使，并深得郭威的信任。俟郭威诛杀王峻之后，周世宗柴荣先后以文臣郑仁诲、魏仁浦、王朴为枢密使，范质为参知枢密院事，逐步解除了枢密使的直接统兵权。后周这些文臣出身的枢密使专掌军机而不统兵的事实，到北宋形成以文官出任枢密使的制度。

为适应五代枢密使权力增大的需要，枢密院机构也不断扩展。后梁曾设置判官或副使1人，开平二年（908年）又置崇政直学士2员，选拔有从政经验、文学才能的人士担任。后来逐渐增多，分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或参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枢密直学士、枢密承旨、枢密副承旨、主事、令史等，成为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庞大官僚机构。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汉高祖乾祐元年。

南方诸国也设有枢密使。前蜀如同后唐一样，兼用宦官、士人为枢密使。前蜀高祖王建先以所宠舞童唐道袭任枢密使，掌管机要。王建养子王宗信看不起唐道袭，直呼其名，遭唐道袭诬告谋反而被杀。后梁贞明四年（前蜀天汉二年，918年），王建病重，认为前蜀老将大臣多是跟随自己从许昌起兵的同僚，幼主王衍难以驾驭，特用亲信宦官宋光嗣为枢密使，专掌国家大事，宰相王锴、唐传素唯命是从。后蜀孟昶认为枢密使权力太大，难以制服，勒令枢密使王处回退休，派王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事无大小，一以委之，府库金帛恣其所取不问”^①，权势更加扩大。南唐枢密使陈觉、枢密副使查文徽、李徵古等同掌机密，朋比为奸，挑起对福建的战争，酿成南唐统治的重大危机。

与李唐王朝相比，五代十国枢密使的权力普遍增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枢密使兼任宰相、藩帅，其他宰相却屈居其下，听其指使；其次，枢密使主管军政大事，参与军事机密与军队调遣，甚至领兵征战。这些情况的出现，与五代十国加强中央集权、军事活动增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统治集团内讧迭起

五代十国统治集团内讧迭起，兄弟诛戮之事，层出不穷，后梁、后唐、楚、闽等国尤为突出。清代人赵翼说：“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②。

梁太祖朱全忠晚年没有确立太子，乾化二年（912年）病重时准备传位于养子朱友文，并以亲生儿子朱友珪为莱州刺史。朱友珪立即潜入左龙虎军，与统军韩勣一起领禁兵闯入宫内，杀死朱全忠，自称皇帝，命弟友贞为开封尹、东都留守，就地杀死朱友

^① 《新五代史》卷六四，《孟知祥传》。

^② 《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一，《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中华书局版。

文。后梁军政大臣不服，人心惶惶。北面都招讨使杨师厚杀死魏博牙将潘晏，擅自进入魏州。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不从朝命，弃梁归晋。元老重臣敬翔称疾不问政事。均王朱友贞又秘密联络驸马都尉赵岩、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北面都招讨使杨师厚，再次发动政变，杀死朱友珪，夺取了政权。自相残杀的宫廷流血冲突，加速了后梁的灭亡。

灭亡后梁的唐庄宗李存勖，到晚年又落得与朱全忠的同样下场。同光四年（926年），洛阳发生兵变，唐庄宗被杀。唐明宗李嗣源也拒绝确立太子，第二子从荣、第三子从厚相继发动兵变，用武力抢夺帝位。天福元年（936年），李嗣源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得到契丹的援助，进军洛阳、开封，建立后晋政权。后唐王朝在一系列内乱中遂告结束。

闽国统治集团内部相争，演出一幕幕骨肉残杀的丑剧。闽王王审知于同光三年（925年）病死，子延翰继位，其弟王延钧与王审知养子、建州刺史王延稟联合起来攻入福州，杀王延翰。王延稟推王延钧为主，自己返回建州。长兴二年（931年），王延稟又进攻福州，兵败被杀。清泰二年（闽国永和元年，935年），王延钧病重，子王继鹏与皇城使李倅引兵进入宫内，杀死王延钧，王继鹏称帝，改名王昶。此后，闽国宫廷内部残杀更加激烈。天福四年（闽国永隆元年，939年），拱宸、控鹤军将朱文进、连重遇发起兵变，杀死王昶，立王审知之子王延羲（后更名为曦）为帝。开运元年（闽国天德二年，944年），朱文进、连重遇又杀死王延羲。朱文进当上了闽主，连重遇统管六军，在福州的王氏家族50余人全被杀死。不久，连重遇又杀朱文进，投降于建州的王延政。南唐李璟见福建大乱，出兵灭亡了闽国。

南方楚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也相当激烈。楚王马殷诸子10余人都觊觎王位。长子马希振看破红尘，弃官当道士。马殷于长兴元年（930年）死后，子希声、希范先后嗣位。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马希范死，国内分成两派，都指挥使张少敌拟立武平节度使马希萼（马希范长弟），而长直都指挥使刘彦瑫等人借口马希

范遗命，拥立马希广为王。马希萼不服，几次上表后汉朝廷，请求赐王爵，并要求与马希广分治湖南，遭到后汉朝廷的拒绝。乾祐三年（南唐保大八年，950年），马希萼称臣于南唐，请求支援，然后攻入长沙，杀马希广而自立为王。后来马希萼又与同母弟马希崇争斗不休，为南唐灭亡楚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代十国的统治集团内讧迭起，加速了各国政权的更迭兴亡。

四、宦官、外戚、伶人干政

唐朝后期，宦官集团既掌握着中央禁军神策军，又控制了枢密院，其权力凌驾于皇帝、宰相之上，危害极大。朱全忠在灭亡唐朝的过程中，大批宦官遭到诛杀。建国以后，又以崇政院取代枢密院，派亲信军将统领禁军，宦官势力深受限制。但梁末帝执政又重用外戚赵岩、张汉鼎、张汉杰一伙人控制禁军，参谋机要。他们仰仗权势，“天下之贿，半入其门”^①，朝政日益腐败。

后唐庄宗进入洛阳后，宦官势力死灰复燃。宫中宦官与伶人相勾结，严重干预朝政。河南县令罗贯为人刚正不阿，拒不接受宦官、伶人的请托，被诬陷致死。郭崇韬挺身而出，坚决为罗贯辩护，引起宦官、伶人的切齿痛恨，最后也被宦官李从袭、向延嗣、马彦珪等人迫害致死。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拒绝宦官、伶人的勒索，早已引起他们的不满。郭崇韬死后，朱友谦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入朝洛阳，要求揭发宦官的罪行。伶人景进恶人先告状，又诬陷朱友谦与郭崇韬一起密谋造反。唐庄宗听信谗言，将郭崇韬、朱友谦等人的全家统统杀害。伶人郭门高（后改名郭从谦）因演戏得到唐庄宗的宠爱，升为禁军将领，后来在洛阳兵变中杀死唐庄宗。

后唐明宗执政，减少宫人、伶人，诛杀宦官，但延至晚年，王

① 《旧五代史》卷一四，《赵岩传》。

淑妃与宣徽使孟汉琼、枢密使冯赟（以上二人皆宦官）等纠集在一起，操纵国家大事，杀死重臣安重诲及秦王李从荣。后唐末帝时期，外戚刘延皓官至枢密使、天雄节度使，依仗姐姐刘皇后的权势，胡作非为，掠人田宅、财货，克扣兵士粮饷，激起魏州兵乱。后晋出帝纳叔母冯氏为后。冯后兄冯玉立即身价抬高十倍，由盐铁判官提升为枢密使、宰相，“军国大务，一决于玉。”^① 凡刺史以上官员的任命，其他宰相都不敢过问，由冯玉一人决定。冯玉收受贿赂，资产巨万。

前蜀高祖王建后妃很多，徐贤妃、淑妃姊妹得宠，专房用事。徐贤妃与宦官唐文扆结成死党，由唐文扆掌管六军，杀死太子王元膺（张贵妃所生）。王建想以信王宗杰为太子，徐贤妃、唐文扆又买通宰相张格，立徐贤妃所生王衍为太子。后梁贞明四年（前蜀天汉二年，918年）王建病危，唐文扆派禁兵把守宫门，打算将追随王建的功臣宿将全部杀害。王建养子王宗弼抢先攻入宫内，将唐文扆贬官眉州（今四川眉山）。徐贤妃毒死王建后，王衍称帝，宦官宋光嗣任枢密使、判六军诸卫事，与宦官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宋承蕴、田鲁侍一伙人朋比为奸，干预政事，骄纵贪暴。宦官王承休想当秦州藩帅，故意提出要到秦州选择美女献给皇上，王衍随即任命王承休为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到秦州后，建造行宫，强取民间女子，引诱王衍去秦州巡游。王衍还未到达秦州，后唐大军已进入西川，前蜀政权迅速灭亡。

南汉刘玢称帝，伙同宦官、伶人一起寻欢作乐，朝政腐败不堪。弟刘晟继位，重用宦官林延遇、宫人卢琼仙，专权内外，大肆屠杀。刘𬬮当政，愚蠢无比，认为朝臣各有家室子孙，不能尽忠于国，只有不能生儿育女的宦官可以信任。刘𬬮重用宦官龚澄枢、陈延寿、林延遇、宫人卢琼仙及女巫樊胡子。朝臣如希望得到重用，要同宦官一样，先阉身然后提拔。宦官与朝官尖锐对立，尚书左丞钟允章几次奏请诛杀宦官，遭宦官许彦真诬告而被杀。宦

① 《新五代史》卷五六，《冯玉传》。

官势力愈益嚣张，直至南汉灭亡。

五、藩镇的跋扈与衰落

五代十国沿袭唐朝的政治、军事体制，在各地设置节度使，如后梁有 21 个，前蜀 10 个，南唐 9 个，其他各国也多少不一。节度使管辖一至几个州，还兼任所在州刺史，掌管本藩镇的军事、行政、经济大权，有权推荐州县官，召辟幕僚。各国都采取措施加强中央权力，削弱节度使的职权，而一些强藩巨镇则拚命反抗，窃地割据。各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与藩镇分散权力的矛盾斗争贯彻到五代十国的始终。北方五代王朝藩镇势力大，动乱多；而南方九国藩镇势力小，动乱少。但五代十国藩镇由跋扈逐步走向衰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五代藩镇的跋扈与衰落，河北地区的魏博节度使很有典型意义。魏博镇地处河北大平原南部，滨临黄河，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唐中叶以后长期蓄养重兵数万，多次击退李唐王朝的进讨，割据一方。后梁建国前后，魏博节度使罗绍威、罗周翰被迫归附，后梁长期在这里屯驻重兵，将魏博牙兵诛杀殆尽，魏博镇局势一度比较平静。后来梁国北面招讨使杨师厚闯入魏州，赶走节度使罗周翰，自称藩帅，召募牙兵数千人，重新恢复唐朝魏博镇占地割据的状态。贞明元年（915 年），后梁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卒，梁末帝为削弱魏博藩镇势力，将该镇分割为二，设天雄、昭德二节度使，立即遭到魏博兵士的强烈反对，发动兵变，胁迫新上任的天雄节度使贺德伦投降河东。晋王李存勖抓紧时机，进入魏州，杀死魏博军将张彦等八人，平息了动乱。魏博后来隶属于后唐。

同光四年（926 年），魏博指挥使杨仁最领兵戍守瓦桥（今河北雄县），期满返回。后唐政府认为魏州防务空虚，害怕闹事，要求戍军暂留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魏博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遂拥兵占领魏州。后唐朝廷派大将李嗣源出征，李嗣源又从魏州南下，夺取帝位。

天成二年（927年），魏博军将龙晊率奉节军九指挥3500人远戍芦台军（今河北青县），不给器仗铠甲，魏博兵将严重不满。后唐北面招讨使房知温将戍兵及其家属数万人全部杀害。“魏之骄兵，于是而尽”^①，当地割据势力又遭到严厉的打击。

清泰三年（936年），后唐屯驻魏州禁军将领张令昭作乱，赶走魏博节度使刘延皓。后唐末帝命大将范延光讨乱，张令昭连同7个指挥使的禁兵被屠杀。魏博6州又归于范延光。

此后，魏博节度使范延光、杜重威在后晋、后汉朝时期相继拥兵作乱，兵败后屈膝投降。后周朝经过各方面的改革，国家实力大增，魏博及其他藩镇都不敢再称兵作乱，与中央朝廷的联系比较密切。

五代时期，魏博镇先后发生过六次军事动乱，地方割据势力一度嚣张至极，但结果都失败了。魏博骄兵连同他们的家属多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魏博节度使几乎全部由五代各王朝任命，而且大多由河朔地区以外的人士担任，任职时间比较短暂^②。他们来去匆匆，将不专兵，与当地地主豪强、藩镇军队很难形成利害相关的紧密联系。他们主要依靠朝廷的提拔来达到升官晋爵的目的。到后晋时期，魏博已分割为邺都、彰德、永清、镇宁四个藩镇，管辖地盘大大缩小。唐后期魏博镇长期父死子袭、兄终弟及的恶习得以改变，延续将近200年的魏博镇已走向衰落。全国其他地区的藩镇也大致相同。如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后汉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凤翔节度使王景崇、永兴节度使赵思绾等割据称雄，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藩镇内部，军事动乱也屡见不鲜。后梁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杀节度使李彝昌，后唐灵武都指挥使许审环谋乱，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攻打牙城，后晋延州兵士逐节度使周密。因他们势孤力

① 《新五代史》卷四六，《房知温传》。

② 据统计，五代时期魏博节度使28人，其中属于河北籍贯的仅8人，由朝廷任命的23人，绝大多数人任职期间在1~3年之内。

薄，又没有外面支援，都很快被平息下去。或一时取胜后，又臣服于中央政权。

南方诸国中，湖南刘言、王逵、周行逢、福建留从效等纷纷自立，吴国田𫖳、安仁义之乱，也都属于藩镇跋扈的行为。

五代诸朝，从后梁起就不断扩大中央禁军，削减地方军队，派禁军屯驻全国一些军事重镇，分割藩镇地盘，不断调动藩帅，限制各藩镇举荐州、县官人数。这些措施对迫使藩镇势力衰落也有重要的作用。

六、法制的严重破坏

五代各朝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修订了一些法律。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太常卿李燕等人在唐朝法律的基础上重新编订103卷《大梁新定格式律令》。这部法律“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①，比唐律更加严酷。后唐庄宗自称继承唐朝正统，命刑部尚书卢质纂集《同光刑律统类》13卷。后唐明宗一方面使用唐朝的《开成格》，一方面新修了几部法律。后周重视以法治国，认为以前诸朝法律条文很多，内容相互抵牾，量刑轻重不当，决定“申画一之规”^②，编辑《大周续编敕》两卷，《大周刑统》21卷。南方的《吴令》、《昇元格》属于吴与南唐国的法律。封建法律是地主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主要用来压制广大农民，但有的封建政府颇能按封建法律办事，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行为，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后周整顿司法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现存《宋刑统》30卷就是以《大周刑统》为基础而稍加改易的。当然，五代时期武夫当权，严重破坏法律的事件则比比皆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封建统治者不顾任

① 《旧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

② 《五代会要》卷九，《定格令》，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何法律规定，滥施淫威，杀人如麻；二是采用骇人听闻的种种酷刑。

后梁时，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自称大燕皇帝。在此之前，刘守光囚父杀兄，领兵攻打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一年多。戍守沧州的军队吃完城内粮食，将抓来的百姓杀死后连同麦粉、酒母合煮，以供军食。当时称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为“宰杀务”。后汉军将赵思绾反于长安，城中食尽，杀人而食。赵思绾爱吃人胆，胡说吃人胆千个，将无敌于天下。

天成元年（926年），魏博军将赵在礼发动兵变，以皇甫晖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皇甫晖带着一队骑兵，在城内大肆抢劫并随意乱杀无辜。他问一位百姓姓什么？回答说姓国。皇甫晖以为自己必将灭亡后唐国，这位百姓全家人立即遇害。再问一位百姓的姓氏，回答说姓万，皇甫晖说我杀一万户足够了，这位百姓的全家人同样被杀。

后晋彰义节度使（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张彦泽指使掌书记张式代作表章，奏请晋高祖批准他杀死自己儿子。张式不肯，再三谏阻，张彦泽大怒，用弓射杀。张式逃至邠州（今陕西彬县），静难节度使李周报告朝廷，晋高祖命流放张式于商州（今陕西商县）。张彦泽更不罢休，一定要捉回张式归案。后晋朝廷有些害怕，被迫将张式送回泾州，张彦泽先将张式剖心、决口、断手足，后杀死。

后汉的严刑酷法在五代十国中最为严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警卫京师汴州，“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①有位百姓抬头观看太白星，被坊正拘捕，立即腰斩。凡百姓犯罪，史弘肇不经任何审讯，出示3个手指，即刻斩首。宰相苏逢吉在太原奉命清理监狱，将狱中囚犯全部杀死。后汉各地恣虐杀戮也很严重。卫州刺史叶仁鲁裹胁十几位村民参加镇压起义军，没有遇到义军，却诬蔑十几位村民是盗贼，将他们“断其

^①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史弘肇传》。

脚筋，暴之山麓，宛转号呼，累日而死。闻者不胜其冤，而（苏）逢吉以仁鲁为能，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①。

关于五代十国所用酷刑，名目繁多，难以计数。幽州节度使刘守光将囚犯装入铁笼，四面放火，用铁刷刮剔人的面部。后晋“或以长钉贯穿人手足，或以短刀脔割人肌肤”^②。后汉有断舌、决口、割筋、断脚等刑罚。长兴四年（933年），闽国国计使薛文杰“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铜斗火熨之”^③。吴国武昌节度使张宣专置地窖关押犯人，不论犯罪大小，进入地窖者全部被折磨致死。

这些事例很多，不必一一列举。它表明各军阀当权，不顾封建法制的任何约束，疯狂屠杀人民大众，罪行累累。

第三节 五代十国的经济

五代十国，南北方社会经济状况很不平衡。北方因战争频繁，社会经济破坏严重，而南方的发展则特别明显。南北方的经济交往因不断突破南北分裂的人为障碍而继续进行。

一、北方经济的严重破坏与部分地区的复苏

自唐朝末年到五代，我国北方正处在藩镇割据、五代王朝迅速更迭的混乱时期，先后经历藩镇混战、梁晋争霸中原、契丹大举南侵的各种战争。唐末蔡州节度使秦宗权一度称雄河南，不断派遣军队攻打江淮、襄阳（今属湖北）、洛阳、汴州等地，“贼首皆剽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人烟断绝，荆榛蔽

① 《新五代史》卷三〇，《苏逢吉传》。

② 《旧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唐明宗长兴四年。

野”^①。朱全忠歼灭秦宗权部后与徐州节度使时溥打仗六七年，徐（今属江苏）、泗（今江苏盱眙北）、濠（今安徽凤阳东北）三州又连年发生水灾，广大群众大量逃亡。朱全忠与朱瑄、朱瑾兄弟争夺郓（今山东东平西北）、兗（今属山东）州一带，每年春秋二季，梁军到郓、兗境内抢掠，当地生产无法进行，大片土地荒芜而无人耕种。乾宁二年（895年），朱全忠与朱瑄在巨野（今属山东）南面作战，朱瑄军队遭屠杀，三千余人被俘。天复三年（903年），青州节度使王师范起兵反抗，朱全忠命朱友宁攻打博昌县（今山东博兴），征发百姓十余万人运输木石，驱赶牛驴，在博昌城南筑土山，连人、畜、木石都集于一起，肆意虐待被征百姓，几十里外就听到哭叫之声。

后梁建国前后，朱全忠与河东李克用、李存勖发生了近40年的战争。河北地区是梁、晋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先后在柏乡（今属河北）、魏州（今河北大名北）以及黄河沿线等地发生大战，每次出军几万或几十万人，还征集大量的地方乡兵和民伕参战。乾化元年（911年），梁、晋柏乡之战，梁方大败，自野河至柏乡，尸骸遍野，丢弃的粮食、资财、器械无法计算。梁将杜廷隐自深（今河北深县西）、冀（今河北冀县）二州逃走时，驱逐二州丁壮为奴婢，老弱民众被杀。后梁为阻拦李存勖军队，挖开黄河大堤，导致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到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120里地区沦为泽国。

后唐灭亡后梁，我国北方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大规模战争有所减少。但北方契丹族自唐末逐渐强大起来，阿保机在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契丹国后，严重威胁中原地区的安全。契丹军队多次自河北南下，进攻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契丹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劫，俘虏丁壮，村邑多空。相州（今河南安阳）城内百姓被契丹军屠杀，仅七百余人得以生存。

除上述一些大战外，小的战斗更不计其数。战争的破坏使黄

① 《旧唐书》卷二〇〇下，《秦宗权传》，中华书局版。

河中下游一带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饿死或迁徙他处，不少青壮年被迫服兵役。昔日经济富庶、人口众多的大河南北，呈现出人烟稀少、残破荒凉的悲惨景象。

但是，后梁朱全忠、后唐李嗣源、后周郭威、柴荣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帝王，面对北方经济严重破坏的局面，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又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使农业生产在部分地区得到复苏和发展，以稳定社会秩序，征收赋税，为大批军队提供衣粮、军需器仗。

据《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载，朱全忠在唐末任宣武节度使，“外严烽候，内辟汙菜，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这无疑是他的能战胜群雄、建立梁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洛阳是全国有名的大城市，经历唐末孙儒、诸葛爽交战的破坏，全城还不到100户人家。河南尹张全义上任后，向所属18县每县派出1人，命为屯将，负责招抚农户，恢复生产。对于归附的农户，除杀人者死，其余犯法者只处以枷刑，不用重刑，不征租税，流民归附日趋增多。张全义对于努力生产获得蚕麦丰收的农户，给予物质奖励；生产不好的农户受到指责；农民耕种缺乏耕牛、劳力，则动员乡里百姓予以帮助。经过几年的努力，洛阳各县人户猛增，大县有六七千户，次县四千户，小县也有两三千户，重新恢复了洛阳一带繁荣富庶的景象，对朱梁朝廷的人力、物力给予很大的支持。

后周郭威、柴荣在位时，大胆地推行改革，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工程等，为全国统一事业提供了经济条件。

总之，五代北方地区因屡遭战祸，社会经济破坏相当严重，但有些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和发展。

二、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唐朝安史之乱前后，我国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往南转移，长

江以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赶上并迅速超过北方。这种趋势到五代时期就更为明显。

比较起来，五代北方战争多，动乱不止，而南方诸国战争少，规模小，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吴、南唐、吴越、闽、楚、蜀各地劳动力增加很多。南方诸国地盘不大，力量有限，无力向外扩张，一般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气候炎热，土地肥沃，河渠湖泊纵横，水利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粮、茶、桑、麻各项农作物生产的有利条件。其中吴、南唐、吴越的发展特别突出。

吴国奠基者杨行密占领江淮地区，为医治战争的创伤，实行保境息民，招抚流亡，减轻租税等政策，使江淮地区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其后李昪专权，接受宋齐丘建议，改革两税征收办法。在此之前，农民必须以现钱纳税，被迫贱卖谷帛而换取现钱，深受地主富商的剥削。改革以后，农民直接缴纳粮食、绢帛，减少了中间盘剥。这不仅增多了国家赋税收入，还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江淮地区农桑生产的发展。南唐建国后，继续减轻赋役，奖励开垦荒田，种植粮桑，使南唐成为南方诸国最富强的国家。

吴越国王钱镠一方面多次召募百姓开垦荒田，一方面大办水利事业。他征调大批劳动力，兴修钱塘江捍海石塘，以巨石置于长数十丈的竹笼中，利用大木、铁幢、铁组固定在江边。这是五代时期最有名的水利工程。它保护江边大片农田不受海潮的侵蚀，又能蓄水灌溉农田，对于杭州城市的繁荣与附近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资治通鉴》二六七卷载，“钱塘富庶，盛于东南”。钱镠的继承人钱元瓘、钱佐、钱俶等也多次减免租税，或下令允许百姓耕垦荒田，发展生产。

前、后蜀占有四川地区及汉中平原，具有进行农业生产的优越的地理条件。王建称帝次年就发布诏书，免除境内百姓原先拖欠的赋税，当年应征夏税每贯减二百文，国家太仓及诸州县收取粮食，不得分外加耗一分一合，倘有违犯，允许百姓申诉，一经

查实，不论官职高低，严加处分。王建还借鉴刘备、诸葛亮治理蜀国的经验，指示各州县安抚百姓，劝课农桑。由于这些措施的贯彻，前蜀农桑业得到较快发展，国家仓库装满了粮食。后蜀孟昶在位时，米斗三钱，比唐太宗贞观年间米斗三四钱还便宜，也反映出四川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闽、楚两国后期虽发生内讧和战争，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但前期王审知、马殷当政时，福建、湖南地区经济、文化事业都得到长足的进步。福建地区经历晚唐与闽国时期，人口和县镇设置都显著增多；水利兴修受到重视，海运和外贸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湖南，而湖南蚕桑、茶叶生产的发展也比较明显。

五代时期南方各国人口增多，粮、桑、茶、麻等各项农作物发展较快，纺织、造船、陶瓷等手工业生产也有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广度都超过了北方。这是南方各国能与北方抗衡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三、南北双方的经济交往

五代十国，南北方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经济联系受到严重影响。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南北双方之间互通有无的经济交往并没有全部中断，仍继续进行。全国大致上形成了三个区域，一是关中与前、后蜀的物资交流；二是五代诸朝通过江陵（今属湖北）、潭州同楚、南汉、闽、吴越诸国的贸易；三是吴、南唐同后唐、后周的经济交流。自唐末起贯穿我国南北的大运河出现淤塞，而且沿线战乱频繁，漕运不通，以江陵为中心的南北经济联系比以往更为重要了。

前、后蜀东北部边境与五代诸国关中地区凤翔节度使所属州县犬牙相接。自唐末延至后梁、后唐，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长期被封为王，名义上称臣于中原朝廷，但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王建取得东西川之后，打算出兵攻占凤翔。大臣冯涓谏阻说：兴师

用兵，损国害人，不如与李茂贞和亲，给以麻布、茗草，双方结成姻好之盟^①。李茂贞大喜，运去青盐、紫草，换回前蜀的白布、黄茶。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唐庄宗派使臣李严到西川购买奇珍异货，前蜀规定绵绮珍贵品不得出口，一些粗糙的丝织品被允许进入中原，双方贸易受到人为的限制。后汉时，割据凤翔的王景崇致书后蜀凤州刺史徐彦，请求允许互市贸易，得到了后蜀的同意。五代诸国关中地区与蜀地之间的边境贸易可能一直在进行。

南方荆南、楚、南汉、闽、吴越诸国，五代时期多臣服于中原朝廷，称臣纳贡。这些国家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主要沿着广州、潭州、江陵的路线。荆南高季兴鼓励南北商旅通过江陵，收取赋税，甚至掠夺商旅财货以饱私囊。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荆南高从诲要求得到郢州（今湖北京山），后汉朝廷不允许，双方一时断绝交往，北方商旅不再来江陵。不到一年，高从诲向后汉上表谢罪，很快得到后汉的慰抚，暂时中止的南北贸易又重新恢复。楚国不直接向商人征税，四方商旅云集潭州，运来大批货物，满载茶叶而归。楚国还在汴、襄、唐（今河南泌阳）、郢、复（今湖北沔阳西南）设置邸务，运茶叶到河南、河北销售，换回缯纩、战马。后汉朝廷派三司军将路昌祚到湖南，一次购买茶叶1.8万斤。楚国每年向中原朝廷贡茶25万斤。在茶叶贸易中，楚国获利不少。

吴越国与五代诸国的交往，因吴、南唐的阻隔而绕道虔州（今江西赣州）、潭州北上。钱镠不断派出使者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同时开展货物贸易。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年）嘉奖吴越王钱镠，授予诸道兵马元帅。“朝议多言镠之入贡，利于市易，不宜过以名器假之”^②，说明了钱镠进纳贡物的事情真相。贞明四年（918年），吴国攻占虔州，控制了江西全境，吴越改由海道经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抵达汴州。吴越国在这条航线的沿

① 《鉴诫录》卷四，《得夫（失）地》，湖北崇文书局版。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二年。

海诸州设置博易务以发展南北之间的贸易。

吴、南唐与五代诸朝隔淮河相望，发展贸易十分便利。杨行密占领淮南后，派牙将唐令回运茶万余斤到汴州、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推销，朱全忠命令逮捕唐令回，没收全部茶叶。后来梁、吴两国对立，双方经济交往深受影响。后唐与吴国的关系比较融洽，吴国多次遣使纳贡，送上大量物品。后唐同光元年（吴国顺义三年，923年），吴国一次送给后唐金器200两，银器3000两，罗锦1200匹，龙脑香5斤。礼尚往来，后唐也回送很多礼物。后汉乾祐元年（南唐保大六年，948年），南唐李璟致书汉隐帝说，由于河中李守贞求援，南唐派兵响应，两国沿淮河边境贸易业已中断。现两国已撤除边境防备，有关商旅往来请按照旧例允许通行^①，可见后汉、南唐淮河边境之间早有贸易交往。后周建立，与南唐贸易有所发展，淮南饥荒，不少百姓赴淮北购买粮食。南唐还收买后周地区的羊、马。淮南茶叶也运往北方。

南唐与契丹的海上贸易比较活跃。天福元年（吴国天祚二年，936年），契丹使者27人来到金陵，献马300匹、羊2.5万头。次年，契丹东丹王又向南唐贡献羊、马，还运来羊3万头、马200匹在金陵出售，并购买江南罗纨、茶、药运回契丹。

五代时期虽南北分裂，各自为政，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往，互通有无，从未全部停止。这是各国封建统治者很难阻拦的。结束五代时期的南北分裂，削平各地封建割据，已成为五代十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广大群众的普遍愿望。

四、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

五代十国经济的复苏、发展，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① 《旧五代史》卷一〇一，《汉隐帝纪》。

唐王朝在均田制与租庸调赋役制度破坏之后，实行按财产多少征收的两税法，取消了地主、官僚占田限额和土地买卖的限制，农民大部分土地逐渐被地主阶级所占有。土地高度集中与贫富严重不均，造成唐末社会的严重危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但唐朝末年及五代时期的频繁战争，不仅使广大农民生灵涂炭，颠沛流离，官僚、地主们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因而在全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北方中原地区出现大量荒芜土地，从而为五代十国调整土地关系提供了物质条件。

五代十国统治者为缓和社会矛盾，增加国家赋税收入，不断鼓励无地、少地的农民开垦荒芜土地，发展生产。前面所述后梁河南尹张全义利用洛阳周围的大量荒地，数年间招抚流民几万户进行开垦就是典型的事例。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左谏议大夫崔胤上书说，自张全义在洛阳地区“配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①，这证实后梁、后唐政府公开承认这些开垦者已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是隶属于封建政府的自耕农民。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二月，晋高祖诏书说，邓（今河南邓县）、唐、随（今湖北随县市）、郢诸州，没有耕种的闲地，允许人户耕种，免除五年赋税。后周世宗大力推行改革，广泛鼓励农民回乡生产，允许他们耕种逃户庄田；倘逃户在五年内归来者，只收他们原来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或一半，逾期不归，则全部归当地耕种的农户所有。

南方诸国政府对调整土地关系与恢复农业生产也非常重视。南唐昇元三年（939年）诏书说：近来干戈骚扰，土地荒芜，衣粮缺乏，“民有向风来归者，授之土田，仍给复三岁”^②。还规定每个壮丁垦田80亩，赐钱2万，5年之内不收租税。吴越国垦荒事业发展更快，境内几乎没有闲弃的土地。前蜀武宁节度使晋晖铲除蠹弊，招回逃亡人户，重新把他们与土地结合在一起，为发展农

① 《册府元龟》卷四七五，《台省部·奏议六》，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陆游《南唐书》卷一，《烈祖本纪》，绿签山房版。

业生产作出了成绩。

后周政府还将国家直接掌握的营田、官庄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广顺二年（952年）正月敕，除京兆府庄宅务等部分国家庄田外，其余全部割属州县，所有庄田、桑土、房屋便归原佃户充作永业。这年九月又明文规定，京兆府耀州（今陕西耀县）、三白渠使所管庄田，应有桑土、房屋、园林、车牛都全部赐予佃户充作永业。广顺三年（953年），后周又将营田务所管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全部给予农民为永业。我们已无从知道五代十国自耕农民的户数，但经过各国对土地占有政策的调整，有些地区自耕农民比唐朝末年有所增加^①。

土地兼并在我国封建社会各王朝反复出现，五代十国也不例外。随着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建立，一批批新贵登上政治舞台，仰仗权势，大肆括占土地。有些官僚来自唐朝，所占田产世代相传。地主豪强、寺庙僧侣也兼并不少土地。这方面的实例很多：

梁太祖女婿赵岩曾帮助梁末帝夺取帝位，“占天下良田大宅，袁刻商旅，其门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②

后晋延州节度使刘景岩听信幕僚熊皦的劝告，在邠、泾二州购买田产，获利很多。后遭高允权诬陷被杀，这些田产又归延州节度使高允权所占有。

宋彦筠历仕后唐、晋、汉、周四朝，官至刺史、节度使，“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国。将终，以伊（伊水源出河南栾川县伏牛山北，往东北流，经偃师县注入洛河）、洛（洛水源出陕西洛南县西北，东北流，途经洛阳、汜水注入黄河）之间田庄十数区上进”^③。

岐王李茂贞在凤翔有田千顷、竹千亩，传其子李从暭。

前蜀王宗翰为彭州刺史，部民史氏有胡让庄，土地肥沃。王

① 参阅郑学檬《五代十国的若干土地政策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72页。

② 《新五代史》卷四二，《赵犨传》。

③ 《旧五代史》卷一二三，《宋彦筠传》。

宗翰杀死史氏，尽夺其地。后蜀将相大臣骄蹇蛮横，不遵法令，“务广第宅，夺人良田，发其坟墓”^①。北宋灭亡后蜀，征购后蜀大臣毋守素、李廷珪、王昭远、韩保贞等人的庄产、茶园，各赐钱300万。可见这些人都占有不少土地。

五代十国寺院的土地来源于封建政权的赏赐或达官贵人的施舍，也有的是僧侣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后蜀灭亡时，藩帅田钦全将成都土地万亩捐给正法寺，其中有不少良田。后周打击佛教时，共查出境内有寺院三万余所，其占有土地数额会相当可观。

五代各国将国家庄田、营田以及人户逃走所留下的土地，一般都给农民耕种，国家征收租税。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大部分出租给佃户（庄客）耕种，收取租谷。如前面举出的刘景岩在延州做官，远在邠、泾二州购买良田，自然是出租与人。后唐宰相豆卢革自称在鄜州（今陕西富县）有二三处田产，百姓租佃多年。周行逢在后周时期占据潭州，他的夫人严氏回到武陵（今湖南常德），将田地租给佃户耕种，每年亲自督促佃户送租入城。这种建立在以租佃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人身依附关系比前代有所削弱，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总之，五代十国土地关系的变化，一是不少农民耕垦荒芜土地，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佃农有所增加；一是封建地主将土地租佃给农民耕种。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起了促进的作用。

① 《新五代史》卷六四，《孟昶传》。

第二章 五代十国的军事制度

第一节 军事领导体制

唐朝末年，唐朝廷领导全国军队的军事体制已破坏无遗。唐僖宗、昭宗先后召募部分神策军或中央六军，但很快被藩镇所吞噬。盘踞在全国各地的新老军阀称兵黩武，各自为政。五代十国帝王们建国之后面临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军事权力逐渐集中于封建朝廷，建立高度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其具体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枢密使掌管军事机密。五代十国普遍设置有枢密院，其长官为枢密使（后梁称崇政院和崇政使）。枢密使的重要职责是协助帝王处理全国军事机务，凡调动军队、任免将帅、作战谋略，枢密使都随时向帝王提出建议，供帝王决策，并由枢密使监督执行。后梁敬翔、后唐郭崇韬、安重诲、后晋桑维翰、后汉郭威、杨邠、前蜀唐道袭、南唐陈觉、查文徽都曾是权势显赫的枢密使。后梁军国大政，梁太祖多与崇政使敬翔商议，宰相听命行事而已。梁、唐争霸中原，枢密使郭崇韬向唐庄宗提出在博州东面马家口另筑城垒以开辟新的战场，以及奔袭汴州的重大建议。长兴三年（932年），北面契丹军进犯，后唐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属山西）一带戍兵较多，因未设置军事统帅，枢密使范延光奏报：“已议石敬瑭与康义诚北行，然其定夺，即在宸旨。”^① 唐明宗听从枢密使范延光的建议，派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统一指挥后唐屯戍河东地区的军队。

^① 《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

五代十国各朝虽设置有宰相和兵部尚书，但他们实权有限，多听从枢密使的摆布，各国帝王通过枢密使掌握军事机密以控制全国的兵权。

二、由禁军将领、节镇藩帅分别统领中央禁军、藩镇兵。五代各朝对建立中央禁军极为重视。中央禁军经过梁、唐两朝的发展变革，到后晋始设置侍卫司，由侍卫亲军最高军事长官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统一领导全部禁军。后周又增置与侍卫亲军并列的殿前军，设有殿前军都指挥使，掌管朝廷殿前诸军。凡中央禁军的征召、管理、训练、衣粮供给、保卫京师或戍守地方，都由禁军将领具体负责。各国朝廷通过对禁军将帅的任免与军队的调动而牢牢控制中央禁军。

各地直接领导藩镇兵的节度使，全面负责藩镇兵的征召、管理、衣粮赏赐和在当地执行军事任务等。五代诸朝通过任免藩帅以及对藩镇各种限制措施，使唐后期藩镇骄兵悍帅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藩镇兵也已成为中央朝廷所控制的地方武装。

三、由朝廷随时派遣行营军事统帅指挥征战。五代十国发生战争，各国帝王随时征调中央禁军、藩镇兵，甚至还包括一部分乡兵组成军事行营；并临时派遣军事统帅指挥行营军队作战。这些军事统帅称之为行营都统、行营都招讨使、行营都指挥使、行营都部署、军前招慰安抚使。如后梁派陕州节度使李思安为潞州行营都统、同州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后唐派魏王李继岌为西川行营都统、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晋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后晋派天雄节度使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后汉派枢密使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抚安抚使；后周派天雄节度使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凤翔节度使王景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这些行营军事统帅分别来自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枢密使，但其中最多的还是各地节度使。所有行营军事统帅都是各国帝王临时委任的。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各复原职，或另有调动；参战部队又返回原来的驻防地区。

五代十国将枢密使、禁军大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殿前军都指挥使）、节度使、临时委任的行营军事统帅分别直接隶属于中央朝廷，由各国帝王决定将帅的任免和军队的调动，正如后唐枢密使安重诲所言：“兴师命将，出自宸衷”^①，五代几朝元老冯道也说过：国家征讨大事，完全由皇帝陛下独自裁决。^②各国帝王通过枢密使、禁军大将、节度使、行营军事统帅，掌管全国军权，使枢密使掌军事机密而不直接统兵，禁军大将与节度使直接领兵但无权擅自调动军队，行营军事统帅只临时负责指挥作战。各方面相互制约，以避免各级军将私自操纵军队，称兵作乱，危及国家的安全。后唐、后汉、后周虽一度出现枢密使亲自统兵出征的事实，如郭崇韬征蜀、郭威平关西三叛之乱、王峻赴晋州抗击北汉，但没有形成长期的固定的制度。然而五代各国要建立以加强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军事领导体制，必然会遭到那些野心勃勃的军事将领们的不满和反抗。后梁北面招讨使杨师厚掌握大部分禁军，在朱全忠刚死去就自称魏博藩帅。后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杨光远兵权在手，干预朝政，晋高祖石敬瑭有时不得不屈意顺从。后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盛气凌人，汉隐帝曾受到他的压制。至于各地藩帅称兵作乱，多次挑起战争冲突，更不胜列举。但经过五代各国长期反复的斗争，特别是周世宗的军事改革，终于建立起强大的中央禁军——侍卫亲军、殿前军，并大大削弱了藩镇节度使的军事权力，最终实现了由封建帝王直接控制枢密使、禁军大将，以及行营军事统帅，从而建立起高度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也为北宋王朝枢密使——三衙统兵体制的创立提供了蓝图。

第二节 中央禁军的军事制度

中央禁军在五代十国武装力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经

① 《旧五代史》卷六六，《安重诲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晋高祖天福四年。

过长时期的发展变化，到后周正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编制体系，已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①

一、中央禁军的建立和发展

五代十国的开国者多来自地方节度使。他们在相互兼并的战争中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其中有一支骁悍善战的亲军，如杨行密的“黑云都”，钱镠的“武勇都”，王建的“貔虎都”、“威信都”，朱温的“厅子都”，李存勖收编魏博的“银枪军”等。随着五代十国新王朝的建立，这些亲兵一跃而为国家禁军。

开平元年（907年）四月，梁朝刚建立，就将原宣武节度使亲兵左右长直，左右内卫，左右坚锐、夹马、突将，左右亲随军将等，分别改为左右龙虎军，左右羽林军，左右神武军，左右龙骧军。此后，梁朝又增置天兴、广胜、神捷、天武、天威、英武、控鹤等禁军。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称帝后，又将原河东亲兵作为后唐、后晋、后汉中央禁军的主力，并不断收编部分藩镇兵加入中央禁军，或重新增召禁军。后汉枢密使郭威建立后周王朝，又全面因袭了后汉的禁军系统。

五代各朝禁军番号很多。羽林、龙武、神武等乃是沿袭唐朝禁卫六军的旧称，为梁、唐、晋、汉、周各朝所通用，其他禁军称号时有变化。前蜀龙武、后蜀捧圣、闽国控鹤及拱宸、楚国银枪也都是禁军的称号。一个朝代有许多支禁军，他们互不统一，承担的军事任务不同，地位有高低，待遇有差别，很容易发生动乱。五代诸朝把这些不同禁军逐步统一起来，经历了长期的过程。

据《文献通考》一五五卷载，梁太祖初置侍卫马步军。开平二年（908年），梁、晋双方在泽州（今山西晋城）一带大战，梁

^① 参阅齐勇锋《五代禁军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史论丛》第三辑（1987年1月）。

左龙虎统军刘捍因防守泽州立功，被授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这时侍卫亲军只是梁朝禁军中的一支精锐武装。后唐除了继续建立侍卫亲军外，并在原有基础上对禁军加以严格整顿，形成新的强大马步军队。天成二年（927年），后唐朝廷以石敬瑭为汴州节度使，兼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应顺元年（934年）正月，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康义诚兼判六军诸卫事，使唐朝以来的禁卫六军、五代侍卫亲军逐渐合一。在此前后，禁军中的神威、雄威与魏博镇广捷军合并，改称羽林军，共辖4军，每军置10指挥（系编制单位，非指挥员）。应顺元年，改左右羽林40指挥为左右严卫军，龙武、神武40指挥为左右捧圣军。严卫、捧圣两军可能是当时侍卫亲军中人数最多的两支主力。后晋建立侍卫司，由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统一领导全部禁军。这样，五代禁军的建立、改组以至统一，到后晋已基本完成。

后周对禁军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周世宗鉴于五代以来禁军纪律松弛、兵骄将惰、老弱混杂等各种弊病，决定大力整顿禁军，严饬军纪，删汰老弱病残，挑选身体强壮、作战勇敢的藩镇兵士加入禁军，加强军事训练。经过周世宗的改革，后周禁军战斗力大大提高，南征北战，所向披靡。

二、中央禁军的编制体制

五代禁军在唐朝后期神策军和藩镇兵的军事组织形式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到后晋已形成军司、番号军、厢、指挥、都、队的编制体系。

军司：前已指出，梁朝新成立侍卫亲军，到后晋、后汉设有侍卫司并成为中央禁军最高一级的军事组织。侍卫司最高军事长官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下面分设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到后周增置殿前军，侍卫亲军与殿前军两大军司并列，同是禁军最高一级的军事组织。后周殿前军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的长官仍如同后晋、后汉。

番号军：五代番号军的名称很多，如龙捷、虎捷、捧圣、护圣、羽林、控鹤，等等。番号军大约从后晋起，隶属于侍卫亲军。在其下分为左右两厢。番号军长官为都指挥使，如后汉捧圣左右厢都指挥使朱洪实、严卫左右厢都指挥使皇甫遇、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①。

厢：中唐以来，厢已成为军队的一级军事组织。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说：“诸军皆分左、右厢，厢各有主帅。”^②据《新五代史》卷四八《杨思权传》载，杨事后梁为控鹤右第一军使，后唐明宗朝又任右羽林都指挥使，即先后在控鹤军右厢、羽林军右厢担任军职。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三月敕，羽林军左右厢共辖4军，40个指挥，左右厢可能各管2个军，20个指挥。周世宗升迁高平战役中有功将领，有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李千、龙捷右厢都指挥使田中、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张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慕容延钊。吴越国禁军同样有金马左右厢都指挥使。可见都指挥使是厢的主帅，还有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协助都指挥使共管一厢的军事。

军：军属厢下面一级的军事单位，其长官有都指挥使、都虞候各1人。厢管多少军，似因地而异，没有统一的规定。龙骧、羽林各辖4个军，捧圣至少有5个军。军的称号多以数字顺序排列，如后唐捧圣右厢第二、第三、第五军，雄义左厢第二军；后晋护圣第二军，彰圣右厢第三军。由于参加高平之战有功，后周控鹤第一军都指挥使赵鼎升至虎捷右厢都指挥使，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赵弘殷晋升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这表明厢与军相互之间上下级的密切关系。

指挥：指挥是五代在军之下普遍建立的军事组织，设有指挥使、副指挥使。如天福六年（941年）后晋派护圣等马步39指挥

① 由于五代禁军编制的不断变化，而且兵额多少不一，可能有些番号军一级的编制徒具形式，由各番号军的左右两厢分别直接隶属于侍卫军司。

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周太祖显德元年。

进讨镇州安重荣。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将南唐投降兵士编为6军30指挥。后梁天武军夹马指挥使有兵士500人。后唐捧圣7指挥有兵士3000余人，奉节等9指挥有兵士3500人。每个指挥约有四五百兵士。

都：晚唐已有都的组织，领兵官为都头。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秦王李从荣奖赏各级统兵官，诸军指挥使每人绢10匹，都头以下7至3匹；长兴三年（932年）又赐诸军指挥使每人各“七千钱”，都头人各“五千钱”。可见至迟在后唐明宗时“都”已成为军队的编制单位，并隶属于指挥使之下。每都领兵多少人，尚不清楚。

在都之下还有队一级的基层编制单位。

三、中央禁军的任务和性质

五代禁军人数多，战斗力强，是各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凡各国对外、对内进行战争，在全国一些重要地方屯驻戍守，主要依靠禁军执行任务。具体说来，五代禁军沿袭唐朝神策军的某些特点，承担着以下军事任务。

（一）宿卫。在各国首都部署大批禁军，保卫以封建皇帝为首的中央朝廷，是我国封建社会各王朝中央禁军的基本任务。五代十国的中央禁军也无一例外。

乾化二年（912年），梁太祖说，近年以来，京师开封（今属河南）屯兵太多。次年，均王朱友贞与驸马都尉赵岩密谋策划杀死其兄朱友珪。赵岩认为这件事只要北面招讨使杨师厚告谕禁军，一定能够成功。经杨师厚同意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率禁兵数千人突入宫中，10余万禁军在洛阳（今属河南）乘机大肆抢劫。可见当时后梁的禁军，除一部分人随从杨师厚屯驻魏州，还有大批兵将留守洛阳或汴州，担当宿卫京师的任务。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九月，枢密使郭崇韬领禁军6万人出讨前蜀。当这支军队还没有返回洛阳，次年二月魏州赵在礼作乱，

唐庄宗命李嗣源统亲军出征，具体人数不详。不久李嗣源自魏州南下夺取中央政权，唐庄宗率从驾兵 2.5 万人出逃。由此推测，唐庄宗时京师洛阳禁军人数不少于 10 万。《宋史》二四九卷《魏仁浦传》载，后汉国都汴州有宿卫禁军 6 万人。

同光二年（前蜀乾德六年，924 年），前蜀王衍轻信后唐使者有关两国和好的谎言，忽视对后唐的军事防御，撤回边防前线威武城戍 24 军，武定、武兴招讨 37 军，天雄招讨 29 军，金州 7 军，共 97 军。这些军队连同左右龙武 40 军，共有 137 军^①，即使不包括其他禁军，成都城内至少有禁军 5 万人。

（二）出征作战。五代禁军出征作战，大致可分为对内对外两大类。对内主要指平息藩镇的叛乱，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包括抗击契丹军队的进犯，各国之间的互相侵掠乃至兼并。这些战争连年不断，有时双方出动几万或几十万人。

有关平息藩镇之乱，主要发生在五代各国。开平三年（909 年），后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归附凤翔李茂贞，派兵扼守潼关（今陕西潼关县东北），攻打华州（今陕西华县）、长安（今陕西西安），梁太祖派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鄩讨伐，收复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及长安城。天成二年（927 年），宣武节度使朱守殷反，唐明宗亲自率禁军讨平。天福六年（941 年），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反，后晋高祖派护圣等禁军 39 指挥迎击。襄州安从进作乱，禁军奉国都指挥使刘词首先攻入襄州（今湖北襄阳），歼灭乱军。后汉时，河中李守贞、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连衡作乱，枢密使郭威统领中央禁军、藩镇兵出击，大获全胜。五代各国如没有中央禁军对付这些叛乱，藩镇乱事可能愈演愈烈，随时有吞没五代各国的危险。

契丹军队大规模南犯，历经后唐、晋、汉、周诸朝，一度灭亡后晋，对中原地区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五代诸国经常派遣大批禁军戍守幽州（今北京市西南）、太原（今山西太原南）、魏州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唐庄宗同光二年。

等地。后唐、后晋、后周多次出动禁军，与契丹鏖战于河北、河南一带。

五代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主要依靠中央禁军。乾化元年（911年）柏乡之战，后梁出动龙骧、神威、神捷诸军，晋王李存勖派李嗣源率亲军迎战。后周出征北汉、南唐、契丹，侍卫、殿前两支禁军屡建奇功，大胜而归。开平二年（908年），吴国军队攻打苏州（今属江苏），吴越王钱镠命其弟牙内指挥使钱鏗领亲兵驰援，大败吴国。

（三）禁军屯驻。唐代神策军主要屯驻在长安及长安西北一带，拱卫京师。五代禁军的屯驻地区更为广泛。除前面所述宿卫京师及戍守河北、山西边防前线防御契丹外，另在国内许多地区驻有禁军，以监视、控制地方藩镇势力。如后梁怀州（今河南沁阳）有龙骧军，后唐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有捧圣、羽林军，安州（今湖北安陆）有左神捷、左怀顺军，后晋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有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的3000骑兵。后汉平卢节度使刘铢骄横不法，朝廷先派禁兵屯驻青州（平卢节度使治所，今山东益都），然后派大臣符彦卿替代刘铢。“铢顾禁兵在，莫敢有异意，乃受代还京师。”^①广顺三年（953年），彰武节度使高允权卒，其子高绍基自称继承父位，后周太祖派供奉官张怀贞率禁军两指挥屯驻鄜（今陕西富县）、延（今陕西延安北）二州，高绍基见势不妙，悻悻离开。《旧五代史》卷四三《唐明宗纪》载，“帝谓范延光曰：‘如闻禁军戍守，多不禀藩臣之命，缓急如何驱使？’延光曰：‘承前禁军出戍，便令逐处守臣管辖断决，近似简易。’帝曰：‘速以宣命条举之。’”后唐政府打算消除屯驻在各地的中央禁军与地方藩镇的对立状态，要把屯驻禁军纳入各地藩帅的势力范围之内，只不过是官样文章。事实上，中央禁军屯驻外地的主要任务即监视藩帅，加强控制；他们自成体系，驾凌于藩镇之上，确是五代各朝的惯例。

① 《新五代史》卷三十，《刘铢传》。

中央禁军还在中原一带粮食生产发达的地区进行屯驻，以便就地而食，减少远程运输军粮之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诏书说，“其近畿粮储，可令诸军就食。”^①长兴三年（932年），神武军赴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北）就粮，唐明宗指示不要侵扰当地百姓。后唐清泰末年已出现“就粮禁军”的名称。

五代中央禁军屯驻外地，有军事屯驻和就粮屯驻两种目的，到唐明宗时已比较普遍，并形成具体制度。北宋禁军屯戍即在五代的基础上加以广泛推行而已。

后晋出帝诏书说：国家禁军“或从征丑虏，显立勋劳；或出讨叛臣，方期平定；至于边陲守戍，藩镇分屯，尽系捍防”^②。这如实说明了五代各国禁军承担着宿卫京师、出征作战、屯驻地方的任务，已发展成为封建国家直属的常备军队。这是在唐朝后期中央军队日益衰落、藩镇势力异常强大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同藩镇割据势力、契丹连年入侵的斗争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为全国统一事业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节 地方军的军事制度

五代十国和唐朝一样，在各地设立有节度使。每个节度使都蓄养有军队，通称藩镇兵。这些兵士的召募、训练、衣粮、器甲、戍守、作战等一般由各藩镇负责。这是各地藩镇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前提。

一、藩镇兵的分布

藩镇军队根据他们屯驻地点、担负军事任务的不同，可分为

① 《册府元龟》卷九二，《帝王部·赦宥一》，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同）。

② 《全唐文》卷一一九，《改元开运大赦文》，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同）。

牙军、牙外军、外镇兵、州兵等。

牙军：唐后期各地藩镇一般在节度使治所兴建牙城，专门组织有保护牙城、衙府的牙军。后梁建国前夕，朱全忠为了控制魏博节度使，将魏博牙兵 8000 人杀戮殆尽。朱全忠被儿子朱友珪杀死后，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置银枪效节军凡数千人，皆选摘骁锐，纵恣豢养，复故时牙军之态”^①。晋王李存勖进入魏州，银枪效节军又归李存勖控制。

后梁天平节度使王檀招募军队，选拔强悍者置于帐下，以为亲兵。

后唐天成元年（926 年），枢密使院向唐明宗奏报：“节度使、刺史所置牙队，许于军都内抽取，便给省司衣粮，况人数已多，访问尚有招致。”^② 可见各藩镇牙军已出现越来越多的趋势。

后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有牙兵数千人。李嗣昭战死后，其子李继能领牙兵占据潞州。

后周广顺二年（952 年），兗州节度使慕容彦超反，募二千余人为牙兵。

杨行密在淮南，经常有数千牙兵驻守在牙城内面。高季兴初赴江陵，后梁特派 5000 兵士为牙兵，兵士衣粮由梁朝供给。吴国武昌节度使李简病死，他的女婿徐知询擅自扣留李简牙兵 2000 人在金陵（今江苏南京）防守。

牙兵长期屯驻在节度使治所牙城内面，主要用来保卫牙城和节度使。各藩镇挑选强壮善战的青壮年当牙兵，战斗力很强，是藩镇一支最精锐的军队。由于他们在藩镇内部的特殊地位、作用，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凶悍异常，稍不满意，动辄称兵作乱，甚至逐杀藩帅。五代魏博镇的银枪效节军最为典型。后梁襄州牙兵王求作乱，天平节度使牙兵杀藩帅王檀，成德大将张文礼指使牙兵千余人谋害节度使王鎔，后汉赵思绾也主要依靠千余

① 《旧五代史》卷二二，《杨师厚传》。

② 《旧五代史》卷三七，《唐明宗纪》。

牙兵反叛于长安。

牙外军：各地节度使既要建立牙军保护自己，又要在藩镇治所会府牙城之外的罗城部署重兵以应付军事上的急需。唐后期称这支军队为牙外军，或外营兵。我们还未发现五代十国牙外军的明确记载。但五代时期各藩镇都蓄养重军，如后梁魏博节度使有精兵数万，后晋河东节度使有步骑5万人，成德节度使也有兵士四五万人^①。这些军队肯定不可能都驻在牙城内面，其中会有相当数量的兵士驻在藩镇会府罗城。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天平节度副使裴彦率府兵平息牙兵作乱，军府很快获得安定，这里“府兵”很可能即牙外军。后唐清泰三年（936年）七月二日夜，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作乱，领兵攻打子城，节度使沙彦珣逃出城外，次日招集兵士进入城内平息了叛乱。桑迁之所以能攻打云州子城，沙彦珣很快调军队入城，都表明在云州城或附近驻有不少牙外军。

外镇兵：外镇兵是节度使在州治之外所属各州县屯驻的军队。后唐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有11镇，延州有白安镇，后晋魏州有夏津镇。后周陇右防御使管辖三县五镇。镇兵的长官称镇将、镇遏使。镇将不仅统领军队，还兼领中央度支、户部、盐铁使在地方上所设的场院，主管场务。有的还在县、乡擅自征取赋税。梁太祖有次路过朝邑县（今陕西大荔东），亲自见到镇将权势在县令之上。各地镇将地位较高，几乎成为当地的一霸。后周朝诏书说：“京兆（治所在今陕西长安）、凤翔府（今属陕西）、同、华、邠（今陕西彬县）、鄜（今陕西富县）、耀（今山西耀县）等州所管州县军镇，顷因唐末藩镇殊风，久历岁时，未能厘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争讼、赋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职；其擒奸捕盜，庇护部民，合是军镇警察之职”^②。这是对地方军镇的权力加以限制。

^① 《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反，有兵士2万人逃走，2万余人被杀。则成德军至少有4万多人。

^② 《全唐文》卷一二四，《令州县军镇各守职分敕》。

州兵：州兵系由州刺史直接统领的军队。各州军队多少人，史籍缺乏记载，估计最少有数百人。后唐末帝时，金州防御使马全节领州兵数百人打退了后蜀军队的进攻，升为沧州留后。安州发生兵乱，节度使符彦超被杀，节度副使李端很快召集州兵攻入安州城内，诛杀叛乱头子王佛留等人。后晋初，契丹军队南下，祁州刺史沈斌率州兵邀击，因兵力不济，兵败身亡。忻州刺史丁审琦不敢抵抗契丹军，领州兵逃抵镇州（今河北正定）。后梁乾化二年（912年），吴国军队进攻楚国岳州（今湖南岳阳），楚王马殷派水军驰援。吴国命抚（今江西抚州市东）、江（今江西九江）、袁（今江西宜春）、吉（今江西吉安）、信（今江西上饶）五州兵屯驻吉州，牵制楚国军队。

五代十国的藩镇兵由牙军、牙外军、外镇兵、州兵等组成。牙军、牙外军、外镇兵直接隶属于节度使，州兵虽归州刺史领导，但与节度使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二、藩镇兵的编制体制

五代和唐朝一样，节度使仍是各藩镇的最高军事统帅。在节度使之下，还设置有节度副使、都虞候、都教训使、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及主管牙军的牙内都指挥使（中军都指挥使）。其中马步军都指挥使的权势很大，是协助节度使掌管本道军队的重要的军事长官。

在各藩镇马步军都指挥使之下，形成了厢、军、指挥、都、队的军事体制，与中央禁军的编制系统大致相同。长兴四年（933年），西川有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仁罕、西川左厢马步军都指挥使赵廷隐、西川右厢马步军都指挥使张知业。天成元年（926年），北京（今山西太原南）有右厢马步军都指挥使安审通。在此之前，后唐庄宗攻克魏州，张廷裕补天雄军左厢马步军都虞候。可见五代西川、太原、魏州等军事重镇，节度使军队分成左、右两厢，各置左、右厢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都

虞候等军事长官。至于比较小的藩镇，军队人数少，可能没有左、右厢的分置。

在厢之下有军、指挥的编制。后晋天福八年（943年），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召募兴捷、武捷等10余军，史弘肇曾任武捷军都指挥使。后唐西川有左明义指挥使毛重威、左冲山指挥使李瑭。登州指挥使李谨、王居厚抗拒朝命，被青州节度使霍彦威处斩。唐明宗时，魏博镇奉节等9指挥使领兵3500人几乎全部被杀。军的人数较多，其长官称都指挥使，或简称军主、军使。指挥在军之下，每指挥约有兵士数百人，设指挥使一人。

都、队是比较低的军事组织。梁、晋争霸，镇州节度使王镕归附晋王李存勖，遣大将王德明率37都助晋征伐。都的长官称都头，或称兵马使。队是藩镇中最低的军事基层单位，如康延孝、乌震、相里金都曾任队长，后升为军将。队的设置是比较普遍的。

三、藩镇兵的军事任务及其削弱

五代藩镇兵主要在本道内执行军事任务，维持社会治安，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或防御邻道军队的进讨；还要奉各王朝之命，配合中央禁军出征或戍守边防。五代各朝有关重大战事，几乎每次都征调藩镇兵从事征战。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安州节度使李金全反叛，朝廷诏新授安州节度使马全节以洛、汴、汝（今河南临汝）、郑（今属河南）、单（今山东单县）、宋（今河南商丘南）、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曹（今山东定陶西）、濮（今山东鄄城北）十州兵讨伐。贞明二年（前蜀通正元年，916年），前蜀大举讨伐岐王李茂贞，武信、天雄、匡国诸军都同时被应征出战。五代诸朝北面防御契丹，南面防御吴或南唐，经常征调各道兵在沿边地区守边防卫。后唐同光年代中，曹州刺史西方邺以曹州州兵屯汴州，后汉命滑州兵戍守同州，后汉兗州（今属山东）兵士数百人在金州（今陕西安康）屯戍。根据五代藩镇兵所担负的军事任务考察，他们是五代诸朝中央禁军的重要的

后备力量。

藩镇兵与中央禁军分别直接从属于地方节度使和中央朝廷的两种不同军事体系。藩镇军队一旦被地方军阀所利用，就可能成为进行分裂割据甚至兴师问鼎的重要工具。唐后期河朔三镇与李唐王朝长期分庭抗礼，关键在于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各有强大的藩镇军队。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一些藩镇嚣张跋扈，称兵反抗，也主要由于这些藩镇的头领掌握了不少藩镇军队，有的甚至与部分禁军相勾结。因而加强中央禁军，不断削弱藩镇军事力量，已成为五代十国长期实行的重要措施。五代十国的帝王们有时忍辱妥协，被迫向某些强悍藩帅作些让步，甚至承认拥兵自立的军将为节度使；但如形势有利，则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歼灭了大批藩镇乱兵。

此外，五代王朝为削弱藩镇军事力量，还抽调藩镇兵加入中央禁军。后唐庄宗灭亡后梁，杀死后梁昭义节度使李继韬，将其牙兵配入后唐中央禁军从马直军。宣武节度使李从审死，其子李彦超将其父牙兵 8700 人送归朝廷。清泰年初，后唐朝廷命诸道从地方部队中选募骁果充实中央禁军，汝州小校刘词被选入禁军，后升为禁军将领。后晋魏博节度使范延光叛乱失败，魏博牙兵全部并入中央侍卫亲军。周世宗在高平战后更将藩镇骁勇之士尽归朝廷，减少了藩镇军的后备兵源。

五代诸朝分割节镇，藩镇设置愈益增多，所管地盘越来越小，拥有的军队也随之大大减少。唐末昭义节度使原有泽、潞（今山西长治）、邢（今河北邢台）、洛（今河北邯郸东北）、磁（今河北磁县）五州，地势险要，后梁开平二年（908 年）被分割为保义、昭义二镇。贞明六年（920 年），后梁静胜节度使温昭图仅有耀州（今陕西耀县），管辖两个县，“虽名节度使，实一镇将，比之雄藩，岂可同日语也”^①。可见梁末有的节度使掌握的军力只等于一个小镇将的军事实力。唐末四川地区只有西川、东川两个节度使，前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一，梁均王贞明六年。

蜀王建兼并了山南西道，共分割为 10 个节度使。江南西道在唐朝末年仅设置 1 个镇南节度使，南唐则分为镇南、奉化、安化、昭武、百胜 5 个节度使。

五代十国通过上述措施，导致藩镇兵力严重削弱，中央禁军大大增强，已成为实现国家统一、左右政局的可靠的军事力量。唐后期以来全国军事部署外重内轻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变。

四、乡兵的建立与发展

唐朝自武则天起开始在部分地区征发团结兵。安史乱后，团结兵设置增多。他们是在当地服役而又不长期脱离生产的地方民兵。五代十国征战频繁，征发地方民兵越来越多，有乡兵、乡社兵、民兵、义兵、团军等不同称呼。

五代乡兵的建立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由朝廷发布命令，在全国或部分地区集中征发。后梁末年规定，全国各地每 7 户出 1 乡兵。郑州人史弘肇先被征为乡兵，后转入本州开道都当藩镇兵，又选入禁兵。后唐末年，石敬瑭起兵太原，唐末帝“发民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仗，谓之‘义军’……凡得马二千余匹，征夫五千人”^①。石敬瑭建后晋不久，指责后唐在各州府抽点乡兵，遭到各地群众的强烈不满，纷纷逃窜山谷，逃避兵役。天福八年（943 年），晋出帝与契丹关系严重恶化，为抵抗契丹军队大举入侵，开运元年（944 年）命全国征发乡兵，每 7 户出 1 兵，兵仗器械由 7 户共同筹集。这次共征集乡兵七万余人，号武定军，次年又改为天威军。这支军队训练较差，战斗力弱，到天福十二年（947 年）全部被撤销。后晋统治者却趁机敲诈勒索，命令乡兵所有的铠仗全部归国家所有，还强迫每 7 户向官府纳钱 10 贯。不少乡兵逃入深山老林，公开进行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晋高祖天福元年。

反抗。

十国征发乡兵也很多。南唐每家出1名兵士，号为“义师”，又从客户中三丁征发一兵，称为“团军”。南唐濠州刺史征发乡兵万余人，州兵5000人，大败后周军队于定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西川孟知祥与董璋作战，命都押牙高敬柔率资州（今四川资中）义军2万人出征。楚国内战，马希萼征发朗州（今湖南常德）丁壮为乡兵，号静江军。北汉地狭民贫，面对后周强大军队的进逼，在境内大量征发乡兵，多次被后周俘走。后周又将这些乡兵放归乡里，以便瓦解北汉的军队。

第二，各地节度使、刺史因军事需要，在境内征发乡兵。后晋魏博节度使范延光征发乡兵入魏州城内作战。后周慕容彦超在广顺二年（952年）反抗中央，“偏于管内抽点乡军，人户不伏追差，逐处杀劫镇将”^①。那些臣服于中央朝廷的节度使、刺史，经常征发丁夫作战，也都属于乡兵。

第三，各地乡社为保卫地方治安而组织乡兵。开运元年（944年），后晋缘河巡检使梁进领导乡社兵从契丹手中收复德州（今山东陵县）。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说，“乡社兵，民兵也。时契丹寇掠，缘河之民，自备器械，各随其乡，团结为社，以自保卫”^②，对乡社兵的性质、器械来源、任务作了明确的叙述。后周显德四年（957年），中书舍人窦俨奏请说：“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南）一县，团结乡社之人，名为义营，分立将佐。一户为贼，则累其一村；一户被劫，则累其一将。大举鼓声之所，壮丁云集。贼徒至多，不过一二十数；义营所聚，动及百人，贼人奔逃无有免者。”^③这种以乡社为单位所组织起来的民兵，用以防御外来扰掠或在当地捕捉“盗贼”，规模小，主要在本地活动。

五代十国乡兵的征发，遍及南北各地，超过了唐朝的规模。既

① 《册府元龟》卷一一八，《帝王部·亲征三》。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晋齐王开运元年。

③ 《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议七》。

有各国朝廷的统一征发，也有各地节度使、刺史以及乡社地方豪强自行征集的。乡兵在各地节度使、刺史的领导下，不登进军籍，不长期脱离生产，多在当地服役，即使奉命远征，任务结束后又返回家园。后周与南唐、北汉作战，一再指示将俘获对方的乡兵放还，让他们继续从事农耕。这与长期脱离生产而以当兵为谋生职业的藩镇兵有明显的区别。

第四节 兵种与兵役制度

一、兵 种

五代十国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弓弩刀枪和战马、战船等。用这些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与五代十国以前封建王朝基本相同，仍然是步兵、骑兵、水军。北方各国主要在陆地作战，步、骑兵的作用更加突出。南方各国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水军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步兵指持弓、弩、刀、枪徒步作战的兵士，占各国军队的绝大多数。贞明二年（916年），后梁大将刘鄩与晋军在魏州附近交战，一次损失步兵7万人。后唐明宗有军队30万人^①。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给南唐李璟诏书说：“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②。由此推测，北方五代各国大致各有军队30万人左右。唐明宗有马3.5万匹，倘以一兵一马计算，则后唐骑兵3.5万人约占全国军队总人数的11%。后唐灭亡前蜀时，郭崇韬曾以蜀骑兵3000人置左右骁卫等6营，步兵2.4万人置左右宁远等20营，其中骑兵约占总兵力11%，与后唐比例大致相同。

弩是一种射程远、杀伤力大的武器，万弩齐发，经常给敌人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传》。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一六，《周世宗纪》。

以重大杀伤。所以步兵队伍中有专门组织的弩军，如后唐任汉权任西京弓弩指挥使，曹英为后晋弩手军使，南汉神弩战士 3000 人大败楚国军队于封州（今广西梧州东南）。

五代十国都建有骑兵。唐朝末年朱全忠初任宣武节度使仅有战马 500 匹，分别派遣邓季筠、庞师古、氏叔珍等统领。梁军四出征战，又从对方手中缴获大量马匹，光化元年（898 年），在巨鹿（今属河北）青山口败晋军，缴获马千余匹。光化二年（899 年），朱全忠与卢龙军战于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夺马 2000 匹。光化三年，葛从周又大败卢龙军于乾宁军（今河北青县）老鷁堤，夺马 3000 匹。仅此三次，共缴获马六千余匹，骑兵队伍随之扩大。后梁对骑兵建设相当重视。乾化二年（912 年）春，梁太祖驻军相州，检阅战马，华州防御使邓季筠、魏博军校何令稠、陈令勋三人因马瘦被斩。谢彦章、孟审澄、侯温裕都是后梁有名的骑军将领，孟、侯二人所领战马不超过 3000 匹，谢彦章“多而益办……每敦阵整旅，左旋右抽，虽风驰雨骤，亦无以喻其迅捷”^①。

晋王李克用、李存勖及后唐明宗李嗣源都出身于沙陀族，长于北方，从小驰骋疆场。他们军队主要以北边少数民族成员为骨干。长兴四年（933 年），唐明宗说：太祖李克用在太原时骑军不超过七千，庄宗有马万匹，现在增至三万五千匹了。^②后唐骑兵发展很快，人数多，可能超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其他国家。李存勖、周德威、史建瑭、李嗣源都是有名的骑军将领。李存勖灭亡后梁的原因很多，但晋方骑兵多，战斗力强，梁步骑军难以抵御，当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南方各国因地理条件的限制，除前蜀、后蜀外，骑兵人数不多。后唐灭亡前蜀时，得马 9500 匹，前蜀可能有骑兵万余人。吴国杨行密军队多是江淮人，不习骑射。唐末兖州节度使朱瑾归附淮南，杨行密得朱瑾精骑，作战能力迅速增强。徐知诰加紧准备

① 《旧五代史》卷一六，《谢彦章传》。

② 《旧五代史》卷四四，《唐明宗纪》。

灭亡吴国，天福二年（937年）开始建太庙、社稷，任命左右丞相，置骑兵8军，步兵9军，证实吴国骑兵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乾祐三年（950年），楚王马希广与朗州节度使马希萼交战，屡次失败，楚将刘彦韬对马希广说：“朗州兵不满万，马不满千，都府精兵十万，何忧不胜！”^①可见楚国及所属朗州也有部分骑兵。乾祐元年（南汉乾和六年，948年），南汉帝刘晟见楚国马希广、马希萼兄弟相争，派巨象指挥使吴珣、内侍吴怀恩攻打楚国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大败楚军。这是史载五代十国唯一见到使用巨象作战的骑兵。

骑兵和步兵同样是我国封建社会两个古老的兵种，但五代十国使用骑兵的广度、深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五代十国从中央到地方，骑兵单独建置，中央禁军有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各番号军有马军都指挥使（如后唐捧圣马军都指挥使、后周龙捷马军都指挥使），各藩镇及某些州也有马军都指挥使，不少军事将领指挥骑兵作战的艺术熟练自如，是相当成功的。

水军主要分布在南方各国。北方水军规模很小。贞明五年（919年），梁、唐双方争夺黄河中下游沿岸军事据点德胜南城，梁大将贺环以三层楼船10余艘蒙上牛皮，悬板为楯，横置黄河中间，阻止晋兵渡过黄河援救德胜南城。晋亲兵将领王建及命兵士自黄河上游乘战船而下，火烧后梁楼船，梁兵死伤很多。这场战争可能是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最大的一次水军交战。

周世宗讨伐南唐，交战初期，主要靠步、骑军渡淮河作战。南唐大批战船在淮河游弋，后周因缺乏水军抵御，作战非常被动。周世宗指示在大梁城西汴水侧置造船务，造战船数百艘，挑选各州强壮兵士赴京师组成水军，加强训练，战争形势迅速改观。

南方各国作战，出动战船和水军人数大大超过了北方。开平元年（907年），吴王杨渥出水军3万人进攻湖南，楚王命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将水军3万人应战，结果楚军缴获战船800艘。开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九，汉隐帝乾祐三年。

平三年，淮南军队攻打苏州，有战船 200 艘被吴越军队夺走。吴国这两次战役就损失战船 1000 艘。徐知诰建立南唐，经济发展，兵力强盛。显德四年（957 年），周世宗进攻淮南，南唐濠州团练使郭廷谓屯战船数百艘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城北，还有战船数百艘在涣水东，准备援助濠州。沿淮河一带寿州（今安徽寿县）、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楚州（今江苏淮安东）都部署有战船和强大的水军队伍。吴越国王钱俶为配合后周军队征讨淮南，派邵可迁领战船 400 艘、水军 1.7 万人屯于通州（今江苏南通），准备出击南唐。

荆南高季兴在境内荆州（今湖北江陵）、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造战船数百艘，训练水军，多次击退吴、楚及中原政权的进攻。开平二年（908 年），高季兴亲自迎战，将吴国水军 1.5 万人击退。

后蜀孟知祥称帝之前，扩充军队达 7 万余人，其中水军有“左、右飞棹兵六营，凡六千人，分戍滨江诸州，习水战以备夔（今四川奉节东）、峡”。^① 孟知祥后来派遣张武、袁彦超、李仁罕率水军攻占渝州（今四川重庆）、泸州（今属四川）、涪州（今四川涪陵）、忠州（今四川忠县）、夔州，夺取西川东部沿长江流域不少州县。

南汉在楚天成三年（南汉大有元年，928 年），一次出动战船数百艘，击退楚国水军对封州的进犯。闽国王审知死后，子弟相争，在福州（今属福建）、建州（今福建建瓯）等地动辄用水军相攻。

总之，南方吴、南唐、楚、吴越、荆南、后蜀、南汉、闽等国随着造船工业技术的进步，所造战船很多。多次作战出动战船几百艘、上千艘，水军几万人。他们和步、骑军一样，建立有自己独立的指挥系统，如吴国楼船使、水军指挥使，南唐战棹指挥使，楚国水军指挥使、战棹指挥使，后蜀飞棹指挥使，闽国楼船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唐明宗天成元年。

指挥使。

五代十国步、骑、水三军并列，各有自己的专门编制体系，但在行军作战中又往往紧密配合，共同行动。周世宗出征淮南，后周水军在淮河水面作战，两岸用步、骑兵追击敌人，步、骑、水三军一起完成军事任务，取得了作战的重大胜利。

二、兵役制度

唐朝安史之乱前后，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募兵制逐渐取代征兵制。募兵本来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用来筹集军队的一种方式。但将募兵作为一种兵役制度来考察，这不仅指如何召募军队，还应包括家属随军、衣粮赏赐、优恤等内容。只有这样，五代十国才有可能召募到兵士，并长期保存下来。

（一）召募。五代十国都按照一定的条件召募人们当兵。《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召募之制》载：后梁“方其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后瞻面，赐以缗钱、衣履而隶诸籍。”后梁募兵时考察人们的身高、行走速度、视力远近等。周世宗整顿禁军，选拔武艺超群、身体强壮者。其他各国募兵也注意身体素质。

朱全忠在唐朝末年出任宣武节度使，兵力严重不足，派遣朱珍为淄州刺史。朱珍在淄州（今山东淄博南）、棣州（今山东惠民东南）很快募兵万余人。又命郭言到陕州、虢州（今河南灵宝）召募丁壮，半年内得锐士万余人。朱全忠对这些募兵十分满意，自诩夺取帝位，必将成功^①！

晋王李存勖与朱全忠争霸时，广募军队，太原人常思以趁悍应募，多次跟随李存勖征战，升为捧圣军使。澶州人赵晖以骁果应募，与大梁交战百余次，迁马直军使。潞州留后李继韬散金召

① 《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

募豪杰，郭威在潞州前往应募，后来成为五代后周的开国皇帝。

后晋出帝时，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国内政局混乱，契丹必将入犯，乃广泛募兵。灵武节度使冯晖一次募兵千余人。周世宗除大量召募禁军外，还在边境地区募兵防御契丹。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询问德州刺史张藏英抗击契丹的策略，张藏英详细汇报了当地的山川形势，要求批准召募骁勇者当兵，发给衣粮，由自己统领以打击契丹军。周世宗当即同意，命张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到任数月，募得千余人。此后契丹南下，张藏英随时领军驰击，使契丹军不敢贸然入犯。

后晋开运元年（闽国天德二年，944年），闽国内乱，大将朱文进杀死王延羲，自称威武留后，用重赏募兵2万人，进攻泉州（今属福建）。开运三年（946年），吴越国王钱弘佐命统军使张筠、赵承泰将兵3万人进攻福州，起初募兵，很长时间没有人响应。钱弘佐命改善应募兵士待遇，消息传开后，许多人争相应募。楚国也募民8000人为银枪军，南汉募市井无赖子弟充当禁军。

五代十国召募的兵士，正式登入军籍，一般长期在军队中服役，定期领取衣粮赏赐，称为健儿、官健或长行兵士。

（二）家属随军。唐后期推行募兵制，没有明文规定军人家属必须随军居住，但广大破产农民既以从军入伍为谋生职业，他们的家属在家乡生活无着，自然会离开乡井随军居住。这种情况在五代十国更加普遍，各国中央禁军都有大批家属随军住进军营。后唐长兴元年（吴国大和二年，930年）八月，吴国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拯杀本州刺史陈宣，率所部兵士及家属5000人归附后唐。广顺二年（952年），后周讨伐兗州节度使慕容彦超，特别发布诏书告谕屯驻金州的兗州兵士说，朝廷已派专人领兵首先进入兗州军营，保护好你们的家属。这说明吴国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后周兗州等藩镇兵也有不少兵士家属随军居住。

五代各朝为严密控制军队，对军人家属的行动往往加以干预。唐明宗自洛阳行幸汴州，命护驾诸军的家属随同前往。后唐末中央禁军羽林军1000人屯戍陕州，他们的家属也从洛阳迁往陕州。

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各地自然灾害严重，百姓普遍流亡，晋朝廷命禁军万人并家属同时开赴东京。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增置水军，命令各州将所挑选的青壮年连同他们的家属送往大梁。五代各朝对不服调遣和进行叛乱的军人及其家属的镇压极为残酷。朱全忠在建国前夕，一次杀死魏博牙军8000家。唐明宗时期，屯驻汴州的控鹤军拒绝赴瓦桥（今河北雄县）戍守，拥兵作乱，3000兵士家属全部被杀。天成元年（926年）四月，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放火闹事，攻打屯驻滑州的魏博军，滑州崇牙、长剑、建平诸军将校数百人遭到族诛。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彰圣军指挥使张万迪自怀州叛逃太原，唐末帝命令尽诛他们家属。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中说，“凡乱兵皆夷其家”^①是符合事实的。

（三）衣粮赏赐。五代十国对所征召的官健，每年发放衣物。天成二年（927年），后唐朝廷讨伐荆南高季兴，命楚王马殷出军配合作战，五月，赐湖南行营将士夏衣1万套。清泰二年（935年）六月，石敬瑭领大军屯驻忻州（今属山西），后唐派使者赐军士夏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讨平魏博范延光叛乱后，后晋朝廷派专人发放魏州城内投降兵士的冬衣。每月还发放口粮。可能还有一些酱菜钱。这些衣、粮、酱菜钱只能维持兵士本人的简单生活，随军家属没有薪饷。由于国家经费不足，加上军将们贪污克扣，兵士们有时不能按时领到衣粮而衣食不济。他们为养活自己的家口，拼命追求赏赐，各国政府及藩镇为取得官健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勇敢作战，也往往给予种种赏赐。这些赏赐名目繁多，如召募赏赐，李克用曾说各国都悬重赏召募勇士。福建朱文进也用重赏募兵。还有册尊号、郊祀等定期赏赐。赏赐最多的是战争赏赐，如后晋抗御契丹，“其始发军也，有赐赉，曰挂甲钱；及班师，又加赏劳，曰卸甲钱，出入之费常不下三十万”^②。这些数额巨大的赏赐，除鼓励奋勇作战外，也是封建政府发给兵士们用来养活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唐明宗天成二年。

② 《新五代史》卷五二，《李守贞传》。

家口的薪俸。

(四) 优恤。对作战伤亡的将士，各国政府制订了一些具体优恤办法。开平二年(908年)二月，正当后梁大军在潞州外围作战久攻不下时，梁太祖亲自巡幸泽、潞，特发布诏书说，自去年六月以后，凡昭义行营作战死亡将士，由政府将死者三年内粮赐发给其妻子儿女。^①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平息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作乱的赦文说：诸军兵士战死于沙场，给各户三年粮赐，倘死者的子女长大成人，由侍卫司酌情安排继续当兵，以便维持他们家中的生活。^②晋出帝征讨契丹的赦文说，将作战死者的亲男配军收管，支给衣粮^③，但不再提及对死者的家属发放死者的三年粮赐。周太祖讨平兖州慕容彦超的赦文说：诸军将士“所有歿于王事者，各等第给孝绢，仍以本人半分衣粮与本家一年；有亲子者，官中并与收录安排”^④。

五代十国军队没有服役年龄的具体限制。青壮年应召入伍后，几乎是终身服役，军队中不堪战斗的老弱兵士越来越多。《鉴诫录》卷四《蜀门讽》有一首诗：“六十休论少壮时，尉迟功业拟奚为，高声念佛寻街者，尽是拗停老健儿”，反映了五代时期这方面的情况。

归纳起来，五代十国募兵制大体包括有关召募、家属随军、衣粮赏赐、优恤等内容。然而各国各自为政，相互对立，实行兵役制也很难完全一致。但各国发放衣粮赏赐已大致实行。

五代十国军队来源主要靠召募兵士，但也不断征发兵士。各国征集兵员办法很不一致，有的按年龄征集，有的几户共出一兵，有的任意抓兵。朱全忠在后梁建国前夕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争夺幽州、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刘仁恭屡次战败，下令征发境内

① 《旧五代史》卷四，《梁太祖纪》。

② 《全唐文》卷一一四，《平张从宾赦制》。

③ 《全唐文》卷一一九，《征契丹还大赦文》。

④ 《册府元龟》卷九六，《帝王部·赦宥十五》。

15~70岁的男子当兵，得兵10万人。后梁义武镇行军司马李应之征发管内白丁，另置新军。义武节度使王都阴谋作乱，“擅致军都，遍抽编户，专修城垒，潜造甲兵。”^① 贞明三年（917年），晋王李存勖发起胡柳陂战争，征发魏博白丁3万人从军，负责修筑营栅。石敬瑭领大军自太原南下，后唐末帝征集诸道百姓当兵，这些临时凑集的队伍尚未到达洛阳，晋军已入京师。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连衡作乱，招集亡命之徒，连路过襄阳的商旅也被抓当兵。后汉讨伐河中李守贞，征调五县民丁2万人修筑城垒。周世宗攻打北汉都城太原，征怀、孟（今河南孟县）、蒲（今山西永济西）、陕丁夫数万攻城助战；后来南渡淮河，征宋、亳（今属安徽）、陈、颍（今安徽阜阳）、徐（今属江苏）、宿（今安徽宿县）、许（今河南许昌）、蔡等州数十万丁夫攻寿州城。

与五代情况相同，十国强制征发百姓当兵的实例很多。南唐搜括百姓当兵，除老弱外，能披坚甲、持锐利兵器的骁勇之士，称为“排门军”。建州王延政与福州王延羲兄弟交战，多次发民为兵。北汉刘崇更严厉规定，按照户籍册的记载，征发境内丁壮当兵。吴越湖州刺史高澧擅自征兵，遭到当地百姓的强烈反抗，竟关闭城门，残酷杀死3000人。

这些被征发的兵士一部分人登上军籍，长期当职业兵，他们与召募来的兵士也就合而为一，都是国家的正规军。但一部分人在征战中从事运输粮草、修筑城栅，战事任务结束后遣返回乡，服役时间比较短。

五代十国统治者为应付各国之间频繁的战争，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普遍蓄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大批青壮年入伍当兵，甚至终身服兵役，不仅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影响，而且军费开支巨大，兵士衣粮赏赐也难以保证。“五代之际，民苦于兵”^②，繁重兵

① 《全唐文》卷一〇六，《讨王都制》。

② 《新五代史》卷五六，《何泽传》。

役给广大群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第五节 后勤保障

五代十国庞大军队所需要的兵甲器仗、战马、衣粮，绝大部分由国家供应。后勤供应的好坏直接关系军队能否稳定与作战的胜败。各国统治者对此十分重视，制定了有关的生产、管理制度。

一、兵器生产及管理

五代十国中央朝廷及地方藩镇都设有作坊（或称作院），由这些作坊生产兵器以供应军队的需要。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西巡陕州，蒲、雍（今陕西西安）、同、华等州刺史纷纷进献铠甲、戈戟。梁太祖后来与晋王李存勖争夺河北，屡战失利，河南尹张全义每月进献铠甲，补充后梁军队的需要。这些藩镇向梁朝中央进奉的兵器，当是本地作坊制造的。后唐设置甲坊使，专门负责制造铠甲。张敬询曾为晋王李克用专管甲坊15年，工作出色，唐庄宗又授为甲坊使，后升为刺史、节度使。唐庄宗还命令诸道制造天王甲以进奉中央。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昭义节度使奏报管内铜鞮（今山西沁县西南）等五县拾到甲仗6070副，已由本道作坊修理完毕，现送往邺都供朝廷使用。后晋出帝诏书说，各地作坊制造军器，残破较多，今后不许用金银装饰以谋求表面的华艳，而要注重坚实耐用^①。后汉隐帝不满大臣史弘肇、杨邠对自己的控制，深夜与心腹臣僚密谋杀史、杨时，还听到汴梁作坊锻造兵器的声音。后汉中央作坊制造兵器，夜以继日，相当忙碌。作坊使贾延徽备受汉隐帝的信任。

① 《旧五代史》卷八三，《晋少帝纪》。

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周朝廷对全国兵器生产进行了全面整顿，周太祖认为兵器生产有严重弊端：一是各地州府作院制造兵器，本来由国家拨给经费，但各地节度使、刺史又在辖区之内强行征发物品，“征敛数倍，民甚苦之”^①。他们还私造器甲，所耗原材料也取之于民。二是各州府制造器甲不精。因而决定全部停止各地作院的兵器生产，“选择诸道作工赴京作坊”^②，扩大和加强中央作坊的兵器生产。这次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显德五年（958年），周世宗一次赐吴越王钱弘俶骑军钢甲200、步军甲5000及其他兵器，国内还储藏大批兵器，满足了周世宗南征北战的需要。

同光三年（925年）后唐灭亡前蜀，收缴兵器700万件。天福十二年（南唐保大五年，947年）南唐军队攻打福州大败，丢失军需器械数十万。周世宗南征淮南，显德二年（955年）大败南唐北面行营都部署刘彦贞于正阳东，缴获军资器械三十万余件。南方有些国家一次作战使用这么多兵器，足见当地兵器生产的规模相当庞大。

对兵器的生产、管理，根据后周的情况，先是由中央政府每月规定诸道作坊制造兵器的数额，按季度运送中央，制造兵器的原材料主要由中央支付钱帛以备开支。后来，中央又直接控制兵器生产。五代各国对兵器的生产和管理有两点很值得注意。第一，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政府命令诸道不得擅造器甲。天福二年（937年），后晋政府因讨伐魏博范延光叛乱而指示各地禁造兵仗器甲，可是后晋、后汉不少藩镇兴兵作乱，首先需要大量的军需武器，绝不会停止当地作坊的军器生产。所以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又下令撤销各道的作坊。五代朝廷既需要地方政府组织作坊生产，为朝廷提供兵需甲仗，但又害怕各藩镇私自制造、占有大量武器，称兵作乱。这显然是五代诸国朝廷与地方政府内在矛盾的反映。第二，不许臣僚和百姓私自储藏兵甲。安重诲任后唐枢密使，深得唐明宗的信赖。有人密告安重诲私置兵仗，唐明

^{①②} 《旧五代史》卷一二，《周太祖纪》。

宗认为这是图谋不轨，对国家安全不利。尽管不少军将再三保奏，事情暂时缓和下来，但君臣之间从此发生了严重的裂痕，最后竟处死安重诲于河中。在此之前，汝州防御使张继孙私藏兵甲，招置部曲，也被唐庄宗赐死。后汉时，沿淮巡检使唐景思被人告发接受南唐重贿，私贮器械，准备充当内奸。后汉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立即派人逮捕，唐景思辩解说：倘查出我私藏一副兵甲，愿意接受处罚。^① 经过搜查，未发现唐景思私藏兵器，幸免遇害。南方吴国也禁止老百姓私藏兵器。五代各国对私藏兵器处罚极严，一般要处以死刑。

五代十国统治时间不长，军事技术发展主要有猛火油用于作战与弩机的改进。早在南北朝的北周时，突厥军队围攻酒泉（今属甘肃），北周军队利用玉门县（今属甘肃）出产的石脂水（石油）焚烧敌军的战具，保护了酒泉城。五代称石油为猛火油或火油。贞明三年（917年），吴国派遣使者向契丹帝阿保机送上猛火油，并谈到出兵攻城，“以此油然（同燃）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②。胡三省引《南蕃志》称，猛火油出产于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水上作战，用猛火油焚烧敌船。^③ 贞明五年（919年），后梁与晋王李存勖争夺德胜城（今河南清丰西南），双方水军在黄河上交战，晋军自上游“以木甕载薪，沃油然（同燃）火”^④，顺黄河水往下漂流。在柴草上面浇油，可引起大火，烧死很多敌人，这很可能是占城国的猛火油。显德五年（958年），占城国王因德漫派大臣甫阿散进贡猛火油84琉璃瓶。

除占城国外，还有从大食（伊朗）国进入的火油。贞明五年（919年），吴与吴越国水军作战，吴越国用火油燃烧对方的战舰，获得大胜。据《吴越备史》卷二《文穆王》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武肃王以银饰其筒口，脱

^① 《旧五代史》卷一二四，《唐景思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三年。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七〇，梁均王贞明五年。

为贼中所得，必剥银而弃其筒，则火油不为贼有”。这表明吴越国对怎样利用火油作战，以及防止火油落入敌军手中，都经过深入研究。

朱全忠初镇汴州，选拔富家身体强壮的子弟当亲兵，称厅子都。这支军队作战勇猛，使用“弩张一大机，则十二小机皆发，用连珠大箭，无远不及”^①。晋军非常害怕。显德三年（956年），后周大将赵匡胤进攻南唐寿州城，“城上发连弩射之，矢大如屋椽”^②。这些弩机的连续发射和“大如屋椽”的巨箭，说明五代弩机、箭的制造技术有所发展。

二、军马的来源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大片地区，国家牧场大部丧失，军马来源基本断绝，不得不出高价购买各少数民族的马匹。五代时期，战争频繁，战马损失多，仅契丹灭亡后晋就一次掠走军马2万匹，因而战马的缺乏尤为严重。五代十国统治者为满足骑兵的需要，主要采取国家牧养、括夺私马和向少数民族换取与购买马匹三条渠道来筹集马匹。

（一）国家牧养。五代十国存世时间较短，动乱多，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国家牧场。根据史料记载，只有相州（今河南安阳）、卫州（今河南汲县）、同州设置过牧监，另外，中央设有直属的飞龙院。

晋王李存勖进入河北与朱梁争夺中原，以康福为马坊使（一称小马坊使），在相州置牧场放牧。康福工作很有成效，繁殖马匹较多。天成元年（926年），唐明宗自魏州南下路过相州，从康福那里得马数千匹，军威大振。唐明宗后来授康福为飞龙使，继续

① 《旧五代史》卷六四，《王晏球传》引《清异录》。

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周世宗显德三年。

掌管朝廷的厩马。天成二年（927年），宰相任圜奏请说：周边各族及诸藩镇所进马匹，“请约旧制，选孳生马分置监牧”^①。这些监牧设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南）、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唐明宗时有马3.5万匹，超过了晋王李克用、李存勖时期的马匹，证实国家牧场养马确实有所发展。

天福八年（943年）十一月，后晋出帝到八角视察马牧。八角的具体地理位置不详，但出帝当时正在汴州，估计八角是离汴州不远而由飞龙使直接管辖的牧场。

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对侍臣说，诸军与飞龙院历来有不少老弱病马，可送同州沙苑监（今陕西大荔县南）、卫州牧马监进行放牧。同州沙苑监是唐代以来的老牧场。贞明六年（920年），晋方军将李存审与梁军战于华州，命王建及到沙苑放牧。卫州监可能是后周新设置的。

唐朝后期设有内飞龙使，以宦官充任，总管内厩的马匹。五代改由朝官出任飞龙使，如后唐康福、后汉李彦从、后赞等。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分飞龙院为左右，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飞龙院的职责仍然是管理朝中的厩马，但也要为军队提供一些马匹。总之，五代时期国家养马有地方牧监与朝廷的飞龙院，规模不大，而且时断时续，能提供给军队使用的马匹比较有限。

（二）括夺私马。五代诸朝因军事需要，屡次掠夺官员、百姓的私马，有“括马”、“征马”、“和市马”、“率马”等不同说法，但实际上都是封建政府公开搜括掠夺，后晋出帝诏书也公开承认“战骑不足，则假人之乘马”^② 的事实。

梁、晋双方在河北地区交战十余年，都不断“索取公私马”或“配买征马”。贞明元年（915年），晋王李存勖与梁军在河北魏州附近交战，命新州节度使李存矩出军。李存矩募劲兵数千人，强迫百姓以10头牛换1匹马从军。后唐出征前蜀，同光三年（925

① 《册府元龟》卷六二一，《卿监部·监牧》。

② 《旧五代史》卷八三，《晋少帝纪》。

年)六月命令，在河南、河北诸州，各级官员只许留下1匹马，其余由官家收取，藏匿不交则严加处理。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政府因抵御契丹军，在全国括马征兵，明确规定在京文武百官、主军将校、各道州府县镇、乡村士庶的马匹，都在抄借范围之内，即使体小瘦弱的马匹，也指定由各道统一收管，不退还本人。这次共掠夺马2000匹，民间大扰。后晋出帝与契丹交战，深感骑军力量不足，一再指示各地搜括私马以补充后晋骑军。

(三)换取和购买各少数民族的马匹。五代沿边地区有契丹、党项、回纥、吐浑、吐蕃等少数民族，产马很多。他们或以进贡马为名，换取五代各朝的大量物资，或双方开展互市贸易，用马、羊交换中原地区茶、绢等生活用品。后梁建国初，契丹阿保机出兵云州，与晋王李存勖结成联盟，给李存勖马3000匹，晋王以金、缯数万相赠。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割幽、云等16州给契丹，契丹送良马20匹，战马1200匹，帮助石敬瑭军队进攻后唐。回纥、党项、吐浑各族统治者也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马匹。“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值以给之，然计其馆给锡赉，每年不下五六十万贯。”^①天成四年(929年)，后唐朝廷认为费用浩大，难以支付，决定在沿边地区置场买马，不许各少数民族直接送马到洛阳出售。

南方诸国因地理条件的关系，战马利用受到限制。但各国为增强国防力量，仍想方设法购买马匹，建立骑军。前蜀王建自唐末大顺二年(891年)攻入成都后，不断从文(今甘肃文县西南)、黎(今四川汉源东北)、维(今四川理县东北)、茂(今四川茂汶)诸州购买马匹。天复三年(903年)，宣武节度使使者王殷在成都对王建说，蜀川甲兵真多，但缺乏战马^②。王建很不高兴，立即命令各州将马匹集中在星宿山检阅，共有官马8000，私马4000，显示出西川拥有马匹的实力。吴、南唐两国地处江淮，离契丹遥

① 《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羌》。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昭宗天复三年。

远，但为了对抗中原各国而长期与契丹保持着联系，沿海路运回不少战马。

从上述可见，五代十国军马的来源，主要通过国家牧养、括夺私马以及向少数民族换取和购买马匹三条途径。但国家牧场少，养马数量有限；强行掠夺又遭到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从沿边地区购买马匹路途远，行运困难，一旦双方关系恶化，互市买马就被迫停止。由于五代十国战马缺少稳定可靠的来源，“国家常苦马不足”^① 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骑军队伍的建设。

三、军需衣粮的供应

前面叙述五代兵役制度时，已说明各国军队衣粮由国家供给，国家还定期或不定期对军队赏赐钱物。试以后周 30 万兵士为例，全国一年就需要米 216 万石，绢布 360 万匹，赏赐兵士钱物多少尚无从知道。然而这只是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一旦发生战争，耗费更多。周太祖说：“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②。可见军事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后周财政收入扣除军事费用，“鲜有赢余”，其他一些国家很可能已入不敷出。

后梁置建昌宫，以博王朱友文判院事，掌管全国财政，筹办军队的后勤供应事务。后来废建昌宫，改置国计使，以张全义为使。后唐灭梁，派孔谦为租庸使，负责供应军需，及时满足了全国军队的需要。后唐明宗诛孔谦，废租庸使，按照唐后期旧例分盐铁、户部、度支三司，正式设置三司使，以张延朗担任。开运元年（944 年）冬，后晋出帝准备北上抗击契丹，特诏令“所有供亿，宜令三司预行计度”^③。由三司使掌管全国经济，主管全国军

① 《五代会要》卷二九，《党项羌》。

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周太祖显德元年。

③ 《旧五代史》卷八三，《晋少帝纪》。

队衣粮赏赐，从此一直延续到后周灭亡。

五代推行两税法的赋税制度，全国两税收入划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即分别由各国中央、藩镇节度使、州刺史三级所有，各占一定的数额。与此同时，全国军队的衣粮饷赐也同样由中央政府、各道节度使、刺史三级负担。中央主要供养禁军，节度使供养藩镇兵，州刺史供养州兵。战争时期征集的军队由中央财政开支衣粮，另派转运供军使、转运制置使、粮料使等官员筹办前线兵士的军需供应。

五代各国在军队集结地区附近设置粮仓，储存粮食，准备随时就近供应军队的需要。河北地区是梁、晋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也是五代各国防御契丹南下的前方基地，所以靠近运河的贝州（今河北清河西）与所属临清县（今河北临西），以及濒临黄河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等交通便利地区，储粮很多。贞明元年（915年）魏州之战，晋将周德威与梁将刘鄩同时抢占临清县，周德威事先夺取、控制了临清县储存的大批粮食，军粮充足，给后梁方面带来严重的威胁。后晋为防止契丹南犯，在贝州储粮数十万石，天福八年（943年）契丹军队攻占贝州，这些粮食为契丹所得。后唐郭崇韬讨伐前蜀，夺取前蜀威武城粮20万石，凤（今陕西凤县东北）、兴（今陕西略阳）等州粮各40万石，三泉县（今陕西宁强西南）粮40万石，成都粮253万石，可见前蜀在京师成都及一些军事重镇都储存了很多粮食准备供应军队的需要。

广顺三年（953年）十一月，后周单州刺史刘禧奏请说，本州仓库粮食除留足州内军队一年多食粮外，还剩下大麦6万石，准备开仓出卖赈济贫民，得到了周太祖郭威的批准。^①十二月，亳州、颍州地区大水，后周朝廷指示这两州除留足军队一年的食粮外，其余仓储粮食减价出售。^②这说明后周一些州也储存了不少粮食，供应当地驻军的食用。

战争爆发时，五代各国经常在作战前线集中大批军队，有时

^{①②} 《册府元龟》卷一〇六，《帝王部·惠民》。

多达几十万人。这些军队的食粮除利用就近各地仓库的储粮外，还及时从附近地区征调粮食，甚至从京师运送到前方战场。开平元年（907年），后梁军队攻打潞州，征发河南、河北民众向潞州前线运输军粮。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北面招讨使王晏球攻打王都占据的定州（今属河北），命定、祁（今河北无极）、易（今河北易县）三州百姓缴纳租税，直接供应后唐定州行营军队食用。长兴元年（930年），后唐大将石敬瑭出讨后蜀，关中各藩镇“钱帛、刍粮昼夜辇运赴利州（今四川广元），人畜毙踣于山谷者不可胜计”^①。由于刍粮的缺乏，石敬瑭被迫收兵。后晋将军张彦泽屯军恒州（今河北正定）、定州，晋出帝命邢、魏、相、卫诸州军队运送军粮。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乘高平之战大胜之机，集中数十万大军进攻北汉刘崇盘踞的太原城，军粮不足，一方面向太原附近诸州征纳当年粮租，劝诱地主、富商输粟买官，凡纳粟500石、草500围者，赐予当官的资格，纳粟1000石、草1000围者，授以州县官。同时命令河东地区泽、潞、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慈（今山西吉县）、隰（今山西隰县）及靠近太原的河北邢、赵（今河北赵县）、镇（今河北正定）、定诸州向后周太原行营运送军粮。周世宗后来出军河北，“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②，由京师汴州直接运往河北前方战场。

五代十国向广大群众征取的巨额赋税，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军需开支，财政多入不敷出，经常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各国政府为了筹措军需物资，往往派出大批官员分赴全国各地搜括财物，广大群众的粮食、钱帛、马匹，以及青壮年劳动力，都成为官员们掠夺的对象。这样的大势搜括，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也不多见。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唐明宗长兴元年。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一九，《周世宗纪》。

第六节 军事法规

五代统治者重复“古之用兵，必先立法”^①的主张，制定并运用严格的军事法规，严肃军事纪律，以加强和维护军队的战斗力。后唐清泰元年（934年）及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中央朝廷先后发布两道诏令，一再指示官兵上下之间必须高低界线分明，服从指挥，如有违犯，一律按军法处置，决不姑息。倘兵士犯罪，交本都副兵马使处理；副兵马使犯罪，委本都都头科罚；都头犯罪，由都指挥使报请中央裁决^②。这样严格规定军队内部上下高低的隶属关系，强调下者服从上者，统一国家军队的行动，也是鉴于唐末以来骄兵悍将不断犯上作乱的历史教训而采取的防止叛乱的重要措施。

五代以前，李唐王朝制定的《唐律疏议》是我国封建社会保存下来较完整的第一部封建法典，涉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军事法律几十条，包括征发、召募、调动、宿卫、戍守、作战、兵器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对五代军事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后唐御史台奏请说，制定刑法律令，一定要符合唐朝的旧制^③。天福十二年（947年），南唐冯延鲁擅自出征福州，被吴越军队打败，御史中丞江文蔚弹奏窃弄朝廷大权的冯延己^④、魏岑一伙人：“福州之役，岑为东面应援使，而自焚营壁，纵兵入城，使穷寇坚心，大军失势。军法逗留畏懦者斩。律云主将守城，为贼所攻，不固守而弃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掩覆者皆斩”^⑤。知制诰徐铉、史馆修撰韩熙载也上表说：“（陈）觉、（冯）延鲁罪不容诛，但（宋）齐丘、（冯）延己为之陈请，故陞

①② 《册府元龟》卷六六，《帝王部·发号令五》。

③ 《旧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

④ 此据《南唐书注》和《资治通鉴》，也有史料作冯延己。

⑤ 《十国春秋》卷二五，《江文蔚传》。

下赦之。擅兴者不罪，则疆场有生事者矣；丧师者获存，则行陈无效死者矣。请行显戮以重军威。”^①这里所指的擅兴、逗留怕敌、失守城池等罪名，与《唐律疏议》中有关军队行军作战的某些法律规定相同。尽管五代各国制定的律令格式已全部遗佚，但我们参照唐代的军事法律，结合五代的具体事实，仍可以了解五代军事法规的大致情况。

五代干戈扰攘，战争频繁，各国统治者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实行有关军队作战的法规极为严厉。据史料载，梁太祖曾规定，凡将校战死疆场，他们所统领的兵士全部处死，称为“跋队斩”。这引起后梁兵士们的强烈反抗。开平二年（908年），晋军占领潞州，梁朝大将李思安久攻不下，死伤将士上万人，梁太祖将李思安削职为民，监军杨敏贞被处死。开运元年（944年），契丹十余万大军南下，在澶州（今河南清丰西）一带与晋军发生激战，晋护圣指挥使协霸叛变投敌，逃入契丹军中，其全家被诛杀。护圣第二军都指挥使安重怀、指挥使乌韩七、监军何彦超等临阵胆怯，手失兵仗，也都被处死。周世宗为严肃军事法纪，坚决按军法从事，将高平作战败将樊爱能、何徽等全部杀死。

周世宗出征南唐，长时期集中兵力攻打寿州。南唐寿州节度使刘仁瞻在寿州城内孤军奋战，曾主动要求南唐齐王李景达准许他出城决战，未得批准，忧郁成疾。显德四年（957年），刘仁瞻幼子刘崇谏夜晚泛舟偷渡淮河，准备进入后周营地，被南唐兵士抓获。刘仁瞻将刘崇谏腰斩示众，左右军校都不敢出面营救。监军使周廷构哭于军门，要求释放刘崇谏，刘仁瞻不准。周廷构又求救于刘仁瞻夫人，夫人说：“妾于崇谏非不爱也，然军法不可私，名节不可亏；若贷之，则刘氏为不忠之门，妾与公何面目见将士乎！”^② 命迅速斩杀。刘仁瞻夫妇严格执行军法，大义灭亲，在古代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传为佳话。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周世宗显德四年。

关于行军出师，五代统治者法令严明，又十分具体。李存勖初即晋王位，军事力量远不及后梁，决心训练士卒，加强战斗力。他命令骑兵没有遇到敌人不许乘马，保持部队充沛的战斗力；各支部队在行军作战中不得互相穿越，或停滞不前，回避险恶；各路兵马分道并进，必须按时到达指定的集结地点，不准拖延时间。违犯以上各项规定，坚决处斩。同光三年（925年），后唐大军出讨前蜀，前锋队伍到达宝鸡，招讨判官陈乂佯称患病，逗留不进，都统判官李愚指责陈乂害怕困难，动摇军心，将其斩首示众。后晋末，河东刘知远命大将史弘肇为南下大军的前锋，军队所过之处，如侵犯老百姓田苗或在树上系马，都要处死。有位指挥使稍不从命，立即被杀。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兗州节度使慕容彦超据城反叛，周太祖出兵讨伐，规定诸军进入兗州城内，不得在居民村舍停留，犯者按军法从事。由于这些措施和规定在军队中得到贯彻，号令严明，行动统一，为保证作战取胜起到重要的作用。

五代时期，军队中官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兵士们不堪忍受官将的役使，或衣食不济挨冻受饿，纷纷逃亡反抗。五代有些统治者采取极为严厉的黥面（即在脸上刺字）措施，以便寻捕和处分逃亡兵士。如后梁召募兵士时，在其脸部刺上军号，倘他们逃跑，各地关防根据其脸部所刺的军号而及时逮捕归案，严厉镇压。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征兵10万人，他们脸上都刺“定霸都”三字作为军号。以儒学闻名的幽州人赵凤害怕当兵刺字，剃光头发，入寺为僧。长兴元年（930年），东川节度使董璋检阅兵士，全部剪发刺面。后汉赵思绾镇守长安，阴谋反叛，自己带头在脸上自刺，长安兵士都效法行事。此外，五代对逃亡兵士还时而诛杀他们的家属。后周朝廷显德元年（954年）命令，所有逃亡军健，不管途程远近，必须及时派人逮捕，严加处理。

五代统治者以法治军，最大阻力是唐末以来骄兵集团的存在。不论是中央禁军或地方藩镇兵，不少兵将结党营私，骄横跋扈，不顾国家法令，多次发生动乱，借拥立帝王将帅以邀求重赏。有些

统治者害怕骄兵作乱，多次厚赏骄兵，不敢绳之以法。晋王李克用有亲军万人，纪律败坏，有人劝他进行整顿，李克用回答说：“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① 到后周时骄兵情况才有重大改变。

五代统治者为了自身和本阶级的利益，有法不依，事例很多。由于武夫当权，不顾法令，滥杀兵士、百姓，尤为突出。后晋刘知远一次杀死后唐降军千余人。后汉史弘肇、苏逢吉、刘铢、赵思绾杀人如麻，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飞黄腾达。至于在战争过程中实行屠城的残暴行为，更骇人听闻。

① 《旧五代史》卷二六，《唐武皇纪》。

第三章 后唐灭后梁及平蜀战争

第一节 后梁建国后的形势与李克用的扩张发展

一、后梁建国后的形势

后梁开国者朱温参加过黄巢起义军，投降唐朝后，授为河中节度使，赐名朱全忠。中和三年（883年）出任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以汴州（今河南开封）为基地，善于选拔、重用从各方面归附的军将，不断扩大军队。他采用集中兵力、分别击破的策略方针，先后吞并了河南一些藩镇，迫使长期嚣张一时的河北藩镇屈膝归附，将河东李克用围困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南）及其附近地区，并出兵攻占河中（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大败凤翔（今属陕西）李茂贞。朱全忠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最强大的军事集团首领。他囚禁并杀死唐昭宗，又立年仅13岁的辉王李祚为帝。唐末天祐三年（906年），河东军将李嗣昭攻打潞州（今山西长治），梁昭义节度使丁会投降，朱全忠害怕引起连锁反应，于次年四月灭亡唐朝，建立五代第一个中原王朝——梁国，史称后梁。

朱全忠急忙称帝建国，标志着他的实力已经达到顶点，但又是向下滑坡的重要转折。

唐王朝在黄巢起义后已日暮西山，但朱全忠要灭亡存世近300年的李唐王朝，独吞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不仅遭到盘踞各地的军阀的反对，即使在梁国内部，也由于封建社会忠君伦理的影响，引起一部分人的强烈不满。朱全昱就痛斥弟弟朱全忠灭亡唐朝，绝不会有好下场。占领西川的王建、淮南杨渥都把自己打扮

成保卫唐朝的忠臣，致书诸道，表示要与太原李克用、凤翔李茂贞共同出兵讨伐后梁，兴复唐室。幽州刘守光自恃地广兵强，正加紧在幽州（今北京市西南）称帝的准备。军阀们各有打算，无法建立一致进讨朱全忠的联合阵线，但他们共同反对朱全忠灭唐建国，使朱全忠在对付周围军阀的斗争中相当孤立。

朱全忠为加强对魏博镇的控制，曾在天祐三年（906年）秘密勾结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残酷屠杀魏博牙军8000人，并杀害其家属，连妇女、小孩都不得幸免。这很快激起魏博军队的动乱，朱全忠出动大军残暴镇压，半年之后才平息下来。河朔其他藩镇深怕魏博事件再次重演，对朱全忠的残暴和对藩镇的控制也深感不满。

朱全忠由藩帅当上皇帝，对所属功臣武将严加防范，动辄诛戮杀害。氏叔珍曾攻打泽潞（治潞州，今山西长治）、汾州（今山西汾阳），大败晋王军，升任节度使。曾任武宁军留后的朱友恭，后迁为左龙虎统军。朱全忠密诏氏、朱二人杀唐昭宗，但不久借口二人军政不修而杀人灭口。朱珍是朱全忠的心腹大臣，战功显赫，因专杀李唐宾而被处死，几十员大将为朱珍请赦，朱全忠也不肯赦免。刘知俊原来事徐州节度使徐溥，后降于朱全忠，持剑斗敌，勇冠诸将，在讨伐秦宗权、时溥、王师范、李茂贞作战中均立有战功。朱全忠见刘知俊威望很高，猜疑日甚，刘知俊遂背梁而归附凤翔李茂贞。刘知俊后来攻打灵武（今属宁夏），大败梁军。李谠、李重胤、范居实等人也以种种罪名遭到杀害。《资治通鉴》卷二六八说，后梁“功臣宿将往往以小过被诛，众心益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朱全忠对外广树仇敌，对内滥杀功臣战将，内外离叛，人心涣散，从而导致对河东李克用、李存勖斗争的节节失利。

二、李克用父子的军政改革

李克用，本姓朱耶氏，是内迁今山西北部的沙陀族人。祖父

朱耶执宜，唐宪宗朝蔚州刺史、代北行营招讨使。父朱耶赤心，唐懿宗朝咸通年间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赐姓名李国昌，授任振武节度使。黄巢大起义爆发后，唐朝各地藩镇武力溃不成军，唐僖宗命李克用为大同节度使。不久，李克用率军 3.5 万人开赴关中，残酷镇压义军，重新占领长安（今陕西西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河东诸州未经战乱破坏，物力雄厚，兵马精壮，四周又有关险可守，李克用军很快成为唐末的强大军事集团。

黄巢起义军自长安撤至河南后，河南藩镇均无力阻挡。汴州朱全忠、徐州（今属江苏）时溥请求李克用出兵。中和四年（884 年），李克用驰赴河南，会同汴、徐军队大败义军。当李克用回师途经汴州附近，朱全忠设伏兵杀死河东监军陈景思等三百余人。李克用得到随从亲将的保护，免遭毒手，逃回太原。从此以后，河东、宣武两大宿敌进行了将近 40 年的战争。

李克用以太原为基地，拥有北方少数民族人组成强大骑军，又收骁将李嗣昭、李嗣源、李存孝等为养子，充当军队的骨干，战斗力很强。河东军队四出作战，南巡泽（今山西晋城）、潞，略地怀（今河南沁阳）、孟（今河南孟县），北占云（今山西大同）、幽，成德、易定两镇主动归附，邢（今河北邢台）、洛（今河北邯郸东北）、磁（今河北磁县）三州力屈归降，南至河中，西入关中，大败邠州（今陕西彬县）王行瑜，迫使华州（今陕西华县）韩建、凤翔李茂贞乞盟结和，河东军实力迅速增强。但是，河东军队“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昼剽攘，酒博喧竞”^①，军纪极端败坏。李克用到处作战，疲于奔命，军队损失很多。李克用所占之地，往往得而复失，不断遭到朱全忠的攻击。天复二年（902 年），当太原被朱全忠围攻时，李克用惶恐万分，召集诸将领商议对策。李存信鉴于关东、河北地区都受朱全忠控制，河东兵少地狭，难以抵挡朱全忠的进攻，要求撤离太原，“且入北虏，徐图进取”^②。李

① 《旧五代史》卷二七，《唐庄宗纪》，中华书局版（下同）。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昭宗天复二年。

克用也赞同李存信放弃太原、逃往代北的主张。因刘夫人及不少将领的反对，李克用改从众议，命李嗣源等奋勇抗敌，击退梁军，保住了太原。李克用在连战中丧地失兵，势孤力弱，龟缩在太原附近，几年间不敢与朱全忠争战。

由于河东镇面临危亡的窘境，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着手进行军政改革，力图摆脱困境，重振昔日雄风。天复二年（902年）三月，河东掌书记李袭吉献策，要求李克用“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①。李存勖也说“当遵养时晦，以待其（指朱全忠）衰，奈何轻为沮丧，使群下失望乎！”^②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决定抓紧时机，“训兵务农”，稳定社会秩序，增强实力，再伺机出击。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一）**严肃军纪，训练军队。**李克用、李存勖决心加强士卒训练，对行军作战制定严明的纪律，一旦违犯，决不宽恕。晋王军后来在柏乡之战中，“进退有序，步骑严整，寂然无声。帝（指李存勖）临阵誓众，人百其勇，短兵既接，无不奋力”^③，充分显示出河东军队经过整顿后作战能力的增强。

（二）**整顿内部，稳定统治秩序。**李克用收壮士为养子，派遣他们充当军将。这些人自恃掌握军权，又年长于李存勖，对李存勖袭位河东节度使十分不满。他们密谋作乱，怂恿河东蕃汉都知兵马使李克宁谋害李存勖，投降后梁。李存勖得到河东监军张承业的大力支持，果断地处决李克宁、李存颢等人，保证了河东统治秩序的稳定。李存勖命令各地推荐有才能的人士，并罢免贪官恶吏。河东马步都虞候李存璋坚决贯彻李存勖的意图，在河东地区诛杀为非作歹的地方豪强，纪纲大振。

（三）**减轻租赋，发展生产。**河东监军张承业长期留守太原，蓄积钱帛，收市兵马，招怀流散，劝课农桑，为发展河东地区经济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潞州经过梁、晋长期交战而遭到严重破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昭宗天复二年。

③ 《旧五代史》卷二七，《唐庄宗纪》。

坏，市井萧条，泽潞节度使李嗣昭及时减轻租赋，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四）联合各地藩帅，孤立后梁。李克用、李存勖改变过去到处树敌的不妥作法，尽可能联合较多的藩帅，如幽州刘仁恭与刘守光、镇州王镕、定州王处直、凤翔李茂贞、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等，使后梁处处受到牵制。

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军政改革，增强了河东的军事、经济实力，为争霸中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梁、晋矛盾的激化及双方的战略

中和四年（884年），朱全忠谋杀李克用未遂。李克用逃回太原后，八次上表唐朝廷，要求讨伐宣武镇。朱全忠作贼心虚，自诉系唐朝廷与宣武牙将所为，与他本人无关。但那时双方正忙于扩张地盘，兼并周围藩镇，尚未直接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朱全忠后来吞并河南诸镇，进军河北，占领河中，军事力量远远超过河东，双方矛盾迅速激化。

朱全忠见吞并河东一时难以得逞，又忙于围攻凤翔李茂贞，乃及时将唐昭宗抢到手中。李克用、李存勖也正在着手进行军政改革，发愤图强，等待时机，梁、晋之间的矛盾在天复二年（902年）后暂时有所缓和，双方信使往来，表示重归旧好。朱全忠在建国前后制服了周围的不少藩镇，与朱全忠直接抗衡的有幽州刘仁恭、凤翔李茂贞、淮南杨渥。但这些人实力有限，唯有李克用是朱全忠统一北中国的最大障碍。梁、晋双方势不两立，都决心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休。

晋方统治中心太原与后梁国都汴州相距较远，相互之间还有太行山连亘1000余里的阻隔，任何一方想一举占领对方统治中心，迅速灭亡对方，都很难实现。朱全忠已有两次兵败太原城外的深刻教训，李克用这时实力较小，正忙于内部改革，也难以单独与朱梁直接抗衡。因此，李克用的战略企图是先进军河北，竭

力争取河北藩镇，共同组成抗击后梁的联合阵线，不断扩大军事力量，伺机从河北渡黄河南下，直逼汴州、洛阳。朱全忠仰仗自己的强大实力，决心先用武力征服河北诸镇，再经河北西出太行，从河南北上，并从东、南两个方向夹击太原。同时，梁、晋双方也不放松对晋东南战略要地潞州的争夺。

第二节 梁、晋争夺潞州之战

一、梁军围攻潞州

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在后梁建国前夕占据幽州、沧景两道，伺机扩张。天祐三年（906年），朱全忠亲自出征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刘守文（刘仁恭子）困守城内，粮尽兵危，刘仁恭前后派出使者向晋王李克用求援。李克用痛恨刘仁恭反复无常，不肯应允。李存勖却认为这是争取河北藩镇、打击朱全忠的有利时机。李克用遂决定联合幽州兵进攻潞州，既可以解沧州之围，与幽州刘仁恭结成联盟，又能占领晋东南重镇潞州。这一箭双雕，诚为良策。

潞州，古称上党，靠近太行山西侧，地势险峻，居高临下。自潞州出发，往北过石会关（今山西沁县北）直逼太原，东过壶关（今属山西）则进抵相（今河南安阳）、卫（今河南汲县），逼近魏博，南至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可以切断河东与河中的联系，或沿汾水北上翻过阴地关（今山西霍县西北）向太原进发，南下怀、孟直奔洛阳（今属河南）、汴州。占领潞州对梁、晋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天祐三年（906年）十月，李克用派周德威、李嗣昭联合幽州军队，共8万人^①，攻打潞州。梁昭

^① 《新五代史》卷二五，《周德威传》载，“晋遣德威将五万人为燕攻梁，取潞州”，《资治通鉴》卷二六五载，刘仁恭“遣都指挥使李溥将兵三万”与周德威共攻潞州，则双方共出兵潞州为8万人。

义节度使丁会因对朱全忠杀害唐昭宗非常不满，又害怕朱全忠乱杀大将，自己也遭连累，乃不战而降，开城门迎接晋军进入城内。闰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全忠在沧州前线听到潞州失守的消息，立即烧毁沧州行营的刍粮，二十六日从沧州撤军。

开平元年（907年）五月十六日，梁太祖朱全忠命保平节度使康怀贞为招讨使，领10万大军进攻潞州^①。朱全忠的战略意图是乘晋方新得潞州而尚未稳定之机，用强大军事力量发起猛攻，夺回潞州，占领对河东李克用作战的战略要地。

六月，康怀贞赶到潞州，派军队昼夜轮番进攻半个月，毫无进展。接着改变策略，筑城挖堑，将潞州城团团围住。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闭城拒守，顽强抗击。与此同时，晋王李克用派名将周德威为潞州行营都指挥使，领兵5万，率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锋指挥使史建瑭、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使李嗣源、骑将安金全等将领驰援潞州。八月，康怀贞派军将秦武攻打周德威所率晋军于高河（今山西屯留县东南），被晋军击败。

八月十二日，梁太祖鉴于康怀贞进攻潞州失利，重新任命李思安为潞州行营都统。李思安率领兵马来到潞州城下，在康怀贞所筑城墙之外，另筑新城，合称为夹城。李思安企图对潞州进行更严密的封锁，既防止潞州城内守军突围外逃，又阻止晋军前来增援，等待城内粮尽兵疲再发起攻击。

晋将周德威屯军于潞州城西北的余吾寨，见后梁军锋尚强，暂不出动主力与敌人决战，而多次派小股骑兵拦截后梁送往前的军粮，阻拦后梁骑军到夹寨外面放牧；同时，又不断破坏夹城，填平沟堑，每天进攻数十次，打死后梁将校40余人，兵士死亡以万计。开平二年（908年）三月，梁太祖再次撤换潞州前线领兵统帅，将潞州行营都统李思安削职为民，杀死监军杨敏贞，任命刘知俊

^① 此“10万大军”以《旧五代史》卷二三《康怀英传》所载，但《资治通鉴》卷二六六云，“康怀贞（又名康怀英）将兵八万”，说法不一。

为潞州行营招讨使。梁太祖亲自到达泽州视察前线的战况。

二、晋军大举反击

开平二年（908年）正月，晋王李克用病死，子存勖袭王位。这时形势剧变，迫使梁、晋双方重新研究对潞州之战的部署。

梁太祖抵泽州十余天，见前线没有出现新情况，准备解除对潞州之围，班兵还朝。但诸将领认为李克用已死，晋援军自余吾寨撤退，潞州城内守兵孤立无援，梁军会很快取胜。梁太祖连忙改变主意，放弃了从潞州外围撤退的打算，还认为即将收复潞州的大局已定，自己于四月十二日回到汴州。攻打潞州的梁军也盲目骄傲轻敌，麻痹大意，放松了对晋军的监视戒备。

晋王李存勖即位后，很快制止了叔父李克宁的政变阴谋，内部政局迅速稳定。李存勖随即与诸将商讨潞州之战的对策。他说：梁、晋双方交战，朱温只害怕我父亲先王。他认为我刚即王位，年纪很轻，不懂军事，必然会产生骄傲怠慢的思想。倘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简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①。晋王李存勖决心亲自出征，利用敌人疏忽防备，突出奇兵以解除潞州之围。河东监军张承业也十分赞同李存勖的主张。四月二十四日，李存勖率晋军出征，每天行军近100里，于二十九日下营于潞州北面45里的黄碾。五月初一，李存勖领亲军设伏在屯留县（今属山西）东南的三垂冈。第二天早晨漫天大雾，晋军抓紧时机，直抵夹寨。晋将李嗣源、周德威、李存审分三路发起反击。这时，梁军没有派兵侦察、设防，夹寨内兵士尚未起床，更没有想到晋军突然到来。李嗣源首先从夹城东北角打开缺口，梁军慌成一团，往南逃窜，丢弃兵甲满地皆是，晋军俘梁副招讨使符道昭大将等300人，彻底解除了梁军对潞州的包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梁太祖开平二年。

从开平元年（907年）五月到次年五月的潞州之战，是梁朝建国后同晋王进行的第一次大战。梁朝的军事、经济力量远远超过晋方。倘梁军长期围困潞州，及时设防阻止并打击河东的晋援军，特别是朱全忠到达泽州后，再深入到潞州前线，利用李克用之死以及晋援军撤退的有利时机，亲自指挥梁军作战，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梁军从这场战争开始就一筹莫展，三换主帅，伤亡惨重，关键在于缺乏作战的正确指导。梁军先打算从晋州、相卫两个方向实行东西夹击，以强大兵力突然占领潞州。一旦进攻受阻，又改为筑夹城长期包围，伺机决战。当包围不能奏效，朱全忠又准备撤退。李克用之死，朱全忠更盲目乐观，自己不督促作战而回到汴州，梁军也放松了戒备。这样指挥作战，朝令夕改，注定是要失败的。

晋王李存勖在乃父李克用死后不久，当机立断，统帅大军赶到潞州前线，亲自指挥作战，这与朱全忠犹豫不决、临阵退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晋方将帅团结一致，士气高昂，无疑是潞州之战取胜的根本原因。其次，晋将周德威不急于与暂时强大的后梁军队硬拚，而先用轻骑骚扰、破坏，使梁军蒙受重大伤亡。这不仅牵制了敌方的进攻，还为最后决战创造了有利战机。再次，当晋军转入反攻时，使用骑军实施远距离突然奔袭，兵临城下，出敌不意攻破梁军夹城。晋方这些军事谋略的运用都是很成功的。

潞州之战结束后，梁、晋大军又移师河北，连年大战。

第三节 梁、晋争夺河北之战

河北地区北接大漠，南临黄河，东靠大海，西隔太行山与河东交界，境内平原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潞州之战爆发时，河北地区有卢龙刘守光（沧州节度使这时由刘守光控制）、成德王鎔、易定王处直、魏博罗周翰四个藩镇。刘守光出兵帮助河东李存勖，魏博站在后梁一边，成德、义武（又称易定）两道按兵不动，密切注视着这场战争的动向。后

梁不甘心潞州战役的失败，一度命镇国军节度使杨师厚、相州刺史李思安领兵屯驻泽州，准备再次攻打潞州。后因怀疑成德节度使王镕与晋方相通，就首先挑起争夺河北的大战。

一、柏乡之战

(参见附图 1)

开平四年（910 年）十一月，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出兵进驻易州涞水县（今属河北），准备攻占定州（今属河北）。梁太祖急派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将魏博兵 3000 人分别进入深州（今河北深县西）、冀州（今河北冀县），借口帮助成德镇防御燕兵南侵而企图夺取成德镇。成德、义武两道使者来到太原，向李存勖乞求援兵，并推举李存勖为共同联合的盟主。李存勖不顾军将们的反对，果断地作出决策，派周德威领兵途经井陉（今河北井陉县东北）进驻赵州（今河北赵县），与义武、成德两道一起抗击后梁。

十二月三日，朱全忠得知晋军进驻赵州，并与成德镇结成联盟，乃命北面行营招讨使王景仁、副招讨使韩勣统兵出击。四日，王景仁自河阳（今河南孟县）渡过黄河，会同魏博罗周翰军，合 4 万人^①，屯驻邢、洛二州。二十一日，王景仁进抵柏乡（今属河北）。王景仁、韩勣离开洛阳前夕，朱全忠告诫他们说：王镕反复无常，终将是梁朝的后患。现将精兵交给你们，即使镇州有铁打的城墙，也一定要为我攻占下来^②。可见后梁这次出征的目的是首先吞并成德镇，进而夺取整个河北。

成德节度使王镕见后梁大军进逼，形势险峻，再次向河东求援。李存勖以蕃汉副总管李存审留守太原，亲自领兵经赞皇（今

① 后梁出军人数，史有 10 万、8 万、7 万、4 万人四种说法。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七载，后梁在柏乡作战失败，有 2 万人被杀，收集逃散兵士万人，还有部分兵士被俘，则后梁出兵 4 万人说法较妥。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梁太祖开平四年。

属河北)东进，义武王处直也派兵5000人随同出征。二十五日，李存勖到赵州与周德威会合。二十六日，李存勖继续前进，离柏乡30里，派遣周德威以骑兵向梁营挑战，梁军坚壁不出。二十七日，晋军营于野河(即槐水之别名，源于赞皇县西南，经柏乡东流)北面，距柏乡仅有5里，再派骑兵向梁军营地驰射，诱敌外出。梁将韩勍等领步骑3万人，分三路出战^①。晋兵士见梁军铠甲精美，光彩夺目，有些害怕。周德威激励将士们说：这些军队属于后梁天武禁军，多出身于屠沽商贩，衣铠鲜美，徒有其表，十个也不如我军一人^②。周德威亲引千余骑攻击梁军左右两翼，轮番冲杀，俘梁军百余人，离野河不远而止。梁军也退回营内。

经过上述作战，晋军和梁军尚未最后决定胜负。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关于下一步的作战方略，周德威向李存勖建议说，梁军众多，兵锋强甚，又驻守在柏乡城内；我们骑兵便于在平原旷野奔驰突击，难以在攻城作战中发挥作用，要求“按兵以待其衰”^③，先疲困梁军，再伺机出击。李存勖认为晋方孤军远来，救人危急，与成德、义武两道仓促联合，难以旷日持久，“利于速战”^④。他对周德威的言论很不高兴，退卧帐中，其他将领都不敢进言。周德威坚持己见，又急忙谒见河东监军张承业说：我们与梁军仅一水之隔，相距很近。倘他们造桥过河作战，晋军将会全军被歼。晋王在这种形势下主张速战是急躁轻敌的表现。我们只有“退军高邑(今属河北)，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⑤。张承业当即向李存勖报告：周德威是知兵善战的老将，他的作战谋略不可忽视。恰在这时，李存勖从晋方审讯梁军俘虏中得知梁军正在建造浮桥，准备过野河袭击晋军。这与周德威对敌情估计完全相同，李存勖便采纳了周德威的作战方案，命令全军退至距柏乡30余里的高邑地区，不与梁军在野河两侧对峙，以等待有利时机。

①②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梁太祖开平四年。

梁军屯驻柏乡，缺少喂养战马的草料，派兵士在营地附近割草。周德威命骑军不断袭扰。梁军害怕晋方伏兵，再不敢外出，只得拆茅屋、坐席作为饲料，战马饿死很多，损失严重。

乾化元年（911年）正月二日，周德威为诱敌出战，与别将史建瑭、李嗣源领精骑3000逼近梁营，大声谩骂。梁将王景仁、韩勣被晋军激怒，全军出战。周德威且战且走，退至高邑南面。晋将李存璋阵于野河北侧。梁军横亘数里，拚命争夺野河桥，准备渡河北进。李存勖见镇（今河北正定）、定二州步兵防守河桥难以支持，命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及（又名王建及）选精兵200协助固守，才打退梁军的进攻。梁、晋双方战斗一个上午，胜负未定。李存勖有些急躁，打算立即与梁军进行决战。周德威连忙谏阻说：“观梁兵之势，可以劳逸制之，未易以力胜也。”^①梁军离开自己营地三十余里，尚未吃饭，俟日落之后，饥渴疲累，必无斗志，我们再“以精骑乘之，必大捷”^②。李存勖很快改变了自己速战速决的主张，采纳周德威以逸待劳、伺机决战的作战方案。双方战斗到傍晚，梁将王景仁引兵后退。周德威抓紧有利战机，急忙命令晋军向梁军东西两阵发起总攻击。梁军东阵先退。晋将李嗣源率众攻打西阵，大声叫喊东面梁军已经逃命，你们怎能久留。西阵梁军受惊，相互溃逃，乱不成军。晋将李存璋引步兵追上，高喊不杀降者。梁军纷纷解甲投降。晋军共斩杀梁军2万人，缴获战马3000匹，铠甲兵仗7万件，俘将校285人。梁将王景仁、韩勣、李思安领数十骑逃走。

柏乡之战是晋军首次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晋王李存勖利用河北藩镇与后梁的矛盾，联合成德、义武两镇共同对后梁作战，既迅速壮大了自己一方作战的实力，又使梁军在河北战场上相当孤立。李存勖不坚持己见，接受周德威主动撤退、诱敌出动、以逸待劳、伺机歼敌的作战方案，避免过早与敌人决战，先将晋军主动撤至高邑，然后诱敌离开自己营垒，利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梁太祖乾化元年。

用敌人疲惫不堪以及平原旷野的有利地形，充分发挥骑军快速机动、突击猛烈的强大威力，大败梁军。晋方指导作战谋略的正确是晋军在柏乡之战取胜的根本原因。

后梁在柏乡之战不顾河北平原旷野的地理条件以及晋军骑兵战斗力强的特点，用兵失当，优势兵力难以发挥作用，又急于求成，盲目出战，所以惨遭失败。

李存勖在柏乡战后军威大震，后梁军队非常害怕。成德、易定两道从此长期依附于晋方，河东军队进驻赵州，为后来北攻幽州、南下魏博取得了重要的前进基地。

二、幽州之战

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自开平四年（910年）正月吞并沧州后，自以为得天之助，恣行淫虐，妄自尊大。柏乡之战刚结束，他马上派使者会见成德王鎔、易定王处直说：晋王李存勖与你们二镇大败梁兵后，举军南下，我也有精骑3万，打算充当你们的先锋。但四镇连兵，必有盟主，你们怎样对待我呢^①？李存勖很快识破了这是企图破坏晋与成德、易定的结盟。河东诸将说：“云、代（今山西代县）与燕（指幽州节度使）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后可以专意南讨。”^②这时，晋军在河北面临幽州刘守光与魏州罗周翰的两条战线。魏博已归附于朱全忠，后梁派军队协助防守，而且后梁大军可随时渡黄河北上，配合作战。刘守光缺少外援，比较孤立。晋方将领们提出先取幽州再南下魏州（今河北大名北）的作战方略是积极可靠的，当即得到李存勖的批准。李存勖随即将进入魏博诸州的军队撤至赵州，自己回到太原，密切注视着刘守光的活动。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梁太祖乾化元年。

晋王李存勖为使刘守光得意骄狂，并放松对晋军的戒备，故意联合成德、义武、昭义、振武、天德等道推刘守光为尚书令，朱全忠也授刘守光为河北都统。刘守光更加狂妄骄横，叫嚣卢龙镇领地 2000 里，兵甲 30 万，谁能阻挡我当皇帝！乾化元年（911 年）八月，刘守光即帝位于幽州，国号大燕。十一月，刘守光派兵 2 万进攻易州容城县（今河北容城西北），从而揭开了幽州战役的序幕。

幽州是战国以来我国北方的重要都会，地势雄要，北倚燕山山脉，南临华北平原，又有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居庸关（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等重要关隘，险峻相连。唐朝安禄山、史思明以幽州为基地，发起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一蹶不振。唐后期幽州节度使长期割据，与长安朝廷分庭抗礼。幽州城防经过历代统治者的苦心经营，城高坚固，易守难攻。晋军进攻幽州比潞州、柏乡两次作战的任务更加艰巨。

乾化元年（911 年）十二月，晋王李存勖派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领兵讨幽州。次年正月，周德威与成德、易定军会于易水（源出河北涞源县西，经易县南 30 里东流）。正月七日，三镇联军攻下燕祁沟关（今河北涿州南）。九日，燕涿州刺史刘知温投降。周德威很快抵达幽州城下，刘守光急忙向朱全忠求救。

朱全忠因潞州、柏乡两次作战失败，决心雪耻报仇。他借口刘守光求援，命招讨使杨师厚围攻枣强（今河北枣强县东），招讨接应使贺德伦攻打蓚县（今河北景县）。朱全忠亲自领大军昼夜兼行，三月二日到下博（今河北衡水县北）南。梁军遇上成德小股骑兵，讹传晋大军已到，急忙南退并会合杨师厚一起进攻枣强。成德兵数千人在枣强城内顽强抗击，梁兵死伤万计。梁军后来攻入枣强，杀人如麻，城内群众不分老幼惨遭杀害。朱全忠又领梁军 5 万人与贺德伦一道攻打蓚县。

晋将李存审屯军赵州，兵力不多，有的将校害怕梁军来攻，要求退入土门（即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县东北），准备逃回太原。李存审不许，与史建瑭、李嗣肱商量说：“晋王李存勖正集中大军进

攻幽州，不能抽出军队南下藩县，我们只有设“奇计”打败梁军^①。于是确定分兵二路，李存审领兵扼守下博桥（今河北衡水县北漳水之桥），阻击梁军北上。史建瑭、李嗣肱领 600 骑兵伪装梁军^②，天黑时混入梁军贺德伦营，突然发起袭击，纵火大噪，弓矢齐发。梁军不辨虚实，惊慌失措，烧营夜遁，道路迷失，又遇上河北当地群众奋起追击。梁军 2 万人被杀，还丢弃大量粮食和军需器械。朱全忠战败后，身患重病回到汴州。藩县战斗是五代时期晋将李存审出奇兵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由于梁军作战失利，刘守光、朱全忠军事联合的企图彻底破产，晋将周德威更加紧围困刘守光，但围而不打，却将大部分兵力先攻占大燕所属州县。三月，晋将李存晖攻占涿州南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四月，李嗣源攻占瀛州（今河北河间）。五月，燕主刘守光命骁将单廷珪领精兵万人出战，被周德威活捉于幽州城东南，3000 幽州兵士被杀。乾化三年（913 年）正月，周德威攻克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又拔安远军，蓟州（今天津市蓟县）成行言投降。二月，晋将李存晖占领檀州（今北京市密云）。三月，晋将刘光睿攻克古北口，燕居庸关使胡令珪不战而降。刘守光连连损兵失地，情势危急，又派大将元行钦领骑军 7000 人在山北（指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募兵，以骑将高行珪为武州刺史，准备接应契丹军队向晋军反扑。晋将李嗣源攻占山后八军，高行珪、元行钦相继战败归降。四月，晋将刘光睿占领平州（今河北卢龙）、营州（今辽宁朝阳）。

大燕所属州县相继失守，契丹又不肯出兵救助，后梁内部动乱不安已无暇北顾，刘守光困守幽州城内两年，势孤力穷。乾化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八，梁太祖乾化二年。

② 《旧五代史》卷五五，《史建瑭传》载，“建瑭乃分麾下三百骑为五军”；同书卷五十，《李嗣肱传》载，“嗣肱自下博率骑三百”，则史、李二人共出动六百骑袭击梁军。《资治通鉴》卷二六八称，史建瑭一人出五百骑，似不当。

三年（913年）九、十两月，刘守光突围外出，攻占顺州，因得不到任何支援又逃回幽州。刘守光再领兵士夜出，进攻檀州，周德威引兵邀击，大败燕军，刘守光领百余骑兵逃归幽州。十一月，晋王李存勖向幽州发起攻击，很快攻入城内，俘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不久被处死。

幽州之战历时两年多，晋军面临朱全忠、刘守光两支劲旅，兵力严重不足。但李存勖、周德威坚持围城打援、伺机进攻的作战方略，从作战开始就分兵二路，周德威统兵专门对付幽州刘守光，李存审领部分晋军屯驻赵州，负责打击北上的梁军，切断燕、梁双方的联系。由于李存审出奇兵大败朱全忠，刘守光寄托于朱全忠援军的愿望化为泡影。与此同时，周德威在幽州城外基本上围而不打，集中军力分别击败大燕所属州县守军，迫使刘守光困守城内，得不到来自幽州城外的任何援助，最后俯首就擒。李存勖、周德威指导作战方略的正确是幽州之战取胜的主要原因。

晋王李存勖并吞了幽州，又与成德、义武两道结成联盟，晋方已控制河北北部、中部大部分地区，并继续南进，与后梁争夺魏博镇已迫在眉睫。

三、魏州之战与梁军袭击晋阳的失败 (参见附图2)

乾化二年（912年）七月，后梁北面都招讨使杨师厚乘朱友珪杀父朱全忠之机进入魏州，赶走藩帅罗周翰，迫使朱友珪授他为魏博节度使。乾化三年（913年）二月，后梁均王朱友贞又杀死朱友珪而夺取帝位（即梁末帝），加杨师厚为中书令、邺王。杨师厚掌握魏博重兵和部分中央禁军，又增置魏博银枪效节军数千人，图谋不轨。贞明元年（915年）三月，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死。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贊献计说：魏博六州，精兵数万，不如分割两镇，削

弱其势力，解除朝廷北顾之忧^①。梁末帝遂分魏博六州为两镇，以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治魏州；张筠为昭德节度使，治相州（今河南安阳）。后梁朝廷借口出讨成德、义武镇，派开封尹刘鄩率兵6万渡河北上^②，屯于魏州南乐（今属河南），监视魏博军队的动静。三月二十九日夜，魏博兵士私下商议：魏博六州“军门父子，姻族相连，未尝远出河门，离亲去族，一旦迁于外郡，生不如死”^③。他们当即发起动乱，攻打驻在魏州的后梁龙骧军，迫使军将王彦章逃走；又杀贺德伦亲兵500人，劫持贺德伦降于晋方。

魏博节度使治魏州，南临黄河，西接相、卫，东近德州（今山东陵县），是沟通河北、河南、河东的重要通道。李存勖立即利用魏博兵乱的有利时机，命蕃汉马步副总管李存审自赵州南下临清（今河北临西）。五月，李存勖亲领大军沿黄泽岭（今山西峻极关南）东下，与李存审会师于临清。李存勖又南下永济（今河北临西南），抵魏县（今河北魏县西南），迫近魏州。

自三月二十九日魏州兵变发生后，魏博军将张彦两次上书后梁朝廷，要求不分魏博为二镇，重新恢复原有建制。此议如得到梁末帝允许，这场动乱会很快解决，魏博镇继续为后梁所控制。可是，梁末帝坚持“已定不移之制，宜从画一之规”^④，拒绝张彦请求，但又不及时采用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命大军火速攻入魏州，及时平息这场动乱。梁末帝及其亲信大臣赵岩一伙人昏庸无能，不懂得用政治、军事手段及时解决魏博动乱，导致魏博归附于晋，铸成大错。

五月，刘鄩知晋军已到达魏州附近，急忙领精兵万人自洹水（今河北魏县西南）赶到魏县与晋军隔漳水对峙。梁末帝还派遣王檀屯军黄河渡口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阻止晋军渡河南下。

六月一日，晋王李存勖在贺德伦的支持下进入魏州。李存勖杀死魏博银枪军将张彦等8人，收银枪军为亲军，严禁兵士暴掠

①③④ 《旧五代史》卷八，《梁末帝纪》。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元年。

百姓，抢劫财产，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但后梁这时还控制着邢、洺、相、卫、澶（今河南清丰西）、贝（今河北清河西）、博、德等州，形成了对魏州包围的态势。刘鄩 6 万大军屯驻洹水至魏州一带，离魏州很近。后梁如能趁李存勖刚入魏州之际，授权刘鄩统一指挥河北各州军队作战，还有重新夺回魏州的可能。但后梁朝廷缺乏正确的指挥，再次失去了收复魏州的战机。

六月，后梁贝州刺史张源德不肯归晋，北结沧、德二州，南连刘鄩，多次出兵破坏晋军运粮通道。有人向李存勖建议先攻占贝州，然后兼并沧、景（今河北东光），则河北东部沿海地区多归晋有。李存勖认为贝州城坚兵多，难以迅速攻取。位于沧州、贝州之间的德州，后梁没有防备，“若得而戍之，则沧、贝不得往来，二垒既孤，然后可取”^①。李存勖随即派 500 骑兵，昼夜兼行，偷袭德州。七月，又派兵夜袭澶州。晋军迅速占领德、澶二州，不仅孤立了后梁沧、贝二州，还有力地配合了晋军在魏州附近作战。

梁大将刘鄩认为晋军主力尽在魏州，太原防守空虚，决定“以奇兵持其腹心，还取镇、定，期以旬时再清河朔”^②。刘鄩故作骗局，缚草人持旗乘驴沿魏县城墙上行动，暗中引大军自黄泽岭西走。晋方见刘鄩军几天不出，城内又无烟火，派人侦察，刘鄩军已西去两天。李存勖算计划刘鄩西行“才及山下”^③，急发骑兵追赶。当刘鄩抵到乐平（今山西晋阳）时，晋将李嗣恩已抢先进入太原。梁军途中遇上 10 多天阴雨，山路道险，泥深尺余，士兵因腹疾脚肿死去十之二三。梁军到乐平时，干粮吃完，后有晋军追赶，前面有晋军防备，刘鄩被迫放弃偷袭太原的计划，回军河北，自邢州逾漳水进入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企图攻占储粮重地临清，并切断晋军运粮通道。

晋将周德威在幽州得知刘鄩偷袭太原，主动领千骑前往驰援。周德威刚到土门，见刘鄩已撤离太行山东走，又返回猛追，经两天急行军赶到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周德威发现刘鄩企图占领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元年。

临清，乃绕过刘鄩军抢先占领了临清，与李存审会合。李存勣也出师博州，打算切断刘鄩与杨刘梁将王檀的联系。刘鄩处境不利，领军经堂邑（今山东冠县东）抵黄河附近的莘县（今属山东），挖堑戍守，自莘县至黄河修筑甬道运输粮饷。李存勣跟踪追击，驻扎在莘县西30里，与刘鄩军烟火相望，一日数战。

八月，梁将王檀、贺瓌攻占澶州，梁末帝命杨延直为澶州刺史，领兵万人镇守，从侧面支援刘鄩。这时，后梁贝州刺史张源德仍戍守贝州，直接威胁着晋军侧后，晋王李存勣命李存审率兵5000攻打贝州，并多次派兵引诱刘鄩出战，同时破坏其运粮通道，给刘鄩增加更大的压力。

刘鄩屯驻莘县，见晋军战斗力很强，因而闭营不出，深沟高垒，训练士伍，日夜戒严，伺机进攻。梁末帝远在汴州，竟不顾前方战场梁、晋双方的实际情况，更不认真研究刘鄩提出的作战方案，不断下诏书指责刘鄩拖延时日，虚耗军粮，增加兵士伤亡，命令刘鄩尽早出兵“速战”^①。刘鄩再次奏请说：“臣无奇术，但人给粮十斛，尽则破敌”^②，继续坚持伺机破敌的作战方案。这时，晋军虽占领魏、博、德等州，但邢、贝、洛、相、卫诸州仍归梁朝占有，黄河以南地区多为梁军控制。倘后梁朝廷能够接受刘鄩的作战方案，命令各州密切配合，仍可以阻挡晋军的进犯。但梁末帝深居宫廷，与宦官们共商军机，胡乱指挥，不断派宦官督促刘鄩出战，加速了梁军的失败。

晋王李存勣多次派兵逼近梁军营地，迫使刘鄩出战，都无法得逞。贞明二年（916年）二月，李存勣命李存审坚守莘县以西营地，自己赴贝州附近视察，声言回师太原，引诱梁军外出。刘鄩中计，错误判断这时出现了有利战机，经奏请梁末帝同意后，决定袭取魏州。刘鄩指示澶州刺史杨延直领兵万人向魏州进发。杨延直军队半夜抵达魏州城南，遭晋军袭击，溃乱逃走。刘鄩天明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元年。

^② 《旧五代史》卷二三，《刘鄩传》。

到达魏州城东，刚与杨延直余众会合，立即被晋军击退。李存审自莘县西跟踪追击，李嗣源领魏州城内兵出战，李存勖也从贝州附近前来堵截。刘鄩退至故元城西（今河北魏县东）。李存勖列阵于西北，李存审列阵于东南，将刘鄩围在中间。经过一番激战，梁7万大军绝大部分被杀和被追至河水中淹死，刘鄩领数十骑突围，收集残余兵马自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渡河，戍守滑州。

贞明二年（916年）二月，梁末帝为策应和声援刘鄩作战，命匡国节度使王檀领藩镇兵3万人，自阴地关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南）。河东监军张承业留守太原，毫无准备，临时征发城内丁匠、市人拒守。梁军日夜急攻，几乎要攻入城内。退居太原的代北旧将安金全见张承业说：太原是根本之地，一旦失守，则晋王统一中原的大事将会失败^①。张承业立即发放兵器，安金全领子弟兵几百人夜出太原城北门，抗击梁军。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也派牙将石君立率500骑兵驰赴太原，与安金全协同作战。梁军死伤很多，王檀退走。梁末帝见刘鄩、王檀作战失败，哀叹大事已去，国将灭亡。

贞明二年（916年）三至九月，晋军又占领卫州、磁州、洺州、邢州、相州、沧州、贝州，河北各地除黎阳外，已全部为晋王李存勖所占有。

魏州之战，晋军不仅占领了河北地区，壮大了军事力量，还为即将渡河南下提供了便利条件。晋王李存勖当机立断，及时抓住魏州兵乱的有利战机，紧急出兵，轻易地占领重镇魏州，是这次作战取胜的首要原因。其次，李存勖占领魏州后，不急于求成，在充分研究敌方的战略意图和刘鄩用兵特点之后，引诱刘鄩离开莘县营垒外出作战，然后以强大骑步兵出击，所以取得了重大胜利。

后梁对魏州之战也很重视，一开始就派名将刘鄩领军6万人开赴魏州前线，实力很强。然后后梁朝廷主暗臣腴，极端无能，对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二年。

魏博兵变的处理失策，也没有抓紧时机打击进入魏州的晋军，一再贻误战机。梁将王檀偷袭太原，有可能迫使李存勖自魏州回师，解除魏博之危，然而投入兵力不足，大败而归，给魏博前线梁军造成了不利影响。梁末帝及其左右大臣不懂军事，不顾刘鄩在莘县坚壁不战、伺机而动的正确作战谋略，一再急于求成，不断督促刘鄩出战。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后梁作战指导不当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四节 梁、晋争夺黄河沿岸要点之战

晋王李存勖兼并河北地区之后，加紧准备渡黄河南下。但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兴起，贞明三年（917年）三月，契丹出动30万大军进围幽州^①，晋将李嗣源、李存审、阎宝等领7万步骑开赴幽州前线，暂时推迟了对后梁的作战。八月，晋军大败契丹，解除了幽州之围，李存勖又急忙调兵南下，与后梁展开了争夺黄河沿岸要点的战争。

一、杨刘之战

杨刘城在郓州东阿县东北60里，是魏州通向郓州的重要渡口。贞明三年（917年）十一月，黄河水面结冰，李存勖立即赶到魏州。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存勖率步骑经朝城（今山东莘县西南）东进，抢渡黄河。后梁3000兵士戍守杨刘，沿河数十里列栅相望，很快被晋军全部攻陷。晋军还俘获后梁杨刘守将安彦之。正在洛阳举行祭天大典的梁末帝，忽闻杨刘失守以及传闻晋军进入汴州并扼守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惊慌失措，迅速赶回汴州。贞明四年（918年）二月，梁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领兵数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三年。

万攻杨刘城，李存勖自魏州率轻骑来到黄河北岸。梁军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挖开黄河大堤，利用滔滔河水阻止晋军前进。这一阴谋很快被李存勖识破。六月二十一日，他再次从魏州来到杨刘，亲自泛舟测量河水深度。两天后，李存勖带领亲军过河，一鼓作气，登上黄河南岸。梁军沿岸阻击，死伤很多，谢彦章只身逃走。晋军当即攻占临近黄河的4个营寨，从而加强对杨刘城的戍守。

二、胡柳陂之战

贞明四年（918年）八月，晋王李存勖调发河东、魏博、幽州、易定、沧景、邢洛等地军队并调用奚、契丹、室韦、吐谷浑兵力，共十余万众，齐集魏州，准备抢渡黄河一举灭亡后梁。晋军自魏州至杨刘，再出兵攻掠郓、濮（今山东鄄城北）二州，沿黄河东上，屯于濮州北麻家渡。梁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瓌、排阵使谢彦章进军濮州北行台村，坚壁不战，以牵制和阻挡晋军前进。十二月一日，晋军自麻家渡进发，逼近梁军营地行台村仅隔10里。在这关键时刻，后梁将领谢彦章“欲持重以老敌人”^①，贺瓌则主张“速战”^②。贺瓌认为谢彦章故意逗留不战，与晋方暗中勾结，一方面向梁末帝进行诬告，一方面与行营马步都虞候朱珪密谋，擅自杀死谢彦章及骑将孟审澄、侯温裕等。梁末帝听信谗言，不分是非，竟提拔朱珪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军副都指挥使，让贺瓌继续担任黄河沿线作战的军事统帅。后梁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

李存勖认为后梁将帅自相残杀，灭亡在即，准备引万骑攻打梁朝国都汴州。周德威谏阻说：梁大将谢彦章虽死，但后梁军队尚未受损失，倘我们这时轻佻侥幸，不能取胜^③。李存勖不听，下

① 《旧五代史》卷一六，《谢彦章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七〇，梁均王贞明四年。

令军中老弱全部回到魏州，以 10 万之众向汴州进发。二十三日，晋军抵胡柳陂（今山东鄄城西北）。次日晨，晋方发现梁军从后面追上，周德威再次向李存勖建议说：梁军刚到，营垒尚未设置，我方已建立营栅，防守较好。现在深入敌境，不可轻易出击，应以“方略制之”^①。周德威劝李存勖“按兵勿战”^②，选用小股骑兵扰乱敌人，俟梁军疲乏不堪时再与之决战。这是晋军柏乡之战行之有效的作战方略。李存勖仍拒不采纳，他对周德威说：“今贼至不击，尚复何待”^③，并批评周德威胆怯怕敌。他立即命令辎重队伍出发，并带领亲兵先行。梁将贺瓌列阵数十里拦阻，李存勖出亲兵冲击，梁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王彦章败退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这时，晋军李存勖居中，周德威在西，镇、定军队列阵东边。位于阵西前进的晋方辎重队伍见王彦章败军自东往西来，惊慌失措，退入周德威阵内，引起晋军自相践踏，死伤很多，周德威父子与魏博节度副使王缄均战死。

梁将贺瓌当时占据胡柳陂中的一座土山，居高临下，对晋军十分不利。李存勖又集合散兵，抢占土山，赶走梁军。傍晚，梁军在土山西面列阵，晋军有些害怕，李存勖及部分将领打算收兵回营，准备早晨再战，但遭到晋方大将阎宝、李嗣昭、王建及的一致反对。阎宝等将领认为后梁王彦章骑兵已经退走，惟有步兵在土山下面，而且战斗已久，都想撤离战场。倘晋军这时用骑兵出击，一定能歼灭敌人。如不战而退，梁军整众复来，则胜负难知^④。李存勖吸取了胡柳陂战役前阶段失败的教训，接受阎宝等人的正确主张，命李嗣昭、王建及领骑兵带头冲入敌阵，诸部紧随其后，元城县令吴琼、贵乡县令胡装各率领民丁万人在山下鼓噪助威，梁兵大败。

胡柳陂之战，梁军和晋军损失兵力巨大，“两军所丧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⑤。由于李存勖一度骄傲轻敌，拒绝采纳周德威的作战方案，鲁莽冒进，造成重大的损失，延长了在黄河沿线的

①②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二七〇，梁均王贞明四年。

作战时间，双方继续在德胜（今河南清丰县西南）大战。

三、德胜之战

德胜城位于澶州南面，系自魏州通向汴州的重要渡口。贞明四年（918年）十二月，晋军进入德胜。次年正月，晋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在德胜夹黄河筑南北两城据守，对后梁造成较大的威胁。四月，梁将贺瓌领军队进攻德胜南城，以竹筏连结战船十余艘，外面蒙上牛皮，上设短墙，横列在黄河上面，阻止晋兵渡河增援。梁军连续攻德胜南城3天，李存勣军队滞留在黄河北岸，防守德胜南城的晋军十分危急。晋将王建及挑选300名银枪亲军，乘船驶至河中，砍断梁军连结战船的竹筏，又以几百个木瓮装着浇上油的干柴，点燃之后，从黄河上面往下漂流。晋军战船也尾随前进。梁军战船绳索被砍断，随流而下，士兵多焚溺而死。梁将贺瓌撤军至行台村。晋军渡河追梁军至濮州后返回。

贞明五年（919年）八月，梁将贺瓌卒，梁末帝以开封尹王瓌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王瓌领5万兵卒自滑州渡河，经黎阳袭击澶州、魏州，被晋将李嗣源拦阻之后，又在距德胜上游18里的杨村夹河筑垒，造浮桥，储存大量军需物资。晋将李存进也在德胜建造浮桥。双方沿杨村至德胜加紧修筑工事，准备再战。

十月，李存勣自太原来到魏州，征发民丁数万人扩建德胜北城，与梁军大小百余战，互有胜负。十二月，李存勣领骑兵沿黄河南岸西上，俘获后梁运粮兵夫数千人。十二月五日，双方再战于黄河南岸，梁军大败，损失马千匹，兵士万人，王瓌退至杨村北城，不久被贬官，梁将戴思远继为北面招讨使。梁、晋双方交战至此暂告一段落。

晋王与后梁争夺黄河沿岸要点之战，是古代冷兵器条件下在河川地区的作战。后梁当时占领着滑州、濮州、博州、郓州一带的黄河渡口，既可以用来屏障都城汴州，还能作为北上的跳板以进攻相、卫、魏等州，进而争夺河北，威胁太原。李存勣只有夺

取黄河渡口，才能巩固新占领的河北地区，挥师南下，攻占汴州。这是关系到能否掌握进攻出发基地的重要战役。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步兵、骑兵、水军同时出动，主要夹河筑城防守，并配以骑、步兵的机动兵力相互支援，水战规模不大。战争结果，晋方夺取了部分黄河渡口，但没有歼灭后梁沿河全部守军，原先打算一举攻占汴州的计划受到挫折。后梁失去了黄河某些渡口，但仍坚守滑州一带的黄河防线。由于双方损失兵力很多，都不占有绝对优势，形成在黄河沿线相互对峙的状态^①。

第五节 同州之战与镇州之战

正当梁、晋双方在黄河沿线僵持不下而处于暂时平静的时期，后梁统治区内同州（今陕西大荔），以及晋方控制的镇州，又分别爆发了战争。

一、同州之战

朱全忠初建梁国，命养子朱友谦为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乾化二年（912年），朱友谦对朱友珪称帝不满，背梁归晋，继续坐镇河中。贞明六年（920年），朱友谦见后梁在河北作战连续失利，封建统治已出现严重危机，遂萌发并吞同州的野心。

同州在蒲州西面八十余里，是蒲州西至长安的重要通道。四月，朱友谦命河中军队攻占同州，驱逐后梁忠武节度使（治同州）程全晖，以其子朱令德为忠武藩帅，当即得到李存勖的支持。六月，梁末帝命大将刘鄩为河东道招讨使，率华州节度使尹皓、崇

^① 参见《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第二册，中华书局版（下同），第409页。

州节度使温昭图出征同州。刘鄩抵陕州时，先安抚招降朱友谦，等待一个多月没有回信，闰六月开始进攻同州。刘鄩认为河中军队人员少，战斗力差，每次出战，穷追河中兵士不放。朱友谦难以应付，向晋王李存勣求援。

七月，李存勣派遣李存审、李嗣昭、王建及出军援救。九月，李存审经蒲州渡过黄河，屯军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先以部分骑兵挫败梁军的锐气，迫使刘鄩军不敢轻易出战。晋军初胜后，有人要求从速决战。李存审认为如果速战倘梁军在同州南面的渭河两侧设营，断绝晋军运粮通道，则进退不得，必将失败；只有“缓师示弱，伺隙出奇”^①，晋军才能取胜。李存审休战10天，乃进逼梁军营地。刘鄩领全军出战，大败逃走。梁末帝勒令刘鄩回到洛阳，暗中派人将其害死。

二、镇州之战

镇州，今河北正定，五代成德节度使的治所。成德节度使辖镇、赵、深、冀四州，西隔太行山与河东毗邻，北接义武（治定州，今属河北）、卢龙（治幽州，今北京市西南），南近魏博镇（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北），处于河北中部的腹心地带。梁、晋争夺河北地区，成德节度使王鎔与晋方结盟，不断以兵力、财力支援晋王李存勣作战。所以李存勣说：“晋、赵（指成德节度使）叶力，破梁必矣”^②，肯定晋方与成德镇结盟对灭梁战争有重要作用。

龙德元年（921年）二月，成德镇军将张文礼煽动亲兵作乱，杀死节度使王鎔，并上表李存勣请求节钺。李存勣闻讯后，对王鎔无辜被杀表示极度悲痛，打算出兵征讨。但河东不少臣僚认为

① 《新五代史》卷二五，《符存审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梁太祖开平四年。

张文礼杀死王鎔，罪恶虽大，但晋方正与后梁争夺天下，不宜在自己后方再树立仇敌，姑且答应张文礼的请求，授予官职^①。李存勖勉强接受意见，授张文礼为成德留后，企图稳定成德镇的局势。

成德留后张文礼深感杀死王鎔事关重大，内心十分不安。他先后三次上表李存勖，并献上货币数十万，恳求李存勖早日称帝，期望得到谅解。但暗中又派使者赴契丹、后梁，请求出兵将晋军赶出河北。可见张文礼这时仍徘徊于契丹、梁、晋三方之间，梁、晋都有争取张文礼归附的可能。当张文礼决定召回随同晋军戍守德胜城的成德大将符习时，李存勖却积极鼓动符习向张文礼宣战，并答应以兵、粮相助，从而为“义犹骨肉”的王鎔报仇^②。八月，李存勖以符习代替张文礼为成德留后，命大将阎宝、史建瑭领军自邢、洺州北上。八月十一日，晋军攻克赵州，张文礼惊惧死亡。九月，阎宝抵镇州城下，张文礼之子张处瑾负城顽抗，晋先锋将史建瑭战死。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与成德镇邻近，见晋军出讨成德，深怕唇亡齿寒，请求李存勖赦免张处瑾，继续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后梁，遭到李存勖拒绝。十一月，李存勖亲率大军赴镇州，张处瑾谢罪请降，仍不许。晋军攻城十余日也毫无战果。龙德二年（922年）二月，因晋北面招讨使阎宝筑垒挖堑，长期围困镇州，镇州城内与外界隔绝，严重缺粮。三月二十六日，成德军500余人出城筹集粮食，阎宝有意先放他们外出，拟再设伏兵予以歼灭。但阎宝疏忽大意，防范不力，成德军几千人一齐外出，破坏了晋军防线，火烧晋军营垒，阎宝败退至赵州，不久死去。晋将李嗣昭代替阎宝为北面招讨使。

四月，成德军千人突围外出，赴九门（今河北正定县东南）运粮。李嗣昭领伏兵邀击，杀敌很多，但自己中箭身亡。晋王李存勖命李存进出任北面招讨使。李存进屯军东垣渡，伐木为栅，继续围困镇州。晋军早晨外出放牧，张处瑾派其弟张处球领兵7000人，利用李存进一时防备疏忽，攻打晋军营垒。李存进领随从十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一，梁均王龙德元年。

余人仓促应战，寡不敌众，被成德军杀死。晋方连连损兵折将，李存勖又急调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屯军镇州城下。九月底，成德军终因久被围困，内外断绝，粮尽力穷，晋军攻入城内，俘张处瑾及其同党，最后结束了镇州之战。

镇州之战，晋王李存勖先行强攻，到龙德二年（922年）二月又改用长期围困敌人的策略。晋军经过长时期的包围，并击退契丹、后梁对镇州的援军，迫使成德军在镇州城内孤军奋战，最后攻克镇州，将成德镇直接隶属于晋方，这对于李存勖稳固河北阵地，加强对后梁的作战是很有利的。但这场规模不大的战争，晋方接连丧失史建瑭、阎宝、李嗣昭、李存进四员大将，伤亡大批兵士。李存勖一生南北征战从未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在镇州战死后，其子李继韬自为藩帅，背晋归梁，晋东南军事重镇潞州又归后梁占有。后梁见晋军主力北上，多次在黄河前线发起反扑，晋方损失严重。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主要是李存勖指挥镇州之战的决策有重大失误。

李存勖争霸中原，应始终把作战矛头指向劲敌后梁。成德兵变发生后，张文礼、张处瑾几次请求归附。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为张处瑾说情，更增加晋方与成德镇有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即使张处瑾心怀叵测，李存勖也应当与他暂时结盟，待灭亡后梁再进行讨伐。可是，李存勖不从斗争的全局出发，尽可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与张文礼、张处瑾的矛盾，迫使他们归附，结果爆发了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是很不妥当的。其次，镇州之战属于进攻重要城市的攻坚战，李存勖先拼命决战，急于硬攻；后来虽将强攻改为长期围困，但对这场攻坚战的特点仍认识不足，对敌人缺乏严密的监视，不仅延长了战争时间，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第六节 后唐袭汴灭梁之战

一、李存勖建立后唐

龙德元年（921年）正月，西川王衍、淮南杨溥劝晋王李存勖称帝，河中、昭义、沧州、定州、邢州、成德、天平、大同、新州、振武、同州诸藩镇连续三次上表劝进，各献货币数十万，供作李存勖称帝建国的费用。李存勖左右幕僚也劝李存勖早日答应大家的请求。李存勖虽口口声声表示忠于李唐皇室，但已命令有关部门购买玉器制造传国宝，准备黄袍加身。河东监军张承业坚决谏阻也无济于事。龙德三年（923年）二月，诸藩镇在镇州之乱平息后再次上表劝李存勖早日称帝。四月，李存勖在魏州即帝位，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诏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以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管辖天雄、成德、义武、横海、卢龙、大同、雁门、振武、河东、护国、晋绛、安国、昭义等13个节度使，50个州，包括今河北、山西大片地区。

二、后梁的政治腐败与毋乙、董乙起义

梁末帝统治期间，一批外戚得到特别重用。梁太祖婿赵岩任租庸使、户部尚书。梁太祖甥袁象先掌管京师大梁马步军并兼任宋州节度使。梁末帝的张德妃兄弟汉杰、汉伦、汉融担任控鹤指挥使或其他要职。他们垄断军国大事，或监督行军作战，出现了五代十国极为严重的外戚专权。

赵岩、张汉杰一伙人在梁末帝的卵翼下，狼狈为奸，培植死党，排斥颇有作为的朝臣。梁朝开国初著名的文臣武将敬翔、李振、张全义都弃置不用。敬翔多次提出治国主张以及抗击晋王李存勖的作战谋略，张全义要求领兵作战，都遭到梁末帝的拒绝。段

凝毫无军事才能，靠重贿赵岩、张汉杰而升为统兵作战的招讨使，激起“宿将愤怒，士卒亦不服”^①。

后梁政治腐败，贪污受贿极为严重。朝廷任命官将不考察个人的才能，而以行贿多少为依据。凡授一位统军官，必须先送上金银千锭。这些官员到任之后，敲诈百姓，搜括兵士财货。由于后梁政府横征暴敛，再加上战争的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广大农民陷入极端困苦的深渊。梁末帝诏书供认“连年战伐，积岁转输……师无宿饱之馈，家无担石之储。而又水潦为灾，虫蝗作沴”^②。地主豪强又乘机发放高利贷，利上加利，恣意盘剥。广大群众纷纷起来反抗，陈州百姓毋乙、董乙起义就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斗争。

后梁惠王朱友能任陈州刺史，自恃皇族骄贵，横行不法，伙同地主官僚们称霸乡里，鱼肉百姓。陈州民毋乙、董乙利用上乘佛教进行宣传，组织农民活动。教徒们不食荤茹，教规朴素，农民群众乐于接受。他们夜晚集中，白天分散，迅速发展到上千人，随即攻打乡社，当地政府官员不敢过问。贞明六年（920年）秋，起义很快扩展到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蔡（今河南汝南）三州，还发展到淮南地区。朝廷多次派遣州兵镇压，屡遭失败。起义军一致推举毋乙为天子，设置官属。后梁朝廷见起义军严重威胁着京师大梁，急忙征调禁军及藩镇兵联合围剿，俘毋乙等义军首领八十余人，押送大梁，惨遭屠杀。

当后梁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人民群众激烈反抗之际，后唐君臣们正策划一举灭亡后梁的军事行动。

三、唐军袭取郓州与梁军反击的失败

后唐庄宗在称帝前后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契丹不断侵扰幽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唐庄宗同光元年。

② 《旧五代史》卷十，《梁末帝纪》。

州以至易（今河北易县）、定一带，沿途钞掠馈运，后唐幽州戍军军粮供应困难。后梁趁晋军北上讨伐张文礼之机，攻占了卫州，俘后唐刺史李存儒。澶州以西、相州之南的地区全部为后梁所占。晋方丧失全部军仓储粮三分之一。后唐泽潞留后李继韬叛附后梁，直接威胁后唐重要基地太原的安全。后唐“民流地削，军储不给”^①，不少人犹豫动摇，认为灭梁争霸的事业难以成功。

同光元年（923年）闰四月，后梁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军将卢顺密投降后唐，向唐庄宗提出：梁朝屯戍郓州兵士不满千人，又不服从梁朝军将刘遂严、燕颙的领导，可出兵“袭取”^②。但枢密使郭崇韬等人提出异议，认为后唐孤军远袭，万一作战失利，将损失兵士数千人^③。大将李嗣源主动请战，要求带兵袭击郓州。唐庄宗分析了这些不同意见，断定后梁目前正注视吞并泽潞，不备东方，乘虚攻占郓州，可“溃其心腹”^④，对进军汴州将起重大的作用。他立即派李嗣源领精兵5000出征。闰四月二十八日，李嗣源沿黄河北岸经德胜向西行进，夜晚冒雨渡过黄河，再从杨刘南下，郓州守兵毫无察觉。李嗣源养子李从珂率众登上城楼，杀死后梁把守郓州城门的兵卒，打开城门，迎接唐军入内。二十九日晨，唐军一鼓作气攻下郓州牙城，俘郓州节度副使崔筠、节度判官赵凤，后梁郓州守将刘遂严、燕颙逃往大梁。唐庄宗即以李嗣源为天平节度使而坐镇郓州。

梁、晋双方交战十多年，后唐第一次占领后梁的腹地郓州，梁末帝非常害怕，杀刘遂严、燕颙，罢除北面招讨使戴思远。梁太祖亲信大臣敬翔急忙谒见梁末帝说，现在战事危急，倘不起用大将王彦章为招讨大将，则国将灭亡^⑤。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准备当场自杀，以死相谏。梁末帝这次不得不用王彦章为招讨使，但又让外戚赵岩、张汉杰的同党段凝为招讨副使，便于牵制王彦章。

梁将王彦章打算先出兵收复黄河重要渡口德胜、杨刘，隔断

① 《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

②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唐庄宗同光元年。

黄河北面的唐军与郓州李嗣源的联系，然后再收复郓州，保卫汴州的安全。他两天内自汴州赶到滑州。五月十八日，梁军分水陆两路自杨村向德胜进发，由兵士 600 人持巨斧、鞴炭乘船顺流而下，王彦章带领数千兵士自滑州沿黄河南岸驰往德胜。当晚天黑小雨，后唐德胜城守将朱守殷防备不严。梁朝水军烧断和斩断后唐在黄河水面上设置的铁链，破坏浮桥。王彦章很快攻占了德胜南城以及附近的潘张、麻家口、景店等黄河以南渡口，一时声势大振。

接着，双方又在杨刘城展开了激战。唐庄宗派宦官焦彦宾抵杨刘，命朱守殷主动放弃德胜北城，装载军需器械浮河东下，一起协助镇守使李周固守杨刘城。王彦章军队也从德胜城顺河而下。梁、唐军队分别在黄河南北岸同时行进，每遇弯曲河道，双方相互在中流交战，一日百战，互有胜负。二十六日，王彦章、段凝领 10 万大军攻杨刘，百道俱进，昼夜不息，并以 9 条巨船横列于黄河水面上，拦阻唐军增援杨刘。梁军连续发起强攻，但遭到后唐杨刘城内守将李周的顽强抗击，王彦章难以取胜，只得在杨刘城南连营把守。

唐庄宗得知消息后，六月二日赶到杨刘。后唐兵士持短兵器出战，遭伏击大败而归。郭崇韬看出梁军战略意图在于收复郓州，提出“筑垒于博州东岸以固河津，既得以应接东平，又可以分贼兵势”^①的方略，企图在博州以东黄河岸边另筑新城，引诱梁军撤离杨刘，并与郓州李嗣源取得联系。这时，驻守在郓州城内的李嗣源与唐庄宗音讯不通，人心离散，朝不保夕。李嗣源派押牙范延光送信唐庄宗。范延光奏请说，杨刘防守坚固，梁军不能攻取，请在博州东岸马家口（今山东东阿西）新筑城垒以通郓州^②。这与郭崇韬的计略不谋而合。唐庄宗遂接受郭崇韬的建议，一方面派人不断向梁军挑战，牵制后梁的兵力；一方面派郭崇韬领兵万人夜晚出发，急奔博州。郭崇韬在马家口渡河，昼夜筑城不息，仅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唐庄宗同光元年。

6天就完工了。十五日，王彦章将兵数万急攻马家口新城，还用十余艘巨舰置于黄河中流配合作战。郭崇韬身先士卒，四面拒战，唐庄宗自杨刘引大军驰援。王彦章攻新城不克，不少兵士中暑死亡，乃退保邹家口。唐庄宗与郓州李嗣源重新恢复了联系。

七月五日，唐庄宗沿河南行，王彦章放弃邹家口，再次进攻杨刘。十二日，后唐游弈将李绍兴败后梁游兵于清丘驿南。后梁招讨副使段凝误认为后唐军队已从上流渡过黄河，直逼汴州。他仰仗朝中赵岩、张汉杰一伙人的权势，指责招讨使王彦章不该深入郓州境内，不顾京师大梁的安危。十六日，唐骑军将领李绍荣直逼梁营，擒其侦察兵，又火烧后梁停留在黄河中的舰船。十七日，梁军从杨刘外围退至杨村，唐兵乘胜追击，梁军屯军德胜。由于王彦章在前线失利，梁朝统治集团内部更倾轧不休。王彦章扬言俟作战胜利后，要杀尽朝中“奸臣以谢天下”^①，梁大臣赵岩、张汉杰、段凝一伙人发誓，宁可死于唐军之手，也不为王彦章所杀。梁末帝不顾重臣敬翔、李振、张全义等人的劝阻，竟听信谗言，害怕王彦章作战胜利后难以制驭，故以段凝代王彦章为招讨使，将王彦章调回大梁。

梁军在德胜、杨刘一带作战，死兵士万人，丢弃大批军粮器械。唐军也损失较大。但李嗣源一举占领郓州，并继续守住德胜、杨刘等黄河渡口，为唐军随时大举南下、灭亡后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四、后梁分兵北进的企图与后唐的袭汴决策

梁、唐在郓州之战后，双方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后唐因德胜战斗一度失利，丧失大量刍粮，储粮已不够军队半年食用。泽潞镇尚未收复。契丹军队继续南扰，传闻冬天将大举入侵。后梁在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唐庄宗同光元年。

王彦章德胜、杨刘作战失利后，人心不稳，士气低落，军将们都不肯听从招讨使段凝的指挥。因此，梁、唐双方统治者都要制定新的战略决策，企图打破长期对峙的僵局，夺取胜利。

同光元年（923年）八月，梁末帝命梁军挖开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南面的黄河大堤，造成滔滔河水横流，淹没曹州（今山东定陶西南）、濮州、郓州的平原地区，阻止后唐军队向汴州进发。八月十七日，段凝领5万大军自高临津（今河南范县东南）渡河，屯军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剽掠魏州、相州一带。王彦章领兵万人屯军兗州、郓州地区，伺机收复郓州。后梁的作战方略是分兵两路，以主力北上收复黄河沿线要点并进军河北，同时用少数军队进攻郓州李嗣源军。由于兵力分散，京师汴州防守力量薄弱。后梁这时如将大部分军队投入到滑州至郓州一带，依托黄河阻止唐军南下，并加强对汴州的防守，伺机而动，同时命令西线泽潞、陕虢军队北犯太原，牵制李存勖在黄河沿线的军队，还有可能改变被动的局面。但由于后梁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以及指挥战争策略的严重失误，所以对后唐作战步步被动，以致败亡。

八月二十七日，后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投降后唐，唐庄宗命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康延孝向唐庄宗详细汇报了梁朝的内部情况：梁朝地盘不小，兵力不少，但梁末帝暗懦无能，外戚专擅朝政，吏治败坏，贿赂公行。段凝身为领兵统帅，大肆搜括兵士财货以事权贵。出军作战，朝廷常派近臣监视，将帅不能自主，终必败亡。“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帅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①唐庄宗亲自了解到后梁内部军事、政治情报的第一手材料，并初次听到“自郓州直抵大梁”的作战方案，十分高兴。

九月，唐庄宗召开会议讨论对梁作战的方略。宣徽使李绍宏等人认为，唐得郓州，周围皆是敌人，孤城难守，不如与梁约和，用郓州交换被梁朝所占领的卫州、黎阳，双方以黄河为界，休兵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唐庄宗同光元年。

养民，图谋以后再起。唐庄宗当场驳斥说，这将使我们死无葬身之地。郭崇韬也认为这是导致“将士解体”、“食尽众散”的失败之策。他私下对唐庄宗说：“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① 然而段凝没有军事才能，不能临机决策，毫不足畏。“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② 郭崇韬在康延孝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以唐军主力固守德胜、杨刘，牵制后梁大军；同时出奇兵自郓州偷袭汴州，一举灭梁。唐庄宗当即表示，“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行决矣！”^③ 李嗣源这时在郓州附近递坊镇败王彦章军，生擒梁朝将校、兵士 300 人，王彦章退保中都（今山东汶上）。消息传来，更坚定了唐庄宗渡河袭汴的决心。

唐庄宗袭取汴州的战略决策，是在总结前阶段的作战经验、深入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而制定出来的。当时，后唐方面虽面临军粮不济、契丹南侵、梁军进犯河北等许多困难，但后梁军指挥不统一，主暗臣愚，兵力过于分散，完全放松了对京师汴州的防守，作战不利的因素更加严重。后唐军队已经深入到后梁腹地郓州，距离大梁很近，随时有可能进入汴州。在这种形势下，后唐避实击虚，出敌不意，轻袭汴州，是一项大胆进取而又积极稳妥的战略决策。

五、唐军奇袭大梁及后梁的灭亡

（参见附图 3）

同光元年（923 年）十月二日，唐庄宗领精兵自杨刘渡河。三日，抵郓州。唐军由李嗣源充当前锋，当天午夜越过汶水（源出莱芜东北，经乾封、中都、须昌等县由东向西流）。四日晨，梁、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唐庄宗同光元年。

唐两军相遇，刚一交战，梁军匆忙逃走。唐军追至中都并予以包围。梁兵再次不战而逃，唐军攻克中都，生擒后梁名将王彦章及都监张汉杰等二百余人，斩首数千级。

唐庄宗又及时召集诸将商议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后唐将领是按照原先制定的袭汴决策继续前进，或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种意见。不少将领认为，后梁京师大梁缺乏防备的传说，不知是否可靠。大梁以东青（今山东益都）、齐（今山东济南）、徐、兖诸镇的军队已全部外调，若先攻占这些空城，然后乘机而动，可谓万全之策^①。康延孝再次要求速取大梁。李嗣源也认为梁将王彦章被俘，段凝未必知道。他即使得知消息，梁兵尚在黄河北岸，因河堤破坏，后梁几万大军无法回救大梁及其附近地区。“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陈（同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离河上，（朱）友贞已为吾擒矣。”^②李嗣源恳求唐庄宗领大军继续前进，自己愿以 1000 骑兵充当前锋。唐庄宗赞同康延孝、李嗣源继续奔袭大梁的主张，下令向大梁进发，诸军皆踊跃前进。四日傍晚，李嗣源率前军倍道兼程，直奔大梁。七日，唐军攻入曹州，梁守将投降。

梁末帝得知王彦章被俘及唐军即将进攻大梁，聚族恸哭，召群臣商议对策，都无言可对。梁末帝一面派人催促段凝回军，因河堤已遭破坏，河水泛滥，使者无法前进；一面派开封尹王瓌征发市民登城防戍。由于大梁四周无险可守，城内又缺少军队，后梁君臣慌作一团。有人提出逃往洛阳，集中各地军队再与后唐对抗；有人要求北逃，依靠段凝大军的庇护；有人说段凝听到王彦章战败，早已胆战心惊，不会为后梁拼死尽力；更有人暗中带上传国宝去迎接后唐军队。梁末帝日夜哭泣，在绝望中让禁军将领杀死自己。

九日晨，唐军攻打大梁城，开封尹王瓌开门出降。唐庄宗入城内，梁百官拜伏请罪。十一日，段凝自滑州渡河回军入援，当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唐庄宗同光元年。

得知大梁失陷，次日领 5 万大军在封丘（今属河南）归降。后唐除杀死赵岩、张汉杰、李振等少数梁朝重臣外，其余官员各复原职。

后唐军队自黄河渡口杨刘城到袭取大梁，全程约六七百里^①，沿途还发生中都、曹州的战斗，仅用九天就完成了，成为我国古代战争中长途奔袭、速战速胜的著名战例之一。唐庄宗制定避实就虚、袭取大梁的战略决策，并多次与军将们商量，统一认识，调动了广大参战将士的积极性。在进军过程中，唐军不分兵占地，不贻误时间，始终把目标对准汴州。后唐骑军昼夜并进，行动快速，充分发挥了擅于平原野战的长处。所有这些，都是后唐袭取汴州取胜的重要原因。

梁、晋（923 年建国后唐）争霸中原之战，如从后梁开平元年（907 年）建国开始算起，到后唐同光元年（923 年）结束，历时 17 年。这是五代初期我国北部两个割据政权一场规模庞大的兼并战争。战争主要在今河北地区进行，但也席卷到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后梁在战争初期所占地盘和军事、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晋方。但晋方（923 年建国后唐）通过多次作战，逐渐变弱为强，最终灭亡后梁。现将双方胜败原因分别加以考察^②。

晋与后唐方面：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二人面临后梁的步步进逼，发愤图强，进行改革，训练军队，发展生产，整顿内部，稳定统治秩序，大力增强实力。李存勖袭晋王位后，善于重用周德威、李存审、李嗣源、张承业、郭崇韬等富有才能的文臣武将，为其英勇奋战，出谋划策，取得争霸中原的胜利。李存勖正确运用战略策略，也是取胜的重要因素。

1、联合河北藩镇共同抗梁。河北地区东邻河东，南近后梁，

① 《元和郡县志》卷一一《河南道七》载，曹州东北至郓州 330 里，西南至汴州 245 里；卷十《河南道六》载，东阿县南至郓州 50 里，而杨刘离东阿县东北不远。由此计算，东阿距汴州约六七百里。

② 参见《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第二册，第 418～423 页。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后梁建国初，河北卢龙、成德、义武等藩镇因实力较弱而臣服后梁，但又想摆脱后梁的控制，保持割据地位。晋方占据河东，地狭兵少，难以与朱全忠抗衡，只有得到河北藩镇的支持才能争霸中原。因而李存勖采取联合成德、义武等藩镇共同抗击后梁的策略，得到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成德节度使王镕的支持，使朱梁吞并河北的企图遭到严重挫折，也为晋方夺取河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2、集中使用兵力，分别击破对手。李存勖在河北作战，北面有契丹的进犯，中间还发生过幽州、成德两镇的动乱，后梁大军又不断北上。河东兵力本来不足，倘再平均使用兵力，分头出击，必然会力量分散，被动挨打。李存勖先集中兵力在柏乡大创梁军，然后挥师北上消灭大燕刘守光；再以大军南下，夺取魏州及黄河沿线重要据点，从而实现了夺取整个河北的战略意图，也为进军中原奠定了基础。

3、充分发挥骑兵的威力，屡败梁军。面对后梁大军逼进以及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李存勖善于使用骑兵作战。他在作战中，常先遣少数精骑对梁军骚扰，使梁军疲惫不堪。尔后将敌军诱出营地，利用平原旷野的有利地形指挥骑兵出击，从而取得柏乡之战、魏州之战的巨大胜利。当后唐大将李嗣源占领郓州之后，李存勖利用后梁主力渡河北上、大梁防备空虚之际，亲自指挥骑兵远距离突然奔袭，高度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威力，迅速袭取大梁，取得了灭亡梁国的决定性胜利。

后梁方面：朱全忠建立梁国后，大肆诛戮功臣武将，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人心涣散。后梁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死活，横征暴敛，野蛮屠杀，激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不断反抗。后梁后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激烈，父被子杀、兄弟相残。梁末帝朱友贞统治极端腐败，外戚专权，离间将相大臣，公开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内部四分五裂。这都是造成后梁灭亡的根本原因。其次，后梁指挥作战军事谋略也有严重失误。

1、进军河北，造成孤立被动。后梁建国，河北藩镇慑于朱梁

的威力已暂时归附。朱全忠更应抓紧时机，联合河北藩镇去打击主要敌人晋王李存勖。但后梁统治者不懂得争取同盟者的重要性，迷信自己一方的强大实力，进军河北，打算吞并成德、义武两镇，结果将这两镇推向李存勖一方，使后梁在河北地区作战极端孤立被动，先后败于柏乡和魏州，黄河沿线也无法守御。

2、急于决战，节节失利。后梁每次进军河北，兵力不少，有可能阻止李存勖东进或将其击败。但后梁军队统帅不顾晋方强大骑兵不利于攻城而适宜在平原旷野作战的特点，往往离开营地主动出击，急于决战，几乎每次作战都遭晋骑军围歼，节节失败。

3、盲目进攻，加速灭亡。当晋军已夺取黄河沿岸重要据点并进占郓州后，后梁京师已岌岌可危。后梁倘能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转攻为守，积蓄力量，固守汴州，伺机而动，也许可能改变被动局面。但朱友贞仍主张盲目进攻，派遣毫无统兵作战能力的段凝渡黄河北上，造成汴州及其周围地区的防务极度空虚，使李存勖乘虚而入，后梁迅即灭亡。

第七节 后唐灭前蜀之战

(参见附图 4)

一、王衍执政后的前蜀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王建创建前蜀国，实行保全东西两川、守境安民的政策，国内比较稳定。但王建晚年不断诛杀旧臣大将，重用宦官宋光嗣为枢密使。王建还专宠徐氏贤妃、淑妃姊妹二人。她们交结宦官，干预朝政，阴谋杀死太子王元膺，立幼子王衍（徐贤妃所生）为太子。后梁贞明四年（前蜀天汉二年，918年）六月，王建病卒，王衍袭帝位，朝政更加腐败。

王衍年幼不问政事，军政大事多由顾命大臣宋光嗣、王宗弼专决。中书令王宗弼主管全国高级军将的任免，大量接受贿赂，上

下怨怒。太后、太妃出教令卖官，刺史、县令各立等级，每一官阙，几个人出价抢购，出钱多者获官职。全国上下贪贿成风，愈演愈烈，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前蜀即将灭亡的前兆。

王衍大兴土木，四处游幸，穷奢极侈，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他在宫苑中用缯数万段结扎彩楼，山上建立宫殿亭阁。王衍信奉道教，与太后、太妃同游青城山，宫人一律穿着道服，头戴金莲花冠，望若神仙。前蜀乾德二年（后梁贞明六年，920年），王衍北游，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不绝。沿途所到之处，各地群众被迫供应这些达官贵人的生活用品，叫苦连天，不堪活命。前蜀一些臣僚再三要求王衍以国事为重，居安思危，不沉溺酒色，不远离都邑，加强战备，亲政爱民，都遭到王衍的无理拒绝。

二、后唐灭蜀的战略决策

唐庄宗灭亡后梁，入都洛阳，各地割据政权都有所畏惧。岐王李茂贞上表称臣。楚王马殷遣其子希范来到洛阳，上报本道将吏籍册。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亲自入洛阳朝见。吴越国王钱镠、闽王王审知都遣使贡奉。惟独吴、前蜀两国自恃有险可守，实力强大，不肯臣服。后唐同光元年（前蜀乾德五年，923年）十一月，唐庄宗在洛阳询问高季兴，我打算讨伐吴、蜀二国，哪个在先呢？高季兴回答说：西川地势险阻，本来难以攻取。但当地经济富庶，王衍昏庸，老百姓怨声载道，出兵征讨，必将取胜。然后沿江顺流而下，取吴国易于反掌^①。唐庄宗对高的回答表示满意。

同光二年（前蜀乾德六年，924年）四月，后唐客省使李严出使前蜀，公开威胁前蜀枢密使宋光嗣说：“吾皇以德怀来，以威歛附，顺则涵之以恩泽，逆则问之以干戈，四海车书，大同非晚”^②。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唐庄宗同光元年。

② 《旧五代史》卷七十，《李严传》。

暗示前蜀倘不臣服，唐国即将出兵进攻。但前蜀王衍一伙人仍麻木不仁，不愿与后唐使者应付周旋，或向后唐臣服，更不肯贡献西川出产的奇珍异物。李严回洛阳向唐庄宗汇报说：前蜀君臣上下腐朽奢侈，朝政混乱，后唐“大兵一临，瓦解土崩，可翘足而待”^①，要求唐庄宗出兵征讨。唐庄宗由于了解到前蜀的实际情况，更加坚定了灭亡前蜀的决心。

前蜀统治中心成都距后唐国都洛阳约 2800 里，路途遥远，而且沿途崇山峻岭，江河阻隔，特别是剑阁（今四川剑阁县东北）、鹿头关（今四川德阳北）等天险，大军很难通过。后唐有些人强调蜀道险阻，对前蜀用兵作战不要操之过急，等待其内部发生动乱，伺机而进。但是，翰林学士、都统判官李愚说：“如闻蜀人厌其主荒恣，仓卒必不为用。宜乘其人二三，风驰电击，彼必破胆，安能守险。”^② 这与李严所谓后唐“大兵一临”，前蜀“瓦解土崩”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对前蜀作战必须长驱直入，速战速决，争取尽快取胜。这些建议被后唐招讨使郭崇韬所采取，成为后唐灭前蜀的战略决策。

三、唐军战前准备及进攻部署

唐庄宗决定出军前蜀后，即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战前准备，主要内容有：

（一）**派遣使者假意谋求两国和好，麻痹前蜀朝廷。**同光二年（前蜀乾德六年，924 年）八月，唐庄宗再次派使者李彥稠入蜀。在此之前，前蜀帝王衍鉴于后唐使者李严威胁恫吓，公开声称唐庄宗“有混一天下之志”^③，对后唐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如同光二年八月前蜀以右定远军使王宗鐸为招讨马步使，帅 21 军屯洋州

^{①③}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唐庄宗同光二年。

^② 《旧五代史》卷六七，《李愚传》。

(今陕西西乡)，以长直马军使林思谔为昭武节度使，屯军利州(今四川广元)。稍后不久，又派前镇江军节度使张武为峡路应援招讨使。前蜀一度加强夔州(今四川奉节)及利州、洋州的军事力量，从水陆两路防备后唐入侵。但李彥稠到达成都后，故意掩盖后唐侵蜀的意图，而要求建立唐、蜀两国的友好关系。王衍被这些谎言所迷惑，特派遣翰林学士欧阳彬出使后唐，还大量撤销防御后唐军事进攻的边防军队。同光二年十一月，罢威武城戍(今陕西凤县东)，命令关宏业等24军撤回成都，罢武定、武兴(治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招讨使刘潜等37军。罢天雄军(治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招讨使，命王宗騤等29军回成都。十二月，罢金州(今陕西安康)屯戍，命王承勋等7军还成都。当后唐大军已经出发，王衍仍不顾大臣们再三谏阻与皇太后哭泣哀求，亲自带领数万兵马离开成都赴秦州巡游，一路吟咏诗赋，游山玩水，对后唐出兵毫不介意。前蜀统治者如此麻木不仁，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二)征集战马，增强作战实力。唐庄宗长期对后梁作战，军马损失严重。同光三年(925年)六月，后唐朝廷命令在河南、河北收购战马，各级官员只许留1匹马使用，隐匿不报者要严加治罪。后唐千方百计征集大量马匹，加强入蜀骑军的力量。

(三)派李嗣源出军河北，防止契丹入侵。契丹雄踞北方大漠，始终是后唐的重大威胁。同光二年(924年)五月，长期坐镇幽州的蕃汉马步军总管李存审病故后，唐庄宗随即以战功卓著的李嗣源为蕃汉马步军总管，率中央禁军3.7万人赴幽州防御契丹。不久又任命李嗣源兼任成德节度使。同光三年(925年)二月，契丹军队侵犯涿州，被李嗣源击退。后唐由于北部边防的巩固，能从内地抽调更多的军队出征西川。

唐庄宗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同光三年(前蜀咸康元年，925年)九月十日发布讨蜀檄文，由皇子魏王继岌担任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为西川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西川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继暉充供军转运

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行营招讨副使，陕府节度使李绍琛充行营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充行营左厢马步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充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魏王李继岌年纪轻，没有实战经验，实际上由郭崇韬充当全军统帅。后唐朝廷征调同州、华州、长安、邠州（今陕西彬县）等藩镇兵与中央禁军，共6万人^①。后唐的战略意图是利用马步军以闪电般的速度先攻入凤州，然后南下成都。同时命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溯江西上，攻取前蜀夔州、忠州（今四川忠县）、万州（今四川万县东），牵制前蜀的军事力量。

四、威武、三泉之战

同光三年九月十八日，后唐大军自洛阳出发西行。唐军由排阵斩斫使李绍琛与李严将骁骑3000、步兵万人为前锋。李绍琛即后梁降将康延孝，曾在袭汴灭梁战役中战功显赫。李严出使过西川，对前蜀情况比较了解。这两人一个骁勇善战，一个善于掌握敌情。由他们充当后唐大军的前锋，足见郭崇韬用兵选将的才能。

十月初，后唐军队抵达宝鸡（今属陕西），开始翻山涉险。招讨判官陈乂害怕困难，借口患病而请求留下不再出征。参与都统军机的李愚严厉斥责陈乂动摇军心，陈被斩首示众。后唐军队中再没有人敢犹豫动摇，军队继续前进。

十月五日，前蜀帝王衍北上秦州巡游，到达汉州（今四川广汉）。前蜀武兴节度使王承捷报告唐军已经西来，王衍还认为是谎报军情，毫不在意，继续向秦州进发。王衍只顾自己奢侈游逸而不管国家危亡，前蜀军队士气更加低落，无力抵挡后唐军队的进攻。

唐军进入散关时，军粮不济，人心惶惶。有的军将出现了畏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唐庄宗同光三年。

难情绪，认为蜀道险阻，难以长驱直入，应按兵不动，待前蜀出现动乱再作计议。郭崇韬发誓说：我们倘前进受阻，很可能全军覆没，只有决一死战，先攻占凤州，夺取储粮，才能取得成功^①。他命令军队倍道前进。十月十八日，后唐前锋将李绍琛攻前蜀威武城，蜀指挥使唐景思、城使周彦禋自知无力抵抗，随即出降，唐军得粮食 20 万斛。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唐军的士气。

后唐攻占威武城后，将 1 万多降兵放归。李严又致书前蜀武兴节度使王承捷，进行招降，并继续向凤州挺进。鉴于后唐大军压境，十九日，王承捷以凤、兴（今陕西略阳）、文（今甘肃文县西南）、扶（今四川南坪东北）四州归降。李绍琛又收降兵 8000 人，粮 40 万斛。郭崇韬看到进军十分顺利，肯定灭亡前蜀一定会成功！

二十日，王衍北上巡游抵达利州，见到从威武城逃回的前蜀降兵，才确信后唐军队已攻入前蜀境内。中书令王宗弼、枢密使宋光嗣急忙建议：东川、山南还有不少军队，请陛下领大军扼守利州，后唐军队怎敢孤兵深入^②。王衍即以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王宗昱三人为招讨使，领兵 3 万迎战唐军。前蜀这时随同王衍北上的军队共 5 万人，还有山西道的军队，比后唐入川 6 万人还多。倘前蜀各方面能相互配合，充分利用西川境内的险阻地形，依险据守，有可能阻止后唐军队入川。但是，前蜀君臣腐朽不堪，从军将到士兵不肯为王衍卖命。后唐军队从凤州向前进发时，兴州都指挥使程奉琏领 500 兵士投降。兴州、成州（今甘肃和县西北）刺史弃城逃走。二十六日，后唐李绍琛领 3000 兵士与前蜀 3 万军队战于三泉县（今陕西宁强西南），蜀军死亡 5000 人，余众逃走。唐又得军粮 30 余万斛，从此“师无匮乏，军声大振”^③。蜀军望风丧胆，纷纷不战而降。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唐庄宗同光三年。

③ 《旧五代史》卷三三，《唐庄宗纪》。但《资治通鉴》卷二七三称，“得粮十五万斛于三泉”，与《旧五代史》记载略异。

五、蜀军望风归降

十月二十九日，前蜀帝王衍闻三泉之战失败后，自利州（今四川广元）西逃，并破坏嘉陵江的吉柏津浮桥（今四川广元西南）。任命中书令王宗弼将大军守利州，并命令处死王宗勋、王宗俨、王宗昱等三招讨使。王宗弼不肯听命，擅自领兵弃利州西走；并将要杀死三招讨使的消息告诉王宗勋等人。他们抱头痛哭，一起密谋降唐。由于王衍、王宗弼一伙人只顾保命，不战而逃，前蜀各地节度使都企图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纷纷望风归附。十月三十日，武德留后宋光葆以梓（今四川三台）、绵（今四川绵阳东）、剑（今四川剑阁）、龙（今四川江油北）、普（今四川安岳）五州降。武定节度使王承肇以洋、蓬（今四川仪陇南）、壁（今四川通江）三州降。山南节度使王宗威以梁（今陕西汉中）、开（今四川开县）、通（今四川达县）、渠（今四川渠县）、麟（疑为潾，今四川大足南）五州降。阶州（今四川武都东）刺史王承岳降。镇江节度使张武以夔、忠、万三州降。十一月九日，昭武节度使林思谔弃利州城归降。十五日，武信节度使王宗寿以遂（今四川遂宁）、合（今四川合川）、渝（今四川重庆）、泸（今属四川）、昌（今四川大足）五州降。天雄节度副使安重霸以秦、陇（今陕西陇县）二州降。到此为止，前蜀所属 10 个节度使，除在成都南面的永平节度使（治雅州，今四川雅安）、武泰节度使（治黔州，今四川彭水）外，其余全部降附后唐。王衍坐守成都已成为瓮中之鳖。

六、唐军入占成都

后唐军队继续日夜兼程向成都进发。十一月九日，李绍琛到达利州，修复吉柏津浮桥，让大队兵马通过。十七日，李绍琛进抵绵州。当地住宅、仓库全部被蜀兵烧毁，绵江浮桥也遭破坏，江

水很深，又没有渡河舟船，唐军继续前进遇到了很大困难。李绍琛告诉招抚使李严：现在敌人望风丧胆，我们如迅速穿越鹿头关，蜀军必将“迎降不暇”^①；倘等待修好浮桥，停留数日，王衍一旦闭关紧守，则胜负难知。李严也赞同李绍琛“利在速战”^②的主张。他们俩人冒着生命危险，带头乘马浮渡绵江，随从兵士渡过1000人，另1000余人不幸溺死。唐军很快占领鹿头关，十八日进驻汉州，3天后，大队兵马陆续赶到。

前蜀中书令王宗弼十一月十五日逃回成都，次日囚禁王衍、后妃及诸王，自称西川兵马留后，并以王衍名义邀请李严先到成都，商谈前蜀投降事宜。李严驰入成都，抚慰前蜀官员、百姓，命令蜀军撤去成都的军事防备。二十六日，魏王李继岌进入成都，王衍及前蜀百官拜降，这场战争全部结束。

后唐灭亡前蜀，得蜀节度使10，县249，步骑兵13万人^③，马9500匹，兵器700万件，粮353万斛，钱192万贯。这是后唐在灭亡后梁之后再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后唐这次入蜀，除在威武、三泉两处与蜀军短期交战外，双方未再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后唐大军长驱直入，前蜀军队望风归降，基本上是一场有征无战的战争。这主要是后唐指导战争谋略的正确。唐庄宗、郭崇韬鉴于前蜀统治集团极端腐败，人心涣散，军无斗志，命唐军长驱直入，闯关涉险，大踏步地向前挺进，使前蜀军队和官员胆战心惊，毫无招架之力。郭崇韬还不失时机地运用政治招降的策略，分化瓦解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后唐的军事进攻，促使敌军大量投降。唐军远途出征，军粮运输特别困难。郭崇韬不依赖后唐政府的运输供给，迅速攻打城市抢占粮仓，取粮于敌，保证了军队的粮食需要，为灭蜀战争全胜创造了极为有利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唐庄宗同光三年。

③ 此处人数从《册府元龟》卷二十，《帝王部·功业二》。但《旧五代史》卷三三，《唐庄宗纪》与《资治通鉴》卷二七四称“兵三万”；《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作“得兵三十万”。

的条件。

前蜀面临后唐的军事进攻，倘全国上下一致，依险防守，很有可能迫使后唐师老粮尽而被迫撤军。然而前蜀以王衍为首的统治集团不顾国家之危亡，竞相奢淫享乐，对于后唐大军的进攻麻木不仁，又未能提出抗击后唐军队进攻的战争谋略。前蜀全国上下分崩离析，纷纷不战而降，国家迅速败亡。

第四章 后唐时期抗击契丹侵扰的战争

第一节 契丹的强盛及其南犯

一、契丹族的发展与阿保机的建国

契丹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的民族，其名最早见于《魏书·契丹国传》，先后与北齐、隋、高句丽、突厥交往密切。契丹各部这时尚未统一联合，各自单独进行活动，内部又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发展比较缓慢。

唐朝初年，契丹8个部落正式形成了大贺氏部落联盟，共同推举部落联盟首领，三年选举一次，联盟首领都由大贺氏家族成员担任。由于部落联盟首领和各部酋长都由显贵家族世选，这表明契丹族已有阶级萌芽，氏族制正处在逐步崩溃的过程中。

契丹各部在唐朝时期纷纷内附，与唐朝关系更加密切。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在契丹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以大贺氏联盟首领窟歌为松漠都督。开元十八年（730年），契丹首领邵固被杀，延续了百多年的大贺氏部落联盟遂告结束。契丹贵族内部又经过一系列的激烈冲突，契丹遥辇氏阻午可汗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成为部落联盟首领。遥辇氏部落联盟从此一直延续到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阿保机自立可汗时为止。

随着契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契丹内部阶级分化更加明显。部落贵族不仅长期把持部落联盟首领、酋长的地位，还全部垄断了部落内部的一切公共职能。部落联盟首领三年选举一次已徒具形式。他们热衷于发动战争，掠夺财物，俘获人口，占有奴隶和农奴越来越多。部落贵族利用军队、刑法维护统治。国家政权机构

正逐渐从氏族社会的母胎中产生出来，阿保机在这种形势下而登上历史舞台。

阿保机姓耶律氏，咸通十三年（872年）出生于契丹部迭刺部世里家族，多智勇而善骑射，9世纪末开始担任挞马狨沙里（可汗的亲兵队长）。天复元年（901年），阿保机被选为迭刺部酋长，专事征讨，连年取胜，被拜为于越。他的地位仅次于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已掌握契丹部落联盟的军事大权。

梁开平元年（907年），契丹可汗痕德堇卒，阿保机被契丹贵族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阿保机上台后，经常外出征战，大肆掠夺人口、牲畜，引起了一些旧氏族贵族的反抗，被阿保机及时平息下去。后梁贞明二年（916年），阿保机建国，自号天皇王，国号契丹，建元神册。

二、契丹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概况

契丹国是在契丹氏族社会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并联合汉、渤海、奚等族某些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契丹国统治阶级包括契丹贵族、汉族的某些地主以及其他族的某些贵族。契丹皇族与萧氏的男女世代联姻，所以皇族耶律氏与外戚萧氏世代掌握契丹的军政大权。太后掌政也是常见的事。汉族中的某些地主是契丹国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等人为阿保机出谋划策，统领军队，修建城郭，发展耕种，备受阿保机的信任。韩延徽曾升为政事令，韩知古迁中书令，谋预军国大事。奚、渤海一些首领有的继续统领其旧部，或充当契丹国的军将。

契丹国被统治阶级包括平民、农奴、部曲、奴隶等。平民指契丹各部落成员。他们平时耕牧，战时从军出征。农奴多固定在国有土地上从事耕种，向契丹政府缴纳赋税，负担徭役，包括有汉、奚、渤海等族劳动者。部曲在契丹贵族和官僚所掌握的大量土地上进行生产，对主人有很深的依附关系。奴隶多在宫廷服役，

或在国家工场做工。这些平民、农奴因民族出身不同，其政治、经济地位略有区别。但他们都是契丹国的被统治者，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严重压迫和剥削。

契丹统治集团为控制全国各族，国家政权也显示出契丹族、汉族的不同特点。全国官制分两个系统，北面官掌管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事务，南面官管理汉民族事务。北面朝官最高机构是契丹北枢密院、南枢密院，各置北院枢密使、南院枢密使，分别主管军政和民政之事。以下惕隐掌皇族，夷离毕掌刑狱，敌烈麻都司掌礼仪。自契丹得燕云 16 州，南面官采用汉制，中央有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等官府，地方设置节度、观察、防御、统军、招讨等使和刺史、县令等。汉人当南面官只占次要地位，各曹首要官职仍由契丹人充任。

契丹国社会经济中，畜牧、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畜牧是契丹国的主要产业，各游牧民族放牧马、羊很多。契丹国在适宜放牧的草原上建立国家牧场（群牧），任命契丹大臣为群牧官。契丹统治者还在战争中大肆掠夺马匹。阿保机在河东代北作战，获牛、羊、驼、马十万余匹，讨女真得马二十余万匹。附属于契丹国的各部族也不断进贡马匹。因而契丹国“群牧滋繁，数至百万余匹”^①。

在契丹各部落，大量汉人、渤海人流入，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种植逐渐推广。阿保机对发展农业比较重视，为开发边疆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契丹国盐铁坑冶等手工业生产都由官府经营。阿保机建国前在汉城生产食盐，供契丹八部食用。耶律德光得燕云 16 州后，“始得河间（今属河北）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今属河北），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镇城、海阳（今河北秦皇岛市西北）、丰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阳洛城、广济湖（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西南）等处，五京计司各以其

① 《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中华书局版（下同）。

地领之”^①。耶律德光在室韦地区生产铜、铁、金、银，由当地人制造铜铁器。又在曷术部、渤海铁利州设置铁冶炼铁。此外，东平县（今辽宁朝阳市）、幽（今北京市西南）、蓟（今天津市蓟县）等地亦置坑冶。契丹工匠生产的马鞍驰名中外。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契丹制造的陶瓷、纺织品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契丹军队沿袭了契丹族社会的传统，“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②军队有正军和家丁之分，奴隶、部曲只能当家丁。每一名正军配备打草谷、守营铺的家丁各一人。铁甲、马具、武具由兵士本人自备。契丹军队行军作战，没有固定的后勤供应，常派遣兵士四出抢掠。全国军队最高指挥权归封建皇帝掌管，军队调动必须凭皇帝发的诏令、鱼符，由皇帝亲自挑选将校领军征战。

契丹军队以御帐亲军最为重要。阿保机挑选骁健精锐者组织亲兵，号“腹心部”。述律皇后“摘蕃汉精锐为属珊军；太宗益选天下精甲，置诸爪牙为皮室军”^③，大约数万人。他们平时负责皇帝的宿卫，战时就奉命出征。契丹皇帝及摄政时间最长的两个太后都置有宫，每宫都划分固定的属地，辖若干正丁（契丹人）、蕃汉转丁（汉人、渤海人及其他各族人），其中契丹正丁有承担宿卫、作战的双重任务。亲王、大臣还带有私兵，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契丹、奚、渤海各部落首领统率自己戍区的军队，叫部旗军。

契丹军队分骑军、步军两种。契丹人当骑军，汉人一般当步军。骑军1人配备马3匹，其中远探阑子军专门负责侦探敌情。骑军攻占敌人城池，进攻敌阵，安营结寨，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行军未遇到大敌而不许乘战马，临近敌人立即驱马前进。同时派遣伏兵断绝敌人运粮通道。他们“馈饷自费，散而复聚，善战、能

① 《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

② 《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

③ 《辽史》卷三五，《兵卫志中》。

寒”^①，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这是他们多次击败五代各国军队的重要原因。

三、契丹向南扩张及对后唐的威胁

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阿保机一面进攻东北地区的室韦、女真、奚各族，一面派30万大军进犯云州（今山西大同）。晋王李克用与阿保机讲和，约为兄弟。双方商定当年冬天同时出兵灭掉后梁。李克用送阿保机金缯数万，阿保机赠马3000匹、杂畜上万头。然而墨迹未干，阿保机却派遣使者送给后梁名马、貂皮、女乐，请求后梁册封。阿保机还与后梁商定，共同出兵灭晋，由后梁册封为甥舅之国。阿保机这样反复无常，是因为契丹诸部刚刚统一，巩固内部尚需时日，所以行挑拨离间之诡计，坐山观虎斗，伺机进犯中原。李克用得知契丹与朱全忠结盟后，大为恼火，临死之前，将一支箭交给儿子李存勖，嘱咐务必灭亡契丹。

阿保机统治时期，契丹南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自开平元年（907年）前后直到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契丹军队不时南下，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富，俘获人口。如后梁龙德元年（契丹神册六年，921年），契丹述律皇后强烈反对阿保机出兵援助成德节度使张文礼作乱，阿保机高兴地说：成德张文礼有金玉百万，留着等待皇后，可以一起夺取^②。于是倾全国军队大举南下。后唐大臣郭崇韬也说：契丹这次南下，完全是为了掠夺财货，不是真正救援张文礼^③，一语道破了真情。

从天成元年（契丹天显元年，926年）起，契丹南侵除了掠夺财富外，更关注吞并中原的领土。这年契丹出兵攻占渤海国扶余城，更渤海国为东丹国，阿保机以长子突欲镇守。阿保机再没有

① 《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

② 《新五代史》卷七二，《契丹传》。

③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

后顾之忧，竟公开威胁后唐使者姚坤说：后唐必须将大河以北地区割让给契丹。倘有困难，先割让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幽州。只有这样，我们才不再南下河北^①。姚坤不肯答应，随即遭到囚禁。这表明契丹随着国势的强盛，正贪婪地注视着河北大片地区，对后唐造成严重的威胁。

第二节 晋王时抗击契丹的斗争

一、晋王抗击契丹的方略

契丹自五代初起就不断往南扩张。倘契丹与河北藩镇、后梁联合起来，晋王李存勖在大河南北就难以应付，甚至有被强敌吞没的危险。李存勖虽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后梁，但又不失时机地抗击契丹的进犯，以便长期占领河北地区，保证能够集中大批军队击败后梁。李存勖对抗击契丹采取防御作战的方针，先后派名将周德威、李存审、李存璋分别出任幽州或大同节度使，配备一定的兵力，确保这两处北部军事重镇的安全。倘契丹大军入侵河北、河东北部地区，李存勖即派大军前往阻击，或亲自领兵出征，直到将契丹军赶出幽州、大同以北为止，然后再集中大军对后梁作战。

二、蔚州、云州之战

后梁贞明二年（契丹神册元年，916年），晋王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附近大败梁将刘鄩，几乎全部占领河北诸州。八月，契丹阿保机见晋方在北面幽州、云州一带防务力量比较空虚，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唐明宗天成元年。

亲率 30 万大军进攻蔚州（今山西灵丘）^①。这里地处云州、幽州之间，“山川险固，关隘深严，控燕、晋之要冲，为边陲之屏障”^②。特别是蔚州西面的飞狐道（今河北涞源），两壁悬崖峭立，道口狭隘，蜿蜒百余里，为河北平原与北方边郡间的交通咽喉。晋方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固守蔚州^③。契丹军队挖地道，昼夜急攻。蔚州城内兵少，外无援军，契丹军攻入城内，俘李嗣本及其子 4 人。接着又进攻新（今河北涿鹿）、武（今河北宣化）、妫（今河北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等州。

阿保机攻占蔚州后，又致书晋大同节度使李存璋，威逼贡献财货。李存璋毫不畏惧，斩杀契丹使者。阿保机连忙调军西向，攻打云州。云州在蔚州西面不远，北控阴山及大漠，南扼太原（今山西太原南），东连易州（今河北易县），西面以黄河为界，是秦、汉以来北方各族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李存璋将云州城内古铁车铸造为兵器，分发城内守军，顽强抗击。晋王李存勖深怕云州失守，危及河东、河北两地的安全，亲自率兵前往驰援。阿保机闻讯晋王已抵达代州（今山西代县），急忙撤军。李存勖遂回师太原。

三、幽州之战

贞明三年（契丹神册二年，917 年）春，晋王李存勖在黄河附近地区河北莘县（今属山东）与后梁大将刘鄩对垒，命威塞军防御使（治新州，今河北涿鹿）李存矩在山北各少数民族募兵征马，并及时送到河北前线。当地边民被迫以 10 头牛换 1 匹马应征，从而激起无比愤怒。李存矩带着裨将卢文进一道押送所征 500 兵士南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二年。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大同府·蔚州》，中华书局版。

③ 此据《旧五代史》卷五二，《李嗣本传》及《资治通鉴》卷二六九。但《辽史》卷一，《辽太祖纪》称契丹拔朔州，俘振武节度使李嗣本，然后攻蔚、新、武、妫、儒五州。

下。二月十五日，被征兵士抵达祁沟关（今河北涿县南）就秘密商量说：“我辈边人，弃父母妻子，为他血战，千里送死，固不能也。”^①遂商定杀死防御使李存矩，拥卢文进返回新州，据城自守。卢文进领乱兵攻打新州、武州，均被击退。晋王命周德威领军追讨，卢文进遂投降契丹，被授为幽州兵马留后。

三月，卢文进引契丹兵急攻新州，晋新州刺史安金全弃城逃走。卢文进以部将刘殷为新州刺史。晋王李存勖命幽州节度使周德威领兵3万人攻新州。周德威营于城东，经过10天作战未能进入新州城内。契丹阿保机在卢文进的勾引下，领30万大军前来增援^②。周德威寡不敌众，败回幽州。

阿保机乘胜攻打幽州，号称百万大军，将幽州重重围住。幽州以北山谷之间，到处是契丹军队的毡车毳幕。卢文进领汉人为契丹制造飞梯、冲车等攻城器械。契丹军挖地道，筑土山，分别从地下、地上急攻幽州。晋军临机应变，一方面在地下烧起柴火，阻止契丹军通过地道进入城内；一方面在城中以烧溶的铜液泼洒攻城的契丹军，每天杀死契丹兵士以千计。但契丹进攻声势不减，幽州城内十分危急。周德威派使者向晋王李存勖求援。晋王这时正与梁军相持河上，“欲分兵则兵少，欲勿救恐失之”^③，一时犹豫不定，遂召集诸将商议对策。李嗣源、李存审、阎宝三人皆劝晋王出兵救援。李存审、阎宝认为契丹军队缺少后勤供给，难以持久，待“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④。李嗣源则坚决主张立即出兵救援，并请求“为前锋以赴之”^⑤。晋王高兴地采纳了李嗣源的建议，命嗣源为前锋率军进驻涞水，阎宝所率镇、定之兵继后。

其后，晋王李存勖因考虑到李嗣源、阎宝兵力较少，难以取胜，于七月二十五日命李存审率部增援。八月中旬，三将会师于易州，共有步骑兵7万人。为了更有效地击败契丹军，他们三人及时聚会，共商对策。他们从敌众我寡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敌

① 《旧五代史》卷九七，《卢文进传》。

②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三年。

骑多利于平原作战、我步兵多利于山险作战的特点，确定了“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① 的作战方略。八月十七日，李嗣源等率军自易州北出。二十三日，晋军翻越大房岭（在今北京房山周口店西）后，沿山涧东进。李嗣源与其养子李从珂率 3000 骑兵为前锋，进抵距幽州 60 里处与契丹军相遇。李嗣源父子依据谷险，挥军奋战，击退契丹军的多次堵截而继续前进。

当晋军到达山谷出口时，契丹一万多骑军突然横列阵前。晋军有些害怕。李嗣源领百余骑前进，挥马扬鞭，指责契丹将领说：你们无故侵犯我领土，晋王命我将百万雄师直抵契丹西楼，灭亡你们。^②然后三次冲入敌阵，杀死一名契丹酋长。这时，晋军大批部队赶到，迫使契丹兵退却，晋军才离开山谷口继续向幽州进发。李存审命步兵每人伐木作成形似鹿角的木叉，宿卫时将叉柄埋地，叉头露出地面，以结寨自卫。契丹军队环寨而过，晋军从寨内强弩万发，杀伤契丹兵士、战马很多。当离幽州不远时，李存审命步兵埋伏于契丹阵后，并派遣部分羸弱兵士燃烧柴草，施放蔽天烟尘，借以掩盖所埋伏的步兵。契丹骑兵很难发挥作用，也不了解晋步兵的多少。晋军随即鼓噪合进，李存审又命晋伏军自契丹阵后发起攻击，契丹军大败，从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山路逃走。契丹军队丢弃车帐、铠仗、羊马于野外。晋兵追击，俘斩万计。河北重镇幽州继续为晋将周德威所占领。这对阻止契丹军队南下、支援晋军在黄河沿线作战，都有重要的作用。

幽州之战，契丹阿保机一次出动骑军 30 万人，晋方以步兵为主力，共约 10 万人^③。这是五代时期以少胜多、主要靠步兵战胜敌人骑兵的重要战例。晋方取胜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李嗣源、李存审、阎宝三人通力协作，制定出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案，扬长避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〇，梁均王贞明三年。

③ 据《旧五代史》卷二八，《唐庄宗纪》载，周德威在幽州有兵 3 万人；加上晋将李嗣源、阎宝、李存审领步骑兵 7 万人，共约 10 万人。

短，充分利用步兵的特长去战胜契丹的强大骑军。其次，后唐名将周德威虽在新州前线被契丹战败，损失惨重；但退回幽州后，依靠幽州城的坚固防御设施，率领将士昼夜乘城，长期坚守幽州，最后配合李嗣源援军作战，内外夹击，赶走敌人。

契丹骑兵多，但攻城作战非其所长，战斗力难以发挥出来。契丹军没有辎重，围城时间长，吃掉自己羊马一半多，严重挫伤了作战的积极性，最后大败逃走。

四、涿州、定州之战

契丹军在幽州作战失利后，继续骚扰河北地区。契丹国卢龙节度使卢文进以平州（今河北卢龙）为基地，经常进犯幽、赵（今河北赵县）诸州，屠杀抢劫，无所不为。晋军自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运输军粮至幽州，常常遭到卢文进部属的劫掠。龙德元年（921年）二月，成德镇军将张文礼杀死节度使王鎔，旋即派使者联络卢文进，要求契丹出兵援助。十月，与成德镇毗邻的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派其子王郁贿诱契丹，请求出兵击退晋军，解除镇州之围。同月，王郁投降契丹。契丹军又攻下古北口，分兵攻略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三河（今属河北）、良乡（今北京房山东南）、望都（今属河北）、潞（今北京通县东）、满城（今属河北）、遂城（今河北徐水西）等十余城，俘走很多百姓。十二月，阿保机再次攻打幽州不克，乃长驱南下，攻陷涿州，俘刺史李嗣弼，又进攻定州。

定州与镇州相隔120里。倘契丹占领定州，再与镇州张文礼取得联系，在镇州城外的晋军就会遭到内外夹击的危险。晋王李存勖得知契丹军进攻定州，定州情况危急，遂不顾镇州城内外正在燃烧着的熊熊战火，亲自领亲兵5000人救援定州，还命令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在狼山（今河北易县西南）屯军防戍，阻挡契丹军南进。

龙德二年（契丹天赞元年，922年）正月十三日，李存勖军队

抵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南。契丹前锋 3000 骑这时从新乐（今河北新乐东北）渡沙河（又称滹沱河，源出山西五台山以西，经新乐东流，注入滹沱河）南行，临近镇州边界。晋军面对契丹军紧逼，部分兵士惶恐不安，匆忙逃走，统军将领难以禁止。

这时，晋方将领对抗击契丹的作战谋略出现了严重分歧。不少人认为契丹全军出动，众寡不敌，应回师南下救援魏州，或西至井陉（今河北井陉东北），暂时逃避。这是面对强敌退却逃跑的主张。晋将李嗣昭、郭崇韬主张坚决前进，先打击契丹前锋以迫使契丹全军撤退。晋王李存勖果断地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他针对军队内部消极畏难情绪的蔓延而严肃批评说：“吾以数万之众平定山东，今遇此小虏而避之，何面目以临四海！”^① 晋王亲自率精骑 5000 先进，契丹万余骑见之，惊恐退走。晋王立即分兵二路追趕，适遇沙河桥狭冰薄，契丹不少兵士溺死水中。当晚，晋王李存勖屯军新乐，契丹阿保机举众退保望都。

正月十六日^②，晋王进至定州。十七日，又引军至望都，契丹军迎战。契丹将领秃馁先将晋王重重围住，晋王自中午战至傍晚，难以脱围。李嗣昭引 300 骑兵横击重围，打退敌人，救出李存勖。晋王随即纵兵奋击，契丹军大败，被晋军追到易州。当时地面雪深 5 尺，契丹兵马缺乏刍粮，饿死很多。晋王乘胜追到幽州。代州刺史李嗣肱又收复山北妫、儒、武等州。

定州之战是晋王李存勖亲自抗击契丹的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通过这次作战，晋军不仅打击了契丹的气焰，保卫了幽州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使困守镇州的张文礼更加陷于孤立，也有力地支持了在黄河沿线作战的晋军。李存勖指挥这次战役，敢于藐视强敌，及时纠正了晋军内部畏惧强敌的消极情绪，鼓舞了全军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一，梁均王龙德二年。

② 据《旧五代史》卷二九，《唐庄宗纪》称，晋王至定州，“翌日”至望都，《资治通鉴》卷二七一称，正月十七日晋王趋望都，则晋王至定州当在十六日。

斗志。其次，晋王善于运用骑兵，及时利用契丹军退却的有利时机，指挥出击，导致这次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三节 明宗时抗击契丹的斗争

一、庄宗后期的腐败与明宗的执政

后唐庄宗曾经在大河南北战场上风云一时，但进入汴州（今河南开封）、洛阳（今属河南）之后，日益骄横腐败，成为当时邪恶势力的总代表，劣迹很多：

1、骄矜荒淫，穷奢极欲。唐庄宗把灭亡后梁归功于自己在马上所取得的胜利，骄矜狂暴，不可一世，拒绝接受臣僚们的忠谏。同光二年（924年），右谏议大夫薛昭文针对后唐王朝横征暴敛，“大失人心”^①，奏请宽徭薄赋，减少国家不急需的营建，放牧官马不要践踏民田，尽可能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唐庄宗却概不理睬，继续大干一系列扰害民众的勾当。他多次带上大部队马在洛阳近畿游畋打猎，伤害百姓田土禾苗，甚至纵容随从禁军任意破坏百姓的家具，拆掉房屋。其残暴行为“甚于寇盗，县吏皆窜匿山谷”^②。唐庄宗命令宦官、伶人到全国各地选择美女充实后宫，一次掠走青年妇女3000人，连魏州军营兵士的家属也难以幸免。唐庄宗在洛阳宫中修建避暑宫殿，“日役万人，所费巨万”^③，大臣郭崇韬两次劝阻都无济于事。

2、宦官、伶人、皇后等乱政败国。唐庄宗不亲政事，纵容宦官、伶人、刘皇后等掌握朝中大权。宦官专权本来是唐朝后期的严重弊政。经过唐昭宗及后梁朱全忠两次大批屠杀宦官，其势力

① 《旧五代史》卷三一，《唐庄宗纪》。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唐庄宗同光三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唐庄宗同光三年。

已大大衰微。但后唐同光二年（924年）诏书说，前朝宦官及各道监军现为私家所蓄养者，不论其身份贵贱，都应当送回京师洛阳^①。后唐宫廷中的宦官很快增到近千人。唐庄宗一律给予优厚待遇，视为腹心，委以要职，或担任诸司使，或授为监军。以景进为首的一批伶人出入宫廷，得到唐庄宗的特别信任，将相大臣、四方藩帅都争相阿谀奉迎。唐庄宗所宠刘皇后发布的“教命”与庄宗诏敕具有同样效力，各地政府都必须执行。宦官、伶人、皇后一伙人狼狈为奸，擅作威福，陷害贤能，搜括民脂民膏，乱政败国，无所不用其极。

3、诛杀将相大臣。后唐大臣郭崇韬在灭梁、平蜀作战中，战功显赫，官至枢密使、宰相，不满宦官胡作非为。平蜀战争刚结束，宦官向延嗣、李从袭就不断诬告郭崇韬专弄威柄，阴谋不轨。唐庄宗一时犹豫不决，刘皇后急忙下达教命在成都（今属四川）处死郭崇韬。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平蜀前锋大将李绍琛、保大节度使李存乂都受到郭崇韬的牵连而被杀。后唐朝野惊骇，人不自保，连蕃汉马步军总管李嗣源也险遭毒手。魏州、西川（今四川成都）、邢州（今河北邢台）、洛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等地相继发生动乱。

4、贪贿成风，民不聊生。唐庄宗、刘皇后、宦官、伶人等大肆接受梁朝降将的贿赂。梁朝降将袁象先行贿数十万，继续充当宋州节度使。降将段凝通过伶人景进重贿朝廷权贵，调任邓州藩帅。各地藩镇也大量贡献财货。宫中内府财物堆积如山，国家财政却支付不出兵士们的饷赐。租庸使孔谦专以聚敛为能事，凡后唐政府所赦免的田租赋税，他如数全部征纳，又趁百姓青黄不接之机发放高利贷，并以贱价征购茧丝，提前征收秋夏租税。同光四年（926年）正月，镇州百姓冻死七千余人，平棘（今河北赵县）等四县饿死二千余人。这年全国大水泛滥，流民饿死数万人，兵士妻子靠采集草木来活命。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唐庄宗同光二年。

同光四年二月，魏州军将赵在礼等作乱，李绍荣率兵征讨失败，唐庄宗派大将李嗣源出征。李嗣源早已受到唐庄宗猜忌而心怀不满，到魏州后又回师南下。后唐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在洛阳发起兵变，杀死唐庄宗。李嗣源同光四年四月在洛阳称帝，改元天成，史称唐明宗。

唐明宗李嗣源，沙陀族人，小名邈佶烈，善骑射。唐末朱全忠围攻李克用于汴州附近上源驿，他奋力保护，李克用才脱离虎口，遂命掌亲兵。李嗣源在灭梁作战中冒刃血战，屡建奇功，先后授为中书令、蕃汉马步军总管。他出身贫贱，了解民间疾苦。称帝后，立即进行改革，废除同光年间的一些弊政。

1、废除旧法，减免赋税。天成元年（926年）四月，唐明宗诏令严厉谴责并处死租庸使孔谦，没收其田宅，废除孔谦所制定的各种厚敛于民的法令。征收夏秋二税，原来每斗加征一升损耗，唐明宗决定免征。诸道州府所欠同光三年租税及天成元年部分夏税也全部放免，全国减免税合计约二百万缗。各地检括田地、征收赋税，诏令州县少派或不派官吏检括、监征，尽可能减少他们对广大农民的滋扰掠夺。

2、打击弄权宦官、伶人，惩治贪官恶吏。宦官之祸在同光年间尤为突出。唐明宗严厉打击弄权宦官、伶人，宫中仅留宦官30人，几百名宦官逃窜山林，或削发为僧，有不少人被处死。各道宦官监军也全部罢除。一些罪恶严重的伶人同样受到惩罚。还坚决打击贪官污吏，整饬吏治。

3、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明宗为节省经费开支，大量裁减宫中人员，后宫量留100人，教坊100人，鹰坊20人，御厨50人，并选用年老旧人，将年轻美貌的宫女放走。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也全部撤销。

4、平息兵乱，削弱藩镇势力。天成元年（926年）六月，汴州控鹤都指挥使张谏不肯赴外地戍守而作乱，焚掠坊市，明宗诏枢密使孔循杀乱兵3000人及其家属。七月，滑州崇牙、长剑、建平诸军数百人因作乱被杀。天成二年（927年）四月，由龙晊所领

邺都奉节等 9 指挥计 3500 人及其在魏州的家属万余人被全部处斩。唐及五代长期桀骜不驯的魏博骄兵到唐明宗朝已基本铲除。十月，宣武军节度使朱守殷据汴州反，明宗亲率禁军及时平息叛乱。后唐政府又命令诸道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等，全部由朝廷命授，不允许诸道自行奏荐。这些措施对削弱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重要的作用。

5、整顿中央禁军。天成二年（927 年），以石敬瑭为汴州节度使兼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将皇帝六军系统与侍卫亲军逐渐合一。在侍卫亲军之外，将其他军队重新编组，形成了捧圣、严卫的两大禁军主力，有利于后唐政府对禁军的控制。

明宗在位 7 年多，经过上述各项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被誉为五代诸朝的“小康”时期，从而增强了后唐抗击契丹的实力。

二、耶律德光执政后的契丹情况

耶律德光是阿保机的次子，深受阿保机及述律皇后的钟爱。契丹天赞元年（后梁龙德二年，922 年）耶律德光任天下兵马大元帅，长期统兵征战，败党项，收回鹊单于城，灭渤海，多次立有战功。契丹天赞五年（后唐天成元年，926 年）七月，阿保机死。九月，述律皇后立耶律德光为帝，史称太宗，改元天显。

耶律德光面临着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地域辽阔的国家，内部缺乏坚固联合的基础，被征服各族虽接受契丹贵族的监督，但仍保留自己的部落和生活方式，与契丹族存在着很深的隔阂。阿保机灭渤海国不久，诸部不满，再次反抗。耶律德光认为渤海国离契丹统治中心较远，难以控制，十分担心。契丹天显三年（后唐天成三年，928 年）七月，契丹大将突吕不讨乌古部，俘获很多。天显八年（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正月，契丹天下兵马元帅李胡出征党项。这表明契丹贵族对被征服各族的统治还不稳定。

汉族降将卢文进自契丹神册二年（后唐贞明三年，917 年）为卢龙节度使，长期镇守平州，多次引契丹军队攻掠幽、蓟一带，给

后唐河北边境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卢文进部下多是汉人，思恋乡土，后唐明宗特派遣使者进行劝诱。契丹天显元年（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十月，卢文进杀死平州城内契丹兵士，带领15万汉族群众重新回到后唐^①。耶律德光又以汉族降将张希崇为卢龙节度使，坐镇平州，并派300骑兵进行监视。契丹天显三年（后唐天成三年，928年）八月，张希崇指使汉族军民杀死契丹在平州的军事首领，赶走契丹驻军，率领二万余汉人回到后唐。卢文进、张希崇的行动给契丹政府很大的打击。

契丹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十分复杂。当耶律德光埋葬阿保机时，述律太后为防止契丹贵族们不肯听从耶律德光的指挥，故意诱骗他们到阿保机墓地予以屠杀。耶律德光长兄突欲没有当上皇帝，心怀不满，奉述律太后之命再回到渤海旧地为东丹国王。耶律德光又怀疑突欲图谋不轨，强迫他迁到东平居住，派卫士监视。唐明宗得知后，秘密派使者前往劝诱，突欲写诗表达出他要求投奔后唐的心情：“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②不久，突欲率部曲40人泛海南来，唐明宗赐姓名李赞华，先后授任怀化军节度使、义成军节度使。突欲出走更增加了契丹贵族内部的裂痕。

耶律德光连年征战，每次发兵几万或几十万人，绝大部分是契丹骑军。在战争中大肆俘获人口，掠夺财富，主要归契丹贵族占有，而契丹平民蒙受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契丹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耶律德光即帝位不久，东丹国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之针对契丹国内部的复杂情况，提出“混一天下”的统治方案^③。他要求首先巩固内部，缓和契丹与渤海、突厥、党项、室韦各族的矛盾，然后利用契丹与被征服各族的兵力，南下中原，统一天下。辽太宗

① 《旧五代史》卷九七，《卢文进传》。

② 《辽史》卷七二，《义宗耶律倍传》。

③ 《辽史》卷七五，《耶律羽之传》。

十分欣赏，表示接受。由于唐明宗在幽州、并州（今山西太原南）一带驻有重兵，防范严密，契丹内部又不大稳定，所以从后唐天成元年（契丹天显元年，926年）耶律德光执政到后晋天福元年（契丹天显十一年，936年）石敬瑭请求出兵的10年间，后唐与契丹除一度在定州大战外，双方边境地区比较平静，契丹国还向后唐提出互市、和亲、派遣使者的要求。从天福元年起，契丹帝耶律德光以为有机可乘，遂发动对后唐、后晋的大规模战争。

三、契丹入占定州与曲阳之战

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定州军将王都囚禁节度使王处直，自称藩帅。王都扩充兵马，屯积财物，妄图割据。后唐明宗于天成三年（928年）四月，以王晏球为北面招讨使领诸道兵讨伐定州王都。王晏球出兵神速，王都措手不及，唐军很快攻占了定州北关城。

五月，契丹接受王都重贿，派奚族将领秃馁领万骑南下。王都遣军指挥使郑季璘、龙泉镇将杜弘寿率2000兵士出城迎接。他们打算城内外相互配合，重创后唐军队。王晏球先集中力量与义武军作战，活捉郑季璘、杜弘寿二将。但由于契丹骑军来势凶猛，一时难以抵挡，契丹骑军很快进入定州城内与王都会合。王晏球退保曲阳（今属河北），秃馁、王都尾随追击。王晏球军队与他们战于嘉山（今河北定县西40里）下面，大败契丹、义武联军。秃馁领2000骑军逃还定州。王晏球乘胜进击，占领定州西关城。因定州城防坚固，短期难以攻破，王晏球增修西关城权作招讨使行府，调发定、祁（今河北无极）、易三州赋税供应军需，打算持久作战，长期包围定州。

当王晏球得知契丹再派兵增援定州，又率领大军前往定州东北面的望都县，命宣徽使张延朗分兵退保定州西南的新乐县。这样，后唐军队分别驻守在望都、新乐、定州外围三处，排成一线，既可以依托望都阻止契丹军南下，又能随时从望都、新乐两处向定州合拢，打击被围困在定州城内的王都与契丹军。但是，契丹

军队巧妙地避开望都唐军主力，自它道进入定州境内，乘夜实施突袭，一举占领新乐城，杀死后唐守将赵州刺史赵建丰。

五月二十一日，王晏球、张延朗会师于行唐县（今属河北），次日到达曲阳。王都与契丹共出动步骑万余人乘胜追击。二十三日，双方在曲阳城南大战。王晏球指示诸将校：“王都轻而骄，可一战擒也。”^①命令后唐军“悉去弓矢，以短兵击之，回顾者斩”^②。唐军分成三路，符彦卿以龙武左军攻敌左侧，高行周领龙武右军袭敌右翼，中路由骑兵实施攻击。后唐军队冲入敌阵，奋力挥剑刺杀，契丹骑军所惯用的弓矢一时难以发挥作用，王都大败，自曲阳至定州横尸弃甲 60 余里。王都与秃馁领少数兵马逃入定州城内，不敢再出城作战。

四、唐河之战与唐军收复定州

唐军在曲阳大胜后，王晏球认为“定州有备，未易急攻”^③，乃继续围困定州。可是，招讨都将张虔钊、朱弘昭扬言王晏球害怕敌人，滞留不进。唐明宗也催促王晏球早日攻打定州。六月二十二日，王晏球被迫进攻定州，死伤将士 3000 人。

七月十九日，契丹再派酋长惕隐领骑军 7000 人援救定州，王晏球迎战唐河（又称澠水，源出蔚州灵丘县，由西北东流途经唐县附近）北，追至满城，杀敌 2000 人，获马 1000 匹。二十一日，后唐军队追到易州，契丹兵士遇久雨河深，被俘杀及淹死者甚多。契丹军逃到幽州境内，幽州牙将武从谏领精骑扼守险要，俘契丹惕隐等 700 余人^④。广大农民也纷纷拿起锄头、白梃砍杀契丹逃散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唐明宗天成三年。

④ 《旧五代史》卷三九，《唐明宗纪》称，俘惕隐五十余人，同书卷六四《王晏球传》作“七百余”；《新五代史》卷四六，《王晏球传》又称，俘惕隐“数十骑”。诸处记载不一。《资治通鉴》卷二七六记载比较清楚，唐明宗赦惕隐等五十人，杀六百余。故七百余一说较妥。

的兵士。契丹仅有几十人逃回国。这是后唐对契丹军队南犯中原一次最沉重的打击，“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①。

唐河作战之后，唐明宗派使者来到前线，督促王晏球攻城。王晏球吸取前次奉命被迫攻城的沉痛教训，不再随便服从。他陪同朝廷使者视察定州城防，在现场对使者说：“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听外兵登城，亦非梯冲所及。徒多杀精兵，无损于贼，如此何为！不若食三州之租，爱民养兵以俟之，彼必内溃。”^②王晏球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长期包围敌人的作战决策，终于说服了唐明宗改变急于攻城的错误主张。这时，王晏球部将见契丹秃馁军大败，都想趁胜进击，但王晏球“独不动，卒以持久弊之”^③，坚持对定州严密围困，不到有利时机决不轻易攻城。

王都困守在定州城内七八个月，契丹援军多次被歼，再不敢出兵增援。因粮食耗尽，王都将1万多城内百姓赶到城外。王都、秃馁见城内军心不稳，士气低落，几次突围外逃，都被后唐军击退。天成四年（929年）二月十三日，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打开城门，迎接王晏球军队进入，俘契丹骁将秃馁及兵士2000人，王都全家自杀身亡。

后唐歼灭定州王都叛军，大败契丹军，是五代时期一次攻城打援非常成功的典型战例。定州城墙高峻，易守难攻，但被后唐军队严密包围，已成为一座孤城，粮食、兵甲、军队都很难补充。后唐统军将领王晏球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先后三次主动迎战，在定州城外、曲阳、唐河大败契丹军；同时又严密围困定州，迫使王都内部发生分裂。王晏球还劝告后唐朝廷改变急于攻打定州的错误主张，又纠正部下的急躁情绪，坚持围城打援的方略，这是取得定州之战胜利的主要原因。

其次，王晏球与广大将士同甘共苦，所得禄赐私财全部分发给部属，不随意处罚杀戮士卒。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始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唐明宗天成三年。

③ 《新五代史》卷四六，《王晏球传》。

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所以越战越强，终于取胜。

第四节 石敬瑭归降契丹与耶律德光灭唐兴晋

一、后唐末期的连续内乱

唐明宗晚年病重，诸子抢班夺权，诱发了一系列的宫廷动乱。

长兴四年（933年）十一月，唐明宗第二子、秦王李从荣见皇上病危，领亲兵攻打皇宫，失败被杀。明宗在宫内血战中惊死，第三子宋王李从厚被立为帝，即唐闵帝，改元应顺。

闵帝年轻，优柔寡断，由枢密使朱弘昭、冯赟等人把持朝政，有才能的朝臣大将多遭斥逐。他们对明宗养子、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十分嫉妒，先免去李从珂之子李重吉控鹤都指挥使，夺取禁兵大权；又将李从珂从凤翔调往太原，准备加以陷害。

应顺元年（934年）二月，凤翔节度使李从珂以清除朱弘昭、冯赟为名，拉拢各藩镇兵经长安（今陕西西安）、华州（今陕西华县）、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进入洛阳，史称唐末帝。唐闵帝逃到卫州缢死。

参加后唐末年动乱的双方都向所属将士封官许愿，或给予重赏，谋求得到他们的支持。当李从珂从凤翔起兵时，许诺兵士们到洛阳后每人赏钱 100 缙。后唐闵帝却尽取洛阳府库财物赏赐禁军，还答应平凤翔之后每人再赏 200 缙。兵士们还嫌不够，扬言到凤翔再拿一份。唐朝后期骄兵集团飞扬跋扈的行为在后梁、后唐时期一度有所收敛，但经过后唐末年连续动乱又恶性膨胀。他们为所欲为，把废立君主当作邀功请赏、升官发财的重要手段，造成国家极不稳定。与此同时，后唐闵帝、末帝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千方百计向广大百姓敲诈勒索，弄得上下离心，人人自危，洛阳监狱人满为患，不少人被迫自杀。这给政治野心家石敬瑭的崛起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石敬瑭的崛起及其归降契丹

石敬瑭，沙陀族人，其父臬捩鸡，骁勇善战，随晋王李克用征战，官至洛州刺史。李嗣源任代州刺史，石敬瑭在帐下任职，李嗣源以爱女许石敬瑭，命石敬瑭将亲兵。李嗣源入洛阳称帝，先后授石敬瑭保义军、宣武军、天雄军以及河阳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六军诸卫副使，长期统领重兵，坐据要镇。长兴三年（932年），契丹进犯云中（今山西大同），石敬瑭又出任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是河东地区防御契丹的最高军事将领。

后唐末年朝廷内部连续动乱，石敬瑭袖手旁观，暗中磨刀霍霍，积极准备灭亡后唐王朝。他以部将刘知远、周瓌为都押衙，分别掌管河东地区的军事、财政，扩充兵力，筹集衣粮。石敬瑭又利用两个儿子在朝廷任职，重贿曹太后左右宫女，专门侦探唐末帝的活动。朝中事无大小，石敬瑭都及时知道。石敬瑭还借口并州一带防御契丹，屯驻禁军很多，不断要求后唐政府增运军粮。清泰二年（935年）六月，唐末帝诏令石敬瑭向河东地区藏粮户征借粮食，在魏博镇购买粮食，征发镇、冀（今河北冀县）州1500乘车辆运粮于代州。调发镇州5万匹绢给太原。大批粮食、绢帛源源不断地归石敬瑭所有。石敬瑭储存在洛阳及各地的财物也借口供军需要都运到太原。

由于石敬瑭的政治野心逐步暴露，唐末帝采取过一些权宜措施，如清泰二年七月，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屯兵代州，牵制石敬瑭的兵力。派羽林将军杨彦询为北京副留守，专门监视石敬瑭的行动。但唐末帝又认为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女婿，国之至亲，还对他抱有幻想。端明殿学士吕琦提出，石敬瑭倘挑起

动乱，“必结契丹为援”^①，要求后唐主动与契丹和亲，阻止石敬瑭与契丹相互勾结，遭到唐末帝的断然拒绝。

石敬瑭为试探朝廷的动静，佯装患病，请求唐末帝解除他蕃汉马步总管的兵权，由太原调到其他藩镇。大臣李崧、吕琦识破了石敬瑭的诡计，力谏不可。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认为石敬瑭调动也反，不调动也反，事在朝夕，不如先下手为强。唐末帝备加赞赏，立即下诏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催促他迅速赴任。

石敬瑭召集臣僚们商议对策，众说不一。有人要求坚决抗拒朝命，也有人同意石敬瑭调任郓州。但石敬瑭自恃河东地区经过长期的准备，财力雄厚，兵强马壮，地势险要，只要“外告邻方”^②，公开投降契丹，就一定能灭亡后唐，称帝中原。石敬瑭心腹臣僚桑维翰极力赞成说：契丹部落正在云州、应州（今山西应县）一带，“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③。石敬瑭随即上表契丹，自称臣儿，请求契丹出兵支援；事成之后，将卢龙节度使及雁门关（今山西代县西北）以北诸州奉献给契丹。耶律德光见石敬瑭上表后，万分高兴，答应仲秋时出兵援助。

三、唐军围攻石敬瑭与契丹出兵

清泰三年（契丹天显十一年，936年）五月，唐末帝命张敬达为太原四面行营招讨使，杨光远为副招讨使，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邢州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保义节度使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前彰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阵等使，准备利用优势兵力一举歼灭石敬瑭。

①③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晋高祖天福元年。

② 《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

太原是河东节度使的首府，位于山西中部太原盆地北端，东有太行山、恒山之险，西以黄河为屏障，周围有雁门关、飞狐道、井陉口、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等关隘，扼守着太原通向塞外、河北、河南的通道。太原城建筑雄伟，历来是我国古代北方的军事重镇。

五月，张敬达领兵3万人从代州南下，营于太原城南。六月，张敬达开始在太原城外兴筑城栅，准备长期围困石敬瑭。但多次遇到暴风大雨，平地水深数尺，所建城栅时而倒塌，无法合围。唐末帝得知契丹出兵，不断催促张敬达急攻，企图早日夺取太原城。后唐军队面对太原城的坚固防御，用云梯飞炮屡攻不下，一开始陷入被动局面。

后唐统治集团本来知道石敬瑭公开起兵，主要依靠契丹军队为后盾，但没有派重兵屯戍云州、蔚州以及重要关隘雁门关，以阻击契丹军队南下。八月，唐末帝派大臣吕琦到河东前线犒赏军队，副招讨使杨光远要他奏报唐末帝：石敬瑭若没有外援，旦夕可以平定；倘勾引契丹军队，俟他们进来后则一举击败^①。但后唐军事统帅骄傲狂妄，注定了必将失败的结局。

由于后唐末期连续内乱，后唐内部一盘散沙，军政大臣各怀异志。有的不闻不问，在旁观看石敬瑭与唐末帝的斗争；有的乘机积蓄实力，妄图篡夺皇位；更多的人眼看后唐统治岌岌可危，急于投降石敬瑭。五月，太原西北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信与雄义都指挥使安元信叛变，领数百骑逃奔太原。后唐捧圣都虞候张令昭准备响应石敬瑭，率众攻入魏博牙城，赶走节度使刘延皓。后唐政府在太原战场之外，又被迫开辟新的战场，派范延光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讨伐张令昭。七月，云州指挥使桑迁作乱。彰圣军指挥使张万迪调往太原附近的虎北口（今太原城北或东北），领500骑投降石敬瑭。后唐内部频繁动乱，既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军事力量，也影响了太原前线军心的稳定。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晋高祖天福元年。

孔，
契丹
石
马步
石敬瑭
反，
立
石
命，
朝的
②，
王僚
一
③。
后
契
助

九月，契丹帝耶律德光率 5 万骑兵，号称 30 万^①，自扬武谷（今山西代县西南）南下。十一日，契丹军途经代州，次日到达忻州（今属山西）。后唐忻、代两州刺史闭城自守，不敢阻拦。耶律德光不分兵攻城，不占领地盘，继续长驱深入。十五日^②，契丹军列阵于太原城外虎北口。耶律德光派使者听取石敬瑭的意见，准备当天进攻后唐在太原城外的军队。但耶律德光又鉴于契丹大军南下，一路长驱直入，无人敢于阻挡，兵锋强盛，而后唐军队士气不振，所以不等待石敬瑭使者的到来，契丹军队急忙与唐骑军将领高行周、符彦卿交战，石敬瑭派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进行配合。张敬达、杨光远领步兵布阵于太原城西北山下，契丹 3000 轻骑直犯其阵。唐军迎击，契丹军佯装示弱，渡汾河退去。后唐军沿汾河北岸向前追击，契丹伏兵突然出击，将唐兵一分为二，汾河以北的唐步兵大败，死伤将近万人。在汾河南岸的唐骑兵逃回晋安寨（今山西太原南郊）。

四、唐军晋安寨之败与契丹册立石敬瑭为晋帝

耶律德光、石敬瑭在后唐清泰三年（契丹天显十一年，936 年）九月十五日太原初战大胜后，不让后唐军队有任何喘息机会，次日即出动大军包围晋安寨。他们在周围长 100 里、宽 50 里的地带设置毡帐，系上铜铃，带上警犬，将张敬达 5 万兵士死死围困在寨内。唐军夜晚从寨内出逃，铃响犬叫，很难通过。耶律德光还“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绝援兵之路”^③。这是五代各次战争中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晋高祖天福元年。

② 耶律德光抵太原时间，《辽史》卷三，《辽太宗纪》作“己亥”（十三日），《资治通鉴》卷二八〇称“辛丑”（十五日）。按耶律德光十二日到忻州，由忻州南至太原还有 180 里，尚需行军时间，似耶律德光十五日抵太原一说较妥。

③ 《辽史》卷三，《辽太宗纪》。

一次最严密的军事包围。张敬达与后唐政府的联系已经断绝。唐末帝得知太原前线消息后，深为恐惧，急忙调兵遣将，命天雄节度使范延光领魏博兵 2 万人抵榆次（今属山西），派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将幽州兵自飞狐道进入太原以北的敌后地区，指使耀州防御使潘环集中蒲州（今山西永济西）、潼关（今陕西潼关县东北）以西诸道戍兵前往慈州（今山西吉县）、隰州（今山西隰县）。又派枢密使、忠武节度使赵延寿率兵 2 万人赴潞州（今山西长治），以右神武统军康思立领禁军抵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南）。后唐拟从辽州（今山西左权）、潞州、慈州、隰州几个方向进发，援救被围困于晋安寨的张敬达。同时出军深入到太原北面，迫使契丹与石敬瑭撤军。后唐朝廷为了增加兵力，又诏令征发百姓当兵，每七户出兵一人，自备铠仗、器甲，称为“义军”；还征发全国将吏及民间马匹，共得马 2000 余匹、义军 5000 人。九月二十二日，唐末帝领兵 3 万人亲征，几天后到达怀州（今河南沁阳），准备统一指挥后唐军队作战。

这些措施倘能认真贯彻实行，几万军队同时调到太原前线，利用卢龙军进扰太原以北或深入契丹境内，以范延光、赵延寿军进攻晋安寨外的契丹军与石敬瑭军队，加上与张敬达军队相互配合，有可能改变唐军的被动局面，甚至夺取胜利。然而从唐末帝到各地军将都心怀鬼胎，各有打算。唐末帝被石敬瑭吓得胆战心惊，饮酒悲歌，形神不安，到怀州就不敢前进。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心怀异志，准备乘后唐大乱而入主中原。他拒绝从飞狐道进入敌后，却领军数千人绕道易州、镇州到达潞州，沿途兼并当地军队，并要求与范延光军合并；遭到范延光拒绝后，又与其子赵延寿进军团柏谷。范延光屯军辽州。后唐政府再三催促他们援救晋安寨，都拒不睬。赵德钧竟厚贿契丹，要求耶律德光立他为中原皇帝，再回兵洛阳推翻后唐王朝。耶律德光没有同意，赵德钧继续屯军团柏谷，按兵观望。至于临时征发的几千义军，不仅无济于事，反而骚扰百姓，增加地方动乱。后唐企图救援晋安寨的一些措施，只不过是画饼充饥。

耶律德光鉴于后唐内部一派混乱，诸路援军各怀异志，肯定灭亡后唐“必有成功”^①。耶律德光为进一步给石敬瑭撑腰，在十一月十二日于太原城内扶植石敬瑭称帝，建国号晋，改元天福。史称石敬瑭为晋高祖。石敬瑭甘心充当儿皇帝，与契丹约为父子之国，将幽、蓟、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雄县南）、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蔚等16州割与契丹，每年纳帛30万匹。后晋王朝的建立对壮大石敬瑭的军事力量，扩大其政治影响，进一步分化瓦解后唐阵营，加速灭亡后唐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契丹从此扩大了地盘，增强了经济实力，又有充当傀儡的后晋朝廷为虎作伥，更加紧准备进占中原腹地的活动。

后晋建立后，石敬瑭与耶律德光继续加紧围困晋安寨。随从唐末帝在怀州的吏部大臣龙敏为解救晋安寨，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请后唐政府拥立早已投奔后唐的耶律德光之兄李赞华为契丹皇帝，派魏博、卢龙二镇军队护送回契丹，造成耶律德光的后顾之忧，然后再选精锐军队向太原附近的契丹军发起攻击。其二，龙敏要求唐末帝挑选精骑兵1000人，派他与勇将郎万金自介休（今属山西）山路，冲破契丹骑军的包围，进入晋安寨内与张敬达会合，共同作战，从而打破契丹与石敬瑭军队的联合包围。契丹及石敬瑭军队当时多在晋安寨前线，契丹后方及太原城内的军事防务比较空虚，且耶律德光、李赞华兄弟之间早已为争夺皇位发生隔阂，倘后唐立李赞华为契丹皇帝，无疑是分化契丹、诱敌撤军的重要措施。契丹述律皇太后后来对赵德钧说：契丹军队南下时，我曾经告诫耶律德光，倘赵德钧引兵北向渝关（今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你必须迅速归来，不可再帮助石敬瑭^②。可见契丹非常害怕后唐军队进入契丹境内。龙敏的建议确是击中要害。唐末帝虽很赞成，但大臣们久议不决，成为空谈。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晋高祖天福元年。

② 见《资治通鉴》卷二八〇，晋高祖天福元年。

后唐招讨使张敬达领兵5万、马万匹被围困在晋安寨内，大将高行周、符彦卿几次领骑兵突围，因众寡不敌，均未得逞。张敬达得不到后唐朝廷的任何消息。自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起，后唐晋安寨内“军储殆尽，至濯马粪、屑木以饲马，马饥至自相啖其骏尾，死则以充食”^①。闰十一月九日，副招讨使杨光远杀死张敬达，投降契丹。大约有5000匹战马、5万件铠仗被契丹运走，降卒归石敬瑭所得。后唐由于在晋安寨的军队全部覆没，元气大伤，灭亡结局已为期不远。

五、团柏之战与后唐灭亡

契丹耶律德光、石敬瑭在晋安寨取胜后，立即引兵南下。天福元年（契丹天显十一年，936年）闰十一月十二日，他们与后唐军队在团柏谷相遇，赵德钧、赵延寿父子首先往潞州逃窜，符彦饶、张彦琦、刘延朗、刘在明等部相继溃逃。后唐军队沿路丢戈弃甲，自相践踏，死者万计。十九日，耶律德光、石敬瑭到达潞州，赵德钧、赵延寿出城投降，随即被押往契丹国。耶律德光见石敬瑭推翻后唐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倘自己继续进军河南，必将遭到汉族民众的强烈反抗。因此，耶律德光暂时留在潞州，准备返回契丹；派太相温领5000骑护送石敬瑭到河阳（今河南孟县），然后根据战争的进展再确定是否抽调其中部分兵马护送石敬瑭到达洛阳。石敬瑭随即领兵自潞州向洛阳进发。

十四日，唐末帝在怀州得知晋安寨失守与杨光远投降，以及石敬瑭称大晋皇帝。后唐君臣慌作一团，纷纷逃命。有人提出魏博范延光军队尚未遭到打击，实力尚强，建议唐末帝暂时逃往魏州。唐末帝听从端明殿学士李崧的意见，决定先撤回洛阳。十七日，唐末帝途经河阳，命诸将分别守卫河阳北城、南城，阻止后

① 《辽史》卷三，《辽太宗纪》。

晋军队渡过黄河。二十二日，唐末帝见人心离散，难以固守，命河阳节度使苌从简毁坏黄河浮桥，集中兵力守卫河阳南城，自己率领随从逃回洛阳。可是，河阳节度使苌从简早已准备好舟船，迎接石敬瑭渡过黄河。石敬瑭为防止唐末帝往关中逃窜，特派契丹骑兵 1000 人扼守渑池（今属河南）。二十六日，唐末帝连同曹太后、刘皇后、儿子重美一起自杀，后唐灭亡。

石敬瑭从太原起兵并迅速灭亡后唐，主要是得到契丹的大力援助，耶律德光、石敬瑭运用战争谋略也相当成功。耶律德光凭借骑军的强大威力，长驱直入，出敌不意，在太原城外主动挑起进攻，诱唐军离营外出，再利用骑军猛烈冲击，导致首战大胜，大大鼓舞了契丹与石敬瑭军队的士气。其次，耶律德光在太原取胜后，暂时停止契丹军队惯用骑军在平原野外主动出击的作战手段，而会同石敬瑭严密包围唐军于晋安寨。当唐军粮刍耗尽，内部分裂，耶律德光、石敬瑭不费一枪一卒而接受杨光远投降，取得了灭唐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后唐作战屡次失败以至灭亡，关键在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以及内部的严重分裂。首先，石敬瑭在太原公开反叛，唐末帝虽派张敬达等领大军进讨，但长期忽视石敬瑭与契丹的勾结以及对契丹军队南犯的防御。后唐没有在太原以北的代州、忻州、雁门关一带据关守险，阻止契丹军南下。张敬达屯军太原城南，也未在太原城北部署重军防御契丹。后唐更未利用契丹内部的矛盾，设法分裂瓦解契丹，或派兵深入契丹内地，诱使耶律德光撤兵。其次，后唐统治者又未研究石敬瑭利用太原城防坚固的实际情况，急于攻城，妄图速胜，使后唐军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第三，后唐地方军阀骄横跋扈，一些节度使手握重兵，心怀异志，虽奉命来到太原前线，却见死不救，坐待张敬达的失败，从而加速了后唐的灭亡。

第五章 契丹的大举南下与中原军民的抗战

第一节 后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加深

一、石敬瑭臣服契丹

后晋灭亡后唐，称帝中原，主要依靠契丹军队的帮助。石敬瑭对此感激涕零，多次发誓要报答契丹统治集团的恩德。他进入洛阳不久，就派遣大臣赵莹向契丹送上燕云 16 州的图籍，每年还纳贡帛 30 万匹，忠实地履行他原先与契丹订下的条约。据《辽史》记载，石敬瑭称帝 6 年，先后派遣使者 43 次去契丹，向契丹帝进纳贡物，问候起居，贺节献礼，请上尊号，报告藩镇动乱，请求批准后晋行南郊庆典。国内外大事几乎全部听命于契丹君臣裁决。

燕云 16 州（包括今北京市、河北与山西北部、内蒙南部的大片地区）历来多为我国中原王朝直接统辖的地区，具有较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历史悠久的文化。石敬瑭将这大片土地拱手送给契丹，自然会遭到当地军民的激烈反对。天福二年（契丹天显十二年，937 年）二月，耶律德光自潞州（今山西长治）返回契丹，路过大同（今山西大同），俘大同节度使沙彦珣，但节度判官吴峦据云州城坚决反抗。契丹军队围攻 7 个月仍无法进入城内。石敬瑭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一方面假意请求契丹军队撤除对云州的包围，一方面调吴峦为武宁军节度使。俟吴峦离开，契丹很快占领了云州。天福三年（契丹会同元年，938 年）八月，契丹南京留守、后唐降将赵思温秘密上表石敬瑭，要求将幽州（今北京市西

南)重新归附后晋,石敬瑭拒不同意。天福六年(契丹会同四年,941年)六月,振武军节度副使赵崇赶走节度使耶律画里^①,要求归附晋朝。契丹帝派衰古只领兵攻打,赵崇在朔州(今属山西)城内坚持斗争半年,得不到后晋的任何支持,石敬瑭还派出使者劝说赵崇投降。朔州军民拒绝投降,将契丹大将衰古只击毙在朔州城下。最后终因众寡不敌,契丹军队攻陷朔州,城内全体丁壮惨遭屠杀。

被契丹用武力征服的吐谷浑、党项、沙陀、突厥各少数民族,由于不满契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肆意欺压,纷纷逃离故土,投奔后晋。契丹帝大为恼火,指责石敬瑭招纳叛人。天福六年(契丹会同四年,941年)正月,后晋派供奉官张澄领兵2000人,在并(今山西太原南)、镇(今河北正定)、忻(今属山西)、代(今山西代县)四州搜查吐谷浑群众,将他们押回契丹。契丹使者一再追问指责,石敬瑭不知所措,忧惧成疾。

后晋国内发生重大事情,如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范延光、镇州安重荣擅自称兵割据,石敬瑭都及时上报契丹。安重荣杀死契丹使者,散发文书公开指责契丹的种种罪行,石敬瑭仍在诏书中强调契丹的恩德和强大,指责安重荣对抗契丹乃自取灭亡。契丹也随即部署军队准备进讨。襄阳(今属湖北)安从进发起叛乱,契丹帝耶律德光指使石敬瑭抓紧讨伐。

总之,石敬瑭称帝后不仅无耻地向契丹称臣称子,割让土地,贡纳金帛,还配合契丹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后晋朝廷是遵循契丹统治集团旨意办事的傀儡政权。

二、藩镇叛乱,谋夺政权

晋高祖石敬瑭对契丹奴颜婢膝,对藩镇又迁就姑息,期望得

^① 此据《辽史》卷四,《太宗纪》,但《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称,赵崇杀伪节度使刘山,与《辽史》略异。

到各地藩帅的支持，并向后晋朝廷提供大量财物。由于唐末帝、晋高祖都从节度使登上帝位，各地藩帅也蠢蠢欲动，企图仿效从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说：“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①这正是藩帅们准备兴兵闹事的充分暴露。晋高祖建国不久，魏博范延光、安州李金全、成德安重荣、襄阳安从进等接连发起叛乱，企图推翻后晋朝廷，夺取全国政权。

范延光先后出任后唐成德节度使、天雄节度使，长期统领重兵，早有问鼎中原的打算。晋高祖起兵太原，范延光领兵2万戍守辽州（今山西左权），拒不投降。晋高祖进入洛阳后，范延光更心怀不满。天福二年（937年）三月，范延光召集所属各州刺史，调动军队，阴谋作乱。后晋宰相桑维翰有所察觉，奏请晋高祖速赴汴州，对范延光采取军事行动。晋高祖遂借口洛阳漕粮缺乏，东巡汴州（今河南开封），加强防备。

六月，范延光以冯晖为都部署，孙锐为兵马都监，领步骑2万人沿黄河西上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二十六日，晋高祖命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张从宾为副都部署兼诸军都虞候，高行周为西面都部署，统一领导对范延光的作战。后晋军队部署在相州（今河南安阳）、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一带，阻止魏博军队渡黄河南下，保卫洛阳（今属河南）、汴州的安全。

范延光一面出兵作战，一面派使者暗中拉拢同谋。后晋东都巡检使张从宾首先响应，公开反叛，杀皇子、河阳节度使石重信，又进入洛阳杀皇子、权东都留守李重义，夺取内库钱帛奖赏兵士。张从宾引兵攻打汜水关（即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杀巡检使宋廷浩，向汴州逼近。汴州城内一片慌乱，晋高祖准备逃往太原。桑维翰叩头苦谏：“贼锋虽盛，势不能久，请少待之，不可轻动”^②，晋高祖才安定下来，继续在汴州指挥作战。

七月，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晋杨光远引诱范延光部

① 《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晋高祖天福二年。

将冯晖、孙锐自六明镇（今滑县东北古黄河北岸附近）穿渡黄河，刚行至黄河水面中间，晋军突然发起反击，魏博兵多溺死，冯晖、孙锐逃还魏州。后晋杜重威及奉国都校侯益引兵抵虎牢关，与张从宾战于汜水，叛军万余人被俘杀殆尽。张从宾渡河淹死。范延光出师不利，又失去了张从宾的声援，被杨光远围困在魏州一年多，天福三年（938年）九月向后晋投降。

天福五年（940年）五月，安州节度使李金全反于安州（今湖北安陆），晋高祖任命马全节为安州节度使，领河南诸道兵出讨。李金全作战不利，投奔南唐。南唐将李承裕率军3000人前来支援，进据安州，被马全节全部歼灭。

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年）初，以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怀有野心，加紧扩充军队，收市战马，伺机而动。他公开谴责晋高祖屈事契丹，尽国中奇珍异货向契丹贡献，凌虐汉人，是万世之耻辱。他争取吐谷浑、契苾、东西突厥、沙陀、党项各少数民族归附成德镇，要求石敬瑭联合他们一致反抗契丹。天福六年（941年）八月，晋高祖自汴州来到邺都（今河北大名北），对安重荣对抗契丹进行恫吓威胁。同时，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奉晋高祖密诏，挑拨离间，劝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脱离与安重荣的联系，投奔河东节度使。达靼、契苾闻讯后，也拒绝与安重荣一起反抗后晋。

安重荣仍无所顾忌，派人联络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天福六年（941年）十二月，安重荣集中境内饥民数万人向晋高祖行在邺都进发。当月七日，后晋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杜重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邢州节度使马全节为副使，领护圣等马步军39指挥讨伐安重荣。十三日，双方军队战于宗城（今河北威县东）西南。安重荣部署偃月阵，晋军攻击不利，杜重威打算撤退。指挥使王重胤说：“兵家忌退。镇之精兵尽在中军，请公分锐士击其左右翼，重胤为公以契丹直冲其中军，彼必狼狈。”^① 杜重威接受建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晋高祖天福六年。

议，重新发起攻击。成德排阵使赵彥之临阵投降，安重荣大败，退保宗城县。当夜三更，晋军攻入城内，获马3000匹，绢3万余匹，安重荣领10余骑逃还镇州。成德军战亡及冻死者2万余人。天福七年（942年）正月二日，镇州牙将引后晋军攻入牙城，捕杀安重荣。后晋改镇州为恒州，以杜重威为节度使。杜重威将镇州官府及安重荣家财掠夺一空，又重敛于民，税外加税，老百姓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

为配合安重荣反抗朝廷，襄州安从进也举兵反叛。安从进原先是后唐山西道节度使，后晋建国后拒绝晋高祖将他调任青州（今山东益都）的命令，继续留任原职。安从进依靠襄州的坚固城防与汉江天险，忙于扩建军队，准备战争。南汉、楚、荆南各国向后晋贡献财货路过襄阳，安从进多掠归己有。来往襄阳的商人也被迫刺面从军。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八月去邺都之前，同意宰相和凝的请求，特留给大梁留守郑王石重贵数十份空白敕书，授权他随时调动军队进讨安从进。

十一月，安从进发兵进攻邓州（今河南邓县）。郑王石重贵派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行营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彥筠为副都部署，张从恩为监军。安从进进攻邓州失利，二十七日退至湖阳县（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北面花山，张从恩迅速赶到，安从进大败，退保襄州。高行周包围襄州半年多，天福七年八月，奉国军攻入城内，安从进全家自杀。

自天福二年（937年）至七年（942年），后晋连续发生藩镇动乱，规模较大，是五代诸朝地方藩镇反抗中央朝廷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些叛乱虽相互有些联系，但缺乏组织严密的统一行动，各自为政，孤军作战，所以被晋高祖分别平定。但它充分暴露出后晋统治的不稳，并严重削弱了后晋的军事力量，对抗击契丹南侵的斗争十分不利。

第二节 契丹的战略及其战争准备

一、后晋北部边防战备的废弛

自契丹占领幽、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雄县南）州之后，后晋北部边防前线主要是邻近幽州的易定、成德、横海三道。横海节度使治沧州，靠近大海，地势低下，又多塘池，对契丹骑兵的行动十分不利。易定、成德两道占据河北大平原中部，是契丹南侵的必经通道。可是，后晋朝廷认为“发兵守塞，兵少则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①，仅仅依靠当地藩镇兵维护成德、易定两道的地方治安，而将中央禁军主要部署在汴州、洛阳地区。

自天福六年（941年）安重荣起兵失败后，晋高祖用其妹夫杜重威为成德节度使。杜重威把当地军队当作欺压群众、搜括民财的工具，从未加强训练以对付契丹统治集团。杜重威贪残不法，屡次借口加强边防，强行搜括老百姓钱帛，占为已有。契丹两次入侵，驱掠大批汉人路过镇州城下，或攻占成德节度使所属州县，杜重威坐镇镇州城内，贪生怕死，从不派遣一兵一卒打击契丹军。宰相桑维翰要求免除杜重威成德节度使职务，晋出帝却认为杜重威是晋朝的密亲，完全可以信赖，让他继续留驻成德镇。

义武节度使与成德节度使有所不同。如义武节度使所属易州刺史郭璘长期坚守易州城（今河北易县），多次打退契丹军队的进犯，还出兵阻击契丹军队南下。但郭璘只是孤军奋战，得不到后晋朝廷及义武节度使的任何支持，难以发挥打击契丹的作用。

后晋朝廷既未派重兵戍守河北国防前线，当地藩镇武装力量有限，又很不可靠，战备废弛，自然无力抵挡契丹大军的入侵。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晋高祖天福六年。

二、杨光远暗结契丹

杨光远，字德明，沙陀族人。其父阿啜啜，事晋王李克用为队长。杨光远先后出任后唐幽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妫（今河北怀来东南）、瀛、易、冀（今河北冀县）四州刺史、振武节度使、义武节度使，长期在河北地区担任军政要职，对契丹情况比较熟悉。石敬瑭起兵太原，后唐末帝命杨光远为太原四面副招讨使，他与招讨使张敬达被围困于晋安寨（今山西太原南郊）。杨光远与次将安审琦一起杀死张敬达，投降石敬瑭；还故意编造谎言，骗取晋高祖的信任，被授为宣武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掌管禁军。

天福二年（937年），杨光远统领晋军征讨魏博范延光，不久授命为魏博节度使。杨光远手握重兵，骄恣跋扈，干预朝政，晋高祖无可奈何，屈意顺从，授其子承祚为左威卫将军，娶帝女长安公主；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宠冠朝廷。晋军讨平范延光之后，晋高祖深感杨光远身居重镇，跋扈难制，特听从枢密使桑维翰的建议，将他调任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解除统领禁兵的权力。自此以后，杨光远对晋高祖、桑维翰极为不满，暗中以宝货贿赂契丹，诉说自己遭排挤，又私下蓄养部曲千余人，培植死党，准备闹事。

天福五年（940年），后晋调杨光远任平卢节度使。晋高祖按照杨光远的要求，又拜其子承祚为单州刺史，承勋为莱州防御使，父子一道东行，一路车马浩荡。晋出帝因军马缺乏，命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归还原先所借朝廷马300匹。杨光远更加不满，遂背叛晋朝，进一步与契丹勾结。天福八年（943年）十二月，杨光远向契丹密告后晋国内形势：“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

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①，要求契丹利用后晋的严重困难而抓紧南下。

三、契丹的战略目标及其南下准备

契丹南下的战略目标经历了长期发展变化的过程。后唐天成元年（契丹天显元年，926年），耶律德光向后唐使者姚坤提出要得到黄河以北诸州，遭到拒绝。天福元年（契丹天显十一年，936年），耶律德光出动大军帮助石敬瑭，夺取了燕云16州，还明确要求石敬瑭“世为我藩辅”^②，长期向契丹称臣，即建立由契丹操纵的后晋政权。天福七年（契丹会同五年，942年）夏，晋出帝与契丹关系日益恶化，耶律德光就打算大举南侵，灭亡晋国，在中原地区建立以耶律德光为首的契丹贵族集团直接统治的政权。

耶律德光为实现霸占中原的战略目标，作了长期的准备工作：（一）天福二年（契丹天显十二年，937年），契丹刚占领幽州不久，就改幽州为南京（今北京市西南），屯驻重兵，作为南下前进的重要基地。天福五年（契丹会同三年，940年），耶律德光巡视南京，亲自检阅步骑兵于南郊。契丹军每次南侵，几乎都是从幽州出发的。（二）储藏军需器械、马匹。契丹多次南侵，大肆掠夺军需器械，仅天福元年晋安寨之战，就将马5000匹、铠仗5万件运回国。后晋大臣桑维翰说：“中华之精甲利兵，悉归庐帐”，契丹“戎器备而战马多”^③，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三）选用汉人为契丹效劳。契丹族与汉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习俗不一，政治、经济也有很大差别。这给契丹南侵造成了困难。耶律德光为此特别重用一批汉族人士充当契丹国官员、军将，为契丹出谋划策，或率领军队冲锋陷阵。赵延寿、张砺、赵延昭、刘晞、崔廷勋、赵思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三，晋齐王天福八年。

② 《辽史》卷三，《辽太宗纪》。

③ 《旧五代史》卷八九，《桑维翰传》。

温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赵延寿、张砺在天福元年投降契丹，耶律德光先后授赵延寿为幽州节度使、枢密使、政事令、中京留守、燕王等官爵。赵延寿也积极充当契丹入侵中原的前锋。张砺入契丹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遇事决不回避，必尽其言，颇得耶律德光的信任。这些投降官将的活动为契丹南下提供了很多方便。

由于契丹长期扩军备战，又占领了幽州、云州等军事重镇，重用一些汉族投降官将，并与后晋杨光远秘密勾结，所以南下作战相当顺利，仅用五年多时间就灭亡了后晋。

第三节 中原军民抗击契丹进犯的斗争

一、打退契丹第一次进犯

天福七年（契丹会同五年，942年）六月，晋高祖病卒，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与宰相冯道立齐王重贵为帝，史称晋出帝。景延广因立出帝有功，升官宰相，又掌管禁军，居功骄傲，不可一世。此后，后晋致书契丹只称孙而拒绝称臣。在后晋境内的契丹商人多被杀，财货被没收。景延广向即将回国的契丹回图使^①乔荣说：“归语而主，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为邻称孙，足矣，无称臣之理。”^②耶律德光胆敢挑起战争，“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③，一定能打败契丹。这些言论，对于契丹统治集团无疑是火上加油，很快成为契丹大举南侵的导火线。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与降将赵延寿更加紧劝说契丹大举南下。耶律德光认为时机已到，派大军征讨后晋。

（一）贝州之战

天福八年（契丹会同六年，943年）十二月，契丹军队分三路

① 回图使，系契丹派往后晋从事贸易的官员。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八三，晋齐王天福八年。

南进^①，西路军由安端率领，经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打忻州、代州、并州；耶律德光亲自统领中路军从幽州出发，经魏州直逼黎阳；东路军归麻答指挥，由德州（今山东陵县）、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一带过黄河与杨光远军会师。耶律德光、赵延寿统领妫、檀（今北京密云）、应（今山西应县）诸州及卢龙兵5万人为前锋队伍。契丹利用骑军机动快速的强大战斗力，挺进黄河北岸，企图以主力自黎阳、德胜（今河南清丰县西南）一带强渡黄河，直入汴州；并用一部分军队自博州一带渡河，与青州杨光远会师后，经郓州袭击汴州；同时用少量兵马在代北一带牵制河东刘知远军队。他们的战略企图是长驱直入，胜则挺进，败则急退，以便保存实力，图谋再次进攻，不灭亡后晋，决不罢休。

后晋朝廷得知契丹入侵后，在军事方面有所部署，先后派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领兵屯守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扼守黄河渡口，阻止契丹军与杨光远军队会合。同时，征发一些藩镇军队屯驻魏州南面的南乐（今属河南）及德清军城（今河南清丰县西南），防止契丹军队占领黎阳、德胜等黄河渡口，抢渡黄河南下。但是，自幽州以南至魏州以北的广阔地区，后晋没有重兵防守。成德节度使杜重威坐镇恒州（即镇州，今河北正定），闭城自守，契丹军队过其城下，概不阻拦，契丹军很快逼近贝州（今河北清河西）。

贝州地处水陆要冲，交通方便，早在唐代便是储存军粮的集中地。后晋在这里储军粮几十万石，系河北诸军的重要粮仓。贝州节度使王令温这时奉诏命入朝，朝廷急派在云州抗契丹军有功的吴峦为权知贝州军州事，指挥本道兵马抗击契丹军。吴峦一到贝州，见兵士在严寒中挨冻，想方设法让他们穿上冬衣，很受兵士欢迎。天福九年（契丹会同七年，944年）正月，契丹军队包围贝州。契丹帝耶律德光亲率奚、渤海诸军四面进攻，城内兵士往夹城投下薪草，继以炬火，将契丹军攻城器具云梯等焚烧殆尽。契

① 《新五代史》卷七二，《契丹传》。

丹军再次合围，城内全体丁壮上城防守。在这紧急关头，隐藏在城内的奸细邵珂打开贝州城南门引契丹军入城。顿时，城内一片混乱，吴峦见大势已去，投井自杀。契丹占领了贝州，杀后晋守城军民万人，缴获大批粮食，继续向南挺进。

（二）戚城之战及马家口之战

贝州之战后，契丹继续分三路大军南下，作战频繁，其中规模较大的战斗是戚城（位于德胜城北，今河南清丰西南）之战与马家口（今山东东阿西）之战。

天福九年（契丹会同七年，944年）正月七日，后晋朝廷调兵遣将，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左羽林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阵使。按照五代行军作战的惯例，北面行营都部署高行周是指挥全军作战的军事统帅，但正月九日晋出帝又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景延广充御营使。景延广发号施令，宰相以下官员都不得过问，所有军将都得听从他的指挥，实际上是后晋的军事统帅。由于高行周与景延广相互牵制，后晋在戚城之战险遭惨败。

正月十二日，晋出帝自汴州出发。十四日，契丹军前锋赶到黎阳。十五日，晋出帝到达澶州（治德胜城，今河南清丰西南）^①，亲自督促对契丹作战。耶律德光当天屯军于元城（今河北魏县东），赵延寿屯军南乐，即将发起大规模进攻。二十二日，后晋征借全国公私马匹，加强骑兵队伍，准备与契丹铁骑相对抗。后晋皇帝、军将、禁军、藩镇兵在短时期内集中于黄河前线一带，显示出对抗契丹的决心。

正月二十三日，契丹军攻打黎阳，后晋急派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率3000骑兵加强防御。晋出帝还派人致书契丹帝，要求停止战争，重修旧好。契丹统治者认为事已如此，不可改变，再次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载，后晋天福三年十一月，徙澶州治所于德胜城（今河南清丰西南）。在此之前，澶州治所为顿丘（今河南清丰西）。

露出一定要灭亡后晋的决心。

正月底，后晋郓州观察判官窦仪奏报博州刺史周儒已投降契丹，又与杨光远相勾结，引契丹军队从马家口渡黄河。左武卫将军蔡行遇领数百骑驰援，被敌伏兵俘走。二月一日，契丹大将麻答自马家口渡过黄河，接着攻打郓州北部地区，急于与青州杨光远会师。倘此意图得逞，契丹军与杨光远军经郓州直逼防务空虚的汴州，后晋朝廷将会重蹈后梁灭亡的覆辙。这天，后晋命前保义节度使石赟守马家口，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守杨刘镇（今山东东阿东北），护圣都指挥使白再荣守马家口，西京留守安彦威守河阳（今河南孟县）。二月二日，又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怀让领兵万人沿黄河水陆东进，大大增强了东线战场马家口一带的防务力量。

耶律德光见后晋军队大批东调，二月三日突然从中线发动进攻，包围后晋将领高行周、符彦卿、石公霸于戚城，景延广命诸将分地扼守，不得相互援救。晋出帝接到高行周的告急，亲自领禁军驰援戚城。契丹上将金头王在戚城战死，契丹军被迫撤退。

二月五日，李守贞等赶到马家口。契丹大将麻答领兵万人在黄河南面兴筑城垒，派骑兵加以掩护。暂时留在黄河北岸的契丹军几万人正分批乘船渡河。李守贞抓住有利时机，突然发起进攻，破其城垒，赶走契丹骑兵，几千人淹死于黄河中。后晋缴获契丹战马 800 匹，俘军将 78 人，兵士 500 人^①，取得了马家口战役的胜利。

当契丹军在中路戚城、东路马家口地区激战前后，契丹西路军也发起进攻。天福九年（契丹会同七年，944 年）正月三日，契丹大将安端进入雁门关以南，围忻、代二州。正月中旬，契丹军攻太原，被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击退。正月二十八日，刘知远奏报

^① 此处人数从《旧五代史》卷八二，《晋少帝纪》，但《资治通鉴》卷二八四称契丹军“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与《旧五代史》记载出入较大。

败契丹于秀容（今山西忻州），杀敌 3000 人，俘兵将 500 余人。晋出帝授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命令他出兵经土门（今河北井陉东北）到达恒州，断绝契丹军退路，迫使契丹撤军。但刘知远拒听朝命，引兵屯乐平（今山西晋阳）不肯前进。耶律德光因占领河北广阔地区而没有后顾之忧，又挑起澶州之战。

（三）澶州之战

天福九年（契丹会同七年，944 年）二月，契丹帝耶律德光吸取戚城、马家口两次战斗失败的教训，暂不主动进攻，佯装撤离元城（今河北大名北），将精兵埋伏在古顿丘城（今河南清丰西），引诱晋军出战，伺机歼灭。后晋邺都留守张从恩多次奏报契丹军逃走，晋大军准备追击，因大雨而未出动。契丹军埋伏十多天，人马疲乏，赵延寿向耶律德光献计说：“晋军悉在河上，畏我锋锐，不敢前进，不如径造城下，四面而进，攻夺其桥梁，天下定矣”^①。耶律德光采纳了这一建议，三月一日，亲自领兵十余万人进攻澶州^②。他们分兵两路，耶律德光布阵澶州东面，赵延寿置阵于澶州西面。有人密报契丹，晋军东面人少，城栅不固，先攻澶州之东，即可夺取浮桥。契丹军队猛攻晋军阵地，后晋偏将药元福、慕容邺出骑兵奋战，契丹军始终无法夺取黄河浮桥。耶律德光又率领骁骑攻打晋中军，晋出帝指挥亲兵列阵以待，旗帜如林，兵马严阵。耶律德光对左右说：杨光远说晋朝兵马已大半饿死，今日所见，多么威壮^③！契丹骑兵往来冲击，晋军屹立不动，万箭齐发，敌军稍退。双方军队战斗到夜晚，兵马死亡很多。最后，契丹军分两路逃走，一路出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一路自深州（今河北深县西）、冀州返回。契丹留赵延照为贝州留后，麻答据守德州，准备再次南犯。

（四）后晋军民乘胜收复失地

契丹军南下及其撤退，所过之处，焚烧抢掠，赤地千里。契

^{①③} 《旧五代史》卷八二，《晋少帝纪》。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晋齐王开运元年。

丹军攻占贝州、博州时，还假惺惺地抚慰当地百姓，对后晋官将授官赐服，笼络人心。一旦败于戚城及马家口，原形毕露，到处大肆屠杀，激起了汉族军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收复失地，赶走契丹军队。

开运元年（契丹会同七年，944年）三月十九日，晋义武节度使马全节攻占泰州（今河北清苑县北）。四月，晋沿河巡检使梁进领乡兵赶走契丹军队，收复了德州。

五月七日，后晋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李守贞统步骑2万人讨青州杨光远。六月二十一日，晋军攻克淄州（今山东淄博南），杀刺史刘翰。青州被围困半年多，契丹救兵又被击退，城内粮尽，军民饿死很多。杨光远子承勋被迫投降，开城门迎接官军，杨光远遭处死。

五月十六日，邺都留守张从恩上表，赵延照虽占据贝州，但麾下兵士因久离故乡盼望回家，应派兵从速攻讨。后晋朝廷命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出征，二十日，赵延照放火焚烧贝州城，抢劫一空，弃城逃走，后晋军又占领贝州。

六月，后晋命府州刺史折从远进攻契丹，拔契丹十余寨。

由于后晋军民的英勇斗争，契丹第一次南侵时所占贝州、德州、泰州在近半年内均为晋军收复，割据青州的杨光远被彻底铲除。后晋朝廷免除景延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接任，并重新任命桑维翰为枢密使，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国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督13节度使兵力防备契丹。后晋朝廷频繁地调兵遣将，准备应付契丹的再次进犯。

二、打退契丹第二次进犯

（一）邢州之战

开运元年（契丹会同七年，944年）闰十二月，契丹再次大举入侵，仍以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为前锋，围困恒州，又分兵攻占鼓

城（今河北晋县）、藁城（今属河北）、元氏（今属河北）、高邑（今属河北）、昭庆（今河北赵县西南）、宁晋（今属河北）、蒲泽（疑在今河北南宫市境内）、栾城（今河北栾城西）、柏乡（今属河北）等9县，前锋很快到达邢州（今河北邢台）。坐镇恒州的顺国节度使杜重威向朝廷告急，晋出帝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诸道兵屯邢州，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邺都。当耶律德光领大军到达元氏，晋朝廷害怕戍守邢州一带晋军被歼，急忙指示张从恩等后撤。晋军匆忙后撤，丢戈弃甲，乱成一团。张从恩随即退至相州。开运二年（契丹会同八年，945年）正月，晋出帝又诏令赵在礼退屯澶州，马全节回军邺都（今河北大名北），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出兵守胡梁渡。二月三日，张从恩奏报契丹主力逼近邢州，晋朝廷又害怕邢州失守，再次指示邺都马全节、滑州皇甫遇向邢州进发。后晋军队往返奔命，无力抵抗。契丹军乘势南进，抢掠邢、洛（今河北邯郸东北）、磁（今河北磁县）三州，进入邺都境内。

契丹军队第二次自幽州南下，占领邢州及其他州，基本上没有遇到晋军抵抗，关键在于晋朝廷军事指挥的失当。后晋防御契丹军第二次南侵，防御重心究竟置于何处，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部署。开始拟将邢州作为第一道防线，派张全恩等阻止契丹大军前进，但又害怕契丹军力量强大，信心不足，又指挥张全恩后撤，企图固守澶州、黎阳，依托黄河作为抵御契丹军南下的天然屏障。可是，后晋朝廷并不甘心邢州失陷，又命令晋军向邢州进发。朝廷指挥如此出尔反尔，统兵将领无所适从，兵士们疲惫不堪，所以面对契丹军的强大进攻而节节后退，溃不成军。

（二）榆林店之战

开运二年（契丹会同八年，945年）正月十五日，后晋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领行营兵数万，在相州安阳河（又名洹水，出自河南林县，经安阳北面东流）南面布阵。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兵负责侦探契丹的动静，至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将渡漳水（出自山西省东南部，经河南邺县附近，

往东南流入卫河)时，与契丹军相遇，边战边退。到榆林店(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契丹大军赶到，皇甫遇、慕容彦超两人商量，如再往后退，敌骑军冲上，数千晋军将会全军覆没。于是，他们列阵对抗，与契丹军从中午战至下午，力战百余回合，双方伤亡很多，皇甫遇始终无法脱围。有人向安阳(今属河南)张从恩报告皇甫遇被契丹军数万人围困，但后晋北面行营马步都监张从恩拒不发兵。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不顾个人安危，领兵驰援。契丹军望见尘埃骤起，惊呼晋大军已到，旋即逃走。耶律德光从邯郸(今属河北)逃至鼓城。皇甫遇等回到相州。

这天夜晚，张从恩聚众将商议：契丹大军南下，我们兵士不多，相州城内储粮很少，倘有人向敌密告，契丹大军来攻，我们会很快失败。不如引军就食黎阳仓，南临黄河以拒敌人，可谓万全之策^①。后晋诸将尚未商妥作战方案，张从恩就带头往黎阳撤退，诸军相继逃命，一路狼狈逃窜，十分混乱。

张从恩撤退时，留步兵500人扼守安阳桥，知相州事符彦伦见人数太少，随即将500兵士召入城内。十六日天明，赵延寿领契丹数万骑列阵安阳河北，很快渡过安阳河，经相州城外南进。当赵延寿抵达汤阴(今属河南)，得知右神武统军张彦泽自黎阳向相州进发，害怕遭到相州城内驻军与张彦泽军队前后夹击，十七日，赵延寿全军退走。后晋在黎阳的张从恩、马全节也不敢出兵追击。

(三) 白团卫村之战

榆林店之战结束后，契丹大军暂时撤退，但又不断骚扰河北一些地区。后晋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人要求利用契丹撤退之际“大举径袭幽州”^②。晋出帝认为再犹豫不战，则黄河以北地区将全部落入契丹手中，十分赞同“径袭幽州”的主张。开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晋出帝下诏亲征，先后命令北面行营副招讨使马全节、北面行营兵马都监李守贞、许州节度使符彦卿、河中节度使安审琦、滑州节度使皇甫遇、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梁汉璋、侍卫步军都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晋齐王开运二年。

指挥使李殷、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左神武统军潘环出征。晋军这次出动多少兵力，两《五代史》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晋出帝派遣后晋许多有名将领同时参战，而且在后来一次战斗中竟出动精锐骑兵万余人，说明晋出帝对这次北上作战极为重视。他们不靠近黄河列阵防守，打算挥师北上，攻占幽州。

开运二年（945年）正月二十八日，晋出帝自汴州出发，二月八日到达澶州。十二日，马全节、李守贞、张彦泽等领前军先发，其余晋军随后分两批北上。十九日，晋出帝命北面行营招讨使、顺国节度使杜重威领本道兵会合副招讨使马全节一起进军。三月九日，杜重威与李守贞、马全节、皇甫遇在定州会合。十四日，晋军攻泰州，契丹泰州刺史晋廷谦降，俘蕃汉兵士2000人。十八日，攻克满城（今属河北），俘契丹酋长没刺及兵士2000人。十九日，收复遂城（今河北徐水西），离幽州仅有200余里。正在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的耶律德光深怕契丹南部军事重镇幽州失守，急领8万余骑南下作战^①。杜重威、李守贞借口“我师粮运不继”^②，决定退还泰州。他们还没有见到契丹军，就着手后撤，再次暴露出后晋将领对契丹十分恐惧。

三月二十日，晋军自满城退回泰州。二十二日，再往南撤，契丹大军跟踪追击。二十四日，双方战于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后晋为抗击契丹骑军，以步军布列方阵，选精锐骑兵挑战，契丹军渡白沟退走。二十六日，契丹军再结阵南进，晋军边战边退，一天仅行十余里，兵士们非常饥饿劳累。二十七日，晋军在白团卫村（阳城南40里，今河北保定西南）被契丹军团团围住。契丹还出动部分军队深入敌后断绝晋军的运粮通道。晋军营内缺水，人马饥渴，兵士们掘井不成，只得用泥水解渴。耶律德光洋洋得意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晋齐王开运二年所记为“八万余骑”，但《旧五代史》卷八三，《晋少帝纪》作“五万余骑”。

^② 《旧五代史》卷八三，《晋少帝纪》。

地说，“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①，似乎必将全胜。此时，东北风突然大起，屋倒树断，耶律德光命骑兵跳下战马，拔掉晋军埋设于地作为障碍物的形似鹿角的树枝，并向晋营中万箭齐发，又顺风纵火烧毁晋军营地。契丹军攻势越来越猛。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晋军统帅杜重威胆怯怕敌，不敢组织军队发起战斗，拟等待风势稍缓，再作部署。兵士们愤怒高呼，都招讨使为何不出军作战，让兵卒等死！众将领也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要求出战。晋北面行营马步都监李守贞提出：“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惟力斗者胜。”^②马军右廂副排阵使药元福认为“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急击之”^③。他们认为现时风沙弥漫，契丹军不了解晋军的实际情况，而且骄傲轻敌，应出其不意，迅速出战。晋将药元福、张彦泽、符彦卿、皇甫遇不等都招讨使杜重威的命令，以万余骑突然横击契丹军，呼声震大地，打得契丹军措手不及，大败逃命。李守贞命晋军往北追袭二十余里，沿途到处是契丹军队丢下的马匹、兵器。耶律德光逃至幽州，收集散兵，并将白团卫村作战失败的契丹酋长各杖数百下，唯独为契丹南犯最卖力的汉族降将赵延寿免遭挨打。

四月，晋出帝见契丹军已被击退，从澶州回到大梁，参加这次作战的各路晋军又返回原地。

第四节 后晋北伐失败与契丹南下灭晋

一、后晋统治的严重危机

后晋对契丹连年作战，各种自然灾害又频繁发生，加以统治者骄奢淫侈，横征暴敛，外戚专权，排斥异己，导致后晋统治陷入严重危机。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晋齐王开运二年。

晋出帝立叔母冯氏为皇后，其兄冯玉很快升为宰相，军国大事全部由冯玉裁决。冯玉一旦生病，出帝告诫诸位宰相，凡授命刺史以上官必须留等冯玉决定，其他宰相都不得过问。冯皇后又用宦官李彦弼为皇后宫都押衙，主管宫内一切事务。后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陈州节度使李彦韬因长期侍候晋出帝，与宦官、冯玉等相勾结，他大言不惭地说，朝廷文官不起作用，妄图全部废除。成德节度使杜重威娶晋高祖妹为妻，仰仗贵戚权势，在镇贪残不法，群众怨声载道。杜重威因害怕契丹势力强大，未经朝廷允许，擅自离开成德镇来到大梁。杜重威向晋朝交出兵士 4000 人及部分铠仗，晋出帝拟将他们编入朝廷禁军，杜重威却要求将这 4000 兵士充当自己的牙兵，由朝廷供给衣粮。他如此藐视朝廷，晋出帝不加追究，还按照杜重威妻的要求，再次任命杜重威为天雄节度使。后晋由这些外戚、宦官把持朝廷大权，或戍守重镇，军事、政治更加败坏。

白团卫村之战取胜后，晋出帝认为全国太平，骄侈益甚，“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①。宰相冯玉、桑维翰接受四方贿赂，财产巨万。禁军将领景延广一次向晋出帝进献帛 5000 匹、绵 1400 两、马 22 匹，进献的器服、马鞍、椅榻多用金銀包飾，华丽无比。各地节度使贪贿成风。赵在礼先后出任十余道节度使，所到之处，设邸店经营商业，大发横财。他离任宋州（今河南宋丘南）时，宋州人相互庆贺说：此人调走，大家好像从眼中拔出了钉子，岂不乐哉^②！赵在礼大为恼怒，赖在宋州不走，向每人征钱 1000，自号“拔钉钱”，一年获钱 100 万。这种税外加税，各地比比皆是。

天福八年（943 年），后晋全国各地接连发生洪水、干旱、蝗虫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几乎颗粒无收，连野草、树叶也被蝗虫吃了。几十万人饿死，不少人四处逃亡。仅据《旧五代史·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晋齐王开运二年。

② 《新五代史》卷四六，《赵在礼传》。

晋少帝纪》载，河南府（治洛阳，今属河南）逃亡 5387 户，河中（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逃亡 7759 户，贝州逃亡 3700 户，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逃亡 8100 户，泾（今甘肃泾川北）、磁、青等州及邺都共逃亡 5890 户。后晋政府不顾人们的死活，竟派遣几十位官员分赴各地征括粟麦，严刑酷罚，老百姓无法生存，纷纷揭竿而起。开运三年（946 年）三月，“河南、河北大饥，殍踣甚众，沂（今山东临沂）、密（今山东诸城）、兗（今属山东）、郓寇盗群起，所在屯聚，剽劫县邑，吏不能禁”^①。这表明各地小股农民起义正蓬勃发展，后晋王朝已临近灭亡的末日。

二、后晋北伐的酝酿及北伐战略

晋出帝在开运二年（契丹会同八年，945 年）三月白团卫村作战胜利后，盲目骄傲轻敌，认为契丹南侵容易对付。十二月，长期主张与契丹媾和的桑维翰被免除枢密使、中书令的职务。晋出帝在宰相冯玉、大将李守贞等人的支持下，不顾国内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积极酝酿北伐契丹，并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

（一）重用立有战功的军将。李守贞、皇甫遇、张彦泽等在白团卫村作战中立有战功。开运二年（契丹会同八年，945 年）九月，晋出帝派相州节度使张彦泽领兵北上屯戍恒州，在边防前线防御契丹。张彦泽还一度主动出击，杀契丹军二千余人，次年九月返回相州。开运三年（契丹会同九年，946 年）上半年，李守贞统兵北上抗击契丹，俘契丹鄆州刺史赵思恭，在定州北面杀死契丹军将解里。九月，后晋朝廷对他们加官晋爵，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守贞加兼侍中，滑州节度使皇甫遇进封邠国公，相州节度使张彦泽加检校太尉，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北伐契丹的战争。

（二）征集战马，屯积军粮。开运二年九月，后晋朝廷派遣使

^① 《旧五代史》卷八四，《晋少帝纪》。

臣分赴各道征集马匹，扩大骑兵队伍。后晋朝廷向北部边防军事重镇定、易、恒州运送军粮，以供战时的需要。

(三) 接洽契丹汉族降将归附。契丹幽州节度使赵延寿、瀛州刺史刘延祚都是投降契丹的汉族降将。他们向后晋朝廷提出，准备脱离契丹的控制，举瀛州城归附，要求后晋派大军速去应接。赵延寿等人如果有此诚意，本应就近向后晋定州（今河北定县）、恒州地方官员接洽，为何又要求后晋朝廷劳民伤财、派大军北上迎接呢？后晋统治集团未能识破敌方制造的假象，不断派出使者暗中与赵延寿、刘延祚联系，准备派兵北上应接。

晋出帝经过一年多的准备，自认为有几员战将可以依赖，又有汉族降将赵延寿等人要求归附，北上击败契丹已胸有成竹，胜利在望。因而大胆地提出“先取瀛、莫，安定（瓦桥）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①的作战方略，即主动派大军北上，接应赵延寿、刘延祚的投诚，先轻取瀛、莫二州，再进兵幽州，将契丹军队赶出河朔，收复河北失地。然而这时后晋境内社会经济严重凋敝，民不聊生，危机四起，很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北伐战争的客观条件。大将李守贞虽立有战功，但又接受杜重威的贿赂，极力推荐杜重威充当北伐作战的军事统帅。至于赵延寿、刘延祚的归附，更是诱晋军上钩的圈套。后晋盲目出兵，必然会遭到失败。

面对即将北伐的后晋大军，契丹统治集团一改以往主动进攻的作法，先诱使后晋大军北上瀛、莫二州，远离统治中心的河南腹地，再伺机围歼；然后出其不意，派骑军突然南下，直奔防务空虚的大梁。

三、晋军北伐失利与契丹入汴灭晋

开运三年（契丹会同九年，946年）十月十四日，晋出帝任命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晋齐王开运三年。

天雄节度使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监，统领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义成节度使皇甫遇、永清节度使梁汉璋、前威胜节度使宋彦筠、洛州团练使薛怀让、奉国军左厢都指挥使王饶等北伐契丹。李守贞等与天雄节度使杜重威在魏州会合后，共领兵十余万人^① 北上。杜重威不断催促其妻（晋高祖妹）入奏，请求增派更多军队。朝廷无可奈何，只得将全部禁军调往杜重威麾下，京师大梁防务空虚。

十一月十二日，杜重威领大军到瀛州城下，城门大开，寂若无人，晋军害怕城内设有伏兵，不敢前进。杜重威得知契丹将领高谟翰已引兵出走，派永清节度使梁汉璋领 2000 骑追赶，在南阳务与契丹军相遇，梁汉璋不幸战死。杜重威遂引兵南走。契丹所控制的束城（今河北河间县东北）等数县请降，杜重威等人既不安抚广大汉族群众，组织他们反抗契丹，攻占瀛州，反而放火焚烧房屋，抢劫妇女，领大军往南逃走。

契丹见后晋军南退，随即大举南下，经过易州、定州往恒州进发。杜重威退至武强县（今河北武强县南）后，还打算沿冀州、贝州继续南逃。此时，后晋戍守恒州大将张彦泽引兵来会，并说明“契丹可破之状”^②，杜重威才引兵西向，以张彦泽部为前锋，沿滹沱河（源于山西繁峙县，由西向东，途经恒州南面）向恒州进发。二十七日，后晋军队赶到恒州南面滹沱河上的中渡桥时，契丹军已抢先占据该桥。张彦泽发起猛攻，契丹军烧桥梁退走。晋军与契丹军双方在滹沱河南北两侧相互对峙。杜重威军扼守在滹沱河以南，滹沱河以北的恒州城仍为晋军屯守，临时撤退到中渡桥北的契丹军队暂时处于晋军南北夹击的态势。晋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谷向杜重威、李守贞建议说：“今大军去恒州咫尺，烟

^① 《辽史》卷七五，《耶律图鲁奢传》称十余万人，但《辽史》卷四，《辽太宗纪》又称杜重威等“率所部二十万众来降”，则杜重威出征时军队至少有 20 万人。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晋齐王开运三年。

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积薪布土其上，桥可立成。密约城中举火相应，夜募将士斫虏营而入，表里合势，虏必遁逃”^①。李谷提出晋军抢渡滹沱河，与恒州城内晋军同时出击，是打败敌人切实可行的正确主张，也得到众将领的支持。但杜重威拒不接受，置酒作乐，很少议论军事，命大军继续留驻原地。

耶律德光见契丹军队南进受阻，又害怕晋军从南北两个方向的夹击，特召集诸将商议对策。众将领要求暂时撤军，大将耶律图鲁奢极力反对说：倘契丹军队中途退走，则幽州必将被晋军攻占。“且彼步我骑，何虑不克。况汉人足力弱而行缓，如选轻锐骑先绝其饷道，则事蔑不济矣。”^② 契丹帝对此十分重视，并马上付诸实施。他一方面命大军阻止晋军渡过滹沱河，一方面派将领萧翰、通事刘重进率部分骑兵渡过滹沱河上游而沿太行山东侧进入晋军后面，断绝后晋军队运输粮饷与往后撤退的道路。萧翰赶到栾城（今河北栾城西），城内晋军戍兵千余人尚未发觉，随即投降。契丹军沿途捉到汉族百姓，在他们脸部刺上“奉敕不杀”四字，放归南走，以扰乱后晋军心。后晋运输粮饷的民夫见到那些脸上刺字的汉族百姓，都弃车逃跑。后晋大军的粮草供应愈益困难。

十二月一日，后晋磁州刺史李谷向晋朝廷报告前线大军十分危急，请晋出帝坐镇滑州，派兵扼守澶州、河阳等黄河重要渡口，防止契丹军抢渡黄河南下。四日，杜重威再次请求增加兵员，晋出帝派防守宫廷的几百名卫士赶到前线，又征发滑州、孟州（今河南孟县）、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刍粮 50 万担束赶运前线。

由于大梁城内宿卫禁军全部派往前线作战，人心惶惶，恐惧不安。开封尹桑维翰见国家危在旦夕，要求拜见晋帝。晋出帝玩鸟取乐，拒不接见。桑维翰又要求拜访宰相，当权者也毫不理睬。后晋皇帝、宰相已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又怎能指导前线作战？十二月六日，晋朝廷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都部署，符彦卿为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晋齐王开运三年。

② 《辽史》卷七五，《耶律图鲁奢传》。

副都部署，共同防守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广镇守河阳，防止契丹铁骑往南奔冲。但他们兵力有限，无济于事。

这时，杜重威与朝廷的联系已中断，契丹军队已深入赵州境内，晋军腹背受敌，处境很难。但后晋大军还未受到严重损失，恒、易、定等州尚为晋军占领，如果后晋各方面能够统一行动，向中渡桥发起突击，还有可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夺取胜利。为避免晋军“营孤食尽，势将自溃”^①的结局，奉国军都指挥使王清提出强渡滹沱河、进入恒州的建议，为杜重威所采纳。杜重威遣王清与前威胜节度使宋彦筠一起前进。王清勇猛作战，很快进入中渡桥北岸，契丹军被迫后退。宋彦筠作战失利，又退回滹沱河南岸阵地。王清在河北岸与契丹军鏖战，互有伤亡，多次请求杜重威出兵援助。但杜不肯发兵，王清终因众寡不敌，一直战斗到傍晚，全体将士壮烈牺牲。后晋部分官兵企图挽救危局的行动再次失败，各路兵马更不满杜重威见死不救，灰心丧气。

十二月八日，杜重威领大军困守在滹沱河南岸附近，内外断绝，粮食殆尽。杜重威、李守贞、宋彦筠等密谋投降契丹。杜重威的心腹军将来到契丹牙帐，向耶律德光接洽投降，邀请重赏。耶律德光欺骗说：赵延寿威望很浅，不能当南面君主；倘杜重威来降，决定立他为中国皇帝^②。杜重威大喜，决意投降。十日，他召集诸将领商量，首先拿出投降表，逼使大家一一签名。又命令全体兵士列阵。兵士们认为即将与契丹进行决战，个个斗志昂扬。当杜重威突然宣布投降，命大家放下武器，兵士们嚎啕痛哭，声震原野，对杜重威屈膝投降的行为，无不切齿痛恨。

晋出帝这次北征，除河东节度使军队留守原地外，大河南北的藩镇兵以及朝廷亲军，几乎全部调入杜重威的前线行营。后晋十几万大军及一批将领不战而降，已决定了后晋即将灭亡的命运。耶律德光抓住战机，首先迫使河北各州一一归降。杜重威引耶律德光来到恒州城下，向恒州城内守军恫吓威胁，顺国节度使（即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晋齐王开运三年。

成德节度使)王周六开城投降。十二日,耶律德光进入恒州城内。契丹军队又出征代州,刺史王晖很快归降。接着,易、定、邢等州都被契丹占领。河北各地几乎全部为契丹所有,彻底解除了契丹南进的后顾之忧。

耶律德光引兵沿邢州、相州南下,杜重威领降军随行。耶律德光派麻答及降将张彦泽领 2000 人为前锋,直奔大梁。麻答、张彦泽的兵马如入无人之境,从白马津(今河南滑县东)渡黄河继续南侵。十六日晚,晋出帝得知张彦泽到达滑州,急忙召集大臣李崧、冯玉、李彦韬商议对策,打算诏令河东刘知远派兵赴援前线。次日天未亮,张彦泽从封丘门斩关而入,城中大乱,晋出帝、李太后奉表求降,被押送到契丹境内长期囚禁。后晋王朝至此结束。

后晋末期,统治集团昏庸腐败,社会经济全面崩溃,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不具备大军北伐的政治、经济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出军北伐,后晋中枢既无法对前线作战给予正确的指导,又不能及时保障前方的军需供应,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在军事上,后晋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选用军事统帅不当。军事统帅肩负指挥战争的重任,对夺取战争胜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晋出帝挑选军事统帅任人唯亲,重用对契丹作战一贯临阵脱逃的驸马都尉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统领十余万大军。宰相赵莹很不满意,对宰相冯玉、李崧说:“杜令国戚,贵为将相,而所欲未厌,心常慊慊,岂可复假以兵权”^①,但晋出帝拒不理睬。其他一些将领对杜重威唯唯诺诺,阿谀奉迎,很少议论军事。结果,杜重威带头降敌,全军覆没,加速了后晋的灭亡。倘后晋朝廷改用皇甫遇、高行周、符彦卿等大将为统帅,战争结局会有所不同,或推迟后晋的灭亡。

第二,受骗上当,战略决策失误。晋出帝在白团卫村作战取胜后,由原先害怕契丹进攻转变为盲目骄傲轻敌,低估契丹强大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晋齐王开运三年。

的军事力量，错误估计耶律德光与汉族降将赵延寿等人之间已发生裂痕，将北伐战略决策建基于汉族降将幽州赵延寿、瀛州刘延祚的归附，严重失误。因此，晋出帝将全部中央禁军、大河南北藩镇兵十余万人统一集中到瀛州附近，既没有部署一定数量的二线防守梯队固守邢州、相州，连澶州、河阳等军事要冲也未派重兵防守，大梁城内防务空虚。结果，晋军在瀛州城外接洽刘延祚归降受骗上当，前锋作战失败，又缺乏其他应变措施，从而导致契丹军长驱南下，后晋无力阻挡。

第三，晋军北上没有联合河北藩镇，孤军奋战。后晋北伐期间，晋军还占领河北地区顺国、易定、魏博等道，特别是顺国、易定两道，背靠太行山，面临河北大平原，居高临下，占有监视、打击契丹军队南下的有利条件。耶律德光每次经过易州城下就大发感慨，“吾能吞并天下，而为此人（指易州刺史郭璘）所扼”^①，可见利用顺国、易定镇对打击契丹十分重要。然而后晋大军北上始终没有主动联合顺国、易定镇的军事力量。即使晋军在争夺中渡桥作战严重受阻时，杜重威仍拒绝出军支援禁军大将王清去打通通向恒州的道路，以便与顺国军合势击敌。因而北上晋军孤军作战，日益被动，以至失败。

第五节 契丹的残暴统治与各地的抗暴斗争

一、契丹入犯中原后的残暴统治

天福十二年（契丹会同十年，947年）正月一日，耶律德光进入汴州城内，因害怕别人报复，当天傍晚又移居城郊赤冈。七月，再次入城，派契丹士兵日夜严密把守开封府及朝廷宫殿诸门。耶律德光为试探后晋臣僚们的想法，特对后晋百官说：契丹国地域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晋齐王开运三年。

广大，方圆数万里，有君长 27 人；但与中原文化习俗不同，我打算挑选 1 人当中原的皇帝，你们意见如何？早已看透了耶律德光内心的后晋降臣们，个个顺水推舟，异口同声地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全国各族都愿推戴陛下当皇帝^①。二月一日，耶律德光穿上汉族皇帝的衣服，当上了中原皇帝，国号大辽，将会有十年改元为大同元年。此后，史称耶律德光为辽太宗。

辽国先后任用后晋降臣张砺、和凝为宰相，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但辽朝军国大权由契丹族人掌管。一贯充当契丹南侵急先锋的赵延寿想当中原皇帝的愿望落空。翰林承旨张砺拟迁赵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省、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如故。辽太宗亲自涂去“录尚书省、都督中外诸军事”。赵延寿竟不能参与辽国的军事，后晋其他降臣更无权过问。各地节度使、刺史，特别是沿黄河附近的诸藩镇节度使，多由契丹将领或他们的亲信充当，如留珪任义成节度使（治滑州），潘聿任横海节度使（治沧州），朗五任澶州节度使（治德胜城），萧翰任宣武节度使（治汴州），麻答任安国节度使（治邢州）。辽国利用他们控制这些重镇，残暴镇压各地军民的反抗斗争。

辽太宗刚进入汴州即通告当地百姓说：大家勿须恐惧不安，辽朝政府会使你们休养生息。他还对臣僚们说：自今以后，不置甲兵，不买战马，轻徭薄赋，全国太平^②。这完全是欺人之谈。辽太宗本人就广泛接受各地贡献，每天纵酒作乐，将中原地区大量兵器、战马、财货源源运回契丹。中原辽军以抢掠财物作后勤供应。他们进入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以放牧战马为名，纵容辽国骑兵到各地轮番抢掠，称之为“打草谷”。他们杀死大批成年丁壮，将老弱者弃于沟壑。自大梁、洛阳两京到郑、滑、曹（今山东定陶西）、濮（今河南濮阳西南）各州，数百里间，公私财物被洗劫一空。与此同时，辽太宗为优赏辽国军队，迫使三司使刘昫征括大梁城所有官员、百姓的钱帛，自宰相、大将以下都不得幸免。又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晋高祖天福十二年。

派遣数十人到各州括借，动辄残酷诛杀。“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①

中原各地原后晋军民在政治上还受到辽朝统治集团的种种迫害。当辽太宗向汴州进发时，曾命杜重威领降兵随行，刚抵达黄河岸边，他又害怕晋兵叛变，密谋将这些降兵全部淹死河中。有人谏阻说：各地晋兵很多，倘杀死晋朝降兵，他们必将顽强反抗。这对于契丹十分不利，不如安抚降兵为宜。辽太宗害怕激起晋朝士兵的大规模反抗，被迫接受意见，让杜重威领降兵屯于陈桥（今河南开封东北20里）。进入汴州后，他又要将晋降兵全部杀害。赵延寿献策说：晋国南有南唐，西邻后蜀，常为仇敌，可派陈桥降卒分别戍边，防御南唐、后蜀的进扰。同时将这些降兵家属全部迁徙到恒、定、云、朔诸州，也不怕他们在南面叛变^②。辽太宗赞同以降兵家属为人质的阴险毒计，这些降兵才免遭屠杀。

辽朝大将麻答先后出任安国节度使、中京留守^③。他将民间的珍货、美女抢走，还诬蔑村民为盗贼，施行披面、抉目、断腕、焚炙等酷刑。麻答外出常带着多种刑具，还以被害者的尸体威胁当地民众。河北地区的民众惨遭杀害，难以计数。天福十二年（辽朝大同元年，947年）四月，辽太宗往北路过相州，命蕃汉诸军进占城内，杀害全部男子，妇女被驱掠北走，一次杀死十余万人。辽国统治者妄图以疯狂掠夺、残暴屠杀等手段维持对中原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却遭到各地军民前仆后继的反抗。

二、各地军民的抗暴斗争

中原各地原后晋军民为了反抗辽国统治者的残暴统治，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抗暴斗争，保卫家园。他们“多者数万人，少者不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晋高祖天福十二年。

③ 辽朝建国，以恒州为中京，见《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晋高祖天福十二年。

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①。辽国统治者坐卧不安。

天福十二年二月，滏阳（今河北磁县）梁晖有众数百人，侦知契丹彰德节度使高唐英尚未到达相州，城内兵力少，很快攻入城内，杀契丹军数百人，夺取器甲数万件。梁晖自称相州留后。

二月，辽国澶州节度使朗五残虐贪浊，当地群众恨之入骨。澶州农民首领王琼联合夏津张乙，领兵士千余人，夜袭德胜南城，又进攻黄河北岸的德胜北城，将朗五围困在牙城内面。辽太宗得知后极为恐惧，急忙将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天雄节度使杜重威放回郓州、魏州，对这些军事重镇加强防守，又派兵支援澶州。王琼最后战败被杀。然而他们的斗争打破了耶律德光长期统治中原的美梦，开始作逃归塞外的打算。

二月，在汴州以东，农民抗暴队伍更加庞大。农民首领李仁恕统领数万人攻打徐州城（今属徐州）。辽太宗惊叹说，我不知道华人如此难以制服^②！乃派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赶回兖州、徐州，稳定当地局势。

四月，嵩山农民首领张遇有众万余人，推后梁朱乙为天子。伊阙首领也自称天子。他们攻打郑州（今属河南）、洛阳，战斗失利。

与上述广大农民斗争遥相呼应，各地后晋军将也奋起反抗，驱杀辽朝派往各地的节度使、刺史、括借使，据守州郡。天福十二年正月，契丹派张彦超为雄武节度使，史佺为彰义节度使，前节度使何重建、史匡威公开反抗，不允许张彦超、史佺进入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泾州城内。何重建自此归附后蜀，领后蜀兵攻打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

辽国派将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治陕州）。后晋军将王晏、赵晖、侯章一起攻入牙城，将刘愿砍首示众，又杀死辽国监军，推赵晖为陕州留后。辽太宗还不死心，再派使者前往拉拢，赵晖又杀死使者，并打退前来进攻的辽国军队。

此后不久，后晋军将武行德奉辽太宗之命，率兵士千余人押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晋高祖天福十二年。

几十船兵器运往契丹境内。途经河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时，武行德告诉兵士们说，契丹不能久留中原，不如驱逐其军将，坚守河阳。他们夺取铠仗分发给兵士，乘虚进据河阳。辽太宗知道河阳失守，焦虑不安，不得不承认自己进入中原后犯了三大错误，即命诸道括借钱物；派契丹兵士“打草谷”；不早派各道节度使返回原镇^①，所以引起普遍反对！

以上所述，仅是反抗辽国暴政斗争的部分事例。这些斗争主要在宋州、亳州（今属安徽）、密州、徐州、陕州、潞州、澶州、孟州等地，几乎将盘踞在汴州的辽太宗四面包围。辽国在中原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小，还不断遭到打击。广大军民反抗辽国暴政的正义斗争，有的被镇压，有的逐渐归附于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但辽太宗开始认识到契丹无法用军事暴力长期统治中原，遂准备撤离汴州，北归故地。

三、契丹被迫北归

天福十二年（辽国大同元年，947年）二月，当澶州农民首领王琼破坏德胜渡浮桥时，辽太宗就担心通向契丹的道路受阻，打算撤离黄河以南地区。三月七日，他召集百官，以天气炎热要回契丹故地探望述律太后为名，准备逃离中原；同时派其亲信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继续镇守河南。

三月十七日，辽太宗从汴州动身，带走后晋文武百官、诸军吏卒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将宫中府库财宝掠夺一空。辽太宗见到沿途村落一片废墟，仍纵使契丹骑兵剽掠搜索，还亲自指挥攻打相州城，屠杀城内居民十余万人，再次暴露了契丹统治者惨无人道的罪行。

四五月间，洛阳、怀州（今河南沁阳）、泽州等军事重镇尙归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晋高祖天福十二年。

辽国所控制。契丹昭义节度使耿崇美屯兵泽州，准备进攻潞州。可是，自辽太宗撤离汴州后，汴州西北面的局势急剧变化。后晋宁国都虞候武行德发起兵乱，占据怀州；农民军张遇等一度攻入洛阳。河东刘知远见有机可乘，于二月称帝太原（史称后汉），并自太原出兵南下，辽国泽州刺史翟令奇投降，契丹戍守怀州将领崔廷勋等弃城渡河北走，辽国西京留守刘晞自洛阳逃到汴州。辽国宣武军节度使萧翰朝不保夕，急忙迎接早已闲居洛阳的后唐明宗王淑妃及其子许王李从益到汴州，以李从益为帝，自己却逃之夭夭。契丹在黄河以南的军队已撤离北走。

辽太宗撤退北归途中，四月二十一日病死于栾城。辽国统治集团内部随即发生内讧。赵延寿自称受辽太宗遗诏，权知南朝军国事，抢先进入恒州。辽太宗从子永康王兀欲也相继进入恒州。五月一日，兀欲设计活捉赵延寿，几天后在恒州自称辽国皇帝。但是，辽太宗儿子尚在契丹境内，述律太后也没有立兀欲为帝的命令，兀欲自立为帝，内心不安，经与契丹诸酋长密谋后，以麻答为中京留守，高奉明为安国节度使，将后晋文武官员、士卒留在恒州，自己带领宫女、宦官、教坊人自恒州北上。

六月，辽国彰德节度使高唐英投降后汉，刘知远以后晋都将王继弘为彰德留后。洺州薛怀让也杀死麻答使者，降于后汉。麻答相继失去相、洺二州后，更怀疑恒州城内的汉族士兵，强迫他们离开兵营，并克扣食粮，激起兵士们无比愤怒。后晋军将何福进、李荣、白再荣在恒州城内发起兵变，麻答大惊，携带家属、宝货狼狈逃走。辽国天雄节度使杜重威、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安国节度副使刘铎也先后投降后汉。到此为止，经过大河南北各地军民的广泛斗争，曾经猖狂一时的契丹统治集团及其军队，除继续占领幽、瀛、莫等州外，已全部从河南、河北各地撤走。

第六章 后汉的建立及其平叛战争

第一节 刘知远晋阳称帝

一、刘知远的崛起

刘知远，沙陀族人，世居太原（今山西太原南）。他先与石敬瑭一起在后唐任职，曾在德胜之战保护过石敬瑭。石敬瑭当河东节度使，以刘知远为都押牙，视为心腹。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与刘知远、桑维翰密谋推翻后唐，刘知远提出向契丹称臣，厚贿金帛，请求出兵，这与石敬瑭、桑维翰的意见完全一致；但刘知远不赞成割让土地，并预见到契丹扩张领土之后，必“大为中国之患”^①，颇有政治见识。

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唐，刘知远领河东军坚守城内，不断挫败后唐军队的进攻。后随晋高祖进兵洛阳（今属河南），对后晋建国有佐命之功。契丹主耶律德光对石敬瑭说，刘知远非常能干，切不可无故抛弃^②。晋高祖先后授刘知远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邺都留守，掌管禁军，坐居重镇，权势显赫。但是，晋高祖讨伐叛将范延光、杨光远、安重荣、安从进等人，朝廷禁军多次出征，始终没有派遣禁军统帅刘知远领兵征战，这似乎暗示着刘知远与晋高祖在晋初已开始产生裂痕。天福四年（939年）三月，晋朝廷诏归德节度使刘知远与忠武节度使杜重威并加同平章事，刘知远自以为有佐命之功，而杜重威出身外戚，毫无大功，岂能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晋高祖天福元年。

② 《旧五代史》卷九九，《汉高祖纪》。

同时受命，拒不接受诏书。晋高祖大怒，准备免除刘知远的统兵权。经大臣赵莹、和凝调解，刘知远才勉强受命。双方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和表面化了。

天福六年（941年）七月，后晋朝廷以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又命杜重威接替刘知远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次年晋高祖病危，遗旨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朝辅政，齐王石重贵不肯听命，再次引起刘知远的怨恨，开始萌发灭晋称帝的打算。

刘知远利用河东地区山川险固、战马较多的有利条件，在境内大肆扩充兵马，借口防御契丹而增建兴捷、武节等十余军。刘知远派遣军将郭威招纳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奏请白承福为大同节度使，但不久又将白及其部族四百余人全部诛杀，没收资产巨万，良马数千。晋出帝与契丹频繁交战，刘知远坐山观虎斗，不断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开运元年（944年）正月，晋出帝先以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刘知远不予理睬。晋出帝再命刘知远领兵自土门（即井陉关，今河北井陉东北）进攻恒州（今河北正定），河东军到达乐平（今山西晋阳）就逗留不进。接着又授他北面行营都统，进军河北，刘知远拒不出兵。晋出帝识破了刘知远的面目，特别告诫自己亲信：太原不肯帮助我，必有异图^①。自此以后，刘知远虽为行营都统，但晋朝军事进讨的密谋大计，刘知远已不得参与。刘知远表面上不在意，仍拼命扩充军备，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有步骑5万人，为称帝中原准备了重要的军事力量。

二、刘知远在晋阳称帝

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汴州后，刘知远立即分兵扼守河东四境，防止契丹军入犯。但他又故意与契丹统治者应付周旋，特派牙将王峻送上三份奏表。1、庆贺契丹入汴；2、说明太原系各族聚居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四，晋齐王开运元年。

之地，要有重兵戍守，不能轻易离镇外出；3、请求辽太宗召还进入太原城内的契丹军队，俟道路畅通后再送上贡物。辽太宗信以为真，特赐诏书表扬，亲自在刘知远姓名前加上“儿”字，并赐以木拐。王峻持木拐迅速返回太原，契丹军见之回避，沿途畅通无阻。刘知远又派北都副留守白文珂向契丹贡献奇缯、名马。当时，全国各藩镇节度使接到辽太宗的诏书，都争先恐后上表称臣，或亲自来到汴州（今河南开封）请求朝见。刘知远心有另谋，一再拖延观望，辽太宗深为不满，斥责刘知远既不事后晋，又不奉契丹，居心何在？

刘知远通过两次派使者进入汴州，对契丹情况比较了解。王峻认为，契丹贪图财货，残暴无道，失掉人心，不可能长期占领中原。有人劝刘知远立即举兵南向，赶走契丹军队。刘知远主张用兵要见机行事，契丹占领汴州，得晋兵10万，兵锋强盛，不可轻动。待契丹被迫撤离中原时，再出兵汴州才是“万全”之计^①。

辽太宗在中原军民反抗浪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正准备逃离汴州，河东军将纷纷劝刘知远称帝。刘知远佯作姿态，声言出兵井陉（今河北井陉东北），迎接被契丹押走的晋出帝、李太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故意表示自己对晋朝廷的忠诚，争取晋朝旧臣的支持。与此同时，又和心腹臣僚杨邠、郭威密谋建国登基的准备。开运四年（947年）二月十五日，刘知远迫不及待地在晋阳称帝，为了表示不忍心改掉后晋年号，仍称为天福十二年。

第二节 刘知远南下入汴作战

一、刘知远南下的战略步骤

自耶律德光进入汴州后，刘知远在太原密切注视着契丹在中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晋高祖天福十二年。

原各地的动静。他在太原称帝的第二天，就公开打出对抗契丹的旗号，指示各道停止为契丹征括钱帛，对晋朝降臣担任辽国各道节度使，概不追究，号召他们尽快到刘知远所在地集中；各道要诛杀在本道境内的所有契丹官将。同时，刘知远积极准备南下，统一中原。其具体战略步骤是先部署兵力在河东北部防御契丹，扩大和巩固河东基地，然后南下洛、汴以定中原。

天福十二年（契丹大同元年，947年）二月辽国建立后，在中京（即恒州，今河北正定）、邢州（今河北邢台）一带驻有重兵，用来保护辽国自汴州通往契丹境内的通道，并防御河东刘知远的军事进攻。河东节度使所属承天军（今山西阳泉东北）是守卫自井陉通往恒州的重要关塞。刘知远打着迎接晋出帝的旗号，亲自带兵到达寿阳（今属山西），特留下部分军队戍守承天军，防止契丹入犯。同年四月，契丹军队自河南北撤，一度攻占承天军。刘知远旋即派亲将叶仁鲁将步骑3000人赴援，再次占领了承天军。

在此前后，刘知远还派军将史弘肇攻克代州（今山西代县），以郑谦为忻州刺史兼忻、代二州义军都部署，在太原以北建立起防御契丹的防线。

太原以南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潞州（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历来是自太原南下河南的战略要地。当辽太宗得知刘知远称帝，急忙调兵遣将，以耿崇美为昭义节度使，高唐英为彰德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节度使，分别占领潞州、相州（今河南安阳）、孟州（今河南孟县）等地，企图包围河东地区。二月，后晋建雄留后（治晋州）刘在明归附契丹，赴大梁朝见，刘知远遣使者张晏洪来到晋州，联络当地军将发起兵变，杀死契丹使者和节度副使，由张晏洪任建雄军留后。后晋潞州军将王守恩杀死契丹使者，被刘知远授为昭义节度使。河东大将史弘肇又领大军前往声援，打退了契丹军队的进犯。

从天福十二年正月到四月，河东诸州府除泽州外，已全部归刘知远控制。他有了比较巩固的河东基地，又适逢辽太宗在当年三月从汴州逃走，南下中原的条件已经成熟，就着手策划具体的

军事行动。

二、南下洛、汴以定中原

五月，刘知远召集诸将领商议进入中原的作战方案。很多将领建议先进军井陉，攻取恒、魏（今河北大名北），收复河北，则河南拱手归降。刘知远提出从石会关（今山西沁县西北）南下，由潞州、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进入河南。郭威认为若先出兵河北，兵少路远，倘遭到契丹围击，进退两难，粮饷断绝，非常危险。如途经泽、潞州一带，当地山路险狭，大军经过，粮食供应困难。“近者陕、晋二镇，相继款附，引兵从之，万无一失，不出两旬，洛、汴定矣。”^① 刘知远采纳了郭威沿晋、绛南下河南的作战方案。五月十二日，刘知远通告诸道，自太原出兵，沿阴地关（今山西霍县西北）出晋、绛南下。次日，契丹泽州刺史翟令奇见大势已去，被迫归降。契丹宣武节度使萧翰慌忙从汴州逃走。二十日，刘知远抵晋州。途经绛州时，刘知远命诸军四面包围，暂不进攻，谕以利害，劝诱投降。二十四日，契丹绛州刺史李从朗举城投降。二十七日，刘知远进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六月三日，刘知远入洛阳。十一日，进入大梁。十五日，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称刘知远为后汉高祖。后汉朝廷下诏书大赦，命令后晋王朝的全部官员，包括那些投降契丹的文武将吏，一律全部录用，或就任原职，或加官晋爵。后晋官员们纷纷相继来降。但某些藩镇窥测到刘知远军力有限，加紧暗中活动，准备挑起新的动乱。

五代时期，出身于沙陀族的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以河东太原为基地，进军中原，先后建立起后晋、后唐、后汉三个王朝。比较起来，刘知远南下入汴作战，完全是一次兵不血刃的和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晋高祖天福十二年。

平进军，比起梁、唐双方长期血战大河南北，或石敬瑭依靠契丹才夺取天下，都有明显的区别。这是因为，契丹军队入犯汴州，灭亡后晋，契丹统治集团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相当激烈。正在大河南北与契丹军浴血奋战的汉族军民，都迫切需要在中原地区建立一个新朝廷与契丹势力相抗衡。早已在河东积蓄实力、又善于举起反抗契丹旗号而收揽人心的刘知远，适应了全国形势的需要，所以从太原南下后，得到各地军民的拥护。《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评论说：“汉高祖肇起并（今山西太原南）、汾（今山西汾阳），遄临汴、洛，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①，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

第三节 讨平杜重威与收降赵匡赞

一、汉军讨平杜重威

后汉高祖进入汴州后，早已投降契丹的后晋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治魏州）杜重威奉表归命，还请求调往他镇。天福十二年（947年）七月十三日，后汉高祖调杜重威为归德节度使（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杜重威拒不接受，暗中指使儿子杜弘璲向契丹求援。契丹中京留守麻答派指挥使张琏带领幽州（今北京市西南）2000亲兵进入魏州城内，与杜重威一起抗击后汉。闰七月十八日，后汉高祖派高行周为招讨使、慕容彦超为招讨副使，领兵讨伐杜重威。

八月，高行周、慕容彦超兵临魏州城下。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魏州长期是河朔叛镇魏博节度使的治所，唐朝多次兴兵征讨都无法取胜。魏州南临大河，交通便利，经济富庶，重兵屯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高行周主张用兵长期围困，俟城内粮尽兵疲，

^① 《旧五代史》卷一百，《汉高祖纪》。

再一举歼灭；慕容彦超要求急攻，早日结束战斗。后汉高祖担心前线将领不和，容易引起动乱，决定亲自出征。十月十七日，后汉高祖来到魏州城外，高行周汇报说：魏州“城中食未尽，急攻，徒杀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缓之，彼食尽自溃”^①。不少将领也赞成高行周的意见。可是，后汉高祖急于求成，赞同慕容彦超主张急攻的作战方案。二十五日，后汉高祖亲自督促诸将领攻城，兵士伤亡万余人，未能取胜，被迫停止进攻。慕容彦超再不敢重弹急攻魏州的老调。其后，魏州经汉军长期围困，城内粮食耗尽，饿死者达十之七八，不少人翻城出逃。十一月二十七日，杜重威开城门归降，后汉高祖指示诛杀魏州牙将百余人，没收杜重威全部家财以赏赐将士。次年正月，后汉高祖病危时，命将杜重威及其三个儿子杀死。一个长期以来祸国殃民的地方军阀被处决，受到汴州百姓的普遍拥护，大快人心。

二、汉廷收降赵匡赞

辽太宗进入汴州不久，授降将赵延寿之子赵匡赞为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天福十二年（947年）五月，后汉高祖从太原南下途经霍邑（今山西霍县）时，特派使者告知赵匡赞，其父赵延寿被契丹永康王兀欲囚禁，以争取赵匡赞断绝与契丹的交往，早日归附后汉。

后汉高祖入汴州，宣布契丹所授节度使继续留用，赵匡赞又成为后汉河中节度使。但后汉朝廷对赵匡赞很不放心。后汉高祖接受枢密副使郭威将赵匡赞从河中调往它处的建议，命赵匡赞为晋昌节度使（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赵奉命移镇长安。

十月，后汉高祖亲征杜重威，又引起赵匡赞对后汉的疑惧之心，他担心终久不为后汉朝廷所容纳，会落得与杜重威的同样下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天福十二年。

场。于是，赵匡赞与凤翔节度使侯益一起密谋投降后蜀，要求后蜀出兵占领关中。后蜀帝孟昶抓紧战机，立即出兵，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为北面行营招讨安抚使，领兵5万人进军凤翔（今属陕西）^①，奉銮肃卫都虞候李廷珪将兵2万人声援长安，与赵匡赞相互接应。乾祐元年（948年）正月，后汉高祖命左卫大将军王景崇率禁兵数千人经略关中。临行前，后汉高祖告诉王景崇：赵匡赞、侯益的具体行动暂时还不大清楚。你到关中后，倘他们已经入朝，就不必追究；如故意拖延观望，允许你见机行事^②。这时，晋昌节度判官李恕劝告赵匡赞说：“今汉家新得天下，方务招怀，若谢罪归朝，必保富贵，入蜀非全计也”^③。赵匡赞既害怕后汉军威，归附后蜀又遭到部下的反对，终于离开长安，赴汴州朝见。后汉朝廷收降赵匡赞，没有大动干戈，轻易取得河中、长安两镇。但接替赵匡赞的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和永兴节度使牙将赵思绾又互相勾结，抗拒朝廷，不久便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第四节 平定关西三叛之战 (参见附图5)

一、关西三叛的爆发与汉军进讨部署

乾祐元年（948年）正月，后汉左卫大将军王景崇领禁兵数千人来到长安，立即征调长安军校赵思绾与关中诸藩镇兵一起抗击后蜀军队，追至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二月，后汉朝廷命王景崇兼凤翔巡检使，王景崇引兵抵凤翔，节度使侯益已不辞而别。侯益来到汴州，控诉王景崇专横霸道，并重贿杨邠、史弘肇等后汉大臣，侯升为开封尹。王景崇对此十分不满。

三月，后汉朝廷害怕赵思绾骄暴难制，命赵思绾领牙兵开赴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八七，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乾祐元年。

汴州。赵不服，告诉同党常彦卿说：小太尉（指赵匡赞）已落入后汉朝廷手中，我们再去汴州，必将一起被杀。常彦卿嘱咐赵思绾要机密行事，临机应变，防止过早暴露。王景崇从旁怂恿赵思绾作乱。

三月二十四日，后汉供奉官王益抵长安，永兴节度副使安友规出城东迎接。赵思绾报告说，他所领兵士今晚留宿城东，但他们家属多在城内，请允许这些兵士入城接家属前来。王益、安友规同意后，赵思绾即带领士兵入城。他们刚进入城内，就杀死把守城门的兵卒，打开府库，抢走铠仗，召集城中丁壮四千余人，据长安城公开反叛。二十五日，后汉朝廷调王守恩为永兴节度使，赵晖为凤翔节度使，同时命王景崇为邠州留后，以便控制长安、凤翔。但王景崇拒不听命，继续在凤翔召集丁壮，加紧准备反叛。

这时，河中节度使李守贞也蠢蠢欲动。李守贞原先是后晋的宿将，长期统领禁兵，在抵抗契丹的马家口与阳城之战和讨伐青州杨光远，都立有战功，后来与杜重威一起投降契丹，继续担任天平节度使。后汉高祖入汴，调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后汉隐帝自乾祐元年（948年）正月袭位，大臣杨邠、苏逢吉、史弘肇等把持朝中大权，李守贞既恐惧不安，又藐视他们缺乏治国治军的能力，因而在河中修城郭，缮甲兵，昼夜不息，派使者赴南唐、后蜀、辽诸国，请求声援。长安赵思绾向李守贞送上皇帝御衣，凤翔王景崇推李守贞为主。李守贞自称秦王，设丞相、枢密使、国师等官职，派王继勋占领潼关（今陕西潼关县东北），授赵思绾为晋昌节度使，俨然以新王朝自居。

三月二十八日，静难（治邠州，今陕西彬县）、彰义（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匡国（治同州，今陕西大荔）、镇国（治华州，今陕西华县）四节度使同时奏报河中节度使李守贞与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相互勾结，兴兵作乱。四月三日，后汉朝以镇宁节度使郭从义为永兴行营都部署，将禁兵讨伐长安赵思绾。九日，以保义节度使白文珂为河中行营都部署，内客省使王峻为都监、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为西面行营都虞候，会诸道兵出征河中李守

贞。在此之前，汉朝廷调保义节度使赵晖为凤翔节度使，专门对付占据凤翔的王景崇。后汉讨伐关西三镇，不设军事统帅，各自为政，互不统一。自四月到七月，除陕州都监王玉一度收复潼关外，其他将领怯懦畏敌，相互观望，昭义节度使常思屯潼关、白文珂戍同州、赵晖驻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都不敢进攻河中、凤翔。郭从义、王峻虽兵临长安附近，但二人严重不和，自春至秋，不肯攻战。西面行营都虞候尚洪迁孤军作战，在长安战斗中不幸身亡。后汉进讨的军队长期分兵屯驻，师老无功，非常被动。

汉隐帝鉴于后汉进讨军不设主帅、指挥不一、征讨不力的状况，八月五日，特命枢密使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统一指挥河中、长安、凤翔行营的军队。郭威路过河阳（今河南孟县）问策于元老大臣冯道。冯道提出“合诸将之兵以攻一城”^①，即集中优势兵力专攻河中，被郭威所采纳。

八月二十日，郭威领大军抵河中前线。他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关西三叛的作战部署，很多人提出先进攻长安、凤翔，然后攻打河中。镇国节度使扈从珂却独持异议，主张擒贼先擒王。他说：“今三叛连衡，推守贞为主，守贞亡，则两镇自破矣。若舍近而攻远，万一王、赵拒吾前，守贞掎吾后，此危道也。”^②郭威充分肯定扈从珂的作战主张，于是确定他本人自陕州、白文珂与刘词自同州、常思自潼关，从三条路线同时向河中进发。郭威“抚养士卒，与同苦乐”，使“将卒咸归心于威”^③，大大鼓舞了士气。

比较起来，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作战经验不足，军事力量薄弱，都远远不如李守贞。这无疑是诸将要求先攻讨长安、凤翔的主要原因。然后后汉军队进入关中作战，必须通过与河中邻近的潼关天险，一旦潼关失守，导致“王、赵拒吾前，守贞掎吾后”，则后汉军队在关中遭到前后夹击，粮食又供应不上，后果异常严重。郭威先集中主要力量分三路围打河中，同时抽调部队牵

① 此据《新五代史》卷五二，《李守贞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汉高祖乾祐元年。

制长安、凤翔之敌，待歼灭李守贞后，则赵思绾、王景崇易于击破。由于后汉军事统帅专一，战略部署正确，平定关西三叛之战很快出现了重大转折。

二、攻克河中

八月，当郭威主攻河中强敌的战略部署确定后，后汉军分三路同时向河中进发。保义节度使白文珂很快自同州攻占河中西关城（今山西永济县黄河西岸）。昭义节度使常思与郭威分别自潼关、陕州逼近河中城，在城南、城西建立围栅。由于后汉军事形势渐趋好转，不少将领对河中作战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求成，要求迅速攻城。郭威详细分析了河中作战敌我双方的特点和战争态势，明确指出李守贞是富有作战经验的前朝老将，而且河中“城临大河，楼堞完固”，易守难攻，绝对不可轻视。汉军只有“设长围而守之”^①，长期严密围困，俟城中粮食耗尽，人心离散，再用兵力强攻，或设法招降，才能取胜。

郭威征发诸州民夫二万余人，挖长壕，筑连城，派遣军队包围河中城。沿黄河岸设置火铺，连延数十里，以步兵轮番守卫。又派水军停船于黄河岸边，河中、长安叛军偷渡黄河暗中来往，无不擒之。郭威既严密围困河中，又完全切断李守贞与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的联系，很快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李守贞在后汉军队开始围攻时，毫不介意，自以为曾担任后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后汉禁军原先都是他的部属，多次接受他的赏赐，到河中后自然会主动归附。可是，郭威治军有素，赏罚分明，深受广大士兵的拥护。大军抵达河中城下，扬旗擂鼓，气势高昂。李守贞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采用了争取外援和突围逃命的两条措施。李守贞多次组织军队突围，都被后汉军击退。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汉高祖乾祐元年。

李守贞派使者求救于南唐、后蜀、契丹，途中多为后汉军所俘。

十一月，河中军将朱元、李平到达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政府以润州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清淮节度使刘彦贞任招讨副使，出军救援河中。但南唐军队缺乏斗志，不愿远征，行至沂州（今山东临沂）境内，收兵后退。南唐帝李璟请求后汉赦免李守贞，遭到后汉朝廷的拒绝。

后蜀国应凤翔王景崇的请求，在乾祐元年九十月出兵凤翔，均被后汉军击退。十二月，后蜀军队再次向凤翔进发，后汉军将赵晖向郭威告急。倘后蜀军队一旦与王景崇叛军会合，将对长安、河中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郭威亲自领兵救援，临行前特别告诫部将白文珂、刘词说：河中军倘不能突围逃走，必将彻底失败。他们骁锐之师“尽在城西，我去必来突围”^①，必须加强戒备。当郭威行至华州，得知后蜀军已经败退，即刻兼程返回。乾祐二年（949年）正月四日夜^②，李守贞侦知郭威已经西行^③，命骁将王继勋（又称王三铁）领精兵千余人沿黄河南下，在黄河西面登岸，分三路攻打后汉军河西寨，一度进入寨内。后汉军将刘词奋力抵抗，杀河中军士七百余人。正月五日，郭威回到河中，立即对刘词坚守河西寨并打退河中军的反扑，深表赞扬，给予厚赏。四月三十日，李守贞再次垂死挣扎，出军5000人分5路自蒲州西北突围，郭威派都监吴虔裕引兵邀击，杀伤大半。五月三日，李守贞最后一次突围失利，其将魏延朗、郑宾被俘。河中城经历后汉军长期包围，与外界完全隔绝，城内老百姓饿死十之五六，兵士伤亡惨重，士气低落。五月九日，河中节度副使周光逊、裨将王继勋、聂知遇领兵1130人来降，随后前来投降的兵士不绝于途。

五月十七日，郭威见河中李守贞的队伍已基本瓦解，命禁军、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汉隐帝乾祐二年。

② 此日期从《资治通鉴》卷二八八记载，《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纪》称正月五日夜，与《资治通鉴》记载相差一天。

③ 《旧五代史》卷一〇二，《汉隐帝纪》称“贼城内侦知郭威西行”。

各藩镇兵进攻河中城。自此以后，汉军进攻昼夜不停。七月十三日，郭威领三寨将士一举占领河中外城，李守贞退保内城。郭威为减少部队伤亡，又命令汉军暂时缓攻，用重兵围困河中内城。李守贞最后走投无路，与妻、子自焚身亡。郭威领后汉军进入内城，俘其宰相靖峰、孙愿及枢密使刘芮、国师总伦等，取得攻克河中的彻底胜利。

三、夺取长安

乾祐元年（948年）四月，永兴行营都部署郭从义领禁兵攻打长安，汉军伤亡很多，作战失利。郭从义乃改变作战部署，设长堑围困长安城。七月，后汉朝廷以郭从义为永兴节度使兼行营都部署，但郭从义与监军王峻两人严重不和，进攻长安毫无进展。八月，汉隐帝命河中、永兴、凤翔诸军统一由郭威指挥。赵思绾据守长安城内，河中李守贞、凤翔王景崇自顾不暇，无力支援。赵思绾派儿子赵怀义见后蜀帝孟昶，请求支援，后蜀军队进入宝鸡（今属陕西），被汉军击退。从乾祐元年四月至次年六月，长安城长期受围，城内严重缺粮，赵思绾派人活捉妇女小孩，充作军食。设宴犒军，杀妇女小孩甚多。长安城内十余万民众或饿死，或被杀，最后只剩下万余人。赵思绾日暮途穷，走投无路，郭从义乘机加紧招降。乾祐二年（949年）五月，赵思绾为求自全之计，向闲居长安的左骁卫上将军李肃请教，李肃与判官程让能告诉赵思绾：“公比于国无嫌，但惧死而为此尔！今国家用兵三方，劳敝不已，诚能翻然效顺，率先自归，以功补过，庶几有生；若坐守穷城，待死而已。”^① 赵思绾遂派牙将刘成赴汴州乞降，后汉朝廷授赵思绾为华州节度留后，永兴城内都指挥使常彦卿为虢州刺史，命他们随即离开长安，便道赴任。但赵思绾贼心不死，敛财受贿，三

^① 《新五代史》卷五三，《赵思绾传》。

改行期，不肯离开长安，准备率同党 500 人逃亡后蜀。郭从义奏请郭威同意后，七月十一日领汉军攻入城内，杀赵思绾及其同党 300 人，夺取长安。

四、占领凤翔

凤翔节度使治所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后蜀在开运三年（946 年）占领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成州（今甘肃西和县西北）、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后，几乎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凤翔。王景崇反于凤翔，主要依靠后蜀的援助，同时又臣服于河中李守贞并请求支援。乾祐元年（948 年）三月，汉隐帝以赵晖为凤翔节度使，王景崇不肯调离，不久请降于后蜀。八月，后蜀改凤翔为岐阳军，以王景崇为岐阳节度使、同平章事。赵晖出讨凤翔，军队不足万人，一部分兵临岐州城下，一部分在宝鸡依山列栅，防御后蜀军队的进犯。这比起长安之战与河中之战，作战任务更为艰巨。

九月，后蜀为支援凤翔王景崇，出兵大散关（又称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赵晖派都监李彦从迎击，蜀军退走。十月，王景崇军出岐州城西门突围，被汉军击溃，退守城内。汉军几次挑战，王景崇闭城拒守，不敢出战。后汉兵士伪装后蜀军队，从长安南面南山而下，大声喧叫蜀军已到。王景崇信以为真，遣兵士数千人出城迎接，遭到早已埋伏的汉军突然袭击，伤亡殆尽，此后再不敢派兵士出城。这时，后蜀分兵两路，由雄武节度使韩保贞出兵汧阳（今陕西千阳县西北），从凤翔西北面牵制后汉军队；同时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安思谦领兵再次出大散关，向凤翔南面的宝鸡进发。双方在宝鸡一带展开激战，后蜀军队一度占领宝鸡，并进屯宝鸡县的渭水一带，再前进 90 里，就可以到达凤翔与王景崇军队会合。后汉凤翔节度使赵晖急调军队 5000 人收复宝鸡。安思谦不敢再战，借口粮少敌强，十月二十日退屯凤州，不久又撤军到兴元（今陕西汉中）。十二月，后蜀朝廷不断收到王景崇告急奏表，

再派安思谦出兵相救。八日，安思谦率军队自兴元抵达凤州，请求先运粮 40 万石。后蜀帝孟昶洞察出安思谦逗留不进的意图，仅运出数万石粮食。十四日，安思谦进屯散关，先后在箭筈安都寨（今陕西凤翔西）、玉女潭（今陕西凤翔西南）取得胜利，汉军退屯宝鸡。雄武节度使韩保贞也出兵新关（今陕西陇县西）。安思谦终因军粮缺乏，乾祐二年（949 年）正月回师凤州，上表谢罪。韩保贞也退保弓川寨。后汉凤翔节度使赵晖在兵力分散、军队人数比后蜀少的不利情况下，接连三次打退后蜀军队的进攻，迫使王景崇孤立无援，困守岐州城内，坐以待毙。有人劝王景崇说：现在河中李守贞、长安赵思绾已经失败，蜀军支援也不可靠，不如早日投降后汉。几天后，王景崇与其将公孙辇、张思练商定，由公孙辇、张思练二人火烧城东门诈降，阻止后汉军队攻入凤翔城内，他自己领牙兵出凤翔城北门突然袭击后汉军队，妄图垂死挣扎。十二月二十四日天未亮时，凤翔军将公孙辇、张思练按照王景崇的部署火烧城东门诈降，而凤翔节度使府院同时起火，王景崇自杀。公孙辇等人被迫向赵晖投降。后汉军进入岐州城内。

河中、长安、凤翔三镇叛乱，从乾祐元年四月到次年十二月全部结束，历时一年九个月。这是短命的后汉王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五代时期一次影响颇大的藩镇动乱。它的特点是一主（河中李守贞）二从（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紧密勾结，又有后蜀军队的大力支援，而且地域相连或距离很近，占有非常有利的地理条件。后汉朝廷开始对这次作战的特点及其艰巨性认识不足，因而从乾祐元年四月至七月的第一阶段作战，缺乏统一指挥，将领们不团结，没有确定首攻战略目标，不敢主动进攻，作战消极被动，毫无战绩。乾祐元年八月郭威出任平定叛乱的军事统帅后，形势突变，最后获得全面胜利，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分割包围，主攻强敌。郭威到达河中后，既不平分兵力，也未先攻打长安或凤翔军事力量薄弱之敌，而是集中主要力量，进击主要敌人。他亲自指挥军队主力攻打强敌河中李守贞，并对河中、长安、凤翔三城实施分割包围，坚决切断敌人之间的联

系。俟敌人军需供应严重缺乏以及队伍内部不稳之际，郭威抓紧战机，以军事进攻为主，辅以引诱劝降，分别歼灭敌人，占领河中、长安、凤翔三城，大获全胜。

第二，坚决打退外来之敌。河中、长安、凤翔三处叛敌被围之后，为摆脱困境，积极争取外援，派使者求援于契丹、南唐、后蜀各国。南唐曾出兵沂州，后蜀三次出兵，甚至越过宝鸡，但每次都遭到后汉军队的顽强阻击，郭威也一度自河中来关中指挥打援。三处叛敌始终得不到外来的有力援助，各自孤军作战，最后败亡。

第三，军需物资供应充足。在后汉平定关西三叛期间，契丹军队刚从中原地区撤退，辽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已无力大举南犯。后汉朝还及时平息了魏博杜重威的动乱，消除了国内的重大隐患。由于国内形势比较稳定，后汉朝廷能及时将大批禁军、藩镇兵，以及军需器仗、衣粮源源运到河中、关中前线，“使兵食不乏”^①，有力地支援了郭威平定关西三叛的战争。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汉隐帝乾祐二年。

第七章 南方诸国的军事斗争

第一节 南方诸国的基本国策

朱全忠开平元年（907年）建立梁国前后，南方相继出现吴（后为南唐取代）、吴越、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前蜀灭亡，孟知祥又建立后蜀）诸国。这些国家是在唐朝末年南方藩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或称王，或称帝，疆域大小不一，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有所不同，然而都是割据一方的独立的封建政权。在诸国林立而且斗争相当激烈的情况下，各国统治者把制定推行一系列重要政策，维护封建统治，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一、大力发展生产

唐朝后期，南方战争减少，社会相对安定，江淮八道曾经是供应李唐王朝物资财货的重要基地。但在黄巢大起义失败后，南方军阀势力有所发展，局部地区的破坏也相当严重。淮南道经过高骈、毕师铎、孙儒、杨行密之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曾经长期是国内外贸易繁华都市的扬州（今属江苏），房屋焚毁殆尽，民户大量逃亡。淮南节度使所属八州荒凉残破，周围数百里人烟断绝。唐末靠近长江北岸的大都市江陵（荆南节度使治所，今属湖北）只剩下17户居民，已沦为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后梁贞明五年（919年），吴与吴越战于常州（今属江苏），吴国大臣徐温亲自督战，取得大胜，众将领要求乘胜追击，一举灭亡吴越。徐温回答说：天下动乱很久，“民困已甚”，我们应当戢兵罢战，“使两

地之民各安其业”^①。这就是南方诸国统治者推行大力发展生产政策的根本原因。不然，南方各国如继续长期干戈相见，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必然会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抗，给各国统治者带来很多麻烦，甚至出现覆舟亡国的危险。

南方各国开国者杨行密、李昇、钱鏗、王审知、马殷、高季兴、王建等人出身于贫穷的社会下层，比较了解广大群众的疾苦。他们即位后，大力推行发展生产的政策措施，主要有调整土地占有关系，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让广大农民得到或租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减轻租税，招抚流亡人户；发展水利事业，修建陂塘，增加灌溉面积；主要发展粮食作物的生产，同时也促进桑、茶、麻各项作物产量的增加。因此，五代时期南方诸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同光三年（925年）前蜀灭亡时，仓储存有铠仗、钱粮、金银、缯锦以千万计。后晋天福八年（南唐昇元七年，943年），南唐帝李昇病卒时，德昌宫储兵器、钱帛700万。吴越国仓储堆积有足够10年支用的军粮。农业生产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南方各国如此巨额物质财富的积累，无疑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江淮以南广大地区在五代时期愈益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所在。

二、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

南方诸国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又谋求与邻国和睦相处，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

（一）**奉事中原朝廷，牵制邻国。**南方楚、吴越、南汉、闽、荆南诸国面对中原王朝强大军事力量的压力，又处在周围邻国的包围之中，占领地盘不大，实力有限，一般都臣奉于中原王朝，以便牵制邻国。楚王马殷与吴国杨行密、荆南高季兴、南汉刘䶮等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〇，梁均王贞明五年。

为敌，恐惧不安。其谋士高郁献策说：“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誑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力而有待尔。”^① 马殷采纳了高郁的建议，不断派使臣向梁太祖、梁末帝、唐庄宗、唐明宗朝觐，进贡各种金银器物，接受后梁、后唐赐官封爵，采用梁、唐两朝的纪元年号。楚国还在京师洛阳或汴州设置进奏务，作为藩属的办事机构。由于楚国对外打着“尊王”旗号，对内努力发展生产，所以在南北各国相互对立的环境中得到稳定的发展。

吴越国占领地域不大，又长期受到吴或南唐的威胁。吴越王钱镠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较早认识到保境安民的重要。唐朝灭亡前夕，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称蜀，淮南杨氏称吴，都劝钱镠称帝自立。钱镠说：“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而又踞我于上耶！”^② 他害怕戴上了皇帝的桂冠，遭到中原朝廷的讨伐，还不如当节度使以保住终身的富贵。所以吴越王钱镠和湖南马殷一样，长期向中原朝廷称臣，先是派遣使者通过江西、湖南、荆南到达洛阳或汴州，当吴国吞并了江西全境后，又绕海道北上，自山东半岛来到河南，表示他对中原朝廷的无限忠诚，以牵制吴或南唐。吴越王钱镠在长兴三年（932年）病卒时，还谆谆告诫儿子钱元瓘说：“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③ 钱镠子孙们执行这条遗嘱，保持与吴、南唐的睦邻关系，保境安民的政策得以实行，促进了吴越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荆南高季兴仅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姊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之地，地盘很小；但北接中原王朝，又与南方诸国相毗邻，处于南北各政权之间的缓冲地带。荆南不仅臣奉中原王朝，还先后向吴、南唐、楚、南汉、后蜀、闽国称臣，希望得到他们的保护或赐予，以求维持本国的生存。

（二）卑辞厚礼，应付周旋。吴与南唐是南方诸国中疆域最大、

① 《新五代史》卷六六，《马殷传》。

② 《吴越备史》卷一，《武肃王》，钱塘丁氏嘉惠堂版（下同）。

③ 《吴越备史》卷二，《文穆王》。

经济最富庶的国家。后梁建国，淮南王杨渥（杨行密子）继续采用唐朝天祐年号，以兴复唐朝为名而长期与后梁对抗，但双方未发生大的战争。晋王李存勖灭梁建国，派出使者通报吴、蜀二国。谋臣严可求献策说：“闻唐主始得中原，志气骄满，御下无法，不出数年，将有内变，吾卑辞厚礼，保境安民以待之耳。”^① 吴国随即派司农卿卢蘋向后唐进奉金器200两、银器3000两、罗锦1200匹。然后还多次向唐庄宗、太后进奉金银、锦绢等，庆贺后唐的重大节日。后唐使者出使吴越、闽国，途经吴国境内，吴国政府都热情接待。吴国这样对后唐“卑辞厚礼”，使两国关系比较融洽，达到了保境安民的目的。以后南唐与后晋之间有些不和，但也未发生大的战争。

（三）罢战休兵，睦邻相处。吴、南唐东西两侧是吴越和楚国，双方之间一度很不融洽。朱全忠称帝不久，命吴越王钱镠兼淮南节度使，楚王马殷兼武昌节度使，打算利用吴越、楚国进攻吴国。吴国首先挑起苏州（今属江苏）、湖州（今属浙江）、常州（今属江苏）等战役，企图兼并这些地区，进而灭亡吴越。但到后梁贞明五年（919年）常州战役时，吴国大臣徐温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很难打败吴越，还给广大群众带来巨大的战争灾难。徐温主动送还吴越国俘虏，钱镠也遣使请和。自此以后，吴国停止战争，休养生息，民众安居乐业长达二十余年。

吴、楚两国在五代初期为争夺岳州（今湖南岳阳）也发生过短暂的战争，但此后吴、南唐与楚国保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交往。南方闽、南汉各国之间也很少发生战争。

后唐天成元年（926年），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大练水军，准备进攻楚国。掌书记孙光宪谏阻说：“荆南乱离之后，赖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与楚国交恶，他国乘吾之弊，良可忧也。”^② 这也是劝高季兴保境安民，不要轻易发动对邻国的战争。高季兴当即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唐庄宗同光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唐明宗天成元年。

采纳，停止了进攻楚国的准备活动。

总之，南方各国对外争取与邻国友好相处，对内抚息民众，训练兵马，力图保持国内的长期稳定，维持割据政权的封建统治。这已成为南方诸国的基本国策。但一些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或谋求扩张，也进行过一些战争。后晋天福八年（南唐保大元年，943年），南唐李璟违背徐温、李昪的传统国策，决心出兵灭亡闽国、楚国，结果导致国力衰落，自食恶果。

第二节 吴对吴越的战争

一、吴与吴越的关系

唐朝末年，淮南及两浙一带地方军阀杨行密、钱镠利用唐王朝已名存实亡、群雄并起的混乱时期，分别建立吴、吴越两个政权。吴国辖境包括今安徽淮河以南、湖北武昌以东、江西全境及江苏自连云港至常州一带的广阔地区，有28州，是南方诸国中势力最强大的国家。吴越国占有今浙江境以及江苏苏州以东地区和福州以北地区，仅有13州，势力较小。吴越北面、西面都受到吴国的包围，东面濒临大海，处境十分不利。淮南杨行密及其继承者一度企图灭亡吴越，吞并两浙，先后发生几次战争。

二、苏州之战

开平二年（908年）八月，梁、晋潞州之战已经结束，争夺河北地区的战争尚未打响。吴越王钱镠派使者王景仁到汴州，与后梁密谋攻取淮南。吴国统治者先发制人，派步军都指挥使周本、南面统军使吕师造出讨吴越。九月，吴国军队围攻苏州。苏州是吴越北部的边疆城市，倘一旦失陷，吴国军队挥师南下，将直接危及吴越政治中心杭州（今属浙江）的安全，所以双方争夺苏州之

战相当激烈。

吴越军队一方面在苏州城内固守，一方面主动进攻吴国的常州，迫使吴军回师常州以解除苏州之围。吴越王钱镠派张仁保攻克常州东洲镇（今江苏常州东南），杀死吴军万余人，缴获战船 102 艘。吴国却继续严密包围苏州，另派池州团练使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在鱼荡大败张仁保，收复东洲镇。

开平二年（908 年）十一月，梁太祖为声援吴越，命亳州团练使寇彦卿领兵 2000 人渡淮河南下，攻打寿州霍丘（今属安徽），被当地土豪朱景击败。寇彦卿又进攻庐（今安徽合肥）、寿二州，战斗失利，撤回大梁。

吴国军队长期围攻苏州，运用各种攻城器具轮番进攻，未能收效。开平三年（909 年）四月，他们用木材造成洞屋，内面藏着兵士，外面蒙上牛皮，用来攻打苏州城。吴越军将孙琰用长竿绑上轮子，系好锥刀，揭开洞屋上面的牛皮，杀伤吴国兵士。吴军攻城再次受到挫折。

苏州城内外河流纵横交错，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吴国为断绝苏州城内军队与城外的联系，在各条水道张网系铃，沉入水下。倘有人通过，网触铃响，很快被吴国军队发现。吴越游奕都虞候司马福在水中故意持大竹竿触网，吴军闻铃声举网，司马福潜入水中通过，后进入城内。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潜出城外。吴越国经过司马福沟通苏州城内外的联系，乃采用吴国的“军号，内外夹攻，号令相应”^①，于四月十六日大败吴国军队，俘吴国军将何朗、闾邱直等数千人，缴获器甲二十余万件，战船数百艘。吴国步军都指挥使周本率军逃走。

苏州之战长达 8 个月，是吴国主动挑起的一次攻城战。周本后来谈到这次作战失利原因说：“苏州之役，非彼强我弱也，盖上将权轻，下皆专命故耳”^②，说明吴国兵权分散、指挥不灵，是这

① 《新五代史》卷六七，《钱镠传》。

② 《九国志》卷四，《周本传》，鸿本书局本（下同）。

次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此外，吴国围攻苏州，忽视了围城打援，没有部署军队阻击敌人的援军，也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因素。

三、湖州之战

湖州在苏、杭二州之间，系保卫吴越国统治中心杭州的重要屏障。开平三年（909年）十月，吴越湖州刺史高澧征发百姓当兵，遭到当地百姓的反对，残暴杀死三千余人。高澧害怕吴越王钱镠问罪，举湖州叛附淮南，还怂恿兵士焚烧临平镇（今浙江杭州东北）。吴越王钱镠当即命指挥使钱鏗讨伐湖州。开平四年（910年）二月，高澧急忙向吴国求救，吴常州刺史李简出兵支援，湖州将盛师友、沈行思关闭城门，不让李简入内。高澧大败，领部下5000人逃奔淮南。三月，钱镠巡视湖州，以钱鏗为湖州刺史。钱鏗嗜酒杀人，因害怕钱镠惩罚，乾化元年（911年）十月，杀死都监潘长、推官钟安德，出逃淮南。钱镠又派儿子钱元瓘（又称传瓘）坐镇，此后吴越长期占有湖州。

四、常州之战

苏州、湖州之战，吴国没有捞到什么便宜。两国统治者分别调整了各自的作战部署。吴国主要进攻钱镠故乡衣锦军（今浙江临安）。这里离杭州仅128里，对杭州城威胁更大。吴越却把战争引向对方境内，着重攻击吴国的常州。

乾化三年（913年）三月，吴国行营招讨使李涛领兵2万人出千秋岭（今浙江临安西北），攻打吴越衣锦军。吴越王钱镠分兵二路，一路由钱元瓘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率兵直奔千秋岭，一路由钱元瓘（又称传瓘）充招讨收复都指挥使，率水军攻打吴国常州东洲镇，牵制敌人的兵力。千秋岭道路狭隘，钱元瓘派兵士伐木阻塞吴军后路，然后发起攻击，大败吴军，活捉招讨使李涛等三

千余人^①。两个月以后，吴国宣州副指挥使花虔屯兵广德（今属安徽），企图再犯衣锦军，同样遭到钱元瓘的严厉打击，全军覆没。

吴越接连两次获胜，继续采取主动进攻。乾化三年（913年）九月，钱镠派儿子元瓘、元璫、元瑛三人一起向常州进发，屯军无锡县潘葑（今江苏无锡西北）。吴国大臣徐温统率诸道军队迎击，黑云都将陈祐出吴越军之后，前后夹击，吴越军第一次进攻常州遭到大败。

几年后，梁、晋争霸中原的战争更加激烈，双方都企图利用附属国的军事力量以牵制对方。贞明二年（916年），吴国为配合晋王李存勖作战，一度出军河南，围攻颍州（今安徽阜阳）。贞明四年（918年），晋王李存勖使者，再次催促吴国出兵攻击后梁。贞明五年（919年）三月，梁末帝命钱镠大举征讨淮南。钱镠派节度副大使钱元瓘为诸军都指挥使，领战船500艘自常州东洲镇攻打吴国。吴国派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偏将陈汾拒之。钱元瓘命各战船装上灰、沙。临战前夕，钱元瓘召指挥使张从宝说：“彼若径下，当避其初以诱之，制胜之道也”^②，决定先引诱敌人舰只南下，然后出其不意，重创敌人。四月三日，双方战于狼山（今江苏南通市南）外大江之中。吴国船队高帆巨舰，乘顺风自西北顺流而下，吴越船队有意避开，让其通过，然后尾随跟踪。吴国水军发现目标后，就急忙调回船头，但船身庞大，逆行不便。吴越船队顺风势追赶，向吴国船上扬撒灰、沙，吴国兵士眼睛睁不开；吴越兵士然后再泼上猛火油，烧吴国战船，火随风势，越烧越旺，吴军大败，百胜军使彭彦章兵败自杀，偏将七十余人被俘。

七月，吴越王钱镠再次派钱元瓘领兵3万人攻吴国常州。吴国镇海节度使徐温率诸将迎战。右雄武统军使陈璋领水军经海门（今江苏启东县东北）尾随吴越军后面。七月一日，双方在无锡

① 此处从《资治通鉴》卷二六八所载，但《十国春秋》卷七九，《吴越·文穆王世家》称“获（李）涛及偏将咸知进等八千余人”。

② 《十国春秋》卷七九，《吴越·文穆王世家》，中华书局版（下同）。

(今属江苏)交战。因久旱草枯，吴国兵士乘风纵火，吴越兵乱大败，指挥使何逢、吴建被杀，斩首万级，钱元瓘逃走，陈璋又败吴越军于香湾。吴国大将徐知诰向徐温要求，请率领步卒2000人乘胜袭取苏州。诸将领也认为，吴越作战主要依靠水军，现在大旱，水道干涸，应当抓紧时机，利用我们强大的步骑兵一举灭亡吴越^①。但徐温以休战息兵，恢复生产，使两国百姓各安其业为理由，坚决拒绝。

吴与吴越的战争互有胜负，任何一方都不占绝对优势。吴国虽地广兵强，但有后梁、楚、荆南等国的牵制，不可能集中全力攻击吴越。钱镠统治吴越，军事力量虽不如吴国，但内部比较团结，水军战斗力强，有效地抵抗了吴国的进犯。钱镠、徐温在常州之战后，审时度势，确定双方长期和平相处，并认真地贯彻实行。

第三节 南汉的残暴统治与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南汉的建国及其残暴统治

唐朝末年，广州牙将刘谦任封州刺史。谦卒后，其子刘隐袭父职。刘隐因平息广州动乱有功，升为清海节度使，遂占据岭南。后梁建立，刘隐称臣，被封为南平王，又进封南海王。乾化元年(911年)，刘隐卒，弟刘䶮继任清海节度使。贞明三年(917年)，刘䶮即皇帝位，国号大越，改元为乾亨，建都广州(今属广州)。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在刘隐、刘䶮统治期间，岭南地区存在着不少割据势力，如交州(今越南河内)曲颢、桂州(今广西桂林)刘士政、邕州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〇，梁均王贞明五年。

(今广西南宁)叶广略、容州(今广西容县)庞巨昭分据诸管，攻略岭南东道所属州县。占据虔州(今江西赣州)的卢光稠也染指岭南，进据潮州(今广东潮安)、韶州(今广东韶关)，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刘昌鲁、新州(今广东新兴)刘潜及江东70余寨也不听从刘隐、刘䶮的调动。经过刘隐、刘䶮的征讨，先后削平一些割据者，占有高州、潮州、韶州、容州、邕州，使岭南地区逐步得到统一。

南汉大有十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刘䶮卒，子刘玢称帝，不到两年又被弟刘洪熙杀死。刘洪熙称帝后改名刘晟，“惧众不伏，乃益峻刑法以威众”^①。他用种种借口杀死14个弟弟。南汉“宗室勋旧，诛戮殆尽”^②。

刘䶮、刘晟凶忍残暴，骇人听闻。刘䶮设置有灌鼻、割舌、支解、剗剔、炮炙、烹蒸种种酷刑。他们把毒蛇聚于水中，将罪人投入，称为“水狱”。又将人们烹蒸之后，再在阳光下曝晒，洒上盐水，使受刑者疼痛难忍，最后折磨致死。刘晟置铁床、剗剔等刑，号曰“生地狱”。这些惨无人道的种种酷刑，充斥南汉全国各地。

南汉统治集团不顾广大群众的死活，施行极端残暴的统治，激起岭南人民的强烈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反抗斗争就是循州张遇贤起义。

二、张遇贤农民起义的爆发

南汉大有十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七月，循州博罗县(今属广东)刻杉镇有人自称神仙降世，利用宗教，组织反抗南汉王朝的起义斗争。当时循州有许多支义军，互不统一，博罗县小

① 《新五代史》卷六五，《刘晟传》。

② 《十国春秋》卷五九，《南汉中宗纪》。

吏张遇贤被推为全体义军的领导人。他自称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设置百官。这时我国中原地区和南方有后晋、南唐、吴越、闽、南汉、楚、南平、后蜀八国，所谓“中天八国王”，似乎是要求结束八国的分裂，统一全国，由张遇贤当全国之王。

张遇贤统一农民起义军之后，声威大振，向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发起进攻。南汉帝刘玢派越王刘弘昌为都统、刘弘杲为副都统，一起出兵镇压。起义军与南汉军战于钱帛馆。广大义军自早晨战至中午，将政府军重重包围，万箭齐发，矢下如雨，杀伤大量官军。刘弘杲流血满袖，依靠偏将指挥使陈道庠拼命反扑，才免遭被俘。十月，起义军攻克循州，杀死南汉循州刺史刘传。接着又攻下广东东部潮州、惠州（今属广东）许多州县，沉重地打击了南汉政权。

三、起义军北进与最后失败

南汉应乾元年（后晋天福八年，943年）七月，南汉派遣指挥使万景忻率军进攻循州的起义军，张遇贤作战失利，遂率军退出循州，往北转移。义军翻越大庾岭（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一举攻占南康（今属江西）。南唐百胜节度使贾匡浩在虔州闭城拒守。张遇贤率领起义军严惩贪官污吏，烧毁官府仓库，连克虔州属县，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

在虔州东北雩都县（今江西于都）以西的白云洞，三个洞上下连接，每洞可容纳百余人。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张遇贤在白云洞建造官署营房作为起义军的基地，继续坚持斗争。

南唐保大元年（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南唐帝李璟害怕起义军向境内腹地深入发展，急忙下令镇压。并下诏免除虔州各县租税，以收买人心，企图切断广大群众与义军的联系，迫使义军孤立作战。南唐政府又采用招抚、镇压两种手段，一方面大肆宣扬招降纳叛，号召起义军解甲归降；一方面命令诸军分路进讨，所俘义军全部杀死。十月，南唐朝廷派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通事

舍人边镐统军讨伐。他们到达虔州后，勾结当地文人白昌裕，从起义军驻地后面伐木开道，偷袭白云洞，放火焚烧义军官署营房，大败义军。张遇贤屡战失利，被迫转移。义军叛徒李台将张遇贤、黄伯雄、景全等义军将领缚送南唐军。边镐将他们押送金陵，惨遭杀害。

张遇贤起义历时一年多，转战大庾岭南北，发展到十余万人。这是五代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南汉、南唐统治者沉重的打击。这次起义迅速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具有卓越才能的领导人，张遇贤始终以宗教为号召，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口号，因而很难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并长期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其次，义军主动放弃有群众基础的粤东根据地，转战到人地生疏的虔州地区，遇到挫折后，又不敢广泛流动作战，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去重创敌人，反而固守一处，给敌人提供了围歼的有利时机。

第四节 楚平定溪州与荆南谋求 扩张领土的战争

一、马氏建楚与高氏据守荆南

马殷，字霸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少年当过木工，在唐朝末年入蔡州（今河南汝南）秦宗权军，因骁勇闻名，升为偏将。马殷后来随军渡淮河南下，转战扬州、宣州（今安徽宣城）、洪州（今江西南昌）。乾宁元年（894年），马殷随刘建峰进入湖南，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杀死潭州刺史邓处讷，唐昭宗授刘建峰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

刘建峰被部下杀死后，潭州行军司马张佶等军将推马殷为主。不久，唐朝授马殷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但马殷实际上只能控制潭、邵（今湖南邵阳）二州，周围地区还有不少窃地割据的

地方军阀^①。在湖南地区以外，又遭到荆南、吴、南汉、前蜀的包围。马殷为摆脱窘境，在军事上主要依靠来自河南的旧部同僚，派遣他们四出征战，如内外马步军指挥使许德勋、水军指挥使王环、长直指挥使姚彦章、岭北七州游奕使李琼、秦彦晖；在政治上重用扬州人高郁，署为都统判官，为其出谋划策。马殷按照高郁的主张，先后奉事后梁、后唐中原朝廷，对邻国基本上采取和好相处的政策；在境内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各国的贸易交往。马殷从乾宁元年（894年）进入湖南以潭州为基地，到梁开平二年（908年）攻取岭北六州的十余年间，逐一消灭湖南地区的割据者，或迫使他们归附，从而使统辖地区日益扩大，共有23州，辖地包括今湖南全境、广西东北部、贵州东部等广大地区。后梁太祖拜马殷侍中兼中书令，封楚王。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又封马殷楚国王。马殷以潭州为长沙府，正式建国，自置左、右相以及尚书、仆射等官属，但自己不称帝，不置纪年，史称楚国。

在楚国北面，高季兴割据荆南。高季兴，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人，本名季昌，避后唐讳更名。唐末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收高季兴为牙将，后升为宋州刺史。开平元年（907年），后梁拜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并派5000兵士充当荆南牙兵，以防止高季兴的不轨行为。唐末荆南节度使辖10州，后被诸道侵夺，只剩下江陵一城，残破不堪。高季兴招抚流亡，人士渐归，又用倪可福为将帅，梁震、司空薰、王保义为谋士，并修治城隍，设置楼橹，建造战船，暗中准备割据。唐庄宗灭梁，高季兴亲自入洛阳朝贡，后唐同光二年（924年）被封为南平王。后来夺取前蜀的归州、峡州，加荊州共有3州，是南方诸国中最小的国家，地狭

① 这些割据者有：岳州邓进忠，朗州（今湖南常德）、澧州（今湖南澧县）向环，衡州（今湖南衡阳）杨思远，永州（今湖南零陵）唐世旻，道州（今湖南道县西）蔡结，郴州（今湖南郴县）陈彦谦，连州（今广东连县）鲁景仁等。

兵少，难以自立，江陵又处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所以高季兴及其后的南平国统治者先后向后梁、唐、晋、汉、周以及南汉、闽、楚、后蜀、吴国等称臣，希望得到一些赏赐，并在江陵拦截各国使者的财物。

二、夔州之战

长江上游的夔（今四川奉节东）、万（今四川万县市）、忠（今四川忠县）、涪（今四川涪陵）四州，原属于唐朝荆南节度使，唐末为王建所占。高季兴企图收复这些州，在乾化四年（914年）领水军攻打夔州，前蜀夔州刺史王成先迎战。荆南水军纵火焚烧前蜀浮桥。前蜀招讨副使张武预先将铁链沉入江中，俟荆南战船临近时，突然将铁链拖出水面，锁住长江，阻挡船只通过。恰巧这时风向突变，荆南战船由顺风而遇上逆风，前蜀军放火焚烧，荆南兵士死伤甚多，约五千人被俘。高季兴换乘小船逃走。高季兴再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等待有利时机。

同光三年（925年），高季兴利用后唐讨伐前蜀之机，连忙请求用本道军队攻取夔、忠、万、归、峡等州^①，并隶属荆南。唐庄宗同意，命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但高季兴害怕前蜀，不敢直接进攻夔、忠、万等州，而率领水军沿长江西上，攻取施州（今湖北恩施）。前蜀张武又用铁锁链封江，高季兴派勇士乘船研锁。适值大风骤起，船被铁链挂上，难以进退。前蜀军队矢石齐发，高季兴战船损失严重，败归江陵。由于后唐大军自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南下，一路挺进，前蜀军将纷纷不战而降。张武以夔、忠、万三州降于后唐魏王李继岌。高季兴虽连吃败仗，仍以后唐朝廷曾经答应为理由，再次要求将夔、忠、万、峡、归等

^① 此据《新五代史》卷六九，《高季兴传》所载，但《资治通鉴》卷二七三称“诏季兴自取夔、忠、万三州为巡属”。

五州划为荆南属郡。唐庄宗虽予答应，但确定由后唐朝廷任命五州的刺史。夔州之战暂时结束。

三、江陵之战

高季兴得到夔、忠、万、归、峡等州后，请后唐不再任命各州刺史，改由高氏子弟充当。后唐不允许。天成二年（927年）二月，夔州刺史潘炕罢官，高季兴擅自领兵攻入城内，拒不接受后唐新授命的夔州刺史西方邺，还出兵袭击涪州。后唐魏王李继岌灭前蜀后，派牙将韩珙押运西川珍货金帛40万浮江而下，高季兴杀死韩珙，抢走全部财货。后唐朝廷予以指责，高季兴也出言不逊，双方关系更加恶化。二月二十日，后唐朝廷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领步骑军4万人出征荆南；又命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夔州刺史西方邺为副招讨使，会同湖南马殷军队一起进讨。表面看来，后唐进攻的阵营庞大，荆南似乎不堪一击；但后唐诸军将领各有打算，从一开始就很被动。

三月，刘训军队到达江陵。高季兴坚壁清野，并守城不肯出战，同时向吴国求援。三四月间，荆南地区久雨不晴，气候潮湿，军粮运输困难，后唐将士患病增多，攻城毫无进展。四月二十三日，唐明宗派枢密使孔循往江陵督战，也未能攻入江陵城。后唐朝廷赐楚王马殷鞍马、玉带，又赐将士夏衣万套，指望马殷向江陵前线运送军粮，并出兵参战。但马殷不肯发运粮饷，都指挥使许德勋领湖南水军屯驻岳州，观望不进。东川董璋也未派蜀军沿长江东下。五月二十日，后唐朝廷因师出无功，命刘训班师。

天成三年（928年）三月，楚王马殷来到岳州，指使六军使袁诠、副使王环、监军马希瞻攻荆南。楚军到达石首县（今属湖北）刘郎洑，在黑夜将几十艘战船藏在港中，次日天明交战，马希瞻突然出战船拦击，荆南水军大败，伤亡很多。楚军乘胜进逼江陵。高季兴见情势危急，连忙归还楚国中军使史光宪，楚军撤

退。

荆南高季兴一再遭到唐、楚双方的夹击，天成三年乃臣附吴国，被赐爵秦王。后唐命楚王马殷讨伐。马殷派都指挥使许德勋再攻荆南，以子希范为监军。楚军抵达沙头（今湖北沙市），杀死高季兴从子、云猛指挥使高从嗣，高季兴请和，许德勋退兵。

九月二十七日，后唐命武宁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督促军队会合襄阳（今属湖北）军一起出讨荆南。十二月，高季兴死，其子从诲继立。高从诲鉴于荆南邻近后唐，又通过楚王马殷向唐明宗请罪，被后唐授为荆南节度使。唐、楚夹击荆南之战遂告结束。

高季兴初据荆南，仅占领荆州一地，后来从前蜀那里夺取归、峡二州。他之所以能较长期割据荆南，并非荆南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雄厚的物质基础，而是江陵城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了这一区区小国的长期存在。江陵为荆南节度使首府，位于今湖北境内长江北岸，襟带江湖，西通巴蜀，北通襄阳，南极岭南，自古以来就是全国南北交往的重要枢纽。五代前期，高季兴正处在后唐、前蜀、楚、吴四国的包围之中。其时南北大运河漕运受阻，江陵更是沟通四周各国互相交往的必经之地。天成三年（928年），楚军一度大败荆南军，马殷指责六军副使王环不攻占江陵，王环回答说：“江陵在中朝（指后唐）及吴、蜀之间，四战之地也，宜存之以为吾扞蔽”^①，马殷很赞同王环的高见。五代时期南北诸国让高季兴荆南割据政权长期存在，把它当作一块缓冲地带，既有利于各国通过江陵进行交往，发展贸易，又能作为阻滞它国军事进攻的一道屏障，对于周围各国都是有利的。这就是高季兴屡次被别国打败而又能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唐明宗天成三年。

四、楚平溪州之战

溪州（今湖南永顺县东南）在唐代属于黔中观察使，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史书称“蛮”。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八月，溪州刺史彭士愁引奖州（今湖南芷江县西）、锦州（今湖南麻阳县西南）诸少数民族万余人攻打辰州（今湖南沅陵）、澧州，焚掠镇、戍，并请后蜀出兵声援。九月三日，楚王马希范命静江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领步兵5000人征讨。楚军进攻溪州，彭士愁兵败，逃往深山老寨。这里悬崖峭壁，很难攀登。刘勍制造梯栈，围之三重，廖匡齐战死。刘勍利用大风放火箭焚烧彭士愁营寨，彭士愁率残部再逃至溪、锦二州大山中。天福五年（940年）正月二十九日，彭士愁派其子师囗率诸酋长送上溪、锦、奖三州印，向楚国请降。楚王马希范即以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刘勍为锦州刺史。马希范用铜5000斤铸制铜柱，刻上铭文，至今还保存在今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境内。铭文记述了楚平溪州之战发生的原因、经过，溪州少数民族保证臣服楚国，楚国也不得贱买溪州物资与土特产品，不发兵征讨。这已成为湖南湘西各族友好相处的历史见证。

第五节 后蜀建立与进兵散关、凤州之战

一、孟知祥、董璋图谋割据两川 并联兵抗击后唐

孟知祥早年随父居于太原（今山西太原南），娶晋王李克用侄女为妻，任左教练使。后来出任后唐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坐镇国之北门。董璋由后梁投降后唐，升为邠州节度使。后唐枢密使郭崇韬执掌朝廷大权，与孟、董二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同光三年（925年）九月，后唐李继岌、郭崇韬出讨前蜀，以董璋充行营右厢马步都虞候。军机大事，郭崇韬多召董璋商量。灭亡前蜀不久，朝廷根据郭崇韬的奏请，分别授孟知祥、董璋为西川、东川节度使。

后唐讨伐前蜀取胜后，内部动乱接连发生。李继岌、郭崇韬以及讨蜀立功大将康延孝（李绍琛）相继被杀，唐庄宗也死于兵乱之中。孟知祥、董璋见有机可乘，即萌发在蜀地称王割据的打算。天成元年（926年）七至九月，孟知祥大肆扩充兵马，在西川原有骑兵3000人、步兵2.4万人的基础上，又增置左右牙等兵16营，共1.6万人，营于牙城内外；置义宁等20营，共1.6万人，分戍管内州县就食；置左右冲山等6营，共6000人，营于成都罗城内外；置左右牢城4营，共4000人，分戍成都境内；置左右飞棹兵6营，共6000人，分戍滨江诸州，练习水战以备夔、峡。孟知祥迅速扩军到7.5万人，以步兵为主，还有不少骑兵、水军，而且分布在西川境内各州，显然是要用武力称雄西川。

西川地区经济较富庶，赋税收入较多，孟知祥借口供给军需衣粮，拒不上交后唐政府。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十月派客省使李严为西川监军。次年正月，孟知祥杀死李严。董璋在东川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后唐政府要董璋上交税款50万缗，董璋诉说东川地狭民贫，只送10万缗。后唐客省使李仁矩来到东川，董璋当面威胁说：孟知祥杀死李严，难道我不敢处置你吗！李仁矩苦苦哀求，逃回洛阳。

后唐朝廷鉴于孟知祥、董璋加紧图谋割据，就着手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凡两川军将更换，后唐多委派亲信将领，并带上精兵，少者500人，多者2000~3000人。同时，又削减东、西川节度使的属郡，增置新的藩镇。天成四年（929年）十月，割东川阆州（今四川阆中）、果州（今四川南充）置保宁军，以客省使李仁矩为节度使；派枢密使安重海外兄武虔裕为绵州（今四川绵阳）刺史；指使武信节度使夏鲁奇修建遂州（今四川遂宁）城池，训练军队，开始从北南东三个方向对东川、西川进行军事包围，并逼

近成都府和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孟知祥、董璋决定抛弃旧嫌，结为姻亲，联合起来，共同击退后唐的军事进攻。

长兴元年（930年）九月三日，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得知后唐准备发大军讨伐西川，乃与节度副使赵季良商量对策。赵季良提出以东川兵先取遂州、阆州，然后东、西川联合起来把守剑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则西川“无内顾之忧”^①。孟知祥从之，派使者约董璋同时出兵。董璋乃传檄书于武信（治遂州）、保宁（治阆州）、昭武（治利州，今四川广元）三节度使，指责他们充当后唐间谍，随即发兵攻打阆州。九月十日，孟知祥派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为副都部署，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指挥使，率3万军队进攻遂州。又遣牙内都指挥使侯弘实、先锋指挥使孟思恭领兵4000人配合东川军队攻打阆州。保宁节度使李仁矩的部将提出，“董璋久蓄反谋，以金帛啖其士卒，锐气不可当，宜深沟高垒以挫之，不过旬日，大军至，贼自走矣”^②。可是，李仁矩骄傲轻敌，认为蜀兵懦弱，不堪一击，遂命军队出城迎敌。双方尚未交战，李仁矩军就逃归阆州城内。东川军队昼夜进攻，二十日攻入城内，杀死保宁节度使李仁矩。

九月二十七日，后唐朝廷以天雄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三天之后，又派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充东川行营马步都虞候，率兵讨伐两川。因石敬瑭从后唐洛阳抵达两川前线还需一段时日，所以东西川军队继续主动进攻。十月，董璋引兵乘胜进攻利州，因天雨运输军粮困难，又退回阆州。东川军队还接连攻陷合（今四川合川）、巴（今四川巴中）、蓬（今四川仪陇南）、果等州。与此同时，西川李仁罕围攻遂州，武信军将康文通出城迎战，兵败投降。后唐武信节度使夏鲁奇被迫固守遂州城内。九、十两个月，战争主要在四川境内嘉陵江流域附近诸州进行，因后唐大军没有赶到，孟知祥、董璋军队势如破竹，战果辉煌。但董璋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唐明宗长兴元年。

没有攻下在剑州北面的利州，又未派重兵把守剑门，留下了重大隐患。

十一月中旬，石敬瑭进入散关。阶州刺史王弘贊、泸州刺史冯晖、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军都指挥使赵在礼自利州山路出剑门关外，再返回奇袭剑门，杀东川兵 3000 人，俘都指挥使齐彦温。十五日，王弘贊攻陷剑州（今四川剑阁县），但后面大军未及时赶上，无力继续前进，抢掠一些资粮而退回剑门。剑门关在剑州东北大剑山上，两旁峰峦连绵，峭壁千丈，地势险峻，历来是守卫西川的重要关隘。可是，后唐领兵统帅石敬瑭消极拖延，从散关到剑门费时将近 20 天，也未组织大军自剑门南下直捣成都，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战机。

十一月二十日，董璋派使者向孟知祥告急。孟大为恐惧，次日派牙内都指挥使李肇领兵 5000 人倍道兼行，进据剑州，又从遂州前线调回赵廷隐增援剑州。此时屯戍蓬州仪陇县（今属四川）来苏镇的西川牙内指挥使庞福诚、昭信指挥使谢锽得知剑门失守后，主动领兵千余人向剑州进发。刚到达剑州，遇后唐军队万余人，庞、谢二人见敌我众寡悬殊，派兵在唐军营后大声鼓噪，谢锽率部分兵士自前面攻击，唐军惊慌退走，在剑门十余日不敢出来。孟知祥高兴地说：后唐军队占领剑门，不往前进军梓州，反而焚毁剑州，顿兵不进，必将失败^①。十二月三日，石敬瑭到达剑门，六日，进军剑州北山，遭西川赵廷隐伏击，再次退回剑门。

后唐军队在剑门受阻，军需供应遇到严重困难。由关中运粮到利州，道路遥远，山路险折，途中损耗大，每运粮一石只能得到一斗。老百姓不堪役使，纷纷结聚山林，反抗朝廷。唐明宗面告近臣，事已如此，只有自己出征。枢密使安重诲见势不妙，连忙承认前线战争失利，当由自己负责，请求亲往前方督战。十二月二十四日，安重诲离开洛阳，速赴前线，关西藩镇“莫不惶骇。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唐明宗长兴元年。

所在钱帛粮料，星夜辇运，人乘毙踣于山路者不可胜纪”^①。唐明宗听信谗言，又急诏召回安重诲并调任河中节度使。石敬瑭本来不愿西征，见安重诲已离开朝廷，再无所畏惧，不断上表要求休战撤兵。长兴二年（931年）正月，西川李仁罕攻陷遂州，后唐武信节度使夏鲁奇自杀。二月，石敬瑭因遂州、阆州先后失陷，粮食又运输不上，烧营北归，东、西川军队追至利州而止。后唐军队出征两川的失利，唐明宗既不追究领兵统帅石敬瑭作战不力的责任，也不再声讨孟知祥、董璋抗拒朝廷的罪行，反而说孟、董二人一贯尽忠朝廷，枢密使安重诲却挑拨离间，擅动干戈。这样是非混淆，东、西川藩帅更有恃无恐，骄矜跋扈，进而爆发了新的战争。

后唐时期先后有两次讨伐川蜀之战，一次是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韬灭亡前蜀，一次是长兴元年（930年）石敬瑭征讨孟知祥、董璋，结果失地损兵，劳民伤财。比较起来，后一次战争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作战部署，进军缓慢，千里运粮，处处受阻，而领兵统帅指挥不力，当是这次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孟知祥、董璋抗击后唐军入蜀之所以取得胜利，关键在于他们联合起来，协同作战，相互支援；其次，孟知祥在剑门失守之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调动军队迅速占领剑州，阻止了后唐军队从剑门南下；再次，两川军队在抗击后唐军队的同时，分别出军攻占了后唐在嘉陵江流域附近所占诸州，迫使后唐军队入蜀后孤立无援，粮刍供应困难，退出两川。

二、孟知祥吞并东川，称帝西蜀

孟知祥、董璋分别占据西川、东川，唇齿相依，虽一度联合起来抗击后唐，但他们之间早已虎视眈眈，各怀杀机。长兴二年

^① 《旧五代史》卷六六，《安重诲传》。

(931年)二月石敬瑭军队刚撤退，西川大将赵廷隐鉴于董璋诡诈多变，建议孟知祥乘其到剑州劳军之机，将他杀掉而独霸两川。孟知祥因缺乏周密准备而未敢贸然行动。

长兴二、三年之交，孟知祥为防止后唐再兴兵讨蜀，三次派使者来到东川，要求和董璋一起上表后唐朝廷，表示谢罪。董璋因留在洛阳的子孙全部被后唐朝廷处死，而孟知祥在洛阳的亲属均安然无恙，大为不满，怀疑孟知祥出卖自己，双方矛盾日趋尖锐。长兴三年(932年)四月，董璋召集诸将领商议进攻成都，前陵州刺史王晖认为“时方盛夏，师出无名，必无成功”^①，而大多数人都说必将取胜，更助长了董璋的嚣张气焰。孟知祥也及时派出军队3000人到汉州(今四川广汉)防备。董璋首先派兵进入汉州境内，攻取白杨林镇(今四川广汉东)，俘戍将武弘礼。汉州东至梓州210里，南至成都100里，董璋军队一天多就可到达成都。孟知祥见此情况，颇有忧虑，西川节度副使赵季良献策说：董璋为人勇而无恩，得不到士卒的拥护，外出征战必将失败。不过他“用兵精锐皆在前锋，公(指孟知祥)宜以羸兵诱之，以劲兵待之，始虽小衄，后必大捷。”^②并要求孟知祥亲自统兵出征以鼓舞广大将士的士气。西川大将赵廷隐也说董璋轻率而缺乏谋略，举兵必败。这些言论既肯定董璋必将失败，又提出先以羸兵诱敌，再以劲兵出击的作战方案，给孟知祥很大的启示。四月二十九日，孟知祥以赵廷隐为行营马步都部署，领兵3万迎战。五月一日，赵廷隐向孟知祥辞行时，正碰上董璋使者送来檄书，还有书信给赵季良、赵廷隐。董璋在檄书中称赵季良、赵廷隐暗中与他通谋，请他领兵出征西川。赵廷隐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董璋施反间计，企图借刀杀人。赵廷隐随即领兵出发。这天，董璋领军抵汉州，在汉州东南赤水与西川军交战，生擒西川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接着又攻入汉州，初获大胜。

五月二日，孟知祥命赵季良、高敬柔留守成都，亲自领兵8000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唐明宗长兴三年。

人向汉州进发。当天抵弥牟镇，赵廷隐布阵于该镇北面。三日晨，赵廷隐屯于鸡臈桥（疑在今四川广汉县南），义胜、定远都知兵马使张公铎列阵于其后。董璋见西川兵锋强盛，退阵于武侯庙下，而他的帐下骁卒却要求速战。董璋随即指挥军队出动。双方军队刚交锋，东川右厢马步都指挥使张守进投降，向孟知祥报告“璋兵尽此，无复后继，当急击之。”^① 孟知祥登高督战，西川镇守鸡臈桥的军将毛重威、李瑭均被东川兵杀死，赵廷隐三战不利，牙内都指挥使侯弘实也往后退却。孟知祥立即指挥后军上阵。张公铎“麾兵而进，帅众大呼，所部兵无不以一当百，东川兵殊出不意，蹂躏披靡，死者数千人。”^② 俘东川中军都指挥使元瓈、牙内副指挥使董光演等80余人。董璋因自己亲兵被歼，领数骑逃走，余众7000人投降。董璋及其子逃入梓州城内被杀。赵廷隐领西川军先后攻入汉州、梓州，取得了重大胜利。

东、西川之战直接关系到各方的存亡，所以孟知祥、董璋都亲自出阵，作战时间不长但战斗相当激烈。董璋凭愚夫之勇，恃骁锐之师，全军出动，没有部署后续部队，一旦兵败则溃不成军。孟知祥有勇有谋，将军队分为前后两阵，当前军战败时而突然将后军投入战场，以对付东川疲累之师，因而取得大胜。孟知祥占有两川之后，后唐政府再没有力量兴兵出讨，双方仍不断派遣使者应付周旋。长兴四年（933年），后唐朝廷以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封蜀王，有权授命管内节度使、刺史等军政官员，已实际承认孟知祥在西川的独立地位。这年十一月，孟知祥鉴于唐明宗在宫内政变中惊死，唐闵帝已无力西顾，遂于应顺元年（934年）正月在成都称帝，号称蜀国，史称后蜀。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七，唐明宗长兴三年。

② 《十国春秋》卷五一，《张公铎传》。

三、进兵散关、凤州之战

散关位于宝鸡县（今属陕西）西南 52 里，陇山、终南山在这里交会，汧水（出自陕西陇县，在宝鸡县与渭水会合）、渭水（源出甘肃渭源县，经宝鸡南横贯陕西平原，注入黄河）萦流其间，地势险恶，素有“秦蜀噤喉”之称，自古以来即为控扼川、陕间的交通孔道。自散关南行入蜀，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首当其冲，然后通过利州抵剑州。凤州原系前蜀武兴节度使的治所。前蜀亡国后，凤州相继归后唐、后晋所管辖。天福十二年（947 年）正月契丹灭晋时，后晋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拒听契丹之命，以秦（今甘肃秦安县西北）、阶（今甘肃武都县东）、成（今甘肃西和县西北）三州归附后蜀，但散关、凤州仍由后晋军将控制。这不仅威胁着西川的安全，也阻挡了孟知祥谋取关中的重要通道。

何重建归降后，后蜀立即以左千牛上将军李继勋为秦州宣慰使。二月六日，李继勋与兴州刺史刘景攻占固镇（今陕西凤县东南）。后蜀根据何重建的请求，又派山南西道兵士 3700 人会合阶州、成州军队占领散关，将后晋军队拦阻在散关以北，然后进攻凤州。二月中旬，后蜀宫苑使崔延琛领兵攻凤州不胜，又退保固镇。三月，山南西道节度使孙汉韶率兵 2 万人攻打凤州，并分兵协助镇守散关。经过一个月的作战，后晋凤州防御使石奉𫖳孤立无援，率部投降，于是秦、凤、阶、成四州之地尽归后蜀所有。

第六节 南唐攻灭闽、楚之战

一、徐氏代吴建立南唐

徐氏取代吴国，经历了长达 30 年的时间，即从后梁开平二年（908 年）徐温、张颢谋杀淮南节度使杨渥，到后晋天福二年（937

年)徐温养子徐知诰迫使吴国皇帝杨溥让位。

徐温盐贩出身，随同杨行密起兵于庐州，颇受信任。天祐二年(905年)杨行密病卒，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颢立行密长子杨渥为淮南节度使；接着又杀死杨渥，立其二弟杨隆演，徐温迁昇州刺史，在金陵建置水军。徐温派儿子徐知训在扬州辅助杨隆演，处理日常事务。又命养子徐知诰进驻润州(今江苏镇江)，增强声势，以便就近加强对扬州的控制。吴国内外大事全部为徐温父子所专决。随后自北方投奔吴国的平卢节度使、诸道副都统朱瑾杀死徐知训，徐知诰抢先进入扬州，与养父徐温执掌吴国大权。

徐知诰，徐州(今属江苏)人，少年流寓濠(今安徽凤阳东北)、泗(今江苏盱眙北)，被徐温收为养子，改名徐知诰。徐温先以知诰为吴国楼船使，治舟师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又调任润州刺史、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军都副使。徐知诰进入扬州，“尽反知训之所为，接御士大夫，曲加礼敬，躬履素朴，去浮靡，而又宽刑勤理，孜孜不倦。”^①并以吴王的名义全部免除吴国杨隆演天祐十三年(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前百姓所欠赋税，其余欠税待农业生产丰收后再缴纳，从而赢得吴国百姓的广泛悦服。吴国乾贞元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十月徐温病卒，由徐知诰掌握吴国军政大权。

吴王杨溥乾贞元年称帝，拜徐知诰太尉、中书令。徐知诰自己坐镇金陵，留儿子景通在扬州，父子二人总揽国事。吴国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十月，吴国皇帝杨溥被迫让位，徐知诰在金陵称帝，国号唐，史称南唐。

二、南唐军事战略的变化

南唐建立后，徐诰(徐知诰称帝前已更名为“诰”)又改称李

^① 《钓矶立谈》卷一，榕园丛书本(下同)。

昇。他从天祐六年（后梁开平三年，909年）迁昇州防御使到吴国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称帝，经历了将近30年的磨炼，富有统治经验。他规定外戚不得辅佐朝政，宦官不能参与重大政事，保持全国政令、军令的统一。还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发展社会经济。

南唐北以淮河为界与后晋毗邻，西有荆南和楚国，南近南汉，东南接吴越、闽国。李昇称帝时，派遣使者到南汉、闽、吴越、荆南各国表示友好，契丹、新罗、高丽都来人祝贺。这些国家有的与南唐相距很远，有的虽较近，但军事力量较弱，惟有得到契丹支持的后晋政权实力强大，对南唐构成较大的威胁。李昇曾召集大臣宋齐丘、冯延己及太子李璟等人在内廷商议对策，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伺机北伐中原、然后招附南方诸国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战略。

李昇指出，南朝刘裕北伐一度取胜，但不能长期占据中原而匆匆南返；隋末杨玄感未能听从李密进军关中的建议；唐朝徐敬业不北上进犯洛阳；结果都失败了。历史经验表明，要统一全国，首先要占领中原、关中等军事要地，再逐步扩展到四方。长期偏安江南肯定不能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李昇总结这些经验，着重在于教育太子、大臣们充分认识到南唐军事战略的主要打击目标是盘踞中原的后晋王朝。所以他说，倘“中原忽有变故，朕将投袂而起，为天下倡”^①，出兵收复中原，统一全国。

李昇坚决否定大臣冯延己“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②，即首先出兵灭亡闽、吴越、楚国的主张。李昇明确指出，俟南唐收复中原之后，“然后拱揖以招诸国”^③，自然是水到渠成，何必兴师动众！如果南唐现在对南方诸国用兵，有的国家会很快灭亡，有的国家或依险拒守，拖延时日，将会消耗南唐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灭亡邻国之后，还要派兵戍守，将会招致南唐兵力的分散。李昇临死之前，还谆谆告诫太子李璟要与邻国和好，切勿效法隋炀

①②③ 《钓矶立谈》卷一。

帝贪功黩武，自取灭亡。

为了贯彻落实上述军事战略，李昪称帝近六年，从未与南方诸邻国发生战争。后晋天福六年（南唐昪元五年，941年）四月，南汉要求与南唐联合出兵灭亡楚国，遭到李昪的拒绝。同年七月吴越大火，几乎烧尽宫室的全部库藏。大臣宋齐丘奏请即刻出兵，趁火打劫，李昪却反其道而行之，派人送去很多金帛缯绮，救援受灾邻国。但他对后晋的态度则明显不同。天福元年十二月，后晋军将卢文进投奔吴国，李昪特派兵迎接，授为宣州节度使。天福五年（南唐昪元四年，940年），后晋安远节度使李金全归附南唐，李昪派鄂州屯营使李承裕领兵3000人前往接应，李金全才安全抵达金陵，任南唐镇海节度使。后来还委以重任，让李金全担任北面行营招讨使。李昪这样热情地接纳后晋降将，并授以重任，无非是要吸引更多的后晋官将归附南唐，扩充自己的实力。此外，李昪还注意修明政治，内宽刑罚，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屯积财富，为统一全国创造物质条件。

天福八年（南唐昪元七年，943年）二月，烈祖李昪死。太子李璟称帝并重用冯延己、冯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一伙邪佞之徒，被称为“五鬼”。他们与先朝重臣宋齐丘相互勾结，结成朋党，徇私舞弊，排斥异己，专权国事，滋生事端。李璟一度退居深宫，将国事交给他们处理。冯延己自认为有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嘲笑李昪是“龌龊无大略”，“田舍翁安能成大事”^①。李璟即帝位的第二年，冯延己一伙人先后策划讨闽、灭楚的战争。

三、灭闽之战

闽国的建立者是在唐朝末年由河南进入福建的王潮、王审知兄弟。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威武军节度使、闽王王审知死，诸

^① 马令《南唐书》卷二一，《冯延己传》，四部丛刊本（下同）。

子争位，争战不休，政局极端混乱。王审知之子延翰在同光三年袭王位，不久被杀，弟王延钧立。后唐长兴三年（933年），王延钧称帝，改元为龙启，国号称闽。闽国通文四年（后晋天福四年，939年），传至五世王曦（王审知子），其弟延政在建州（今福建建瓯）另建殷国^①，与福州（今属福建）王曦公开对立，举兵相攻。闽国天德二年（南唐保大二年，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南唐帝李璟指责王曦、王延政兄弟残杀，王延政不服，反而讥讽南唐篡夺吴国政权。李璟大怒，断绝了与王延政的关系。

（一）建州之战

闽国天德二年十二月，南唐枢密副使查文徽奏请出兵讨伐建州王延政，朝臣多以为不可，查文徽同党冯延鲁却极力赞成。李璟命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侦察对闽战役是否可行。南唐翰林待诏臧循与查文徽同乡里，曾长期往来福建经商，熟悉当地山川形势，帮助查文徽策划进攻建州的方略。查文徽到达信州（今江西上饶），上言出兵必胜。李璟遂批准出征。南唐分兵二路，查文徽与行营招讨都虞候边镐领洪州兵数千人由建阳（今属福建）抵达盖竹（今福建建阳以南25里），臧循率偏师屯驻邵武（今属福建），准备同时向建州进军。这时，福建内部形势突然发生变化，王延政统军使吴承祐取得福州，由王延政之子王继昌镇守，调福州军队2.5万人驰援建州，汀州（今福建长汀）、漳州（今属福建）、泉州（今属福建）的兵士也奉命助建州防守。查文徽不战而退，自盖竹回师建阳。臧循在邵武战败被杀。

南唐初战失利，李璟应查文徽增加兵员的请求，闽国天德三年（南唐保大三年，后晋开运二年，945年）二月，命天威都虞候何敬洙为建州行营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姚凤为都监，领兵万人^②，会合查文徽进攻建州。他们自崇安（今福

^① 王曦被杀后，王延政在后晋开运二年（945年）正月又改国号为闽。

^② “万人”，据马令《南唐书》卷二，《嗣主李璟书》及同书卷二一，《查文徽传》，但《资治通鉴》卷二八四称“数千人”。

建建阳西北)进屯赤岭(疑在福建建阳县与建州之间)。闽国王延政派仆射杨思恭、统军使陈望将兵万人拒敌。闽军列阵于小溪之南,南唐军在小溪之北,双方坚持月余^①,南唐军不敢进逼。可是,闽军将领对下一步作战方略产生了严重分歧。陈望鉴于南唐精兵多,主张“观其变为万全之策”^②,固阵防守,伺机破敌。杨思恭却说南唐几千兵马远道而来,军粮有限,而闽军有强兵万人,要求立即出兵决战。“若旷日持久,使其营垒坚固,刍粟丰备”^③,就难以取胜。陈望不得已引兵渡河,背水作战。南唐将领祖全恩出大军迎战。另派闽国降将孟坚等潜入敌后,前后夹击,闽军大败,溺死甚多,陈望战死,杨思恭逃走。南唐军队乘胜围攻建州。王延政大惧,闭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顺领泉州5000兵士驰赴建州,分守要害之地。

三月,福州军将李仁达见王延政军事失利,在福州发起兵变,杀死镇守福州的王继昌(王延政之子),自称威武军留后,遣使称藩于后晋、南唐,又与吴越国勾结。王延政这时对协助戍守建州的福州军队产生怀疑,借口遣返他们回家,一举杀死8000人,严重削弱了建州城内的军事力量。八月二十四日,南唐先锋桥道使王建封火烧建州外城,抢先攻入城内,生擒王延政。王忠顺战死,董思安率部众逃回泉州。九月,汀州许文稹、泉州王继勋、漳州王继成相继降于南唐。南唐升建州为永安军,以祖全恩为节度使,几乎控制了福建全境。

(二) 福州之战

南唐将领请求乘胜进攻福州,元宗李璟不许。保大四年(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四月,南唐朝廷不信任闽国降将,调漳州刺史王继成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许文稹为蕲州刺史,召回泉州刺史王继勋,另派军队戍守泉州并监督降将留从效。福州李仁达名

^① “月余”,据《九国志》卷十,《杨思恭传》,《资治通鉴》卷二八四作“旬余”。

^{②③} 《九国志》卷十,《杨思恭传》。

义上臣服南唐，实际上我行我素，不听朝令。当南唐军队向建州进军时，福建百姓苦于闽国统治集团的贪浊残暴，纷纷伐木开道，壶浆迎奉。南唐军队攻入建州后，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福建百姓大失所望。留从效、李仁达乘机扩充实力，暗中准备反抗南唐。

六月，南唐大臣宋齐丘向元宗建议：陈觉很有才能胆略，可以说喻福州李仁达入朝金陵，不需用兵。元宗即授陈觉为福州宣喻使。陈抵福州，李仁达态度傲慢，声称境内安抚未定，待来年再归朝。陈觉匆忙离开，行至剑州（今福建南平市），自称权福州军府事，假传元宗命令，擅发汀州、抚州（今江西抚州西）、信州军队共讨福州。唐元宗发觉陈觉专命，十分恼火，但大臣们都说明南唐军队已到福州城下，不可半途中止，请继续增兵助战。八月，南唐以永安节度使王崇文为东南面都招讨使，漳泉安抚使魏岑为东面监军使，建州监军冯延鲁为南面监军使。他们各领兵万人包围福州。

九月，福州排阵使马捷引南唐兵攻至善化门桥，福州外城再次为南唐兵所据。李仁达（又称弘义、弘达、达）面临福州城破身亡的危险，请求吴越国出兵援助。吴越王钱弘佐召诸将商议。许多人认为道路险远，难以相救，惟有内都监使水丘昭券赞同出兵。吴越国东临大海，北面、西面靠近南唐，倘南面福建再为南唐所有，则吴越陷入南唐全面包围之中。钱弘佐从自身安全出发，果断决定出兵救援福州。十月二十五日，吴越国派统军使张筠、赵承泰领兵3万人，由水陆两路驰援福州。十一月二十二日，吴越兵抵福州，自署浦南潜入州城。南唐军队进据东武门，李仁达与吴越军队联合起来防御，作战失利。福州“自是内外断绝，城中益危”^①。然而南唐王崇文、陈觉、冯延鲁、魏岑、留从效、王建封诸将各自争功，不肯听命统一的指挥，故久攻福州不下。

南唐保大五年（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三月，吴越王再命余安领水军沿海道进发。三月十四日，吴越船队到达离福州不远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晋齐王开运三年。

的白蝦浦。因海滩泥泞，加上南唐兵士向船队猛射，吴越兵士无法登岸。南唐监军使冯延鲁认为福州城久攻不下，是由于李仁达在城内指望吴越国出兵援救。倘南唐军暂时后退，俟吴越军队登岸时尽杀之，则福州李仁达必将投降。与此相反，偏将孟坚认为吴越军目前进退很难，倘让他们登上海岸，必然拚死决战，“其锋不可当，安能尽杀乎”^①。冯延鲁独断专行，固持己见，指示南唐军后撤。吴越兵士抢登岸上，大呼奋击，福州城内李仁达也出城作战，前后夹攻，孟坚战死，南唐兵溃退。这时，南唐将领王建封见死不救，闽国降将留从效幸灾乐祸，引兵回泉州。南唐兵士死亡两万余人，丢弃军械数十万件。留从效占有漳、泉二州，公开下逐客令，迫使南唐戍守泉州的军队撤走。南唐军队一再失败，南唐元宗命锁送冯延鲁、陈觉至金陵。南唐大臣江文蔚、徐铉、韩熙载一致要求处死这些败将。由于宋齐丘、冯延己的包庇，冯、陈二人不久又得到重用。南唐朝廷深深陷入泥沼而无法自拔。

后汉乾祐三年（南唐保大八年，950年）二月，吴越谍者向南唐建州留后查文徽谎报：吴越兵士在福州杀死李仁达，弃城逃走。查文徽信以为真，急于贪功，偕剑州刺史陈海出讨福州。陈海乘战船沿闽江南下，与吴越水军战于江中。陈海领兵士潜入水下，破坏吴越楼船。吴越兵士惊慌失措，南唐军队乘胜追击，俘其将马先进、叶仁安、郑彦华等。二月二十三日，查文徽从陆路赶到，吴越知威武军事吴程遣数百人出城诈降，查文徽传令进城。陈海报告闽人多诈，俟查明城内情况再作处置。查文徽不听，命南唐军迅速进入城内。结果南唐军大败，死万人，查文徽被俘，陈海领军逃回剑州。南唐对闽作战至此全部结束。

南唐对闽战争，包括攻克建州和两次出兵福州，从南唐保大二年（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开始到南唐保大八年（后汉乾祐三年，950年）二月结束，打打停停，先后历时五年多。闽国由于内部分裂，建州王延政与福州李仁达相互残杀，无力抗拒外敌入犯，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汉高祖十二年。

导致国家灭亡，南唐夺取建、汀二州，闽将留从效占有泉、漳二州，吴越控制福州。但南唐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死伤兵士几万人，李昇时期积蓄下来的物质财富（包括军需器杖）几乎耗尽。其根本原因是李璟君臣们违背李昇要求与南方诸国睦邻友好的遗训，主动地打了一场错误的消耗战争。南唐由冯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一伙人指挥作战。他们结成死党，排斥异己，不懂军事，刚愎自用，拒绝听取部将的正确意见。查文徽未经战斗便撤退到建阳，后来攻福州又受骗上当，被敌人俘获。冯延鲁、陈觉违背作战的一般原则，让吴越援军从海上登岸，南唐军腹背受敌，惨败于福州城外。可是，南唐统治集团并未吸取这些教训，还以为南方诸国可指麾而定，又乘人之危而蓄意挑起灭楚之战。

四、灭楚之战

楚国长期奉事中原王朝，与东面邻国吴、南唐时而不和。后唐长兴元年（930年），楚王马殷死，遗命诸子，兄弟相继，其子希声、希范、希广相继嗣位。后汉乾祐三年（南唐保大八年，950年），武平节度使（治朗州，今湖南常德）马希萼与其弟希广相争，希萼由于得到南唐的支援，率领朗州兵、湘西少数民族军队攻占潭州，杀马希广，自称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等军节度使，楚王，以同母弟希崇为节度副使、判军府事。

后周广顺元年（南唐保大九年，951年）二月，马希萼派掌书记刘光辅向南唐入贡。刘光辅见马希萼杀戮无度，纵酒荒淫，不亲政事，乃向南唐帝李璟密报：“湖南民疲主骄，可取也。”^①李璟命大将边镐为信州刺史兼湖南安抚使，屯兵袁州萍乡（今属江西），策划进犯湖南。

九月，武安节度副使马希崇与楚旧将徐威、陈敬迁、鲁公馆、

^① 《十国春秋》卷六七，《恭孝王世家》。

陆孟俊密谋作乱。徐威等率领兵士攻入军府，立马希崇为武安留后。这时，湖南出现了长沙马希崇、衡山马希萼、朗州刘言三个军事集团。马希萼在长沙被徐威等俘虏后，囚禁于衡山县，又得到衡山指挥使廖偃的支持，自称衡山王，召募军队，有兵士万余人，派使者向南唐求援。楚国旧将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副使周行逢立辰州刺史刘言为武平留后，称藩于后周，出兵潭州，声言讨伐马希崇篡夺之罪。马希崇坐镇长沙，受到朗州刘言、衡山马希萼两方面的围逼，十分恐惧，向南唐乞师援助。南唐早已作好准备，立即分兵水陆二路，边镐率兵万人自袁州（今江西宜春）向长沙进发，南唐武昌节度使刘仁瞻率战船 200 艘取岳州。保大九年（后周广顺元年，951 年）十月，楚王马希崇向边镐请降，南唐军遂进入长沙境内。南唐以边镐为武安节度使（治潭州），将马希萼、马希崇及马氏宗族千余人押送金陵。从后梁开平元年（907 年）起共延续四十余年的楚国遂告灭亡。

南唐灭亡楚国比入闽作战容易得多，很快取得大胜。然而好景不长，镇守湖南的边镐一伙人又成为众矢之的。边镐、刘仁瞻初取长沙、岳州，开仓赈济，招抚流亡，深得百姓的拥护。但他们后来疯狂掠夺，将湖南金帛、珍玩、仓粟运到金陵，又苛征暴敛，夺取湖南租赋供养南唐在湖南的戍兵。南唐官将贪污枉法，克扣粮饷，激起南唐戍兵奉节都指挥使孙朗、曹进作乱，逃奔朗州，联合楚国旧将刘言、王逵、周行逢一起反叛。南汉军队也乘机北上，连败南唐军，攻占郴州、桂州、连州。南唐保大十年（后周广顺二年，952 年），楚国旧将刘言、王逵自朗州攻入潭州，降附后周。南唐边镐及戍守湖南诸将都相继逃走。南唐元宗迫于连年出师无功，劳民伤财，决定休兵息民。有人说，愿陛下今后数十年不再用兵，国家可以小康！李璟回答说，我今后终身不用兵，数十年算什么^①！不过为时已晚，南唐已面临后周军队自中原南下步步进逼的严重危机。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周太祖广顺二年。

第八章 后周的建立及其统一战争

第一节 郭威代汉建周及其初步改革

一、后汉的统治危机

后汉高祖刘知远在天福十二年（947年）六月进入大梁（今河南开封），半年后病故。临终之前，他嘱咐大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等人辅佐年仅18岁的儿子刘承祐为帝，史称汉隐帝。

汉隐帝即位后，面临着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朝廷大臣分为史弘肇、杨邠、郭威与苏逢吉这两个派系，双方严重不和。苏逢吉原来是刘知远在河东的节度判官，善于察言观色，阿谀谄媚，很快升为宰相。天福十二年九月，苏逢吉、郭威随同后汉高祖出征邺都（今河北大名北）杜重威，苏逢吉几次在军中侮辱郭威，双方关系进一步出现裂痕。后因关西三镇之乱爆发，后汉朝廷集中全力消弭叛乱，朝廷权臣之间的斗争有所缓和。平叛结束不久，契丹军进犯河北，后汉朝廷在乾祐三年（950年）四月拟派郭威镇邺都，率领诸将防御契丹。史弘肇提出由郭威继续兼任枢密使，便于统一指挥军事。苏逢吉认为枢密使郭威在外握有重兵，会危及国家安全，不赞成郭威再当枢密使。汉隐帝听从史弘肇建议，以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同时任枢密使，并命令河北地区的兵甲钱谷，统一听从郭威调动。苏逢吉与史弘肇、郭威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五月，三司使王章宴请朝中权贵，苏逢吉、史弘肇又为区区小事，在宴会上大吵大闹，史弘肇要当场杀死苏逢吉。枢密使杨邠害怕事情闹大，苦苦哀求，苏逢吉才免遭杀害。

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原出身于低级军校或地方政府小吏。他们依附于刘知远而升为后汉重臣，权势显赫，很看不起书生儒士以及朝中的文臣，甚至加以鄙视与种种限制。枢密使杨邠说，治理国家需要帑藏堆积，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①。三司使王章与杨邠同乡，提拔官吏都是他们的乡亲故旧。王章甚至将不堪供军队使用的杂物高估其价，充作州县官的月俸，更激起一般文官的普遍不满。

汉隐帝年纪轻，毫无治理国家的经验。史弘肇、杨邠等专权擅命，不把他放在眼里。汉隐帝的行动处处受到史弘肇一伙人的压制，深感不满，乃与亲信李业、聂文进、后匡赞、郭允明等人密谋，将枢密使杨邠、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人一举杀死，并尽诛其族。邺都留守郭威和监军王峻两人留居开封的家属也全遭杀害。

后汉削平关西三镇叛乱后，藩镇割据活动有所收敛，但统治集团内部权臣之间的不同派别、文臣与武将、皇室与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错综复杂，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甚至兵戎相见，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二、郭威的清君侧与澶州兵变，灭汉建周

后汉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十三日，汉隐帝杀死大臣史弘肇等人后，急调天平节度使高行周、平卢节度使符彦卿、永兴节度使郭从义、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匡国节度使薛怀让、郑州防御使吴虔裕、陈州刺史李谷等人领兵入朝，企图依靠他们保卫朝廷。同时又派供奉官孟业带上密诏赴澶州（今河南清丰西南）、邺都，分别杀死邺都留守郭威、监军王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孟业到澶州后，镇宁节度使李洪义不敢动手，向王殷密报了朝廷

①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杨邠传》。

的旨意。郭威得知后，随即留养子柴荣镇守邺都，以“除君侧之恶，共安天下”^①为号召，亲自领大军于十一月十五日自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南下。十六日，汉隐帝派遣前开封尹侯益、权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阎晋卿、郑州防御使吴虔裕、前保大节度使张彦超领禁军开赴澶州，守护黄河防线。汉隐帝这些措施倘能全部落实，有可能加强抵御郭威军队的实力。然而所谓藩帅只有后汉高祖刘知远同母弟慕容彦超和郑州防御使吴虔裕赶赴大梁，其余人均按兵不动。侯益提出朝廷禁军不应当轻易离开大梁，因为戍守邺都禁兵的家属都在京师，只要将这些家属集中起来并送上城楼去召呼郭威南下的兵士，他们会不战而降。汉隐帝举棋不定，朝廷调禁军开赴澶州的计划也被搁置。后汉君臣们已无能采取有力措施去对付郭威的大军。

郭威领大军自魏州南下，一路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十一月十六日，郭威抵澶州，与王殷所领禁军会合后继续南下。十七日，入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义成节度使宋延渥开城投降。郭威取滑州仓库财物赏赐将士。监军王峻向将士宣布：奉郭威指示，俟平定京城，允许你们剽掠十天^②，借以鼓舞士气。十九日，郭威到达封丘（今属河南），开封城内一片慌乱，汉隐帝派左神武统军袁龜、前威胜节度使刘重进率禁军与侯益会合于赤冈（今河南开封东北12里），慕容彦超所领大军屯七里店（今河南开封北20里），与郭威军队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北刘子陂对峙。后汉统军将领不能严阵以待，盲目骄傲自大。慕容彦超大言不惭地说，陛下宫中无事，请明日出城，看臣破贼^③。枢密承旨聂文进说，有臣在，肯定不会失败，纵有一百个郭威，我也要一一活捉归案^④。二十一日，慕容彦超等簇拥汉隐帝出城。慕容彦超引骑军主动出击，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纪》。

②③④ 《资治通鉴》卷二八九，汉隐帝乾祐三年。

郭威命部将何福进、王彦超、李筠领骑兵应战^①。慕容彦超马倒，几乎被擒，死亡百余人，“于是诸军夺气，稍稍降于北军”^②。慕容彦超率十余骑逃还兗州（今属山东）。侯益、吴虔裕、张彦超、袁峩、刘重进等将领暗中投降郭威。二十二日晨，汉隐帝逃至汴州城外，被乱兵杀死，苏逢吉、阎晋卿、郭允明等自杀。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威进入京师城内。次日，严禁兵将大肆剽掠，违令者斩，及时稳定了大梁的社会秩序。这时，河东节度使刘崇、忠武节度使刘信、武宁节度使刘蕡（都是刘知远之弟或从子），拥有重兵，占据太原（今山西太原南）、许州（今河南许昌）、徐州（今属江苏）等军事重地，倘他们联合起来，对郭威十分不利，所以郭威尚不敢贸然称帝。二十四日，后汉李太后根据郭威、王峻的奏请，决定由刘蕡即帝位。郭威与同党王峻、郭崇威（后改名为郭崇）分别担任枢密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全部操纵了朝中军国大权。

十一月底，河北诸州相继奏报契丹军入犯，李太后命郭威出征。十二月一日，郭威自大梁出发，十九日抵达澶州。次日晨，前曹州防御使何福进领兵数千人哗变，将撕裂的黄旗披在郭威身上，高呼万岁，共同拥立郭威为帝。郭威再次领兵南下。这时，枢密使王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赶赴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许州，囚杀刘蕡、刘信。广顺元年（951年）正月五日，郭威进入开封城内，称帝建国，史称后周，最后结束了后汉朝廷的统治。

三、郭威的初步改革

郭威，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西）人，年幼迁居太原。后梁龙德二年（922年），晋昭义留后李继韬叛晋王降梁，郭威应募

① 此处从《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纪》，但《资治通鉴》卷二八九称，“郭崇威与前博州刺史李荣”领骑兵拒慕容彦超。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八九，汉隐帝乾祐三年。

当牙兵。唐庄宗灭亡后梁，杀李继韬，将郭威编入禁军。郭威经过后唐、晋、汉三朝二十余年的风雨沧桑才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出身贫寒，长期寄人篱下，读过一些书，了解民间疾苦，又熟知晋、汉王朝的种种弊政，建立后周以后，决心实行改革，使国家富强。

五代时期，封建军阀当权，专权跋扈，轻视有文化知识的士大夫。郭威却与众不同，善于发现人才，重视人才，特别注意选拔富有统治才能的人充当要职。后周建国前，郭威在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幕府任职，得知郑仁诲在太原闲居，就亲自登门请教，召为属官。魏仁浦家境孤贫，曾在后晋枢密院当小吏。郭威一见如故，认为天下事不再有任何忧虑，特提拔他担任兵房主事。郭威称帝后乃重用郑、魏为宰相兼枢密使。出身进士的王溥、范质、李谷在后周郭威当政时出任宰相、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判三司，分别掌管政治、军事机密和经济大权。武将中，郭崇威、韩令坤、李重进、向训这些后起之辈也特别受到重用。这些人为郭威夺取政权与治理国家起到重要作用。

郭威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还广泛求言纳谏。广顺元年（951年）正月诏，今承晋、汉弊政之后，许多人心有余悸，不敢讲话，致使上下之间信息断绝。现在要广泛求言纳谏，“应在朝文武百寮，凡有所见益国利民之事，并可实封而奏”，“纵使指朕之非，攻朕之短，自当改过不吝，岂但从谏如流”^①。宰相李谷先后提出改革征收牛皮税、罢除严重害民的官办营田，都得到郭威的采纳。

对于违法乱纪的各级政府官员，一经查出，郭威概不迁就，从严处理。莱州刺史叶仁鲁、供奉官武怀赞、唐州方城县令陈守愚等因贪污被处死，庆州刺史郭彦钦擅加盐价被免官。广顺三年（953年），卫尉少卿李温美奉命祭祀大海，顺便路回家一趟，被贬为房州司户参军。内衣库使齐藏珍治理黄河，工作不力，河流缺口，被发配到海岛。周太祖郭威大胆整顿吏治，严惩违法乱纪之

^① 《册府元龟》卷一〇三，《帝王部·招谏》，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同）。

徒，这在五代皇帝中是不多见的。

郭威关心广大百姓疾苦，采取多种措施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减轻赋税，促进生产发展。官办屯田营田本来是军队开展屯垦、筹集军粮的有效手段。但自唐朝末年以来，官府多将屯田交归地主豪强经营，地主豪强又转租给农民耕种，从中渔利，而中央仅由户部设置机构统领。广顺三年（953年），郭威接受臣僚们的建议，决定全部撤销“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同现）佃者为永业”^①。原来租种营田的佃户从此变为小自耕农，当年国家增加三万余编户。老百姓分得土地，修房屋，种林木，生产效益大大提高。有人曾提出将官府营田出卖，可得钱数十万缗。郭威回答说：利归百姓所有，如同在国库一样，我要这些钱干什么呢^②？

朱温在唐朝末年进攻淮南，将所掠夺的大批耕牛分配给诸州农民，每年收取牛租。此后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郭威因百姓负担繁重，全部免除牛租。

五代诸朝，继续沿用唐后期两税制度。各级政府官员往往巧立名目，税上加税，贪污中饱，将多收财物一部分上交中央，名曰“羨余”。郭威指示各地原来所进羨余财货，一切停罢。各地历年进贡土特产品也基本上被禁绝。

五代盐鞠专卖，对违法者惩罚极为严厉。后晋天福七年（942年）规定，凡贩运销售食盐，过税每斤7文，住税每斤10文，每户还征钱200至1000文。后汉更规定不论私贩盐多少，处以极刑。广顺元年（951年），后周太祖郭威指示改变盐法，凡犯法经营盐5斤以上者处死。犯法煎咸盐1斤以上者处死，比后汉略有放宽。另外对青白盐征税也有减少。

五代因战争频繁，需要大量牛皮制造兵革甲胄。后周以前各朝禁止百姓私自出卖牛皮，全部上交官府。后汉对犯法私卖牛皮1寸者处以死刑。后周规定自广顺二年（952年）起，全国征取牛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周太祖广顺三年。

皮按原先所征数三分减二，其中一分按田亩征收，每 10 顷田征收牛皮 1 张，其余牛皮听民间自用或买卖。这样改变，减轻了百姓的不少负担。

周太祖称帝 3 年，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一些改革措施，逐步消除了晋、汉以来中原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群众赋税负担有所减轻，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国家实力略有增强，为周世宗全面推行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后周反击北汉南犯之战

一、北汉的建立及其南犯准备

河东地区在五代各国政权更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庄宗以河东为根基之地，终于灭亡后梁而称帝中原。石敬瑭、刘知远先后担任河东节度使，依靠河东人力物力，相继进入中原，分别建立起后晋、后汉王朝。刘知远称帝南下，又授命其从弟刘崇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守卫河东基地。

郭威平息关西三叛之乱，在后汉朝廷中享有很高威望，刘崇对此忧虑不安。河东节度判官郑珙劝刘崇说：汉朝即将大乱，公为宗室大臣，应早作准备，免得今后为他人所制服^①。乾祐元年（948 年）八月，刘崇以防备契丹为名，奏请召募 4 个指挥使的军队，并修缮兵甲，充实府库，屯积财赋，加紧准备割据。

郭威在澶州发起兵变，领大军进入汴州，迫使汉朝李太后立刘崇儿子刘赟为帝。很多人看出郭威这是故意设计圈套，但刘崇高兴说，我儿当皇帝，有何担心！河东使者来到大梁，郭威当面指着自己年少时在颈上刺的飞雀说，自古以来那有雕青天子，希

① 《新五代史》卷七十，《刘晏传》。

望刘公（指刘崇）不要猜疑^①。刘崇信以为真。太原少尹李骧劝刘崇及早发兵出太行山，占据孟津（今河南孟县南，黄河渡口），迫使郭威不敢擅自行动，俟刘赟称帝后再回兵太原^②。刘崇认为这是故意挑拨离间，竟杀死李骧。

广顺元年正月十六日，郭威称帝后立即杀刘赟于宋州。同一天，刘崇在太原即帝位，仍以后汉为正统，沿用乾祐年号，史称北汉，仅有并（今山西太原南）、汾（今山西汾阳）、忻（今属山西）、代（今山西代县）、岚（今山西岚县北）、宪（今山西静乐县南）、隆（今山西太原南）、蔚（今山西灵丘）、沁（今山西沁源）、辽（今山西左权）、麟（今山西府谷西南）、石（今山西离石）等12州之地。比后唐河东道占地还少。刘崇为报仇复国，把主要希望寄托于契丹出兵。

北汉刚建立，刘崇儿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刘承钧致书辽国，表示要效法石敬瑭，同契丹结为父子之国。刘崇自称侄皇帝，请求辽国出兵援助。从广顺元年二月起，北汉刘崇先后派遣通事舍人李晡、宰相郑拱、翰林学士卫融、枢密直学士王得中赴辽国，或送重金行贿，或报谢辽国册立北汉皇帝，或庆贺辽朝皇帝即位，但最主要的使命还是请辽国赶快出军南下。九月，辽世宗耶律阮不顾诸酋长的反对，发动辽军南犯，导致契丹内乱，世宗被杀。辽穆宗耶律璟即位后，继续推行其父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南犯政策，决定出大军配合刘崇作战。

北汉刘崇经过在河东地区长期的苦心经营，积累了相当的军事力量，又有契丹的大力支援，就迫不及待地发起对后周大规模的进击。

二、后周反击北汉的准备和作战方略

后周文学之士王朴在周世宗时上《平边策》说：“唯并（指北

①② 《新五代史》卷七十，《刘旻传》。

汉)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①这句简短的话高度概括了后周一朝处理与北汉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作战方略。郭威代汉建周，与刘崇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双方毫无和解的可能。他面对刘崇磨刀霍霍，已早作防范准备，一方面稳定国内的形势，调整与邻国的关系；一方面做好军事上的反击部署。

后周建国初，后汉在河南的宗室有忠武节度使刘信（刘知远弟）、武宁节度使刘赟（刘崇子）、开封尹刘勋（刘知远子）、兗州节度使慕容彦超（刘知远同母弟）。前已指出，郭威先立刘赟为帝，给刘崇很大的错觉。接着又杀死刘赟，迫使刘信自杀，派兵屯驻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监视慕容彦超。广顺二年（952年）五月郭威又亲征兗州（今属山东），获得大胜。刘勋长期重病，已无所作为。后周这一系列的紧急军事行动，将后汉在河南宗室亲信基本上一网打尽，余者也被置于后周军队严密监视之下，从而消除了后汉留下来的隐患，刘崇寄托于河南刘氏宗室们的共同军事行动已彻底破产。

河北重镇魏州在镇抚河北、控制契丹方面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郭威刚建国，就派遣佐命功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统领禁军的侍卫司也随同迁至魏州。黄河以北的军队由王殷统一指挥。后周将大批军队部署在魏州，监视契丹自河北南下，有利于后周从容不迫地在晋东南地区与北汉作战。

在邻国关系方面，后周注意改善与辽国、南唐的关系。周太祖对南唐采用睦邻政策，争取与南唐保持边境上的暂时安宁。广顺元年（951年），后周朝廷指示沿淮河诸军镇各自把守边疆，不得擅自派兵进入南唐境内，允许南唐商旅来往通商，同意淮南饥民进入后周地区购买粮食。后周对于北部边境劲敌契丹，也不断派出使者安抚拉拢，甚至一次送上10万缗钱，企图阻止契丹与北汉的军事联合。由于北汉向契丹屈膝投靠，后周对阻止北汉与契

^①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王朴传》。

丹的军事联合没有收到成效，但契丹也不敢轻易在河北地区挑起大战。

后周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再加上郭威的初步改革，除北汉刘崇和兗州慕容彦超外，中原地区频繁出现的藩镇动乱已基本消除，国内形势稳定，军事、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换言之，后周已作好反击北汉南犯的充分准备。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后周抗击北汉南犯的作战方略，根据后来战争的整个进程，大致可归纳为三点：

（一）由枢密使或皇帝亲自领兵出征。北汉与契丹军队联合南下，兵力几万人，来势凶猛。晋州之战，后周太祖以枢密使王峻为统帅，“诏诸军并取峻节度，许峻以便宜从事，军行资用，仰给于官，随行将吏，得自选择。”^① 高平之战，周世宗力排众议，御驾亲征，并亲临作战前线指挥，这对保证作战取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坚决守住晋州（今山西临汾）、潞州（今山西长治）等战略要地。位于河东道南部的晋州、潞州历来是自太原南下河南的重要通道，也是后周用来保卫河南的重要屏障。后周及时派重军守住晋州、潞州，阻击北汉军队入犯，不仅使中原地区免遭破坏，后周安全也得到有力的保障。

（三）牵制北汉的军事力量。后周派中央禁军屯驻河北魏州，主要目的是防御契丹，但同时也加强了太行山东侧一些重要关口的把守，如派遣军将陈思让为磁州团练使，专门控扼磁州（今河北磁县）通向辽州的黄泽关（今山西左权县东南太行山上），以牵制北汉的军事力量。

总之，后周反击北汉的作战方略，就是在加强河北地区的军事防御、牵制和分散敌方兵力的同时，用强大的兵力在河东南部与北汉决战，保卫国家安全。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三〇，《王峻传》。

三、晋州之战

晋州位于太原南面。汾水自北往南穿越晋州城傍，构成一道天然屏障。这里东连潞州，西面和南面离黄河不远。自晋州南下，河南军事要塞潼关（今陕西潼关县东北）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都首当其冲。刘知远大军南下，就是选择晋州、绛州（今山西新绛）进军大梁。刘崇仍沿袭这条南下路线，首先攻打后周占领的晋州城。

广顺元年（951年）正月二十五日，北汉帝刘崇以刘承钧为招讨使，与副招讨使白从晖、都监李存瓌将步骑兵万人往晋州进发。二月六日，北汉兵分5路齐攻晋州，节度使王晏闭城不出。北汉军以为王晏胆小怕事，不敢应战，遂竞相登城。王晏立即指挥伏兵出击，北汉军死伤千余人。刘承钧遣副兵马使安元宝焚烧晋州西城，元宝向后周投降。刘承钧乃移军攻打隰州（今山西隰县）。十一日，后周隰州刺史许迁命步军都指挥使孙继业迎击北汉兵于长寿村。北汉兵随即攻隰州城，数日不克，死伤很多，被迫撤回太原。

九月，北汉军将李瓌（一称李存瓌）率马步军各5都、乡兵10都，自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南）侵入窑子店。后周潞州巡检使陈思让与都监向训、张仁谦等在潞州铜鞮县（今山西沁县东南）虒亭与北汉军交战，杀北汉兵300余人，生俘100人，活捉北汉偏将王璠、曹海金等^①。尽管北汉南犯连连失利，但仍不断遣使者北赴辽国求援。十月，辽国派彰国节度使萧禹厥将奚、契丹军5万人会同北汉兵进攻晋州。北汉刘崇亲自率军2万人自阴地关（今山西霍县西北）向晋州进发，十月十八日，在晋州城北三

^① 此据《宋史》卷二六一，《陈思让传》。《资治通鉴》卷二九〇，将虒亭之战载入周太祖广顺元年十月，且过于简略。

处置寨，昼夜进攻，还抽调部分军队骚扰绛州、潞州。

这时，后周新任命的晋州节度使王彦超尚未到职，由巡检使王万敢临时负责晋州军政事务。王万敢率当地州兵配合后周禁军将领史彦超、何徽一起抗击北汉与契丹军。十一月六日，周太祖命王峻为行营都部署，统兵救援晋州，并授权王峻统一指挥在晋州前线的后周军队。七日，王峻自大梁出发，到达陕州后停留旬日未再前进^①。后周太祖担心晋州丢失，拟亲自出征，与王峻一起解除晋州之围，并将此谋划派使者告诉王峻。十二月一日，后周太祖下诏，决定三日西征。后周使者抵陕州，王峻嘱使者速告太祖：“晋州城坚，未易可拔，刘崇兵锋方锐，不可力争。所以驻兵，待其气衰耳，非臣怯也。”^②倘陛下轻易离开京师，则慕容彦超乘虚进入大梁，大事去矣。后周太祖接受王峻的劝告，立即停止亲征。战争的进程果不出王峻所料，被围困在晋州城内的后周龙捷都指挥使史彦超、虎捷指挥使何徽、知州王万敢依托晋州城的防御工事，顽强防守，北汉军和契丹骁骑一筹莫展，伤亡严重。时值隆冬，大雪纷飞，老百姓多聚保山寨，北汉与契丹军抢不到粮草，刍粮缺乏。当王峻军前锋于十二月十八日顺利通过晋州南面险要之地蒙阬时，北汉、契丹军当夜慌忙逃走。王峻进入晋州城内，对众将请求急追北汉与契丹军，一时犹豫不决。次日，王峻派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都排陈使药元福、左厢排阵使陈思让、康延沼等率骑兵追赶，追至霍邑（今山西霍县），纵兵奋击，北汉兵落入崖谷死伤甚多。霍邑道路狭窄，周将康延沼不敢急追，北汉兵逃走。周将药元福说：北汉与契丹军“今气衰力惫，狼狈而遁，不乘此剪扑，必为后患”^③，但后周诸将不想继续追击，王峻派使者指示停止前进，周军遂还。契丹军回到太原，丧失马匹十之三四，统兵大将萧禹厥大败之后，恼羞成怒，将契丹一位酋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〇称“王峻留陕州旬日”，但《旧五代史》卷一三〇，《王峻传》谓“峻至陕驻留数夕”，两者略有差别。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九〇，周太祖广顺元年。

长钉于太原市中，十多天后被斩死。北汉土瘠民贫，又加上战争的大量耗费，弄得“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①。北汉刘崇被迫暂时停止进犯后周。

四、高平之战

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十七日，后周太祖病卒，养子柴荣即位，史称周世宗。北汉刘崇认为这是南下作战的有利时机，立即请求契丹再次出兵。二月，刘崇将兵3万，以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会同辽国政事令杨衮将兵六七万人^②，自团柏谷南趋潞州。刘崇鉴于先前南下两次攻打晋州失利，重新制定了行军路线和作战部署。这次自太原出发，拟自潞州、泽州过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进入河南，直逼大梁。这条路线沿途山路狭窄，但路程较近，而且北汉军不准备攻打晋东南军事重镇潞州，以减少途中的行军时间和人员伤亡，以便实现早日灭亡后周、重建后汉的梦想。

北汉军屯于团柏谷南面的梁侯驿。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派军将穆令均率步骑2000迎战，自己领大军停于太平驿准备声援。北汉大将张元徽与穆令均战，伪装作战失利，穆令均跟踪追击。北汉伏兵发，杀穆令均，俘杀后周士卒1000人。李筠逃归潞州城内，闭城防守。

周世宗得知北汉军入犯，急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臣僚们都说：刘崇在晋州失败后，元气大伤，一时难以恢复。今佯称亲自领大军南下，故意迷惑我们。陛下初即位，人心未定，不宜轻易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〇，周太祖广顺元年。

② 《新五代史》卷七十，《刘旻传》称，杨衮“将铁马万骑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以助旻”，故此处称“六七万人”。但《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称，“杨衮将万余骑”。

离开京师，应命大将出征^①。周世宗不顾几朝元老冯道和满朝文武大臣的反对，断定北汉刘崇肯定会利用周太祖大丧而自己刚刚称帝之际，大举南犯。他说：“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当自将击之”^②，遂决定亲自领兵抗击北汉与契丹军的入犯。

三月初，北汉乘梁侯驿之胜进逼潞州。三日，周世宗命令后周军队分三路出发，以天雄节度使符彦卿、镇宁节度使郭崇威领兵自磁州固镇（今河北武安县境内）出北汉军后；河中节度使王彦超、保义节度使韩通自晋州东出，邀击北汉军左侧；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等先赴泽州，尔后大军北上，正面迎击。

三月十一日，周世宗从大梁出发。十六日抵达怀州（今河南沁阳），十八日宿营于泽州东北。北汉刘崇不知周世宗前来，途经潞州而未进攻，引兵南下，当天夜晚军于高平（今属山西）之南。十九日，后周军前锋与北汉军在高平南面相遇，北汉军稍退。周世宗防止北汉军逃走，命诸军急进。刘崇以中军列阵于巴公原（今山西晋城北35里），前锋都指挥使张元徽列阵东面，契丹将杨衮军其西。后周河阳节度使刘词率后军这时尚未赶到，众心危惧，世宗却坚定果断，命白重赞、李重进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统精骑列阵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将禁兵扈驾。世宗亲自临阵指挥。刘崇见后周军人少，后悔不该请契丹出兵。契丹将领劝刘崇不要冒进，刘崇拒不采纳，反而要契丹军将在旁观战，并立即指挥东线张元徽出兵攻击后周右军。双方交战不久，后周马军将领樊爱能、步军将领何徽引数千骑兵溃逃，步兵千余人投降北汉。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周世宗镇定自若，临危不惧，亲自领亲兵督战。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与偏将赵匡胤各领2000骑兵，冲锋陷阵，敌军望风披靡。内殿直马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周太祖显德元年。

② 《新五代史》卷五四，《冯道传》。

仁瑀跃马引弓，连毙数十人。殿前军将马全义也引数百骑冲入敌阵。北汉刘崇这时得知周世宗临阵督战，指使骁将张元徽抓紧时机乘胜进兵。但张元徽旋即被后周军所杀，北汉军士气顿时低落。后周兵士越战越勇，争相杀敌，大败北汉军。北汉刘崇举旗指挥北汉兵休战，也无法停止后周军的冲杀。契丹大将杨袞害怕后周军强大而不敢援救刘崇，全军退走。

十九日傍晚，北汉刘崇领余众万余人利用一条河涧设防布阵。这时，后周河阳节度使刘词将后军赶到，立即与诸军一起追击，又败北汉兵，杀其大将张晖及枢密使王延嗣。北汉军队丢尸弃甲遍野。初夜，后周军至高平，降北汉军数千人，缴获辎重、驼马、兵器等不可胜计。

高平之战时间很短，规模不大，但它是后周、北汉两国兴衰存亡以及全国统一的重大转折。北汉自这次大败后，国势日弱，一蹶不振，长期盘踞在太原及其周围一隅之地，再无力挑起对后周的大规模战争。与此相反，周世宗在高平战后，威望大增，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抓紧进行改革，国力日强，全国的统一事业不断得到发展。

后周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主要靠周世宗的正确决策。周世宗指挥这次作战，出敌不意，用兵神速，临阵镇定，遇危不惧，英勇善战，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战争开始，世宗就力排众议，指出刘崇利用周太祖病故之际，必将亲自领大军南下，从而作出御驾亲征的决策，使刘崇措手不及。世宗从大梁出发，连续急行军8天，打乱了北汉军急于挺进河南的作战部署。交战之后，后周侍卫亲军将领临阵溃逃，周世宗随即指挥殿前军冲锋陷阵，立刻转败为胜。《旧五代史》卷一一四载：“是日危急之势，顷刻莫保，赖帝英武果敢，亲临寇敌，不然则社稷几若缀旒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北汉刘崇高平作战失败，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刘崇这次南

下的战略意图是不攻打潞州、泽州，直接挺进河南^①，妄图一举灭亡后周。然而双方军队突然在高平相遇交战，北汉军在此前临泽州，后近潞州，这两处都有后周军队把守，实际上处于被后周军前后夹击的境地。所以刘崇一旦在高平战败，难有后续军队支援，几乎全军覆没。倘后周泽州刺史李崇彦能守住泽州北面阵地，则刘崇归路断绝，很可能成为后周的俘虏。其次，刘崇南下主要依靠契丹军队的援助。然而刘崇在高平见后周军人数不多，又忽视契丹的军事力量，以致让契丹军在旁观战。北汉孤军奋战，严重削弱了作战能力。

自古以来，两军交战，骄者败，勇者胜，在高平之战中充分得到证实。

五、围攻太原

刘崇自高平之战失败后，隐姓埋名，领亲骑数十人经沁州逃回太原；接着收集溃散兵卒，修缮兵甲器仗，完备太原城堑的防务工程，加强对后周的防御。契丹大将杨衮领军北屯代州，准备充作北汉的军事后盾。北汉刘崇再次派使者王得中赴辽国乞求出兵，辽穆宗答应发兵援救太原。

周世宗三月二十三日由高平抵达潞州，一方面诛杀樊爱能等败军之将，一方面奖赏高平作战有功将领李重进等数十人，鼓舞士气，并积极策划围攻太原。

① 关于刘崇此次南下的战略目标，旧史无明确记载。据《旧五代史》卷一四《周世宗纪》载，当周世宗与群臣商议抗击刘崇南犯的对策时说：“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资治通鉴》卷二九一也称刘崇“有吞天下之心。”可见刘崇南下是抱有灭亡后周的野心。其次，北汉军队南下路过潞州时，且引兵而南，这大概是刘崇利用后周“大丧”、新帝刚立之机，急于进军河南。据此两点，刘崇的战略目标当是挺进河南，争取早日灭亡后周。

显德元年（954年）三月二十八日，周世宗命令分兵二路进攻太原，以天雄节度使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镇宁节度使郭崇威为副都部署，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军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率步骑2万人从潞州北上；同时命河中节度使王彦超、保义节度使韩通自阴地关北上，先攻占太原东、南面一些州郡，再会合符彦卿军分头围攻太原。周世宗带领河阳节度使刘词、鄜州节度使白重赞等暂停潞州，密切注视着战争态势的发展。

四月，后周符彦卿率军队到达太原城下。王彦超攻汾州，北汉汾州防御使董希颜降。后周大将康延沼攻辽州不下，继而后周使者单骑赴辽州劝说，北汉辽州刺史张汉超降。周世宗派符彦卿自潞州北上时，鉴于太原远离大梁，交通又不便，军需刍粮供应困难，一时未议攻击，“且令观兵城下，徐图进取”^①。当后周军队进入北汉境内时，各地百姓纷纷送上食物表示欢迎，哭诉北汉刘氏赋役苛重，愿意向后周军供应军需物资，助攻太原。周世宗得知后，萌发了一举灭亡北汉的打算；符彦卿、王彦超军事行动的顺利进展，也增强了周世宗攻打太原的决心。世宗派使者与诸将商议。众将领认为军粮、饲料不足，请求班师，等待时机再行征讨。世宗不同意。但后周大批军队、民佚齐集太原城下，纪律败坏，剽掠骚扰，北汉民众大失所望，依山结寨，坚壁清野。世宗急忙驰诏严禁兵士剽掠，安抚农民，只准征收当年租税，还募民纳粟赐以官职。同时命三司使李谷到太原附近地区筹集军粮，征调泽、潞、晋、绛、慈（今山西吉县）、隰以及靠近太行山东侧的河北诸州民夫运粮馈军。

四月十八日，符彦卿奏报北汉宪州、岚州归降。十九日，王彦超攻克石州，俘北汉石州刺史安彦进。二十日，北汉沁州刺史李廷诲举城归降。二十七日，周世宗鉴于后周军队连夺北汉数州，决定自潞州出发，赴太原亲征刘崇。三十日，北汉忻州监军杀死

① 《宋史》卷二五一，《符彦卿传》。

刺史赵梲及契丹大将杨麟姑而降于后周，被授为忻州刺史。

五月三日，周世宗领大军抵太原城下。后周军队在太原城外40里布防，士气高涨，给北汉刘崇与屯军代州的契丹大将杨衮很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杨衮与北汉代州刺史郑处谦发生了严重裂痕，杨衮派几十名契丹兵士把守代州城门，阻止郑处谦与后周方面的联系。郑处谦尽杀契丹守城门的兵卒，关闭城门阻止杨衮进入城内，迫使杨衮逃归辽国。郑处谦以代州城降附后周。

后周自三月底到五月初，一方面将大军部署在太原城外，不断向城内发起进攻；一方面攻占其他州县，或迫使北汉军将投降，占领汾、辽、宪、岚、石、沁、忻、代等8州，占北汉全境12州的2/3，围攻太原的战斗态势非常有利。但是，后周军队接着在忻州一带作战失利，又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周世宗鉴于契丹数千骑屯驻忻州、代州之间为北汉之援，决定出大军主动迎击。五月七日，世宗派符彦卿、郭从义、向训、白重赞、史彦超等大将率步骑万余进入忻州，契丹军退保忻口（今山西忻县南）。二十日，世宗根据符彦卿的要求，又增调李筠、张永德领兵3000人驰援忻州。五月二十三日，符彦卿与诸将列阵忻州城外待敌。史彦超将20骑为前锋，与契丹军交战，李筠引兵追上，杀契丹兵2000人。但史彦超“恃勇轻进，去大军浸远，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①。李筠仅以身免，后周军死伤甚多。符彦卿被迫退保忻州，接着领兵回到太原城外。与此同时，后周军队久攻太原不克，又遇上大雨滂沱，军士劳累不堪。世宗于六月一日诏令班师，指使匡国节度使药元福负责后军，北汉出兵追击，药元福将其击退。但后周军队仓促撤走，“刍粮数十万在城下，悉焚弃之。军中讹言相惊，或相剽掠，军须失亡不可胜计”^②。所得北汉州县相继失守。六月二十八日，周世宗回到大梁。

高平之战是后周、北汉双方在山岭野外的遭遇战，攻打太原属于攻城作战，两者有很大区别。周世宗虽在高平作战叱咤风云，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周太祖显德元年。

取得大胜，但在古代使用冷兵器作战的条件下，后周军进攻经过多年设防、城墙坚固的太原城，比起高平之战困难得多。周世宗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尚不大了解攻城作战的特点，缺乏周密的计划，军需运输困难，诸将领思想认识也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攻城是难以奏效的。其次，后周军纪律败坏，遭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抗击，也是久攻太原不下的重要原因。幸而周世宗见机行事，及早撤退，才免遭更大的失败。

第三节 周世宗谋求统一全国

一、后周“先南后北、再由北往南”战略的制定

周世宗对全国群雄割据，国家分裂，深为不满。当高平之战取胜后，世宗“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①，所以趁热打铁，立即进军太原，企图一举灭亡北汉，为谋求国家统一打下坚实的基础。太原作战受阻后，世宗又感到彷徨。他对朝中宰相说：自后唐、后晋以来，国家分裂，长期得不到统一，我日夜思考怎样治理，一直得不到要领，寝食不安^②。显德二年（955年）四月，世宗特召集文学之士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一篇，为他出谋划策。许多文士都主张修文德以招怀各国；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比部郎中王朴却要求用兵征服。

当时，全国分裂为后周、辽国、北汉、后蜀、荆南、南唐、吴越、南汉等国。闽、楚两国虽被南唐灭亡，但不久又为当地封建军阀所占据。后周实际上处在辽、北汉、后蜀、南唐等国的包围之中。这些国家实力有强弱，距离中原远近不一，与后周的关系也不完全相同。周世宗绝不可能用十个手指同时打人。所以比部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周世宗显德二年。

郎中王朴献《开边策》说：“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指河东北汉政权）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① 这就是王朴主张统一全国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作战方略。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周世宗用兵诸国皆如王朴之言，高度评价了王朴这篇策文的作用，其实有很大误解。

北汉与辽国相联络，先后发动晋州之战、高平之战，还不断深入河北地区进行骚扰。这对后周是很大的威胁，也是周世宗统一全国的最大障碍。王朴策文提出先南后北，俟南方作战取胜后再挥师北上，确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这大概是周世宗十分器重王朴这篇策文的重要原因。

经过后周太祖、世宗的一系列改革，后周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南方邻国后蜀、南唐。然后蜀远离中原，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远征作战困难很多。后唐曾两次出讨蜀国，一次得而复失，一次半途而废，前车之鉴，无疑对周世宗谋划统一全国的事业会产生很大影响。南唐是南方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占地三十余州，经济发达，人口较多，具有抗击后周进犯的相当实力。这两个国家建国几十年，封建统治盘根错节，后周要一举灭亡后蜀、南唐两国，也决非轻而易举的事。在此之前，南唐费了很大力气灭亡闽国、楚国后，派重兵戍守，但不久这两国军将起兵闹事，赶走南唐驻军。周世宗要灭亡以至长期占领南方诸国，必然会经历长时间的艰巨作战，要派兵屯驻各国境内，稍一不慎，还会发生南方诸国旧军阀重新复辟的危险。因而王朴提出先全部讨平南方诸国再进军北方，统一全国，很可能成为泡影，甚至给后周生存带来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周世宗显德二年。

严重威胁。周世宗全面分析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吸取王朴策文的部分合理因素，分清主次，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统一全国的用兵方略。后周出兵后蜀，只收复原先为后唐、后晋所占有的秦（今甘肃秦安西北）、成（今甘肃西和县西北）、阶（今甘肃武都县东）、凤（今陕西凤县东北）4州，决不越过剑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攻打成都（今属四川）。后周出兵南唐，一再声明只占领江北14州，两国以长江为界，希望南唐帝李璟照旧统治长江以南各州县。周世宗更未乘胜出兵荆南、吴越、南汉等国，而是与这些国家继续友好交往。周世宗作这样的军事部署，既教训了后蜀、南唐统治者，迫使他们对后周边境不敢轻举妄动，借以保持后周关中与淮河以北地区的安宁；又从经济富庶的江北14州取得大量人力物力补充后周的军事力量，保证有足够的实力讨伐北面劲敌辽国、北汉，收复河北失地，灭亡北汉。周世宗再领兵南下，灭亡南方诸国，自然是水到渠成，比较容易。由此可见，周世宗统一全国的战略决策是先南后北，再由北往南，稳妥慎重，积极可靠。这与王朴策文的作战方略既有部分相同之处，但又有重大区别。

二、大力推行改革，加强战争准备

战争是敌我双方力量的竞赛。周世宗为了贯彻实施“先南后北、再由北往南”的作战方针，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改革。

（一）选能淘劣，刷新朝政

周世宗在政治上大力选拔贤能，将一些确有治国经邦、统兵作战的人士输送到国家重要的领导岗位，同时坚决惩办、淘汰一批徇私枉法的政府官员，不断刷新朝政。

王朴曾在后汉当校书郎，见后汉即将大乱，主动离职。广顺元年（951年），柴荣为澶州节度使，挑选王朴任掌书记，柴荣称帝后（即后周世宗）又迁王朴为比部郎中。王朴献《平边策》以

后，世宗更欣赏其才能，决意重用，很快提拔他为户部侍郎、枢密使。周世宗三征淮南，两次以王朴留守东京，全权处理朝廷的一切事务。王朴在后汉怀才不遇，愤然离开，而在后周却大显身手，短短几年从校书郎升至枢密使，关键是周世宗善于发现人才，敢于重用人才。北宋欧阳修说：“王朴之材，诚可谓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时，外事征伐，攻取战胜；内修制度，议刑法，定律历，讲求礼乐之遗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岂皆愚怯于晋、汉，而材智于周哉？惟知所用尔”^①。这将后周的统一强盛归结于周世宗选贤任能，的确表现出封建史学家敏锐的政治眼光。

当然，周世宗时期并非王朴一支独秀，还有魏仁浦、王溥、范质、李谷、向训、曹翰、赵匡胤等文臣武将。如刀笔吏出身的魏仁浦，周太祖曾提拔他为枢密承旨，周世宗又提拔他任枢密使、宰相。当时有人说魏仁浦未经科举，不宜当宰相。周世宗回答说，自古任用文武才略的人士为辅佐大臣，难道都通过科举吗？当过郡小吏的曹翰，在乡里名声不佳。周世宗先在澶州署他为小校。后出征高平，曹翰参与谋划，立有战功，寻迁枢密承旨，后来成为宋朝的开国功臣。周世宗选拔人才，着重强调个人的文武才略，即使是布衣平民，或级别低下的官府胥吏，也能越次擢用，身居重位。

周世宗鉴于唐五代以来科举制度弊病很多，决定加以整顿，亲自对新及第进士进行复试。经过复试，显德二年（955年）新及第进士16人，淘汰12人；显德五年（958年）新及第进士15人，落选7人。世宗根据礼部侍郎窦仪的奏请，废除明经、童子二科。显德四年（957年）又批准加置制举，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治、达于教化三科。全国不论前资官、现任职官、布衣百姓，都可以参加应试。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后周选拔人才具有比较广泛的途径。

和后周太祖一样，世宗惩治贪赃枉法者极为严厉。左羽林大

① 《新五代史》卷三一赞文。

将军孟汉卿额外收税，楚州防御使张顺贪污税钱，均被赐死。世宗发现修建永福殿的工徒削木片为菜匙，用瓦片盛饭，当即命杀死负责监工的供奉官孙延希，御厨使董延勋、副使张皓等被免官。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父韩伦，在陈州（今河南淮阳）干预军政，贪污不法，韩令坤为其父陈请，周世宗毫不留情，流放韩伦于海岛。此外，有的节度使未奉朝命擅自入朝，有的官员私自跑回家中，有的官员奉使外出因私事耽误不能按时回朝，有的官员审判案件失实，有的官员举人不当，都一一受到处分。

周世宗一方面大力选拔人才，一方面整顿政府机构，两者相辅相成，扭转了五代以来朝政混乱的局面。周世宗重用一批有才能的人士充当宰相、枢密使、高级将领，对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并大大推动了各项改革的全面进行。

（二）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封建社会中，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最主要的部分。农村人口与农业生产的兴旺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军队的来源与军需物资的供应。所以五代有识之士恳切呼吁“国富兵强，家给人足”^①。周世宗也认为“国以民为本，本立则国家安”^②，把广大民众关心发展农业生产看作国家富强统一的重要前提。他刻木为耕夫、蚕妇，陈放在宫廷内，让自己和朝中官员时时见到他们的形象，不忘记奖励发展农业生产。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后周政府规定，自广顺元年（951年）以后，凡从契丹、北汉、南唐、后蜀各处归来或投降的军人、百姓，允许他们承佃无主荒闲土地，并充作永业。第二年又发布诏书，凡人户逃走，土地荒废，其他人答应承担向国家缴纳租税，可申请耕种荒地。倘逃户在三至五年内回到原籍，可从别人那里领回自己原有土地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对于从契丹统治区回到原籍的人们，五年内可从别人手中收回原有土地的三分之二，十年内收回一半，

① 《全唐文》卷八四三，《陈十事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同）。

② 《册府元龟》卷一五八，《帝王部·诫励三》。

条件更加优厚。后周政府大力招抚流亡，奖励人们从事耕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赋税的增加。

水利事业的好坏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极为密切。五代诸国地处黄河中下游，自后梁以降，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成灾，淹没大批土地房屋。后周以前的各朝政府有时筑堤堵口，收效甚微。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派宰相李谷到澶、郓、齐（今山东济南）等州督修黄河工程。各州征发民工6万人，从阳谷（今山东阳谷东北）抵张秋口修筑堤防。显德六年（959年），郑州原武县（今河南郑州东北）河堤溃口，又命宣徽南院使吴廷祚征发附近各县民夫堵塞决口。

后周政府为了减轻农民赋税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平均赋税的工作，按实有田亩征取赋税，收到了实效。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鉴于近朝征收谷帛，多不按时，往往提前征收，乃指示三司使通告诸州府，今后夏税六月一起征，秋税十月一起征，永远成为定制，减少了随时乱征赋税的弊端。

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整顿寺庙，针对各州寺院混入一些不法之徒以及修建寺院过多的情况，明确规定诸州只能保留朝廷许可的寺院，全国共2694所，僧尼6.12万人。由于一些僧尼还俗从事农耕，同时还废除寺庙免除赋税的特权，从而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和国家赋税收入。

周世宗实行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后周“仓库实，器用备”^①，为尔后南征北战能提供大批物资，保证战争顺利进行。

（三）整编禁军，加强国防

军队是执行国家任务的武装集团，需要广大将士具有武艺超群的过硬本领，还要求有健壮的体魄以及一定年龄条件的限制。因而军队成员要不断增加新生力量，减少不适宜在军队中服役的人员。但是，从唐后期到五代实行募兵制，全国禁兵、藩镇兵主要靠召募取得，不少人一旦取得军籍，便成为终身领取衣粮的职业

^①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王朴传》。

兵。各级军将为取得兵士们的支持，往往曲意顺从，很少在军队中进行认真的拣选淘汰。这样，五代军队中老弱混杂，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周世宗总结显德元年（954年）高平之战的经验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况百户农夫未能赡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升在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①后周决定扩充中央禁军，将藩镇军队中的精兵强卒选入禁军。同时召募全国各地勇士，即使是山林草泽的亡命之徒，也予以赦免，由各州府送到京师大梁，世宗亲自试阅，挑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编入禁军^②。又收编各国投降的军卒，如将北汉降卒数千人编为效顺军，后蜀降兵数千人编为怀恩军，南唐降卒分为6军，共30指挥，赐号怀德军。后周还清除军队中老弱病残者，将他们送回原籍。

后晋、后汉以侍卫司统领禁军，军权过于集中，容易引起动乱。广顺二年（952年），后周太祖在侍卫亲军之外，又建立殿前军，以李重进为殿前都指挥使。在高平之战危急时刻，侍卫亲军作战不力，由于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内殿直马仁瑀、殿前指挥使马全义等将领英勇奋战，终于转危为安，取得大胜。世宗接着命令赵匡胤“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因是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③。殿前军补充了大批强壮之士，队伍迅速扩大，与侍卫亲军相互并列，一起承担宿卫、外出征战的军事任务，使中央禁军发挥出更强大的军事威力。

五代承袭唐制，骄兵问题十分严重。这是多次造成作战失败与频繁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高平之战刚刚结束，世宗就打算严肃军事法纪，在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的支持下，将樊爱能、何徽等败将七十余人全部处斩。此后，后周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李继勋、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在淮南作战失利，周世宗予以贬官，调离淮南前线。世宗还一再下达命令，军队行军作战不准进入民居村舍，不

①② 《五代会要》卷一二，《京城诸军》。

③ 《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世宗纪》。

准践踏民田、伤害禾苗，违者按军法处置。军将赵晁、白延遇等人不听军令，在扬州贪贿钱财，劫人妻女，被后周淮南节度使向训处死。

周世宗为严明军纪，除惩罚失职的军将外，又重赏作战有功的将士。高平之战立功将校李重进、向训、张永德、赵匡胤等数十人都一一迁官。即使资历浅、但作战有功的兵士，也有人“自行间擢主军、厢者”^①，当上了军或厢的指挥使。崔彥进在后周建国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兵士，因参加出征淮南与北伐契丹之战有功，不到五六年间就提拔为散员都虞候、东西班指挥使。这样不拘一格而按军功大小提拔人才，调动了广大将士参战的积极性。

在国防建设方面，周世宗主要是加强对辽国、北汉的防御。河北深州（今河北深县西）、冀州（今河北冀县）一带，接近契丹辖界，辽国军队在后晋、后汉时经常越过胡卢河（漳河别名，在深州、冀州之间）南犯，破坏严重。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亲自看图定策，派忠武节度使王彥超、彰信节度使韩通领兵士、民夫疏浚胡卢河，设置静安军（位于今河北景县东北），留兵戍守。周世宗命德州刺史张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募兵千余人，在胡卢河一带随时打击契丹军。此外，在深州、冀州东面由名将郭崇出任成德节度使，坐镇镇州。在深州、冀州南面以骁将符彥卿任天雄节度使，镇守魏州。这样，后周在河北地区主要以静安军、镇州为防御契丹南犯的第一道防线，继以魏州声援，相互连成一片，不仅阻止了契丹军队南犯，而且有利于后周抽出大批兵力出征南唐。

显德三年（956年）三月，周世宗赐南唐帝李璟诏书说：后周“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万之甲兵，农战交修，士卒乐用……兵不告疲，民有余力”^②。这表明周世宗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措施，国家实力大大增强，为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作了大量的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周太祖显德元年。

② 《旧五代史》卷一一六，《周世宗纪》。

准备工作。

第四节 西征后蜀之战

一、后蜀统治衰微

孟知祥在后唐应顺元年（934年）称帝后蜀，半年后病故。临终前，后蜀宰相、枢密使、禁军将领赵季良、李仁罕、赵廷隐、王处回、张公铎、侯弘实等接受遗诏，辅佐孟知祥16岁的儿子孟昶称帝，史称蜀后主。

孟昶当皇帝三十多年，中原地区正经历唐、晋、辽、汉、周、赵宋六个朝代的更迭，战乱频仍，无暇西顾，这为后蜀偏安一方提供了机遇。孟昶执政初期，以前蜀亡国之君为鉴诫。他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在后蜀广政四年（941年）孟昶发布的一则诏书：“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汎之令长，抚养安绥。……宽猛所得，风俗可依，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① 这是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核心，告诫地方政府官员不要欺压百姓，建立一个富强安定的小康社会。但是，孟昶并没有坚持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反而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在政治上滑坡，用人不当，奢侈怠惰，官将腐败，厚敛百姓，导致后蜀统治日趋衰微。

后蜀李仁罕、张业、赵廷隐、王处回、张公铎等将相大臣，都是孟知祥的勋旧故友，很看不起年少登基的蜀后主孟昶。他们骄蹇蛮横，目无法纪，夺人良田，掘人坟墓，为所欲为。蜀后主利用禁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将李仁罕、张业处死，免除赵廷隐、王处回等军职，勒令退休。孟昶清除了一批顽固保守的元老重臣，但

^① 《十国春秋》卷四九，《后蜀·后主本纪》，中华书局版（下同）。

又凭个人的喜爱和私情重用一些人执掌大权。如僧徒出身的王昭远，曾在东宫侍候孟昶，甚得信任，崇华公主之子伊审征，年幼时与孟昶相互亲狎，这两人先后被孟昶任命为知枢密院事。朝廷事无大小，蜀后主全部授权他们处理。国库金帛财货听任王昭远任意取之，概不追问。《十国春秋》作者吴任臣评价孟昶用人失当，坐致败亡^①，是很有道理的。

后蜀建国初，中央禁军将领、枢密使多兼领重镇，如赵廷隐兼武德节度使（治梓州，今四川三台）、王处回兼武信节度使（治遂州，今四川遂宁）、张公铎兼保宁节度使（治阆州，今四川阆中）。这些节度使多任职成都，委托僚佐主管藩镇军政事务。各地官将没有主帅的监督，更加胡作非为，横征暴敛。后蜀政府于广政四年（941年）三月，一度改变作法，由文臣知节度事，如翰林学士李昊知武德军，散骑常侍刘英图知保宁军，谏议大夫崔鐸知武信军，企图清除地方的一些弊政。但3年后，后蜀朝廷重新以将相遥领节度使，又恢复使府僚佐掌权的旧态，各地军政事务更加混乱。

蜀后主逐渐不亲政事，追求奢侈享受。广政六年（943年），命令各地征取13~20岁的女子以备后宫，致州县骚动，百姓多出嫁女儿，称为“惊婚”。新津县令陈及之上疏切谏，孟昶虽予以嘉奖，赐白金百两，但征集良家女子照样进行。君臣们竞相奢侈，连溺器多以珠宝装饰。后蜀社会到处充斥着贪蚀腐朽的风气，与后周王朝发奋图强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后周夺取陇右

高平之战胜利以后，周世宗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步伐。显德二年（后蜀广政十八年，955年）三月，秦、凤州各族群众相次来到

① 《十国春秋》卷四九，“论曰”。

大梁，控诉后蜀的残暴统治，请求出兵收复秦、凤等州。周世宗鉴于后蜀统治衰落，防御能力有限，接纳秦、凤州民众的请求，对南方作战首先选择西蜀为目标。

后蜀孟昶得知消息，急遣客省使赵季扎检查北部前线的边防战备。赵季扎一贯以文武才略自任，回朝奏报：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凤州刺史王万迪非将帅之才，难以承担防御后周的重任。他毛遂自荐，要求挂帅出征。三月二十七日，蜀后主以赵季扎为雄武监军使，派禁军 1000 人充当他的亲兵。四月十八日，蜀后主命知枢密院王昭远检查督促北面军事设施，对后周加强防御。

四月，周世宗向宰相王溥征询领兵出讨后蜀的人选，王溥推荐向训，世宗乃派镇安节度使向训与凤翔节度使王景、客省使昝居润统兵出征。五月一日，王景自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向秦州进发，连克黄牛等八寨（今陕西凤县东北）。十一日，蜀后主见后蜀初战失利，又派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俦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吕彦珂任副招讨使，客省使赵崇韬为都监，领兵北上以拒周师。后蜀雄武监军使赵季扎刚至德阳（今属四川），听说后周军队已进入西蜀境内，不敢再进，上书要求解除雄武监军使职务并回朝奏事，抢先将军需辎重及妓妾送回。五月二十日，赵季扎单骑逃至成都。蜀后主询问前方军情，赵不能回答，旋即被杀。

六月五日，后蜀北路行营都统李廷珪与后周军战于威武城（今陕西凤县东）东，俘后周排陈使胡立。后蜀使者乞求北汉、南唐出兵牵制后周。北汉、南唐帝都口头应允，但没有具体行动。

七月一日，周世宗命王景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任行营兵马都监，继续对后蜀作战。但朝中宰相认为王景出师不利，运输军粮困难，要求罢兵。世宗不同意说：“吾欲一天下以为家，而声教不及秦、凤。今兵已出，无功而返，吾有惭焉。”^① 并特派赵匡胤到前线视察。赵返回后，奏称能攻下秦州、凤州，更加坚定

① 《新五代史》卷五十，《王环传》。

了世宗收复秦、凤州的决心。

九月，后蜀北路行营都统李廷珪分兵三路迎击后周军：派先锋都指挥使李进据马岭寨（疑在今陕西凤县东北）；遣奇兵出斜谷（由关中通往汉中的一条通道，因斜水河谷得名。斜水出自秦岭太白山，往北注入渭水，谷口在陕西眉县西南30里）；又出兵凤州北面唐仓镇及黄花谷（今陕西凤县东北），企图阻截后周自散关南下的运粮通道。后周大将向训、王景侦知后蜀的用兵意图，命排陈使张建雄将兵2000人直抵黄花谷，又遣别将领劲卒1000人进入蜀军后面，截其归路^①。后蜀染院使王峦统兵从唐仓出发，与后周张建雄战于黄花谷，蜀军战败后向唐仓撤退，又被后周军击败，王峦及将士3000人被俘。后蜀在马岭寨、白涧镇的军队随即慌忙逃走。李廷珪、高彦俦退保兴州长举县青泥岭（今甘肃徽县南）。后蜀雄武节度使韩勋弃秦州，逃往成都，秦州观察判官赵玭举城投降。后蜀成、阶二州亦随之投降，蜀人大震。

由于秦、成、阶三州失守，后蜀孟昶以大蜀皇帝名义致书周世宗，请求罢战讲和。世宗怒其无礼，不予答复。孟昶更加害怕，急忙屯军粮于剑门、白帝（今四川奉节），准备依险防守，阻止周军自凤州南下或沿大江西上以进军成都。

十一月，后周王景等围攻凤州，西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韩通领兵进据固镇（今陕西凤县东南），阻击后蜀援兵。后蜀凤州节度使王环不听后周的多次劝降，据城坚守。十四日，后周军攻克凤州，俘王环及都监赵崇溥等将士5000人。

三、战后对蜀措施

后周出军讨后蜀，经过半年多作战，顺利占领了秦、成、阶、

^① 《宋史》卷二五五，《向拱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周世宗显德二年。

凤四州，保卫了凤翔府及关中的安全，迫使后蜀龟缩在剑门以南，达到了预期的军事目的，遂收兵回朝。接着，又采取措施加强对后蜀的政治攻势。显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世宗发布讨平秦、成、阶的诏书^①，其中对后蜀措施主要有：

自显德二年十一月以前，凡后蜀在秦、成、阶、凤等州关押的罪犯，不问罪刑轻重，全部释放。

后周军进攻秦、成、阶、凤等州战斗中，当地百姓有伤害死亡者，免除本户两税以及三年差徭，赐当户孝服绢三匹。

后蜀在秦、成、阶、凤等州投诚的官兵，按各人的军职予以赏赐。其中西川人员如愿继续任职，听其自便，多与赏赐；倘愿回故乡，发予旅费。

自天福十二年（947年）何重建归附西川起，后蜀政府在秦、成、阶、凤四州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免除，当地百姓只缴纳秋夏两税。

显德四年（957年）四月，后周政府将所俘后蜀指挥使萧知远、冯从谠等将士893人放归西川，发给衣装、巾履、缗钱，一路受到特殊优待。所有这些措施，对稳定秦、成、阶、凤等州民心以及瓦解后蜀军队的斗志，收到一定效果。

第五节 三征南唐之战

一、南唐国内情况

南唐对闽、楚两国的战争，宋齐丘、陈觉、冯延鲁、魏岑、查文徽、冯延己等人是主要肇事者。唐元宗李璟迫于国内不断高涨的抗议呼声，一度决定处死陈觉、冯延鲁二人，先后贬降其他几人的官职，但很快收回成命，又让他们分别担任宰相、枢密副使。

^① 《全唐文》卷一二六，《平秦、成、阶等州德音》，中华书局影印本。

魏岑还接受寿州节度使刘彦贞的重贿，推荐他担任神武统军、侍卫诸军都指挥使，掌握朝廷禁军。这伙人“在外者握兵，居中者当国”^①，继续控制了朝中的军政大权。那些敢于揭发他们罪行的忠诤之士，有的被贬官，有的被处死。户部员外郎范仲敏劝大将王建封上书朝廷，揭露魏岑等人罪行，请求罢免他们官职。唐元宗不分是非，指责王建封干预国政，先后处死王建封、范仲敏。唐元宗在南唐对闽、楚的战争之后，毫不痛改前非，继续重用一伙邪佞之徒，国内形势日益恶化。

在经济上，南唐对闽、楚作战后，本应抓紧时机，发展生产，增加赋税收入，尽快弥补对闽、楚作战的巨大物资消耗，并作好防止后周南下的物资储备。可是，南唐统治者在淮南强行夺取民田作为屯田，征发洪州（今江西南昌）、饶州（今江西波阳）、吉州（今江西吉安）、筠州（今江西高安）等地百姓自带耕牛远到楚州（今江苏淮安东）、常州（今属江苏）修建陂塘，灌溉屯田。江淮一带百姓怨声载道，控告无门，只得焚香于野外向苍天哭诉。南唐政府除向百姓征收两税外，又将盐、茶征收强制抑配民户，迫使农民缴纳缣、帛、稻米，以抵作盐、茶的价值。每年还征收羊、猪以及柴炭等物品。这些名目繁多的征敛已成为广大农民苛重的负担。

在军事上，每年冬天淮河水浅时，南唐常派兵戍守，监视后周军队行动。显德二年（955年），后周准备渡淮河南下前夕，寿州监军吴廷绍思想麻痹，认为前方疆场无事，派兵把守淮河是耗费资粮，决定全部撤除。寿州节度使刘仁瞻上表谏阻，得不到朝廷任何支持。

总之，在后周南下作战前夕，南唐政府用人不当，国内阶级关系比较紧张，对后周作战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① 陆游《南唐书》卷一一，《江文蔚传》，绿签山房版（下同）。

二、周世宗一征南唐

(参见附图 6)

(一) 双方作战部署

后周、南唐之间主要以淮河（淮河源出河南桐柏山区，由西东流，经河南息县、安徽寿县、蚌埠和江苏盱眙，入洪泽湖，东流入海）为分界线。后周进攻南唐，首先要控制淮河南岸光（今河南潢川）、寿（今安徽寿县）、濠（今安徽凤阳东北）、泗（今江苏盱眙北）、楚等州。其中寿州处在光州与濠、泗、楚州之间，濒临淮河南岸，陆路自汴州、兗州、徐州南下，经过寿州可达到南唐国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水路控制着淮、汝（汝水出自河南鲁山县西南，自西北流向东南，途经河南上蔡、汝南，在安徽寿县东与河南淮滨县之间注入淮河）、颍（颍水出自河南登封县东，自西北流向东南，途经河南西华、安徽阜阳，在寿县西正阳镇注入淮河）各水道，历来是淮河南北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军事战略要地。后周只有渡过淮河，占领寿州，才能保持大梁与淮河南岸交通畅通；还能沿淮河顺流而下，夺取濠、泗、楚州。因此，后周作战部署首先是大军出征，强渡淮河，攻打淮河南岸沿线诸州，特别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寿州；其次，在进攻沿淮重镇的同时，派军队主动出击，大量歼灭南唐来自水上、陆地的各路援军；第三，切断南唐各州之间的联系，迫使南唐军分别困守在城内，孤立无援；第四，坚决守住后周在淮河上修建的浮桥，保证后周中原腹地与淮南前线联系的畅通，便于及时将军需物资、军队运到前线。当后周实现上述用兵方略之后，再兵临长江，迫使南唐拱手割让江北 14 州。

南唐从一开始就采取防御作战的守势部署。南唐利用淮河为屏障，在淮河沿线寿、濠、泗、楚诸州修建防御工事，以骁将刘仁瞻、郭廷谓、张彦卿等据城防守，又不断派遣水、陆大军北上增援，阻止后周军队进入淮南。

（二）周军围攻寿州、正阳

显德二年（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十一月一日，周世宗命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庐、寿等州行府事，忠武节度使王彦超为副都部署，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12将出征南唐。南唐元宗急调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领兵2万人增援寿州；奉化节度使皇甫晖为应援使，常州团练使姚凤为应援都监，统兵3万人屯驻定远（今安徽定远东南），准备随时支援寿州。

十一月，后周李谷等在正阳（今安徽寿县西南正阳镇）地区架设浮桥，过淮河，随即东向攻打寿州城。十二月十日，李谷奏报周将王彦超败南唐兵2000余人于寿州城下。十五日，再奏先锋都指挥使白延遇败南唐兵2000人于山口镇（疑在寿州附近）。显德三年（956年）正月三日，李谷又报告败南唐兵1000余人于寿州南面的上窑。

（三）周世宗首次亲征江淮

正月六日，世宗下诏亲征，命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领兵先赴正阳，河阳节度使白重赞将亲兵3000人屯驻颍上（今安徽颍上北），准备增力攻打寿州。八日，世宗从大梁南下。李谷领后周军队攻打寿州，虽在外围一些战斗取得局部胜利，但进攻寿州遭到南唐名将刘仁瞻顽强防守，未能攻入寿州城内。南唐大将刘彦贞急驰寿州，已到离寿州约二百里远的来远镇，又以战船数百艘向正阳进发，准备破坏后周在正阳搭建的浮桥。李谷鉴于后周军不习水战，倘南唐军一旦破坏了正阳浮桥，则腹背受敌，“不如退守浮梁”，等待周世宗的到来。^①世宗抵圉镇（今河南杞县境内），得知李谷撤军正阳的部署，急派宦官前往阻止。世宗使者刚刚赶到，李谷已焚烧周军在寿州城外屯积的军粮、饲草，退保正阳。十三日，世宗到达陈州，派李重进引兵急赴淮河前线。

十七日，李谷自正阳向世宗报告说：现在淮河水日涨，南唐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周世宗显德三年。

战船自淮水中流而进，“若浮梁不守，则众心动摇，须至退军”^①，请求周世宗暂时停留在陈州或颍州（今安徽阜阳）。待李重进到达后，共同商量击退南唐战船的对策，保护好正阳浮桥，再立即奏报。至于进攻寿州，“春去冬来……取之未晚。”^②世宗看到李谷这份报告，很不高兴。

由于后周这时缺乏水军，南唐战船可溯淮河直上正阳，有可能破坏以至占领正阳浮桥，将周世宗、李重进阻隔在淮河北岸。倘寿州节度使刘仁瞻与已到达寿州前线的南唐北面行营都部署刘彦贞、应援使皇甫晖相互配合，南唐几万大军可以从容不迫地围歼在正阳的李谷军队。战争形势对南唐方面非常有利。这是李谷一再害怕出现的被动局面。可是，南唐军事统帅刘彦贞靠重贿朝中权贵而窃据兵权，当节度使多年未打过仗，缺乏用兵谋略，又拒不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刘仁瞻当时警告说：“君来赴援，未交战而敌人退，不可测也，慎勿追逐。君为大将，安危以之，脱有不利，大事去矣。”^③但刘彦贞刚愎自用，高叫军权在手，违命者斩。他武断地认为敌人见我前来，抢先逃走，现不追击，等待何时^④，遂督促军队加速前进，直奔正阳。刘彦贞在正阳东遇到后周李重进军队，突然改变主意，匆忙命令兵士停止前进，将利刃置于拒马^⑤上，用铁索连系起来，又在地面上布置铁蒺藜^⑥等，企图阻挡敌人前进。后周李重进见南唐军士气不振，仓促转入防御，遂一鼓作气，大败唐军，杀刘彦贞及南唐兵士万余人，俘唐将咸师朗等，收缴军资器械 30 余万件。南唐应援使皇甫晖、应援都监姚凤撤退到滁州清流县（今安徽滁县）西南 20 里的清流关。通过这次作战，后周控制了淮河前线阵地正阳，淮河南北通行无阻；而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周世宗显德三年。

③ 马令《南唐书》卷一七，《刘彦贞传》。

④ 《十国春秋》卷一六，《南唐元宗纪》引《江南野史》。

⑤ 古代用来阻挡兵马通行的木制器材。

⑥ 古代铁制的军事障碍器材，放在道路上阻碍敌军行动。

南唐“江、淮久安，民不习战，彦贞既败，唐人大恐”^①，处境非常被动。

正月十八日，世宗抵达颍州汝阴县（今安徽阜阳永宁镇），二十日到达正阳。世宗立即作出两项重大决策：鉴于李谷作战不力，以李重进代李谷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李谷判寿州行府事；组织大军继续围攻寿州。二十二日，世宗亲自来到寿州城下，督促诸军围攻，命迁正阳浮桥于下蔡镇（今安徽凤台县）。二十三日，征发宋、亳（今属安徽）、陈、颍、徐、宿（今安徽宿县）、许、蔡（今河南汝南）等州数十万丁夫，昼夜轮番进攻。

这时，在寿州东北方面的涂山（今安徽怀远东）有南唐水军万余人可直接乘战船溯淮河而上，逼近后周在下蔡架设的浮桥和寿州城。正月二十六日，世宗命赵匡胤进攻涂山。赵匡胤遣百余骑兵临近南唐阵地后伪装逃走，设伏兵邀击敌人。二十八日，大败唐兵万余人于涡口（即涡水入淮之口，在安徽怀远县东北15里），杀都监何延锡，获战船五十余艘。

周世宗为牵制南唐军队，显德三年（956年）正月，以楚国旧将王逵为南面行营都统，领兵进攻南唐鄂州（今湖北武汉）。南唐元宗得知消息后，命武昌节度使何敬洙坚壁清野，移鄂州周围百姓进入城内，准备长期固守。何敬洙决心领导军民在鄂州城外抗击来犯之敌，得到南唐元宗的赞许。

二月，周军下蔡浮桥建成。五日，后周庐、寿、光、黄州巡检使司超（一称何超）奏报败南唐军三千余人于盛唐（今安徽六安），俘南唐都监高弼，缴获战船四十余艘。世宗为扩大战果，歼灭大量敌军以配合寿州之战，又命赵匡胤领兵倍道前进，袭击滁州清流关。南唐军将皇甫晖、姚凤列阵于清流山脚下，赵匡胤引兵从山背后包抄，皇甫晖逃入滁州（今安徽滁县）城内，企图据城防守。赵匡胤直抵滁州城外，迫使皇甫晖出战。九日，当皇甫晖整众而出，赵匡胤立即骑马驰入敌阵，活捉皇甫晖、姚凤，攻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周世宗显德三年。

克滁州，歼敌 1.5 万人。

这是后周军在正阳之战以后又一次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楚国王逵、吴越王钱弘俶应后周要求，兵临南唐边界。二月二十日，吴越宰相吴程督衡州刺史鲍脩让、中直都指挥使罗晟向南唐常州进发。二月二十八日，楚国王逵攻拔鄂州长山寨，杀南唐军三千余人，俘其将陈泽。三十日，吴越上直都指挥使路彦铢攻宣州（今安徽宣城），罗晟率战船屯江阴（今属江苏），迫使南唐静海制置使姚彦洪领兵民万余人归附吴越。三月，吴越军队攻破常州外城，活捉南唐常州团练使赵仁泽。

前阶段将近三个月的作战，南唐军队约五万余人被歼灭^①，损失战船数百艘，不少军将遭到杀害。南唐君臣上下人心惶惶，恐惧不安。显德三年（956 年）二月，南唐元宗派泗州牙将王知朗到徐州，请求后周休战罢兵，愿奉事大周皇帝为兄，每年贡纳财货。周世宗不予理睬，二月十五日，命前武胜节度使侯章等攻寿州水寨。南唐又派翰林学士钟谟、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向周世宗奉表称臣，送上升 500 头、酒 2000斛、金银、罗绮数千。周世宗扣留钟谟、李德明，要南唐皇帝李璟前来认罪，同时加紧筹划攻略江北诸州的战争。

（四）周军攻略江北诸州

南唐江北诸州以扬州（今属江苏）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扬州是南唐的东都府和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又与润州（今江苏镇江）仅一江之隔，离南唐京师金陵很近。由于南唐兵力主要部署在寿州、濠州前线，还有一些预备队伍留在长江以南，扬州城内防务空虚。显德三年（956 年）二月十六日，周世宗命韩令坤领兵轻袭扬州，要他安抚当地百姓，争取人心。二十二日，韩令坤遣先锋将白延遇以数百精骑在天明时进入城内，南唐守将还未发觉。

① 后周在正阳之战歼敌 2 万，滁州清流关之战歼敌 1.5 万，涡口之战歼敌万余，此外在寿州城外、山口镇、上窑三次歼敌 5000 人，鄂州长山寨歼敌 3000 余人，总共约 5 万余人。

韩令坤随后赶到，唐东都屯营使贾崇焚烧官府民房，落荒而逃。“五鬼”之一的东都副留守冯延鲁藏匿在佛寺，被后周兵士活捉。扬州城内市肆安定。韩令坤又乘胜自扬州东进，攻占泰州（今属江苏），刺史方讷逃奔金陵，后周给事中高防权知泰州。

二月二十八日，后周大将赵匡胤奏报扬州西北的南唐天长制置使耿谦降，周军获大量刍粮。

三月，后周光、舒、黄州招安行检使、行光州刺史司超领兵4万人攻光州，三日，南唐光州都监张承翰开城门投降。四日，后周行舒州刺史郭令图克舒州（今安徽潜山），南唐蕲州将李福杀死知州王承嵩，举州归降。后周六宅使齐藏珍率军队攻打黄州（今湖北黄冈）。五日，后周军队攻占和州（今安徽和县）。这时，南唐在长江北岸的光、泰、扬、和、舒、蕲（今湖北蕲春）等州都被后周军占领，黄州也被围困，南唐仅占领庐州（今安徽合肥），成为沟通金陵与淮河南岸寿州、濠州的重要通道。倘周军自扬州、舒州双方同时进击，庐州一旦失守，则南唐与淮河南岸前线交通严重受阻。南唐元宗深感事态严重，第三次派遣右仆射孙晟、礼部尚书王崇质向后周求和，表示仿照吴越、湖南的作法，采用周朝的年号，奉事后周，还献上金1000两，银10万两，罗绮2000匹。不久，孙晟与先前被后周扣留的李德明向周世宗表示，南唐将取消帝号，割让寿、濠、楚、泗、光、海（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6州，每年贡金帛100万，请求罢兵。周世宗不允，要求尽占江北14州。李德明不敢作主，请求周世宗稍等五天，他回金陵劝唐元宗尽献江北之地。李德明到达金陵，宋齐丘认为割地无益，枢密使陈觉、副使李徵古指责李德明卖国求荣，唐元宗大怒，杀李德明。后周、南唐双方和谈不成，又诉之于武力。

南唐元宗鉴于吴越兵屯驻常州境内，恐其侵逼润州。显德三年（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三月中，南唐以右武卫将军柴克宏、袁州刺史陆孟俊救常州，大败吴越兵。南唐这次作战胜利，后方比较稳定，遂再次抽调江南军队北上抗周。南唐还在泉州（今属福建）、建州（今福建建瓯）等地召募勇士，扩军备战。四月，南

唐陆孟俊乘常州之捷，领兵万余人向泰州进发，后周军退走，泰州复归南唐所占。陆孟俊进攻扬州，屯于扬州城西蜀冈，据高处为垒，切断后周援军的通路。后周大将韩令坤自扬州逃走。世宗派张永德领兵经六合（今属江苏）前往援救，韩令坤又回到扬州城内，败南唐兵于扬州城东，活捉陆孟俊。三、四月，南唐为了抗击后周军队南下，保卫首都金陵，命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李景达统兵2万自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渡江北上，但李景达畏惧犹豫，距六合二十余里设营不进。后周众将请求赵匡胤出击，赵回答说：“彼设栅自固，惧我也。今吾众不满二千，若往击之，则彼见吾众寡矣；不如俟其来而击之，破之必矣！”^① 几天后，李景达进军六合，赵匡胤迎头痛击，杀俘南唐军近五千人，剩下万余人逃往江南，因争抢渡船，很多人淹死江中。南唐精锐之师再次遭到重大的损失。

后周攻略江北诸州，捷报频传，但自显德三年（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正月至四月长期围攻寿州却没有进展。后周军又碰上大雨不止，淮河、淝河（又称西淝河，源出河南鹿邑县西北，由北往南流，在安徽凤台县入淮河）水位暴涨，后周攻城兵械皆漂至南岸，为南唐兵所焚。周兵死亡较多。加之后方粮刍供应困难，后周开始商议班师。四月十三日，世宗自寿州来到濠州。十七日，韩令坤奏败南唐楚州将马在贵万余人于湾头堰（今江苏扬州城北），俘南唐涟州刺史秦进崇。张永德奏败泗州兵万余人于曲溪堰（今江苏盱眙西南）。二十四日，周军奏涡口浮桥建成。五月一日，世宗在涡口置镇淮军。涡口位于寿州、濠州之间，后周派重兵防守，既能保护新建浮桥，又可以阻止南唐寿州与濠州守军的联系，或从涡口出军支援进攻寿州、濠州的作战。七日，世宗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继续围攻寿州，自己从涡口北归，二十四日回到大梁。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周世宗显德三年。

三、周世宗二征南唐

(参见附图 6)

(一) 南唐军争夺江北诸州

后周前阶段作战，一面调大军围攻寿州，一面出兵占领江北诸州，兵力比较分散，这为南唐举行反攻与收复江北诸州提供了可乘之机。显德三年（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六月，南唐驾部员外郎朱元汇报用兵方略，南唐元宗大悦，命朱元统兵收复江北诸州。七月，朱元取舒州，出任舒州团练使，接着又攻克和州。南唐军将李平还收复蕲州。

后周军队南下，南唐民众苦于政府的残暴掠夺，纷纷向后周军献牛酒表示欢迎。但后周军队不守法纪，大肆抢掠，欺压百姓。南唐民众大失所望，相聚山泽，建立堡寨，积纸为甲，称为“白甲军”。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多次打败周军。南唐重新收复泰、光、扬、滁等州。

(二) 周世宗二次亲征江淮

自显德三年五月世宗返回大梁后，后周很快丢失了原先攻占的江北诸州，寿州战场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六月，南唐寿州节度使刘仁瞻组织反攻，出寿州城南攻击后周大将李继勋部，杀后周军数百人，焚烧周军大批攻城器具。南唐“援兵营于紫金山（今安徽寿县南），与寿春城中烽火相应”^①。七月，周世宗接受淮南节度使向训的建议，指示撤走后周在扬州的驻军，集中兵力攻打寿州。后周滁州守将也撤兵开赴寿州前线。对于后周军队的紧急调动，南唐将领要求在途中设险阻击，大臣宋齐丘昏聩迂腐，害怕与后周仇恨加深，禁止各地军将出兵拦击。后周军队顺利到达寿州附近，进一步加强了对寿州的包围。后周及时调整军事策略，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周世宗显德三年。

由分散作战改为集中兵力进攻寿州，寿州之战出现了重大转折。

南唐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李景达与监军使陈觉领兵5万坐镇濠州，遥为寿州声援，但无决战之意。八、九月间，南唐将领林仁肇率众千余人进援寿州，水陆齐进，用数艘船装上柴薪，乘顺风前进，企图焚烧下蔡浮桥。但风向突然转变，唐兵败退。林仁肇再次出水军进攻下蔡浮桥，后周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派遣会游泳的兵士潜入南唐战船底下，破坏南唐船只，缴获巨船数十艘。张永德又用铁索千余尺系上巨木，横置淮河水面上以保护浮桥，南唐战船难以通过，无法到达寿州城下。南唐精锐水军很难发挥作用。

南唐元宗还派使者乘海船进入辽国，请求出兵援助。辽穆宗不听，还扣留南唐使者陈处尧。南唐企图联合辽国共同制服后周也化为泡影。

显德四年（南唐保大十五年，957年）正月，南唐军队统帅李景达继续留驻濠州，遣应援使许文稹、都军使边镐、北面招讨使朱元领兵数万，沿淮河西上，屯军寿州以南的紫金山。南唐军沿途设十余寨，与寿州城内烽火相应；又筑夹道数里^①，准备运粮给寿州城内守兵。他们将抵达寿州城北，被后周李重进击败，死亡5000人，丢失2寨。但后周不少人还认为南唐援兵力量强大，请周世宗撤兵休战。二月，李谷上疏说：“寿春（今安徽寿县）危困，破在旦夕，若銮驾亲征，则将士争奋，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②世宗接受李谷的建议，十七日就离开大梁，三月二日进抵寿州城下，亲自督战。

（三）周军攻克寿州之战

世宗第一次南征返回大梁后，总结了前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深感后周缺乏水军，对南唐作战十分不利。于是在大梁城西的汴

^① 此据《旧五代史》卷一一七，《周世宗纪》。但《资治通鉴》卷二九三称“筑甬道抵寿春……绵亘数十里。”

^②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周世宗显德四年。

水侧畔造战船数百艘，命南唐降卒教周军练习水战。数月之后，后周水师纵横出没，几乎胜过南唐水军。这支水军很快来到寿州前线，战局随即改观。

三月二日夜，周世宗抵寿州城下。次日晨，进驻紫金山南，命赵匡胤拔南唐先锋寨及山北一个军寨，杀敌三千余人，断其甬道，使南唐军队首尾不得相救。世宗分兵守卫诸寨后，自己返回下蔡。这时，南唐内部出现了裂痕，北面招讨使朱元自恃收复江北诸州的战功，不肯听从前线军事统帅李景达的指挥。监军使陈觉早与朱元不和，一再上表唐元宗说明朱元系后汉投奔南唐的降将，不可信赖。唐元宗轻信谗言，撤销朱元军职，命武昌节度使杨守忠取代朱元。四日夜，朱元与先锋壕寨使朱仁裕率万余人投降后周。周世宗乘敌人内部开始混乱，决定大举进攻南唐紫金山寨的援军，并命虎捷左厢都指挥使赵晁将水军数千人沿淮河东下，追歼有可能从淮河往东逃窜的南唐军。

五日，后周一举占领寿州城南的紫金山，歼敌万余人，俘南唐将许文稹、边镐、杨守忠，其余唐军自淮河往东逃走。世宗随即分兵三路：一路沿淮河南岸东走，一路由虎捷左厢都指挥使赵晁领水军数千人乘战船东进，世宗亲领骑兵数百人沿淮河北岸追击。南唐军溺死、被俘、投降共约四万人，还损失大批船舰、粮食、兵器。世宗为防止南唐军逃掉，拼命向前追趕，五日晨从赵步出发，下午驰至荆山洪，一天行程二百余里，当天夜晚宿于镇淮军（置于涡口，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七日，后周又征发丁夫在涡口夹淮河修建南北二城，将下蔡浮桥迁至涡口，进一步切断南唐濠州与寿州间的联系。南唐濠州都监郭廷谓命水军逆淮河西上，准备突然袭击，焚烧涡口浮桥。后周右龙武统军赵匡赞设伏兵邀击，败郭廷谓水军。南唐诸道兵马元帅李景达、监军使陈觉见南唐连连失败，援救寿州已毫无希望，自濠州逃回金陵。

三月十一日，周世宗命大将向训戍守镇淮军城。次日，世宗从镇淮军赶赴下蔡。十三日，赐诏书南唐寿州刘仁瞻，劝其投降。后周又耀兵于寿州城北。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世宗即将结束围攻

寿州之战。

南唐元宗鉴于南唐作战连连失利与寿州战场的危急，提出亲自赴江北督战。中书舍人乔匡舜上疏谏阻，元宗认为乔上疏动摇军心，将乔流放抚州（今江西抚州西）。神卫统军朱匡业不正面回答元宗北上督战之议，却当场朗诵罗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①，哀叹南唐即将国破家亡。大臣刘存忠也表示悲观。朱、刘二人随即被贬官。朝中臣僚再无人出来讲话，更没有人要求上前线作战。南唐元宗也不敢亲自领兵北征，只好坐等寿州失陷。

南唐清淮节度使刘仁瞻在寿州坚守一年半，多次打退后周军的进攻，曾要求出城与后周军决战，未得到诸道兵马元帅李景达的批准。南唐寿州守军长期与外界隔绝，城内粮食奇缺，军队伤亡增多。当周世宗兵临寿州城下时，刘仁瞻病重不省人事。三月十九日，寿州监军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以刘仁瞻名义遣使者奉表投降。二十一日，周世宗受降于寿州城北，刘仁瞻被封为天平军节度使，旋即病故。后周军进入寿州城内，将清淮节度使治所从寿州迁至下蔡，并开仓赈济饥民，赦免不及死罪的囚徒，招抚逃亡百姓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安定寿州的社会秩序，医治战争创伤。

四月十二日，周世宗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大梁。

四、周世宗三征南唐

（一）周世宗第三次亲征与濠州之战

世宗离开淮南不到两个月，淮南前线又出现了麻烦。

显德四年（南唐保大十五年，957年），南唐濠州监军郭廷谓与州将黄仁谦（一称仁谨）决心死守濠州城。濠州靠近淮河南岸，

^① 《全唐诗》卷六五七，《筹笔驿》，中华书局版。

倚山带水，东邻楚、泗二州，西近寿州，系南唐控扼淮河的军事重镇。郭、黄二将把城内可能出逃的人们集中在一所庙宇，派兵严加看守，强迫他们制造保卫城防的战具。后周间谍难以接触到濠州城内的民众，无法了解城内的军事行动。郭廷谓认为涡口浮桥对濠州威胁很大，向黄仁谦谈到他的作战方案：“今夏久雨，淮流泛溢，愿假舟兵二千，断其桥，屠其城，直抵寿春。”^①五月，郭廷谓领轻舟溯淮河而上，直奔涡口，放火焚烧了浮桥。后周兵士伤亡很多，储存军粮全部被烧毁。后周南征，曾在正阳、下蔡搭起浮桥，一直未被南唐破坏，为后周向淮南前线运输军队及军需器仗起了重要的作用。涡口浮桥被破坏对后周朝廷震动很大。

后周军队涡口失败后，武宁节度使武行德退保濠州以南的定远县，距濠州仅90里。郭廷谓选派壮士化装成商贩混入定远城内，侦察后周军情。然后征集乡兵万余人，军卒5000人，日夜训练，依山埋设伏兵，大破后周军，守将武行德单骑逃走。郭廷谓虽先后在涡口、定远作战取胜，但南唐朝廷没有增兵声援，郭廷谓孤军奋战，很难进一步扩大战果，不得不回师濠州城内。

七月，周世宗为严惩定远作战失败军将，将武宁节度使武行德贬为左卫上将军。十月十九日，世宗第三次亲征，离开大梁南下，十一月四日抵涡口，五日到达濠州城西。南唐在濠州东北18里的滩上设置木栅，环水自固，阻挡后周军过淮河。六日，世宗命内殿直康保裔率兵士数百人，乘骆驼涉水过淮河，赵匡胤领骑兵紧紧跟上，很快攻占了濠州东面的一个滩头阵地。李重进又破濠州南关城。十一日，世宗亲率诸军攻濠州，破其水寨。南唐屯战船数百艘于濠州城北，还置巨木于淮河水中拦阻周军。世宗命水军进攻，拔掉巨木，烧毁南唐战船70余艘，杀敌2000余人，随即攻拔濠州羊马城，城中震恐。十四日夜，郭廷谓上表周世宗说：臣家在江南，倘现在立即投降，恐全家人生命难保，请允我报告

① 《宋史》卷二七一，《郭廷谓传》。

唐元宗，俟批准后随即出降^①。周世宗同意暂缓进攻濠州，同时严密注视着附近地区敌人的动静。十九日，世宗得知南唐战船数百艘在涣水（在安徽五河县境内流入淮水）东，打算救援濠州，乃当夜发兵水陆并进，大败南唐军于洞口（今安徽凤阳东北），杀唐军5000余人，降2000余人，夺战船300艘。周军接着鼓行而东，昼夜不息，沿淮河附近城栅所至皆下。十二月上旬，南唐濠州使者自金陵返回，郭廷谓得知朝廷不能发兵前来救援，乃领兵万人、粮数万斛投降后周。

（二）周军夺取淮水沿线诸州

当濠州作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尚未最后结束时，周世宗不让敌人有任何喘息机会，及时挥军东进，夺取淮河沿线诸州，进一步扩大战果。

十一月二十三日，世宗来到泗州城下，禁止割柴草的兵士践踏民田，当地百姓热烈拥护，纷纷献送粮草。赵匡胤率先攻打泗州城南，焚烧城门，破泗州水寨及月城。世宗亲自登上月城楼，督促将士攻城。十二月三日，南唐泗州守将范再遇开城投降。

这时，南唐战船数百艘退保清河口（今江苏淮阴县泗水入淮之口）。六日，周世宗领亲军沿淮河北岸、赵匡胤将步骑自淮河南岸、诸将率水军沿淮河东进，三路兵马同时追赶南唐军。淮河两岸附近久无行人，芦苇如织，泥烂沟深，兵士们不顾疲劳，一鼓作气，奋勇争先。八日，追及南唐军，并乘胜进攻。九日，在楚州西北大败南唐军。这时，还有部分南唐水师沿淮河东逃，世宗再乘胜追击，以赵匡胤为前锋，活捉南唐濠、泗、楚、海州应援使陈承昭，所夺战船除焚烧击沉之外共三百余艘，俘敌七千余人。南唐在淮河的战船已丧失殆尽。世宗渡过淮河，营于楚州城西北，又发起夺取楚州的战斗。

十二月十三日，南唐雄武军使、知涟水县事崔万迪降。十六日，世宗攻克楚州月城。十八日，世宗命南唐降将郭廷谓领濠州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周世宗显德四年。

兵士进攻天长；又派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武守琦率骑兵数百人向扬州进发，刚抵到离扬州约一百里的高邮县（今属江苏），南唐戍守扬州军将放火焚烧扬州房舍，尽逐扬州士庶渡江逃命。几天后，后周军入扬州，城内仅剩下病者十余人。世宗得知泰州没有防备，遣兵轻袭，二十五日又攻拔泰州。显德五年（南唐中兴元年，958年）正月五日，后周右龙武将军王汉璋奏报攻克海州。

周世宗一面进攻楚州，一面准备将后周在淮河上的战船驶入长江，迫使南唐早日臣服，但由于楚州城北面的北神堰水位较高，无法通行。世宗视察楚州西北鹳水，亲授规划，征发民工开凿，旬日而成，几百艘战船通过大运河南入长江。南唐军民第一次见到后周战船在大江游弋，惊叹不止，更害怕后周战船直捣金陵。

显德五年（958年）正月十日，后周军攻占静海军（今江苏南通），直接与吴越领土接壤。这有利于后周与吴越双方协调对南唐作战。

楚州之战是淮河沿线作战的最后一幕。尽管楚州月城已失陷，周围各地也归后周占有，但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一作张彦能）与都监郑昭业坚守城内，战斗相当激烈。后周军以“梯冲临城，凿城为窟室，实薪而焚之，城皆摧圮遂陷。彦卿犹列阵城内，誓死奋战，谓之巷斗；日暮转至州廨，长短兵皆尽，彦卿取绳床搏战”^①。张彦卿顽强抗击40天，城内官兵千余人全部战死。后周军队也有重大伤亡。正月二十三日，世宗督诸将发起猛攻。二十五日，后周军攻入城内，不分青红皂白，杀害居民，焚烧房舍，全城一片废墟。这是世宗三次南下淮南作战最残酷野蛮的屠城行为。

到显德五年二月止，南唐淮河沿线光、寿、濠、泗、楚及楚州北面的海州，已全部为后周所有。淮河南北开始连成一片，后周军进一步攻占江北诸州已迫在眉睫。

（三）周军夺取江北诸州城邑

周世宗在指挥后周军夺取淮河沿岸诸州城邑的同时，又遣兵

^① 陆游《南唐书》卷一五，《张彦卿传》。

夺取长江以北诸州城邑。显德三年（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南唐长江以北诸州几乎全部为后周所占。后因后周改变作战部署而主动撤离，或被南唐攻占，江北诸州再次为南唐的属郡。显德四年（南唐保大十五年，957年）十二月，江北军事重镇扬州已落入后周之手。但扬州西北面天长县“当九驿之路，城小而固”^①，南唐于正月底将天长县改置为雄州，命天长军使易文贊为雄州刺史，妄图负隅顽抗。周世宗特派南唐楚州守将张光卿之子张光祐持诏书进行劝降。易文贊得知楚州失守，雄州孤立无援，举城投降。舒州东北面的和州、滁州也为后周军所占^②。后周遣司超与控鹤右厢都指挥使王审琦进攻南唐舒州，歼南唐军3000人，俘舒州刺史施仁望。这时，后周基本上控制了自舒州以下的长江河道，后周战船在江面日夜游弋，南唐首都金陵完全暴露在后周军队的面前。周世宗采用兵临城下的威慑手段，争取南唐元宗归降，主动献出尚为南唐控制的庐、蕲、黄等州。

（四）南唐被迫割地归附

在后周步步紧逼的严峻形势下，南唐君臣万分恐惧。唐元宗三弟景遂早已被封为皇太弟，是唐元宗的合法继承人。李景遂见形势不妙，先后十次上表辞去太弟称号，要求外出藩镇，恳请另立唐元宗长子弘冀为储君。唐元宗四弟李景达也以显德三年（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紫金山之战失败为借口，请求辞掉诸道兵马元帅的军职。这证实南唐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已完全丧失信心，他们除割地投降外，别无出路。

南唐东西两侧的吴越国和荆南政权，见南唐已岌岌可危，趁机出兵参战。显德五年（南唐中兴元年，958年）正月，荆南节度

① 《册府元龟》卷四五，《帝王部·谋略》。

② 周军在显德三年后重新攻取和州、滁州，旧史没有记载。但《旧五代史》卷一一八，《周世宗纪》载，显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李景遣其臣刘承遇奉表以庐、舒、蕲、黄等四州来献，且请以江为界”，由于滁、和二州不在南唐所献州郡之内，则在此前已被周军占领。

使高保融遣指挥使魏璘率兵 3000 人，率战船 100 艘逼近鄂州。三月，吴越国遣上直指挥使邵可迁、秀州刺史路彦铢以战船 400 艘、兵士 1.7 万人屯军通州（今江苏南通）南岸，要求周世宗发布出师令。楚国旧将周行逢也派出军队参战。南唐不仅在江北战场连连失败，而且又遭到毗邻各国趁火打劫，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三月十日，周世宗抵扬州以西的迎銮镇（今江苏仪征），多次来到长江北岸，遣水军攻击南唐军。十二日，世宗在长江北岸望见南唐战船数十艘，命赵匡胤率水军追击，直抵长江南岸，焚烧南唐营栅后班师回营。十三日，世宗得悉南唐战船数百艘泊于东沛洲后，遣慕容延钊将步骑、宋延渥将水军循江而下，大破南唐军于东沛洲；与此同时，又派李重进率兵直趋庐州。南唐元宗深怕后周大军渡江，命兵部侍郎陈觉出使后周，表示将传位给太子弘冀，今后要听命于周朝。陈觉来到迎銮镇，见后周战船停泊在江边，大为惊恐。他向周世宗表示，即将派人返回金陵，取来南唐政府文书，奉献江北庐、蕲、舒、黄四州，并恳请周、唐两国以长江为界，停战罢兵。世宗回答：“朕本兴师止取江北，尔主能举国内附，朕复何求！”^① 十八日，南唐元宗以国主身份上表周世宗，正式割让江北四州，每年贡物数十万，再次请求划江为界。周世宗见出兵江北的战略目的已全部实现，当即指示撤走后周沿江诸军及吴越、荆南、楚国的军队，停止对庐、蕲、黄等州的进攻，减免淮南诸州显德四年（957 年）所欠秋夏税物，遣返所俘获的江南士卒，每年赐盐 30 万斛。三征南唐之战宣告结束。四月，世宗自扬州返回大梁。

后周对南唐作战，自显德二年（南唐保大十三年，955 年）十二月开始，到五年（南唐中兴元年，958 年）三月结束，历经两年四个月，夺取了南唐江北 14 州，60 县，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双方的胜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后周方面：周世宗即位后，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实行

① 《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周世宗显德五年。

改革，国家实力大大增强，还选拔了一批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文臣武将。后周君臣上下团结一致，同心攻伐南唐。周世宗本人雄才大略，运筹帷幄，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后周进攻南唐是要求结束各地分裂、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符合南唐各地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周世宗严明军事纪律，禁止军队焚烧剽掠，还救济遭受战争破坏地区的广大群众，组织逃亡民众回乡恢复生产。如发现周军纪律败坏，周世宗又及时加以整顿，严惩违犯法纪的军将。因而后周在淮南作战，得到淮南民众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广泛支持和有力帮助。所有这些都是后周出征南唐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周世宗三次亲临淮南前线，其指挥作战的谋略也是相当成功的。

第一，坚持主攻寿州，打破南唐防御体系。后周军队南下，首先要渡过淮河和突破南唐在淮河南岸寿、濠、泗、楚诸州设置的防御阵地。周世宗不分散使用兵力，不同时进攻南唐靠近淮河南岸的所有城市，始终主攻战略要地寿州。周世宗及时纠正后周军将进攻寿州的畏难情绪，又不顾南唐寿州城内军队的多次反扑以及天时地利等不利因素，坚持围攻寿州一年多，歼灭了南唐大批援军，从而促使南唐寿州守将被迫投降。南唐寿州失陷之后，在淮河南岸的整个防御体系基本上解体，军心更加动摇，统治集团内部惶恐不安，唐元宗唯有献地求和的一条出路。

第二，采用多种作战形式，歼灭大批南唐军。周世宗指挥征讨南唐之战，善于运用围城、打援、追击、迫降、诱降等多种形式，达到歼敌的目的。如周军在围攻寿州的同时，及时主动出击，先后歼灭南唐刘彦贞、李景达的大批援军，还分别进攻淮南一些州县歼灭敌军。当敌人战败逃跑，周世宗又抓紧时机组织多路兵马穷追猛打，不让逃敌跑掉。世宗还亲自率军，兵临城下，迫使南唐军大量投降。由于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多种作战形式，后周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连连取胜，使南唐军大批伤亡，或战败归降。

第三，联合南方诸国共同作战，使南唐四面受敌。周世宗对

南唐作战，还主动联合吴越钱弘俶、楚国旧将王逵、荆南高保融，指使他们从多方向对南唐出击。南唐企图依靠辽国军队打破以后周为首的军事包围，并骚扰周朝的后方，但辽国拒不出兵，更使南唐在政治上、军事上陷于空前孤立，穷于应付，极为被动。

南唐方面：南唐占有长江中下游大片地区，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特别是南唐的水军使后周在作战初期难以匹敌。南唐如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各方面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实行积极防御，有可能将后周军队阻止于淮河以北。但是，南唐沿淮河南岸寿、濠、泗、楚诸州都是孤军作战，未能与南唐前来增援的军队协调配合，统一行动。各州之间也没有密切的联系。水军优势亦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南唐方面从作战开始就缺乏有力的统一指挥，各自单独作战，陷入消极被动的单纯防御之中，结果被后周军分别击破，以至失败。

第六节 北攻契丹、北汉之战， 赵匡胤代周建宋

一、后周征服南唐后的北伐准备

契丹与北汉相互联络，多次进犯后周。广顺元年（辽国应历年，951年），契丹军5万人会同北汉军进攻晋州。广顺二年（辽国应历二年，952年），契丹军队进入冀州，俘掠丁壮数百人。显德元年（辽国应历四年，954年），契丹六七万步骑与北汉军一道南进，败于高平。显德四年（辽国应历七年，957年），世宗出征淮南，契丹南京留守萧思温领万余骑攻下后周北面沿边州县。契丹还多次与南唐密谋，准备对后周采取共同行动。契丹频繁的军事进犯活动，严重干扰周世宗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并直接威胁中原地区的安全。

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四月二十一日自淮南返回大梁，按

照早已制定的统一全国的用兵方略，着手北伐契丹与北汉，主要有以下准备：

（一）四月二十一日，派澶州节度使张永德领步骑 2 万北上守边。五月，后周成德节度使郭崇出兵攻占契丹所属束城县（今河北河间东北）。六月二日，昭义节度使李筠奏报出击北汉石会关，拔六寨。五日，晋州奏攻克北汉孝义县（今属山西）。显德六年（959 年）三月十九日，命义武节度使孙行友守卫定州西山路。周世宗这些军事行动，或加强防御，或主动进攻，不仅显示出后周的强大军事力量，也对契丹、北汉军产生了威慑作用。

（二）后周连年征战，军需衣粮的开支急剧增加。为保证北伐作战的物资需要，周世宗十分赞赏唐人元稹关于按现有田亩征取两税的作法，显德五年（958 年）十月，命左散骑常侍艾颍等 34 人分赴各州检定民租。次年春天，诸道使臣回到大梁，共查实后周统治地区内有 230.9812 万户，垦田 108.5834 万顷，淮南州县、人户尚不在内。全国统一按实有田亩征收赋税，即使是豪贵显族也不得减免，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得到调整和削减。这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并支援北伐战争起到了一定作用。周世宗还疏通河渠，发展漕运，建立以大梁为中心的水上交通网，江淮、河南、山东各地的物资都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梁，“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①，及时供应北伐军队的物资需要。

周世宗完成上述准备后，很快登上了北伐的征途。

二、周世宗亲征，收复燕南失地

显德六年（959 年）三月十九日，世宗诏令北征，收复被契丹占领的失地。二十二日，命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与军将高怀德、张铎领水陆军先赴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率

① 《旧五代史》卷一九，《周世宗纪》。

龙捷、虎捷、骁武等亲军先赴大名（今属河北）。二十九日，世宗从大梁出发北上。四月十五日，韩通奏自沧州修水道进入契丹境内，筑栅于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南，修补堤防，开凿河流进出口36处，可通航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雄县南）。十六日，世宗抵沧州，当天率步骑数万奔赴契丹境内。十七日，到达乾宁军，契丹宁州刺史王洪开城投降。二十日，世宗分水陆两路并进，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二十二日，世宗乘龙舟北进，舳舻相连，长达数十里。二十四日，到独流口（今天津静海县西），再沿河道西行。二十六日，世宗到达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契丹守关将终廷辉投降。再往西走，水道狭隘，巨船不能航行。二十七日，世宗沿陆路西进，宿营野外，警卫战士不足500人。契丹骑兵从附近通过也不敢逼近。二十八日，周世宗、赵匡胤进入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契丹守将姚内斌降。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瀛州刺史高彦晖均先后投降。

五月二日，周世宗召集诸将商讨攻打幽州。不少将领认为周军离开京师大梁42天，收复瓦桥关以南全部土地，功劳很大。但契丹骑兵都屯聚在幽州北部地区，周军不宜深入。世宗对这些议论很不高兴。他当即指示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首先出发，占领固安县（今属河北）。世宗当天赶到安阳水，命令架设桥梁，准备继续前进。但世宗不幸患病，被迫停止进军。五月四日，义武节度使孙行友奏拔易州，俘契丹刺史李在钦。五日，世宗以瓦桥关置雄州，益津关置霸州，征发丁夫修建霸州城，派军将韩令坤、陈思让分别领兵镇守。

周世宗北伐仅仅一个多月，收复宁（今河北青县）、莫、瀛、易4州，17县，1.836万户^①。周军在北伐中兵不血刃，有征无战，契丹州县望风投降。究其原因，周世宗即位后，战高平，讨西蜀，取淮南，军威雄盛，远近闻名，对契丹所统治的河北沿边州县产

^① 收复17县1.836万户系宁、莫、瀛三州所属，不包括易州属县及户数。

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河北州县百姓遭到契丹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迫切希望摆脱民族压迫，实现国家统一。周军到达瓦桥关，当地百姓纷纷献牛酒，热情欢迎。此外，周世宗进军迅速，出敌不意，也是迫使敌人迅速投降的原因之一。

三、百井之战及后周的灭亡

周世宗北伐开始，对于北汉骚扰后周的活动也特别作了防范。当周军占领瓦桥关并即将进攻幽州时，契丹使者一日驰程 700 里，紧急赶到太原，要北汉帝刘承钧出兵后周边境，牵制后周军队。显德六年（959 年）五月六日，世宗命先锋都指挥使李重进领兵出土门（即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县东北），主动出击北汉。二十五日，李重进大败北汉军于百井（今山西太原北），杀敌二千余人。几天后，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进攻辽州，俘北汉刺史张不（一作张丕旦）及兵士二百余人。

世宗患病后，再无力继续指挥作战。五月八日从雄州动身，三十日返回大梁。他自知病入沉疴，将不久于人世，遂着手布置后事。世宗立符氏为皇后，封长子宗训为梁王，次子宗让为燕国公。命枢密使魏仁浦兼宰相，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充枢密使，宰相王溥、范质参知枢密院事。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升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宰相。后周北征时，曾谣传“点检作天子”，周太祖郭威女婿张永德任镇宁节度使、殿前都点检，世宗很不放心，免去他的军职，改任宰相。另提拔赵匡胤充殿前都点检，掌管亲兵。世宗有意增加宰相、枢密使的人数，利用心腹大臣掌管政务和军事机密，企图共同维系他去世以后的周朝政权。

显德六年（959 年）六月，周世宗病死，由 7 岁儿子宗训继承帝位。次年春，后周禁军最高将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借口北汉联合契丹入犯，率领大军北上防御。赵匡胤到达大梁北郊的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 20 里），发起兵变，黄袍加身，兵士高呼万岁，拥立为皇帝。赵匡胤返回大梁，由于掌握了精锐禁军，侍卫亲军

副都指挥使韩通企图抗御，旋即被杀，年幼的周恭帝宗训和宰相范质更毫无抵抗能力。赵匡胤很快取代后周，建立赵宋王朝。

第九章 统帅的军事艺术与名将事略

第一节 军事艺术

一、李存勖的用兵谋略

李存勖是唐末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的长子。开平二年（908年）李克用死，李存勖袭王位，肩负河东节度使、全军统帅的重任，亲自指挥晋军与其他一些藩镇军队对后梁作战。在长达十几年的战争中，李存勖善于团结周德威、李嗣昭、李嗣源、李存审、张承业、郭崇韬等文臣武将，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果断地作出战略决策。他具备非凡的勇气和胆略，临危不惧，多次指挥千军万马深入敌阵，打击敌人。李存勖和周世宗柴荣一样，都不愧为我国五代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家。考察李存勖一生的战争实践，他的用兵谋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彼知己，果断决策

开平四年（910年）柏乡之战是李存勖进军河北的第一场大战。这时，朱全忠已兼并河北地区魏博镇（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又借口抵御幽州刘守光南犯，出兵成德（治镇州，今河北正定）、义武（治定州，今属河北）两镇。成德节度使要求李存勖发兵援助。李存勖召集将吏商议对策，不少人认为成德节度使王镕长期臣服朱全忠，称藩纳贿，结为婚姻，现在要求我们出兵，必是奸诈，不可轻信^①。李存勖为了统一大家的认识，首先指出成德镇在唐朝或臣或叛，岂肯长期臣服于朱全忠。接着透彻分析了幽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梁太祖开平四年。

州刘守光坐握胜兵逼近成德镇东境，我们又在成德镇西面训练军队，成德镇南面距离后梁不远，所以要求同我们结盟，以保卫成德镇的安全。我们若不出兵援救，正合朱全忠的计谋。李存勖十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知彼知己，从而作出“师出井陉，破贼必矣”^①的重大决策。假若河东当时不肯出兵，让朱全忠乘机兼并成德镇，再北灭卢龙，将对河东道造成很大的威胁。后来李存勖攻占幽州（今北京市西南）、进军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奇袭汴州（今河南开封），都表明他善于掌握战场上的复杂情况，以敏锐的观察力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战机，及时采取果断的措施，因而不断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

（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李存勖用兵作战有两大困难：一是兵力严重不足，二是战线较长，除强敌后梁外，还有契丹及河北部分藩镇（如幽州刘守光、成德张文礼）的骚扰。因而李存勖十分强调集中兵力，打好每一次重大战争。柏乡之战胜利不久，晋军面临南北两面作战，北有刘守光的南下，南有朱全忠的北上。鉴于刘守光实力较弱，李存勖先集中大军对付刘守光，命名将周德威领军北上攻打幽州。周德威奏报兵力不足，李存勖又加派李存审率吐谷浑、契苾兵前往参战，结果俘刘守光于幽州城内。

贞明三年（917年），契丹贵族阿保机领30万大军南攻幽州，周德威固守城内，十分危急。晋军主力这时在黄河中下游沿线与后梁交战，如幽州失陷，契丹进一步南犯，则晋军会遭到腹背受敌的危险。晋王李存勖从全局出发，果断地抽调李嗣源、李存审、阎宝三员大将率7万步骑兵北上，终于赶走契丹军，保住了北疆重镇幽州。然后再回师南下，尽全力发动争夺黄河沿线重要渡口杨刘之战。李存勖根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分清影响全局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集中兵力，各个破敌，收到了显著成效。

^① 《册府元龟》卷五七，《帝王部·英断》。

(三) 委以全权，临机应变

李存勖灭梁之战，对所属将领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让他们根据战场上的复杂情况，临机应变，充分发挥众将领指挥作战的主观能动性。乾化二年（912年），河东军队几乎全部集中在幽州作战，留大将李存审、史建瑭领3000骑兵戍守赵州（今河北赵县）。朱全忠出动大军分两路北进枣强（今河北枣强东）和蓚县（今河北景县）。晋将李存审、史建瑭鉴于李存勖将军队主力投入幽州战场，难以分兵南下，他们自己决定将屯驻赵州的晋军打入梁军营垒，纵火大噪，左右冲突，迫使朱全忠匆忙败退。贞明元年（915年），晋将周德威坐镇幽州，得知梁将刘鄩自魏县（今河北魏县西南）西行偷袭太原（今山西太原南），主动率领1000骑兵前往驰援。因刘鄩半途撤退河北，周德威又回师抢占河北储粮重地临清（今河北临西），给梁军造成严重威胁。这表明晋将李存审、史建瑭、周德威在外执行军事任务，不必事事请示晋王李存勖，自己有权指挥军队对后梁作战。与此相反，梁末帝及其亲信大臣深怕统兵将领拥兵自重，想方设法剥夺和箝制前方将领们的机动指挥权，导致刘鄩、王彦章的失败。

(四) 指挥骑兵，迂回突击

李存勖军队虽比后梁少很多，但特别重视骑兵队伍的建设。由一批刚强剽悍、娴于骑射的沙陀人与太原附近的北方边民所组成的骑军，兵强马壮，士卒精整，战斗力很强。周德威、李嗣源、李嗣昭、史建瑭都是长于运用精骑的著名将领，充分发挥骑军快速、突击、机动的强大威力，多次指挥轻骑破坏梁军的军需供应，引诱梁军脱离坚固阵地出战，并伺机派骑兵远程奔袭，深入敌人的心腹地带，以铁骑向敌阵发起强大的进攻，或追击战败溃逃的梁军。特别是龙德二年（922年）契丹大举南犯，晋军一度产生畏敌情绪，士气低落，李存勖亲率铁骑奋击，迫使敌人落荒而逃，敌伤亡惨重。

(五) 出敌不意，突然奔袭

李存勖自开平二年（908年）潞州之战起，与后梁连年作战，

或攻打城池，或战斗于平原旷野，一般多是双方军队的正面交战。李存勖歼灭了大批梁军，夺取了河北地区这一战略要地。但在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建国前夕，后梁仍有相当数量的兵力凭借黄河沿线渡口据守，甚至攻占相州（今河南安阳），直接威胁魏州的安全。双方仍处于胜败难分的胶着状态。同光元年闰四月，李存勖根据后梁郓州降将提供的信息，得知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城内驻兵很少，果断地派李嗣源领步骑5000人渡黄河南下，直奔郓州，大获全胜。晋军进入中原腹地，后梁朝廷慌作一团，急忙调兵遣将，但军队主力已部署在黄河前线，京师汴州（今河南开封）防务薄弱。李存勖鉴于这种情况，用部分兵力固守黄河沿线南北要地，牵制梁军，亲率精兵向汴州发动突然袭击，直取大梁，灭亡梁国。后梁派往黄河前线的几万大军也不战而降。李存勖（后唐庄宗）这样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的作战谋略，为结束梁、晋两大军事集团的战争最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李存勖灭梁之战，虽出现过轻佻、骄傲、决策不当的一些失误，但他不畏强敌，勇敢、果断、沉着，运用上述军事谋略屡建战功，不愧为五代时期少数民族出身的一位著名军事家。他的卓越军事才能受到当时以及后代人的赞扬。朱全忠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指李存勖——引者），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①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称颂李存勖善于作战，“知用兵之术”^②，“故能以弱晋胜强梁”^③。至于李存勖迁都洛阳后，治国无道，以致身亡名裂，则是他登上帝位宝座后享乐奢逸、骄淫乱政的结果，而非军事谋略和用兵之术的问题。

二、郭崇韬的用兵谋略

郭崇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先后事晋王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梁太祖开平二年。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周世宗显德六年。

李克用、李存勖，任河东教练使、中门使。崇韬随同李存勖征战各地，掌管机要，深受重用。李存勖建立后唐，郭崇韬担任枢密使、兵部尚书、侍中、成德军节度使等要职，在后唐灭后梁、灭前蜀作战中，出谋划策，所立佐命之功居诸将之上，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郭崇韬用兵谋略的主要特点是“临事机警”^①，在出兵作战的关键时刻，能够透彻地分析了解敌军用兵的意图，大胆提出新的作战方案，开辟新战场；或分散敌人的兵力，使自身转危为安；或出敌不意地将利刃插入敌人的心脏，大获全胜。

同光元年（923年），梁、晋争夺黄河渡口之战，久拖不决，相持不下。后梁派名将王彦章代戴思远为北面招讨使，出兵攻占黄河沿岸德胜（今河南清丰西南）、潘张、麻家口、景店诸寨，又以重兵急攻杨刘镇（今山东东阿东北）。后唐庄宗引兵驰援，被阻在后梁阵地之外，无法解杨刘之围。与此同时，后唐大将李嗣源占领郓州后，与唐庄宗失去联系，处境十分不利。唐庄宗面对这些困难，一时计无所出，郭崇韬献计说：梁将王彦章围后唐军于杨刘，企图阻止唐军从杨刘渡黄河南下，让已经占领郓州的李嗣源得不到任何支援，彻底孤立，以便梁军伺机收复郓州，消除后梁的腹心之患。针对这些情况，郭崇韬既不要求驰援杨刘，也不忙于救助郓州，却提出开辟新战场的作战方案：“臣愿得兵数千，据河下流，筑垒于必争之地，以应郓州为名，彦章必来争，既分其兵，可以图也。”^② 战争发展的进程果不出郭崇韬所预料。王彦章得知郭崇韬在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马家口新筑城垒，随即领兵前往进攻，遭到郭崇韬的阻击，损失惨重。王彦章再回师杨刘，又遇到迎击，被迫退走。这次战斗不仅解除了杨刘之围，还恢复了唐庄宗与郓州李嗣源的联系。唐庄宗后来发布诏书说：“潜通河

① 《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

② 《新五代史》卷二四，《郭崇韬传》。

口，贡谋占必济之津，人所不知，惟卿合意”^①，高度评价了郭崇韬为这次作战出谋划策的功绩。

此后不久，唐庄宗争霸事业仍面临着严重困难。后梁以段凝代王彦章为招讨使，领大军渡河北上，不断进掠澶州（今河南清丰西）、相州地区。后唐军粮供应困难。大将李嗣源继续被围困在郓州。后唐一些官将要求休战罢兵，以黄河为界，与后梁分而治之。郭崇韬不盲目随从，他分析后梁的作战意图是：一方面由梁将段凝统大军渡河北上，并决开河堤凭险据守，阻止唐军南渡；另由王彦章乘机收复郓州。他接着请求唐庄宗亲率六军，直趋大梁，汴州城内兵少力薄，必将望风溃败。只要梁末帝首先投降，后梁军将都会不战而降，半月之间，天下可以统一。庄宗采纳了郭崇韬这一避实就虚、偷袭汴州的用兵谋略，果然一举占领汴州，结束了梁、唐双方争霸中原的长达十余年的战争。

同光三年（925年），后唐讨伐前蜀，唐庄宗以魏王李继岌为行营都统，郭崇韬任招讨使。李继岌年纪轻，从未打过仗，“其招怀制置，官吏补置，师行筹画，军书告谕，皆出于崇韬”^②。郭崇韬实际上是出征前蜀的军事统帅。他根据前蜀内部君臣上下人心涣散，毫无斗志，以及蜀道山川险阻的地理条件，大胆地采用长驱直入、速战速决的作战方略，命唐军急速向前挺进，一面攻占城池，歼灭敌人；一面夺取粮食，供应后唐军队需要，迫使前蜀王衍迅速归降。

前蜀灭亡后，后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后唐出使西川的宦官们恶毒攻击郭崇韬，唐庄宗、刘皇后、李继岌也对他猜疑嫉忌，竟杀死郭崇韬于成都，连他的五个儿子都不免于难。

① 《全唐文》卷一〇三，《允郭崇韬再让节镇手诏》。

② 《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

三、柴荣的用兵谋略

柴荣，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善骑射，略通书史，被郭威收为养子。郭威出任后汉枢密使，授柴荣左监门卫大将军；及移镇邺都，柴荣又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掌管亲兵。郭威称帝，拜柴荣镇宁军节度使，镇守澶州，后入朝授开封尹，封为晋王。郭威病卒，柴荣于显德元年（954年）正月称帝，史称周世宗。

周世宗即位后，一方面在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各个领域大力推行改革，增强国家实力；一方面有步骤地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抗北汉，讨西蜀，征南唐，进军河北。周世宗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军事行动，使后周在财力、人力、兵力各方面已占有压倒群雄的绝对优势，为统一全国大业铺平了道路。他用兵谋略主要有：

（一）制定稳妥可靠的战略方针

后周统治中原，面临契丹、北汉、后蜀、南唐各国包围的复杂形势。柴荣针对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接受王朴《平边策》中的合理因素，亲自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再由北往南的统一全国的方略。他先讨后蜀，继征南唐，再出军河北，并抗击北汉的侵扰，兵力集中，目标明确，而敌人始终无法联合起来，被迫挨打。后周士气高昂，越战越强，连契丹军也望风丧胆。倘柴荣不病重早逝，全国统一的重任将由柴荣来完成，决不会落到赵匡胤的手中。柴荣所制定的统一全国的用兵方略，稳妥慎重，积极可行，是指导后周出兵不断取胜的重要原因。

（二）确定主要进攻目标，夺取全局胜利

柴荣三征南唐之战，是南征北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柴荣一开始就不敢于啃硬骨头，确定以淮南军事重镇寿州为主要目标，坚决发起进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周军围攻寿州，长期久攻不下，而且遭到不小的伤亡。南唐大军增援，迫近寿州城外，周军更面临着内外夹击的危险。但柴荣坚持围攻寿州，

决不动摇，结果获得两大明显的成效：第一，周军攻打寿州，南唐以大军声援，十几万精锐之师被歼在寿州附近或淮南一些地区，再无力应战；第二，周军攻下战略要地寿州，掌握了淮南战场的主动权，破坏了南唐的整个防御体系，南唐朝野上下悲观失望，唐元宗只有献地求和的一条出路。这充分显示出周世宗高超的指挥艺术。

（三）运用军事进攻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的手段

柴荣为削平各地割据政权，促进国家的统一，主要靠发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又不失时机利用政治招降的手段。

后周对南唐作战期间，双方使者仍来往不断。显德三年（956年）初，后周攻寿州取得一些胜利，南唐朝廷先后三次派使者献上金银、绢帛、茶、药，并表示愿意割让淮河南岸的寿、濠（今安徽凤阳东北）、泗（今江苏盱眙北）、楚（今江苏淮安东）、光（今河南潢川）、海（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等6州，请求柴荣停战罢兵，谋求两国和好。柴荣虽未同意，但仍派供奉官安弘道与南唐使者李德明一道同赴金陵，继续商谈。柴荣分别赐唐元宗与南唐将领诏书，重申后周出征南唐的决心：“苟能不能恢复内地，申画边疆，便议班旋，真同戏剧”^①，要求两国划长江为界，敦促南唐政府从速商议，尽快作出答复。由于唐元宗不肯割让江北14州，双方谈判没有取得成功。但柴荣政治招抚的策略促使南唐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李德明被唐元宗杀死。柴荣接着将招抚目标从南唐朝廷转移到南唐地方州县官将，下诏宣布，凡能认清时机归顺后周朝廷者，原官爵一切依旧，愿回江南者听其自便^②。给南唐降将许文稹以下1.05万人分别颁赐物品，对其中一些人授予官职。在此之后，南唐寿州刘仁瞻、濠州郭廷谓、泗州范再遇、涟水县崔万迪、雄州易文贊等人，在后周军队强大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下，深感势孤力穷，纷纷归降。柴荣运用军事进攻与政治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一六，《周世宗纪》。

② 《全唐文》卷一二六，《平淮南德音》。

招降结合的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加速了淮南之战的胜利结束。

（四）抓紧时机，用兵神速

兵贵神速是我国古代军事家用兵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周世宗离开本国境内向邻国发起进攻，军队长途跋涉，军需器械、粮刍远程运输，更需要迅速地解决战斗。不然，战争久拖不决，粮刍供应困难，士兵斗志懈怠，将会出现严重的不利后果。因而柴荣南征北战，高度重视抓紧时机、用兵神速的原则，且看以下的事实。

显德元年（954年）三月，北汉刘崇军队南下，柴荣当月十一日从开封（今属河南）出发，十八日到泽州（今山西晋城），第二天高平之战胜利结束，前后只用9天时间。

显德二年（955年），柴荣第一次南征淮南，正月八日离开开封，二十二日抵寿州城下，当即督促诸军攻打寿州。显德四年（957年），柴荣第二次南征，二月十七日离开开封，三月二日抵寿州城下，次日即在紫金山南大败南唐援军。

显德四年（957年），柴荣第三次南征，十月十九日离开开封，十一月四日抵镇淮军（置于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北），天未亮渡过淮河，次日亲自率军进攻濠州。

在古代交通工具落后的条件下，柴荣亲征一般有大军随行和运输辎重的队伍，平均每天行程六七十里，速度是相当快的。柴荣到达目的地后，抓紧时机，即令部队投入战斗，常使敌方措手不及，陷于被动。

柴荣对后蜀、南唐作战取胜后，实力大为增强，立即着手北伐准备，一方面派澶州节度使张永德领兵2万北上防御契丹，一方面疏通以开封为中心的河渠交通，发展漕运，急忙筹备北伐战争的军需物资。显德六年（959年）三月，柴荣率大军北上，经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向契丹统治区进发。柴荣进军迅速，出敌不意，自离开汴州的四十多天内，契丹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宁州（今河北青县）、莫州（今河北雄县南）、瀛州（今河北河间）等地守将望风归降。周世宗正准备向幽

州进发，因患重病被迫停止北伐，返回开封。

（五）充分发挥军事统帅的表率作用

柴荣以唐朝著名君主唐太宗为榜样，要“亲当矢石为人除害”^①，并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柴荣不辞劳苦，不怕伤亡，长期鏖战在河东、淮南、河北的战场上，常亲临战斗的第一线。高平之战，后周有些军将临阵脱逃，千余步兵投降北汉。在此紧急关头，柴荣不顾个人安危，冒矢石督战，全军士气顿时大振，奋勇杀敌，取得大胜。对南唐作战，柴荣三下淮南，直接组织大军攻打寿州、濠州、泗州、楚州。他亲自涉水过河进攻濠州附近的水寨，与兵士们一起露宿楚州城外，日以继夜攻击敌军。当南唐军队自寿州附近撤退逃跑时，柴荣又指挥步、骑、水军分头进击，歼灭大量敌人。柴荣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率部冲锋陷阵，使后周军队焕发出英勇作战的进取精神，成为克敌制胜的强大力量。《资治通鉴》卷二九四称，“及（柴荣）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军，号令严明，人莫敢犯，攻城对敌，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动容；应机决策，出人意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肯评论。

第二节 名将事略

一、“好兵略、涉猎史传”的刘鄩

刘鄩，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祖绶，密州户掾；父融，安丘县令。刘鄩从青年时起就怀有大志，爱好学习《六韬》等兵书，读过一些史传。唐朝末年，刘鄩在青州节度使王敬武、王师范手下当小校，因军功升为登州、淄州刺史，青州节度使行军司马。唐末天复元年（901年），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攻打凤翔（今属陕

^① 《册府元龟》卷一一一，《帝王部·宴享三》。

西），所管河南州郡防守空虚。天复三年（903年）正月，青州节度使王师范分别出兵袭击河南、关中一些州郡，各路兵马纷纷失败，唯独刘鄩袭取兗州（今属山东）获胜。刘鄩先派出间谍扮成卖油商贩，进入兗州城内侦探敌军进出兗州的交通道路。然后根据间谍们提供的情报，刘鄩亲自带领500步兵于夜晚从兗州罗城下面一条水窦进入城内，“一夕而定，军城晏然，市民无扰”^①。刘鄩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而进入兗州，充分表明他善于出敌不意，采用巧妙的偷袭战法打击敌人。刘鄩后来镇守兗州，多次击退梁军的进犯。但终因青州节度使王师范力屈投降，刘鄩孤立无援，也被迫归降。朱全忠对刘鄩非常器重，授他为元从都押牙。刘鄩以降将身份而独居朱全忠旧将之上，实属罕见。

开平三年（909年），后梁太祖授刘鄩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掌管朝廷禁军。当年夏天，后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归附凤翔李茂贞，袭据长安（今陕西西安），并派兵把守潼关（今陕西潼关县东北）。后梁太祖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与刘鄩领兵征讨。潼关南靠华山，北阻黄河，系河南、山西、陕西之间的重要关隘。后梁大军能否顺利通过潼关是讨伐刘知俊能否取胜的关键。刘鄩到达潼关东不远，俘刘知俊在潼关外所置伏兵蔺如海等30人，将他们权作前往潼关的向导。这时，后梁右保胜指挥使、刘知俊弟刘知浣要求经潼关进入关中，潼关守吏开关门让其通过。蔺如海等人尾随来到关下，潼关守吏不了解他们已经被俘，也打开关门允许入关。刘鄩抓住时机，“乘门开直进，遂克潼关”^②，杀刘知浣，迫使刘知俊逃至凤翔。后梁以刘鄩为永平军节度使，镇守长安，为稳定关中地区的局势作出了贡献。开平四年（910年），后梁加刘鄩检校太保、同平章事。

贞明元年（915年），晋王李存勖乘魏州兵变的机会抢占魏州，后梁开封尹刘鄩领6万大军北上防御。刘鄩屯军魏县，见河东军

① 《旧五代史》卷二三，《刘鄩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梁太祖开平三年。

队尽在魏州一带，太原防务空虚，决定用奇兵袭击太原，再回师占领河北。刘鄩为了不让晋军发觉，临出发前故意“结葛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数日，晋人方觉”^①，急派兵追赶。后因途中阴雨连绵，道路受阻，梁军病死甚多，刘鄩被迫班师，屯军莘县（今属山东）。刘鄩偷袭太原虽未取得成功，但在当时仍不失为打击晋方的良策。

刘鄩回师莘县，见晋军来势凶猛，实力强盛，又急于寻找梁军决战，所以准备长期坚守莘县，伺机歼敌。刘鄩上梁末帝书说，用兵作战，贵在“临机制变，安可预谋”^②。他根据战场敌我双方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改变自己的作战部署，充分体现了“临机制变”的军事思想。但梁末帝不懂军事，胡乱指挥，一再批评刘鄩胆怯畏敌，强迫刘鄩出战。刘鄩被迫仓促出军，大败而归，贬官为亳州团练使。

贞明四年（918年）八月，兗州节度使张万进见晋军在河北战场不断取胜，叛梁附晋。梁末帝派刘鄩为兗州安抚制置使，出兵征讨。经过一年多的围困，张万进得不到晋方的援助，处境危急，其小将邢师遇暗中投降，开城门迎接梁军。刘鄩遂进入兗州，杀张万进。刘鄩先后两次进攻兗州，第一次在天复三年（903年），正是朱全忠势力席卷河南、进军关中的迅速发展的时期，所以刘鄩避开锋锐，采用偷袭兗州的策略而取得成功。第二次，贞明四年（918年）进攻兗州，后梁已在河北战场连连失利。后梁兗州节度使张万进这时归附晋方，但与晋王李存勣屯军黄河渡口一带相距甚远，因而刘鄩决定长期围困兗州，也取得重大胜利。刘鄩两攻兗州，依据客观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对策，这正是他认为用兵作战贵在“临机制变”的充分体现。

贞明六年（920年），刘鄩出兵讨伐河中朱友谦，被晋军击败。后梁大臣尹皓、段凝诬告刘鄩逗留养寇，作战不力，被后梁朝廷勒令回师洛阳后被毒死，时年64岁。

①② 《旧五代史》卷二三，《刘鄩传》。

刘鄩是后梁的著名将领，一生用兵作战，被晋王李存勣誉为“一步百计”，“长于袭人”^①。他善于出奇兵，运用暗袭、奇袭的作战手段取胜，第一次取兗州和后来克潼关，都是暗袭敌人的典型战例。但他与晋军交战，多方受到后梁朝廷的掣肘，难以施展他的军事才能，终遭失败，饮恨终身。

二、“勇而多智”的周德威

周德威，字镇远，小名阳五，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东）人，骁勇善射，胆略超群，曾长期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当兵戍边。周德威先在晋王李克用手下当骑将，后跟随晋王李存勣在河北地区长期征战，官至内外蕃汉马步总管、幽州节度使，最后战死于疆场。

唐末天祐三年（906年），周德威、李嗣昭奉晋王李克用之命攻潞州（今山西长治），降后梁昭义节度使丁会。次年，后梁出动10万大军长期围困晋方昭义节度使李嗣昭于潞州城内。晋王命周德威为行营军事统帅，前往解围。面对敌人强大的军事力量，周德威不急于与敌军硬拼，而采取削弱敌人、伺机进攻的作战方针。周德威利用晋骑军快速机动的强大威力，一方面派出少数精骑不断破坏敌人运输刍粮的通道，一方面出动骑军进攻梁军在潞州城外兴筑的夹寨，“倒墙埋堑，日数十战，前后俘馘不可胜计”^②。在潞州城外的梁军遭到潞州城内李嗣昭与前来解围的周德威的内外夹击，兵士伤亡很多，不得不困守阵地，闭壁不出。梁太祖几次撤换统兵主帅，也无法摆脱潞州城外梁军被动挨打的困境。最后，在晋王李存勣亲自指挥下，周德威、李嗣昭分道向梁军进攻，大获全胜。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均王贞明元年。

② 《旧五代史》卷五六，《周德威传》。

在潞州战役结束之前，晋王李克用病卒，儿子李存勖袭王位。这时，周德威统领河东重兵在外，太原城内人心浮动，惴惴不安。周德威奉李存勖召见之命，立即引军返回，留兵太原城下，只身徒步入城，恭礼谒见晋王。周德威以自己实际行动很快消除了河东官将们的疑虑，稳定了政局。周德威顾全大局，以全局利益为重，对晋王忠心耿耿，还主动搞好与其他将领的团结，表现出封建时代军事将领的可贵品质。这在五代时期军阀势力嚣张一时的时代，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开平四年（910年）柏乡之战是梁、晋双方争夺河北的一场关键战役。当时，晋军营于柏乡（今属河北）附近的野河之北，梁军在野河之南，双方相距很近，战争一触即发。梁将王景仁企图凭借7万精兵，急于同晋军决战，抢先渡河歼灭晋军。晋王李存勖认为晋军自太原远来河北，又与义武、成德临时结盟，“利于速战”^①。周德威冷静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情况以及步骑兵作战的特点，提出了主动撤退、诱歼敌人的作战方针^②。他向晋王李存勖说，晋军作战主要靠骑兵的优势，骑兵只有在平原旷野地区才能充分发挥出快速机动的威力。倘攻打敌人营垒，则非骑兵之所长。他要求主动撤军至高邑（今属河北），引诱梁军离开营垒，一举歼之，必将获胜^③。晋王李存勖批准之后，晋军主动后撤。梁军倾巢而出，周德威又将梁军诱至高邑南面，待下午敌军饥饿难忍之时，周德威抓紧战机，突然发起攻击，骑军勇猛冲杀，大败梁军。这是五代时期利用骑军选择有利地形作战而获得胜利的典型战例，也是将敌军拖得疲惫不堪再伺机破敌的典型战例。周德威指导这次作战的谋略是柏乡之战取胜的根本原因。

乾化元年（911年），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在幽州称帝，出兵进犯与晋方结盟的义武节度使（治定州，今属河北）。周德威奉命率师3万，麾军北上攻打幽州。刘守光号称拥有雄兵30万，远远超

^{①③}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梁太祖开平四年。

^② 《百战奇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版，第32页。

过晋军。周德威很快进军幽州城下，围而不打，逐步攻占幽州节度使所属州县，还抽调部分兵力配合成德军阻击梁军北上。刘守光失去了幽州外围一些州县及军事要塞，孤守幽州城内，外无援兵，内缺粮草，两次突围都被晋军击退。周德威身为大将，经常与兵士们一起驰骋矢石之间，最后攻克幽州城，活捉刘守光。李存勖特任命周德威为幽州节度使。这是周德威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谋略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后来契丹出动 30 万军队围困幽州 200 多天，周德威一直坚守城内，终于配合李存审、李嗣源的援兵赶走契丹军。

贞明元年（915 年）魏州之战，梁大将刘鄩乘虚偷袭太原。周德威在幽州未得到晋王李存勖的命令，就主动领 1000 兵士前往阻截。当刘鄩受阻回师河北，周德威又跟踪追击，抢先占领储粮重城临清，挫败了刘鄩企图断绝晋军粮饷的计谋。《旧五代史》卷五六《周德威传》载，“是时德威若不至（临清），则胜负未可知也”，高度评价了周德威善于临机应变以击败敌人的功绩。

贞明四年（918 年），晋王李存勖率大军，决定直捣汴州，灭亡梁国。晋军进至胡柳陂地区与梁军接触。周德威先后两次劝李存勖慎重行事，要切实注意梁军的强大实力，暂时按兵勿战。他“请以骑兵扰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营垒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举灭也”^①。李存勖反而指责周德威害怕敌人，乃匆忙挑起大战，以致晋军丧失 2/3。周德威不幸在乱军中战死。

周德威一生征战，最擅于运用骑兵，出入驰突，变化莫测；临阵作战，善于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想方设法疲惫和消耗敌人，然后抓住战机夺取胜利。北宋史学家欧阳修评论周德威军事指挥艺术说：“德威老将，常务持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常伺敌之隙以取胜。”^② 这是符合周德威军事实践的精辟评论。周德威不愧为五代时期“勇而多智”的著名军事家，为开创后唐大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〇，梁均王贞明四年。

② 《新五代史》卷二五，《周德威传》。

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多智算”的李存审

李存审原名符存，字德祥，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人。父楚，本州牙将。符存“多智算”，爱好兵家之事^①，在唐朝末年纠集家乡地主豪强镇压义军。符存后来投奔唐朝光州刺史李罕之，又为河阳小校，多次击败蔡州秦宗权军队。李罕之为部将所逼，部下离散，符存被晋王李克用收为养子，随从征战，多立战功，任义儿军使，赐姓名李存审。

李存审平生经历大小百余战。乾化二年（912年），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在幽州被晋军围住。梁太祖朱全忠亲自北上援救，急攻蒲县。李存审这时任河东忻州刺史，屯戍赵州，主动向晋将史建瑭、李嗣肱提出设奇计破敌的方略。李存审率领部分兵士深入敌阵活捉俘虏，将其中数人放归，借以瓦解敌军的斗志。史建瑭、李嗣肱各将300骑兵扮成梁军，进入后梁军队阵地，弓矢乱发，左右冲杀。朱全忠误以为是晋王李存勖大军赶到，慌忙退走。这是李存审出奇兵发动突然袭击而以少胜多的重要战例。李存审因战功显赫，调任邢州团练使。

贞明元年（915年），晋王李存勖进占魏州。梁大将刘鄩偷袭太原失利，回师河北，营于莘县。李存审屯于莘县西面，日夜监视梁军。不久，刘鄩偷袭魏州，李存审当即率大军尾随追击，大败梁军。李存勖授他为安国节度使，后调任横海节度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贞明三年（917年），晋卢龙节度使周德威在幽州被契丹军重重包围，晋大将李存审、李嗣源、阎宝奉命领步骑7万向幽州进发。李存审鉴于契丹多骑兵、晋军多步兵的特点，提出避免在平

① 《旧五代史》卷五六，《符存审传》。

原地区与契丹交战的主张。他们经山间险道抵幽州前线。接近契丹军队时，李存审命步兵列阵于后，以羸兵燃烧柴草，施放烟雾，迷惑敌人视线。然后发动步兵直趋敌阵，大败契丹军，彻底解除了契丹对幽州的包围。李存审灵活用兵，创造了以步兵击败契丹骑军的重要战例。

贞明四年（918年），梁、晋杨刘之战后，梁大将贺瓌、谢彦章屯军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北面，坚壁不战。晋王李存勖急躁轻敌，几次领少量轻骑向敌营挑战，险遭不测。李存勖有次外出，李存审拦马哭谏，要求他多从统一中原的大业着想，不要轻易冒险出战。李存勖不得不勒马还营。后来李存勖得知李存审不在，快马加鞭，冲出营房，率领数百骑逼近梁军营地，梁将谢彦章以5000伏兵同时出击，包围李存勖。李存审及时率援兵赶到，梁兵退走。李存审对晋王李存勖一片忠诚，在战场上时时关注李存勖的安全，受到晋方全军上下的普遍赞扬。

贞明四年胡柳陂之战，晋大将周德威战死，李存审、李彦图父子力战，再败梁军于土山下，与李存勖会师。次年，李存审代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军总管。李存审攻取德胜寨，筑南北两城戍守，与敌军对垒经年，消灭了大批梁军，为后来晋军入汴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贞明六年（920年），后梁河中节度使宋友谦攻取同州（今陕西大荔），背梁降晋。梁大将刘鄩来攻，晋王李存勖派李存审、李嗣昭前往驰援。李存审鉴于梁军一贯轻视河中军的骄傲情绪，出敌不意，选精骑200与河中兵一起攻击刘鄩营垒，迫使梁军“自是不敢轻出”^①。晋将李嗣昭等人担心河中军有所反复，提出速决速战以早定胜负。李存审不肯赞同，坚持“缓师示弱，伺隙出奇”^②之计，按军不动。然后指挥军队出击，大败刘鄩，迫使梁军坚壁不战。李存审为避免晋军围歼敌人遭到重大伤亡，接着又采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一，梁均王贞明六年。

② 《新五代史》卷二五，《符存审传》。

取“开其归路，然后追奔”^① 的战术，有意派晋将王建及赴沙苑牧马，诱使梁军撤退时再次大败之。李存审指挥同州之战，灵活用兵，步步进逼，将后梁名将刘𬩽“若婴儿在人掌股之上”，^② 听其玩弄，是他军事指挥艺术充分发挥的表现。

龙德元年（921年），成德镇大将张文礼杀死节度使王鎔，自称留后。晋王李存勣亲自出征，接连丧失史建瑭、阎宝、李嗣昭、李存进四名将领。李存勣改派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北面招讨使，收复镇州，结束了战争，加李存审检校太傅、兼侍中。

后唐建国前夕，晋王李存勣命李存审为卢龙节度使。存审抱病赴任，坐镇北疆。同光二年（924年）五月病死于幽州。李存审一生用兵作战，巧用智谋，尽量避免过早与敌人展开决战，或派遣部分精兵潜入敌阵，或散布烟雾迷惑敌人，或通过险隘山道达到前线阵地，或放开部分阵地诱敌出逃，然后出敌不意，运用奇兵突然出袭，往往取得重大胜利。李存审和周德威都是后唐军功卓著的著名将领。

四、“雄武独夺”的李嗣源

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是沙陀族没有姓氏的部民，骁勇善射。他13岁在沙陀族首领李国昌军中服役，后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赐予姓名。唐末中和四年（884年），晋王李克用在汴州附近上源驿遭朱全忠围攻，李嗣源冒死救护，因而备受重用，令掌亲骑。河东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存信领兵征讨，多次失利，李克用派李嗣源为李存信副将，协同作战，屡获大胜。乾宁三年（896年），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击败李存信于莘县，李嗣源保护晋军回师太原。李克用特命嘉奖，赐李嗣源所属500骑号称“横冲都”，侍于帐下。

① 《旧五代史》卷五六，《符存审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七一，梁均王贞明六年，胡三省注文。

李嗣源又以“李横冲”之号而闻名于大河南北。

天复元年（901年），梁将氏叔琮领5万大军攻打太原，占领了河东所属州县。李克用困守太原城内，外无援兵，又遇上久雨不停，太原城墙多处倒塌。李克用在城内焦急不安，不思饮食。李嗣源、李嗣昭分兵四出，突攻汴军营垒，梁军退走。天复二年（902年），氏叔琮再次进攻太原，李克用打算弃城出逃。李嗣源、李嗣昭一道率敢死队日夜出城突袭梁营，擒其骁将游崑崙等，梁军失利，烧营退走。李嗣源先后两次为保护河东统治中心太原城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平二年（908年），晋王李存勖亲自援救潞州。晋军分兵三路，李嗣源负责攻打潞州东北角，指挥将士砍掉梁军布置的鹿角阵，背草填沟，抢先攻入梁军修建的夹城，大败梁军。

乾化元年（911年）柏乡之战，梁、晋两军刚刚交锋，李存勖有意激励李嗣源说，你见到梁朝骑军白马都、赤马都吗？他们队伍整齐雄壮，令人胆战心惊！李嗣源当即回答：他们的马军虚有其表，即将落入我们的马厩^①。李嗣源配合周德威、李存璋发起进攻，直犯后梁白马都，穷追猛打，直抵邢州（今河北邢台），俘获梁军不可胜计。柏乡之战结束后，李嗣源调任代州刺史。

贞明三年（918年），契丹阿保机围攻幽州，卢龙节度使周德威向晋王告急。李嗣源主动要求领5000骑为前锋去救援幽州。李存勖命李嗣源、李存审、阎宝率步骑7万出征。李嗣源担任前锋，沿途排除险阻，多次击退设防拦阻的契丹军，顺利到达幽州，与周德威会合。几年以后，晋王李存勖授李嗣源蕃汉马步副总管，升为晋军副统帅。

同光元年（923年），后唐与后梁在黄河两侧之战呈现着相互对峙的态势，继续作战面临着不少困难，后唐内部意见很不一致。唐庄宗询问能否袭击后梁郓州，将战火烧到后梁的心腹之地。李嗣源回答说：“今用兵岁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胜，大功何由

① 《旧五代史》卷三五，《唐明宗纪》。

可成！臣愿独当此役，必有以报。”^①李嗣源随即奉命带 5000 步骑渡过黄河，出敌不意，一举占领郓州。不久，大臣郭崇韬建议乘胜袭取汴州，也得到李嗣源的坚决支持。李嗣源分析说：后梁段凝领大军驻在黄河北侧，因河水阻隔，无法迅速赴援汴州。而郓州离汴州很近，“若昼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壘”，则汴州已为我有^②。并再次要求担任前锋，直趋汴州。唐庄宗批准了李嗣源的建议，以他为前锋，抢先攻入汴州，灭亡后梁。唐庄宗高兴地对李嗣源说，我有天下，得你英勇血战，当与你共有之^③，并授李嗣源中书令、蕃汉马步总管。

李嗣源先后随同李国昌、李克用、李存勖祖孙三代征战，将近半个世纪，军功卓著。唐庄宗进入洛阳后，由于李嗣源功高震主，庄宗产生猜疑，遂派人监视，君臣之间发生严重裂痕。同光四年（926 年）赵在礼据魏州反，因河南尹张全义等人的奏请，唐庄宗派李嗣源统兵征讨。李嗣源到达魏州，与乱兵联合起来，引兵南下，入洛阳称帝，是为明宗。唐明宗在位 7 年，比较大的战争有天成三年（928 年）王晏球讨定州王都，长兴元年（930 年）石敬瑭讨东、西川之战。但他这时 60 多岁，年事已高，无力披甲出征，只能在宫中遥控而已。长兴四年（933 年），李嗣源病死于洛阳。

李嗣源从普通的亲兵登上皇帝的宝座，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火与血的战争考验。梁、晋争霸的所有重大战场，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李嗣昭、周德威等名将相继战死后，李嗣源更肩负重任，成为唐庄宗主要依靠的高级军事将领。纵观李嗣源几十年的战争实践，他勇敢果断，多次担任前锋军将，为晋军开辟前进的道路；率领精骑冲锋陷阵，使敌军遭到重大伤亡；善于了解判断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况，伺机发起突然袭击，夺取重大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唐庄宗同光元年。

② 《旧五代史》卷三十，《唐庄宗纪》。

③ 《旧五代史》卷三五，《唐明宗纪》。

胜利。

五、临敌“必以身先”的郭威

郭威出生于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西），家境贫寒，18岁入潞州应募当兵。入伍之后，“多阅簿书，军志戎政，深穷繁肯”^①，又跟随李瓊学习兵书《阃外春秋》，深通兵法要义，为他后来统兵作战、治理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晋时，刘知远为侍卫亲军都虞候，郭威被置于左右，深受信任。刘知远调任河东节度使，郭威随同前往，任蕃汉兵马都孔目官，参与河东幕府军政机密。契丹灭亡后晋，郭威见契丹统治集团暴虐贪残，大失人心，劝刘知远及早称帝，夺取中原政权。当刘知远决定自太原南下进军汴州后，途经哪条路线，各种意见很不一致，郭威提出经晋州（今山西临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再进军洛阳、汴州，被刘知远采纳后，迅速进军到达大梁。这表明郭威胸怀韬略，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刘知远建立后汉，命郭威为枢密副使，与枢密使杨邠负责全国军旅大事。后汉高祖刘知远临终前，命郭威、史弘肇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皇子刘承祐。后汉隐帝即位，升郭威为枢密使。乾祐元年（948年），河中李守贞、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三道连衡叛乱，后汉派去平息叛乱的军事将领分别屯军潼关、同州、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和长安附近，各自为政，互相观望，师老无功。汉隐帝乃命郭威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统一指挥讨伐三个叛镇的战争。郭威这次作战的指挥艺术，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确定以河中李守贞为主要进攻方向。由于河中李守贞是三镇作乱的主帅，又富有作战经验，占领有利地形，在三镇连衡作乱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长安、凤翔两镇只不过是处于李守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纪》。

贞之下的从属地位。只要讨平了河中李守贞，削平长安、凤翔就迎刃而解。所以郭威将大军部署在河中战场，而且亲自指挥，始终抓住作战的主要方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同时也不放松对长安、凤翔的作战。第二，进攻河中、长安、凤翔，是一场攻打大城市的攻坚战。郭威不急于求成，采取长期围困、伺机歼敌的方针，坚决切断河中、长安、凤翔城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待敌兵疲粮尽，然后一举歼灭。郭威还很注意发挥军事统帅的表率作用，在河中前线“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赐与，微有伤痍者，亲为循抚”^①，激励了广大将士的高昂士气。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郭威夺取了平息三个叛镇的全面胜利，凯旋回朝。汉隐帝特别嘉奖，赐以金帛、玉带，加官检校太师兼侍中，大大提高了郭威在后汉朝廷中的威望。

乾祐二年（949年），契丹军攻掠河北，前锋到达魏博镇境内。汉隐帝派枢密使郭威镇守邺都，统领诸将防御契丹。乾祐三年，又任命郭威兼任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河北地区兵甲钱谷统一听从郭威的调动。不久，朝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汉隐帝与一伙亲信臣僚密谋杀死了大臣史弘肇、杨邠，并派人赴魏州谋害郭威。郭威随即以清君侧为名，自魏州南下，进入汴州，灭亡后汉，建立后周王朝。

郭威称帝后，大力推行改革，后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开始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为周世宗统一全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① 《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纪》。

后记

本书撰写提纲由军事科学院中国历代战略研究室张文才同志拟。1991年初稿写成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泽咸同志和张文才同志审阅了全书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谢国良、中国历代战略研究室原主任吴如嵩也给予了许多帮助，谨此深致谢忱。

此后，我在全书初稿的基础上对本书的结构、史料引用、文字叙述，特别是有关战争规律、特点的叙述，又作了多次修改。本书不当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方积六